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九卷

1889年12月—1895年8月

著 作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 目 录

前言 .....	1—19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	3—50
一 .....	5
二 .....	16
三 .....	27
*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 .....	51—54
今后怎样呢? .....	55—59
论反犹太主义 .....	60—62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 .....	63—65
《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 .....	66—73
伦敦的 5 月 4 日 .....	74—80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 .....	81—83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 .....	84—86
*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	87—91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	92—96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	97—104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	105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	106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	107—10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	109
致 G. 布卢默 .....	110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 和文件 .....	111—223
一 .....	115
二 .....	121
三 .....	127
四 .....	133
五 .....	137
六 .....	144
七 .....	150
文件 .....	163
一 被指控的引文 .....	163
第 1 号 成立宣言 .....	163
第 2 号 《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版 第 670—672 页 .....	165
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	168
第 3 号 控告。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杂志第 10 期 .....	168
第 4 号 马克思的答辩。187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 《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 .....	170
第 5 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杂 志第 27 期 .....	175
第 6 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72 年 8 月 7 日 《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	180

第 7 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1872 年 8 月 22 日《协和》杂志第 34 期	190
三	塞德利·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194
第 8 号	塞·泰勒的攻击。1883 年 11 月 29 日《泰晤士报》	194
第 9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1884 年 2 月《今日》月刊	195
第 10 号	塞·泰勒的反驳。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197
第 11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200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206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	206
第 13 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212
第 14 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215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议会报道摘录	219
第 16 号	格莱斯顿致信布伦坦诺。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第 49 期	221
第 17 号	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1891 年《新时代》第 13 期第 425 页	221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224—225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226—239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240—241
*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242—243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	244—245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 .....	246—25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 .....	256—257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 .....	258—27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 .....	272—276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	277—295
一 绪论共十段 .....	279
二 政治要求 .....	287
三 经济要求 .....	293
[第一部分的附件] .....	294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296—297
*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	298—301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	298
欧洲局势 .....	299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草稿片断 .....	302—303
致《人民之友》编辑部 .....	304—305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 .....	306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	307—30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 .....	309—310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	31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	312—326
德国的社会主义 .....	327—346
一 .....	330
二 .....	336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 .....	347—350

《共产党宣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 .....	351—354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	355—356
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 .....	35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 .....	358—386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	387
卡尔·肖莱马 .....	388—39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	392—408
*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 .....	409—410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	411—412
*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条目的 补充材料 .....	413
美国的总统选举 .....	414—417
马克思, 亨利希·卡尔 .....	418—428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	429—432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	433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	434—438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 .....	439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	440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	441—443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 .....	444—453
一 .....	444
二 .....	446
三 .....	449
1893 年五一节致奥地利工人 .....	454—455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	456—460

欧洲能否裁军? .....	461—494
序言 .....	463
一 .....	465
二 .....	468
三 .....	472
四 .....	477
五 .....	480
六 .....	484
七 .....	488
八 .....	491
1893 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	495—497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 回忆 1848 年的一件往事 .....	498
1893 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	499—500
尽管如此 1893 年五一节致法国工人 .....	501—502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	503—504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 致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 .....	505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 .....	506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	507
*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	508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	509—510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	511—527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 .....	528—531
* 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 .....	532—533
*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	534—539

---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	540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	541—542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	543—544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	545—576
一 .....	547
二 .....	554
三 .....	564
致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 .....	577—578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给卡·德拉瓦勒的信 .....	579—580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	581—582
*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 .....	583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	
部的信 .....	584—586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	587—588
法德农民问题 .....	589—613
一 .....	593
二 .....	605
*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册 .....	614—61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	616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	617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导言 .....	618—641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	642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 .....	643

## 附 录

-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 647—649
-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 ..... 650—651
-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 ..... 652—658
- 路易莎·考茨基 伦敦的5月3日 ..... 659—663
- 路易莎·考茨基 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 ..... 664
- 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 ..... 665
-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1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  
谈话 ..... 666—672
-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  
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 ..... 673—674
-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  
召开的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 675—676
-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  
集会上的讲话 ..... 677—678
- \* 弗·恩格斯 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  
谈话 ..... 679—685
- 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电 ..... 686
- \* 弗·恩格斯 1893年6月27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  
的谈话 ..... 687—693
- 弗·恩格斯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 ..... 694—695
- 弗·恩格斯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 ..... 696—698

*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	699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 大会上的演说 .....	700—702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 上的演说 .....	703—704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 .....	705
弗·恩格斯 1895 年 1 月 1 日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 .....	706
弗·恩格斯 189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同维·阿德勒的谈话 .....	707
注释 .....	711—860
人名索引 .....	861—901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902—905
文献索引 .....	906—954
报刊索引 .....	955—967
地名索引 .....	968—978

## 插 图

载有《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 封面 .....	6—7
《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扉页 .....	6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手稿 .....	273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第一页 .....	281
《共产党宣言》1892 年波兰文版第一页和第二页 .....	353—35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扉页 .....	359
恩格斯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 .....	425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扉页 .....	457

- 
- 1894 年俄国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的扉页,书中载有《〈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513
- 1895 年《新时代》发表的《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619
- 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书单的第一页和第二页…………… 653—654

## 前 言

本卷正文收入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至 1895 年 8 月所写的 92 篇文章,其中包括 17 篇恩格斯为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著作再版所写的导言、序言和跋;附录收入 21 篇其他人在恩格斯指导下或根据恩格斯提供的材料所写的文章、关于恩格斯讲话的报道以及恩格斯同其他人的谈话记录。

19 世纪 90 年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野心,使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以俄国和法国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阵营之间开始出现战争阴云。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普遍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欧洲的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1889 年 7 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成立,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进一步加强。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见本卷第 627 页)。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不断推进国际工人运动,恩格斯进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强指导。他加紧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重要著作,以满足工人运动对科学理论指导的需

求；他深刻总结革命经验，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阐释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精辟地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科学态度；他一如既往地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及时提出新的理论判断和新的策略原则，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他精心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大力促进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严厉批判各种错误倾向，对各国工人政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进行有力引导。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一直把编辑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在《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中，他简要介绍了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以及它与前两卷的联系。1894年底《资本论》第三卷在汉堡出版，历时近十年的编辑工作终于完成。在《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册》中，恩格斯谈到计划把马克思写于1861—1863年的一部长达1472页的手稿中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见本卷第615页），可惜他未能在生前完成这一计划。这一时期，恩格斯在编辑整理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的同时，还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年）和第二卷德文第二版（1893年），并为这两个新的版本撰写了序言。

1891年，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柏林出版新的单行本。为了更准确地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科学原理，对马克思年轻时代的这部著作中的个

别提法作了修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义得到确切表述。恩格斯在为这个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修改的情况,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 247 页)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劳动力这种商品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向工人群众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在《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这篇长文中,恩格斯对所谓马克思捏造引文的谰言进行了严厉驳斥,挫败了资产阶级旨在以此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企图。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重要著作。他在为这些著作所写的序言或跋中,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论述这些著作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现实指导意义,总结过去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分析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指明斗争方向。

本卷收入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再版所写的三篇序言。在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高度评价了《宣言》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指出:“《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见本卷第 72 页)在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和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还阐明了波兰和意大利等民

族实现独立和统一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卷第 459 页）

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对马克思这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见本卷第 227 页）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揭示了公社失败后这两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丧失影响力的原因。恩格斯高度赞扬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个可靠的方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见本卷第 237—238 页）最后，恩格斯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239 页）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阐释重大政治事件的初次尝试，其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严格检验。这部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

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本卷第 622 页)恩格斯认为,这一公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恩格斯阐述了 1848 年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本卷第 626 页);因此他表示,1848 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分析了 1848 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工人政党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他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见本卷第 631 页)。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号召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同时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无条件地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见本卷第 637 页)。

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和 1892 年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自己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指出“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见本卷第 392 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指出自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夺取了大部分执政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英国为世界工厂,以其他国家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的世界市场体系。“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见本卷第 324—325、405 页)但是,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德、美等国现代大工业的不断崛起,英国逐渐丧失作为其现存社会制度基石的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即使在工商业空前繁荣的时期,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当景气消失之后,这种贫困就更为加剧。这是社会主义将在英国重新出现的原因。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 314、395 页)。他简要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 317、398 页),指出鼓吹这种社会主义的“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见本卷第 317、398 页)。他告诫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 407 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是一篇有丰富理论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以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简要回顾了 17 世纪以来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指出不可知论实质上是力图与唯心主义调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并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

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第一次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 370 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宗教执迷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先是打着宗教旗帜反对封建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后又用宗教对抗唯物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反动目的，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见本卷第 385 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见本卷第 385 页）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是恩格斯为介绍收入文集的各篇文章的内容而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见本卷第 529 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见本卷第 530 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跋中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的

新发展,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想法,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 518—519 页)他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对这些国家给予积极支持。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指出:“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526 页)在这种条件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 527 页)。在这篇跋中,恩格斯不仅回顾和介绍了自己在 1875 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而且还详细引述了马克思在 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判

断,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预测,并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充分体现了他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以大量研究材料为基础,评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在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研究上的贡献和局限性。他高度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摩尔根对母权制氏族的发现,认为这一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见本卷第268页)。恩格斯的这篇序言为正确理解《起源》提供了理论背景。

恩格斯始终非常关心并大力支持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各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和工人阶级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书信和文章就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国内局势与他们交流看法。恩格斯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和重大事件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对工人政党应采取的对策的意见,对各国工人政党克服错误倾向、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恩格斯十分关注德国的发展。德国的政治局势在19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不断取得巨大成功,对此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评述。在《德国1890年的选举》和《今后怎样呢?》等文章中,他分析了1890年2月的选举对德国政局的影响:“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可以说,它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见本卷第52页)这次选举后不久,俾斯麦黯然下

台；同年秋天，实施了 12 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止。本卷附录中收入的《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是恩格斯在 1893 年帝国国会选举前后的两篇访谈录。在前一篇访谈录中，恩格斯评析了 1893 年的德国政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在后一篇访谈录中，恩格斯评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欧洲局势的影响。这两篇访谈录都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提出的要求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这样的要求在德国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 683—684 页）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信。他在信中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党的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应当采取的策略，指出它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891年6月18日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党内出现的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288页),而在半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见本卷第289页)。他深刻揭露了工人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288页)恩格斯还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289页)。《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以及《答保尔·恩斯特先生》等文章中,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由青年大学生和作家组成的反对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恩格斯认为,在实践上,这个青年反对派无视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条件,一味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参与议会,如果任凭他们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轻率的冒险主义势必对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带来严重危害。在理论上,他们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是一致的,而实际上他们所拥护的是一种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本卷第85页)。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

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 98 页)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担任领导职务应当具备的条件:“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见本卷第 86 页)

《德国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为《1892 年工人党年鉴》撰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扼要地评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了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应当采取的策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充分利用合法性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会破坏合法性,“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见本卷第 334 页)。他认为,反革命的暴力也许会推迟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恩格斯针对俄国、法国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阐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的态度。他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德国,这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在这种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见本卷第 340 页)。恩格斯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

《欧洲能否裁军?》是恩格斯应倍倍尔的请求针对德意志帝国国会有关军事法草案的讨论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策略。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军队与其说用来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用来防御国内的敌人”(见本卷第 463 页)。工人政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废除这样的常备军,将军队从压迫的工具改造为“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见本卷第 463 页)。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德国通过改革军事训练方法和改良军队作风而不断缩短各兵种现役期的可行性,指出这样做不但可以在国内逐步减少常备军,而且还能引导其他各国以这种方式裁军,从而遏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使欧洲和平得到保障。这篇文章通过论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军队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著作。

19 世纪 90 年代初,德法等国的工人政党围绕如何制定土地纲领以争取农村选民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领袖福尔马尔在 1894 年 10 月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把保护小块土地私有制写进纲领,并援引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该决议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反驳了福尔马尔的说法,随后撰写了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德法等国的工人政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见本卷第 591 页),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592 页)。他对农村中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

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606页);对于在农业经营活动中普遍雇用长工的中农和大农,出路在于“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见本卷第611页);而对于大土地占有者,则应该实行剥夺,至于这种剥夺是否要以赎买的形式来进行,这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态度。恩格斯还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恩格斯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本卷收录的几篇与意大利有关的文章中,恩格斯结合意大利的具体情况,阐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和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

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中,恩格斯通过分析一桩金融骗局揭露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腐败。

在《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中,恩格斯驳斥了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乔·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轻视政体问题的指责,重申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指出:“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见本卷第348页)恩格斯还驳斥了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的指责,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而这一经

济革命如何实现，“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见本卷第 349 页）。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是恩格斯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论述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著作。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状况，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见本卷第 536 页）。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持这个伟大目标，把每一个进步的或革命的运动看做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步；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时要保持独立性，同时把农民看做“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见本卷第 535 页）。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一般策略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怎样运用于意大利，“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见本卷第 539 页）。

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中，恩格斯驳斥了意大利反动势力对意大利社会党的诽谤，简要论述了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见本卷第 585 页）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恩格斯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为他们准备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政策，

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制度是扼杀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凶,同时揭露了西欧反动势力同沙皇俄国互相勾结的反动目的。恩格斯通过考察 19 世纪欧洲局势的演变,揭露了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指出:“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见本卷第 50 页)基于这一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恩格斯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指出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与西欧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见本卷第 49 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形势以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范,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是 1893 年 12 月恩格斯写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希望从大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508 页)。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伦敦的 5 月 4 日》、《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等文章,他写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工人组织的书信,以及本卷附录中收录的一系列有关恩

格斯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的报道,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其中包括:支持各国工人从实际情况出发举行五一节游行和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争夺工人运动主导权,促进各国工人组织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协作等等。这些文章、书信和报道体现了恩格斯作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最为重要的领袖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积极致力于人类学和宗教史问题的研究,其有关论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由恩格斯的译文和恩格斯的评述组成,译文描述了生活在库页岛的尚处于群婚状态的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恩格斯指出,人类学家的新发现证实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和阐述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演变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根据对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启示录》的分析,说明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受苦受难的人,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他们只能在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恩格斯指出,基督教作为诱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必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这个世界宗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便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恩格斯把原始基督教同现代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在产生时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也是

被压迫者的运动,原始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要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两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基督教诱使人们在天国中寻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斗争在现实世界中、在社会改造中实现解放。

本卷收入了几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文章和关于马克思家人的文章。《马克思,亨利希·卡尔》是恩格斯为《政治科学手册》写的词条,文中简述了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详细列举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和《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中,恩格斯严厉驳斥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家人的诽谤。附录中收入的两篇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是根据恩格斯提供的材料写成的,文中简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

恩格斯于 1895 年 8 月 5 日在伦敦与世长辞。他是马克思去世后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杰出和最重要的革命领袖,深受各国工人的敬重和爱戴。恩格斯在 70 岁生日时曾经表示:“我将把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奉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见本卷第 106 页)他用自己伟大的一生完美地践行了这一庄严承诺。

本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相应卷次相比有如下变动:第一,正文新增 3 篇文章:《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草稿片断》;附录新增 8 篇文章:《伦敦的 5 月 3 日》、《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 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德国社

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弗·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1895年1月1日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弗·恩格斯1895年7月底至8月初同维·阿德勒的谈话》。第二,有5篇文章中文第1版第22卷收入正文,本卷收入附录:《弗·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弗·恩格斯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弗·恩格斯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因为前4篇文章是报刊对恩格斯演说的报道,后一篇文章只能确定与恩格斯关系密切,不能确定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本卷所收文章,凡是有不同版本的,版本之间的重要差别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收入本卷的文章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2002年)和第32卷(2010年)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弗·恩格斯

1889年12月—1895年8月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sup>1</sup>

写于 1889 年 12 月 23 日前—  
1890 年 2 月底

译成俄文载于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1 期  
和第 2 期,原文载于 1890 年 5  
月《新时代》杂志第 8 年卷  
第 5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sup>①</sup>，加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sup>②</sup>；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一直还强调得不够——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的正常发展，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一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sup>③</sup>的地理据点。

卡尔·马克思的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必须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的斗争。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

---

①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

——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而是“主要堡垒，同时也是它最后的防御阵地和最强大的后备军”。——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竟的事业。<sup>①</sup>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

---

①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sup>2</sup> 50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的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sup>3</sup>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sup>4</sup>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对弈,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棋子,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的学说,充满了对许多鲜为人知的、几乎从未得到过明确证实的事实的暗示。他建议恢复追究大臣的法律责任的做法,并用枢密院<sup>5</sup>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sup>6</sup>”——编者注



载有《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封面



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敌人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sup>7</sup>,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控制自己内部的贪污腐化,而在外部则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德;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世俗的私人利益和家族利益,他们并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因为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首领地位;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像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标,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赂,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sup>①</sup>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

---

① 指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被谋杀一事,见本卷第21页。  
——编者注

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魏克瑟尔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光辉，足以绰绰有余地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吹嘘夸耀足以绰绰有余地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详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正确地利用了现有的实际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贞不贰，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人群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出色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一面边界，即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也只有这一面易受攻击；

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由于道路交通不畅，幅员广阔，补给资源缺乏，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玩弄各种把戏，把任何一个别国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

俄国在防御方面强大到几乎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却相当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装备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具备大规模进攻能力的尝试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做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sup>8</sup>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方面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历来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做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来挑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领土承受战场的破坏，由它们提供众多的士兵，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受到保护，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相对少的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 1813—1815 年的战争<sup>9</sup>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头来看看 1760 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征服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由此毁灭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还算可观,但也日益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出现反抗。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保护被压迫的希腊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就会在这里为在解放<sup>①</sup>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sup>②</sup>。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希腊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了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而是“解放被压迫者”。——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者”,而是“救星”。——编者注

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由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击,也可以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尔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它在海上也就会是不可攻克的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德里亚海。但是如果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国家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本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不过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sup>10</sup>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sup>11</sup>此后,由于波兰文明程度更高,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16世纪,耶稣会会士统治波兰时期,

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sup>①</sup>被迫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伟大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就并不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sup>②</sup>;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希腊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sup>12</sup>,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不可挽回地陷入土崩瓦解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sup>13</sup>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sup>③</sup>就只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越来越接近完全的主权。他们的同皇帝意志相对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自由否决权<sup>14</sup>)<sup>15</sup>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sup>15</sup>中明确得到法国和瑞典的保障,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对此加以阻挠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占有它的征服地,因而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国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法国的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而是“信奉希腊正教的波兰人”。——编者注

② 弗·米克洛希奇《斯拉夫语比较语法》1852年维也纳版第1卷第Ⅸ页。——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德意志罗马帝国”,而是“神圣罗马帝国”。——编者注

贿金，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保有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sup>①</sup>。<sup>16</sup>因此，皇帝早已不在他的帝国内部，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寻找自己的支柱，因为帝国只是让他耗费金钱，而且使他劳神费力、忧愁烦恼，除此之外，毫无裨益。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绝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不仅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sup>17</sup>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认识到，而且制定并开始实行了对瑞典、土耳其、波斯、波兰以及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关注。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土耳其离他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办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跻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无功；他只做到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结成姻亲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的纠纷。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变得进一步有利于俄国了。这样，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要依靠法国或俄国的帮助——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越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便越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

---

① 见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页。

属关系。

由此可见,在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获取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利益冲突,就能使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生活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卷入永无休止的争吵,彼此总是忙于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追求权力的人,即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开明的”18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sup>①</sup>的开明国际。这个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斯<sup>18</sup>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样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捷琳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

---

<sup>①</sup> 在英译文中不是“贵族资产阶级”,而是“半贵族半资产阶级”。——编者注

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才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sup>①</sup>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15世纪和16世纪<sup>②</sup>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18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一切不清楚自身起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sup>19</sup>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sup>③</sup>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活动,怎样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

①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有3份恩格斯手稿片断和1份打字稿片断保存下来,在手稿片断中不是“15世纪和16世纪”,而是“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 二

1762年<sup>①</sup>，当大淫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谋杀丈夫后登上王位的时候，世界<sup>②</sup>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的侵略计划。七年战争<sup>20</sup>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英国摧毁了法国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实力，然后又背弃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这后者，在1762年，当俄国的彼得三世登上王位并且<sup>③</sup>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sup>④</sup>这位被自己最后和唯一<sup>⑤</sup>的同盟者英国所抛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敌对，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拜倒在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王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目标。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捷琳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sup>21</sup>，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sup>⑥</sup>

① 在打字稿片断中没有“1762年”。——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世界”被删除。——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登上王位并且”，而是“突然”。——编者注

④ 在打字稿片断中，此处还有“因此而得救的弗里德里希从这时起也成为俄国的奴仆”这句话。——编者注

⑤ 在英译文中没有“和唯一”这几个字。——编者注

⑥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在必要的时候”。——编者注

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sup>①</sup>的一根骨头,使它在 100 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谈第一次瓜分波兰<sup>22</sup>的详情细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捷琳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具有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加以践踏,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sup>23</sup>

这些开明、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捷琳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sup>②</sup>是 18 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 19 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sup>③</sup>一样。沙皇政府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没有一次不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sup>④</sup>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sup>⑤</sup>,就像同样幼稚可笑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sup>24</sup>,保持秩序、宗教、欧洲<sup>⑥</sup>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

---

① 在打字稿片断和英译文中此处加有“这条狗”。——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族人民”,而是“解放受奴役的各族人民”。——编者注

④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族人民”,而是“解放被压迫者”。——编者注

⑤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⑥ 在英译文中“欧洲”二字被删除。——编者注

大资产阶级党派。俄国外交,也只有这种外交,被容许同时既是正统的又是革命的,既是保守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开明的。这样一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sup>①</sup>在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陷于纷争,这又只对叶卡捷琳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能再像彼得那样期待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sup>②</sup>;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而它终于获得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泰申和约<sup>25</sup>,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sup>15</sup>的执行。这样,德国的弱势地位就被确定下来,德国被宣布为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捷琳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sup>26</sup>。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占领了亚速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河。<sup>③</sup>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

① 在打字稿片断中不是“普鲁士”,而是“德国”。——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③ 在打字稿片断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在美国独立战争<sup>27</sup>期间,叶卡捷琳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sup>①</sup>“武装中立”的原则(1780年)<sup>28</sup>,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它的军舰<sup>②</sup>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在1856年巴黎和约<sup>29</sup>中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捷琳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sup>③</sup>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莱奥波德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捷琳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借口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问题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落入了圈套。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捷琳娜的同盟者的角色)还算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大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补偿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捷琳娜手中。<sup>30</sup>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使用了1792—1794年同盟<sup>31</sup>的力量,它就削弱了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法国这时就得以强大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

①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所谓的北方”。——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它的军舰”,而是“战时它的海军”。——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编者注

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捷琳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下一个瓜分对象;把夺取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捷琳娜在腓特烈港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提出的<sup>32</sup>;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信仰基督教的莱雅<sup>①</sup>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相信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捷琳娜逝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拥有了超过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sup>②</sup>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所有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口。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都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必考虑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打好了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sup>③</sup>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

① 莱雅是奥斯曼帝国内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臣民的称呼。——编者注

② 保罗一世。——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人民”被删除。——编者注

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成就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捷琳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难以捉摸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行动；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随即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式而成了这帮耶稣会外交家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听凭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sup>33</sup>，法国获得了德国的<sup>①</sup>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规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泰申和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意志帝国混乱<sup>②</sup>局面的保证人共同发表决定性意见。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贪婪，以及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sup>③</sup>，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的意见成为决定性的意见。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订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订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sup>34</sup>

作为联邦的<sup>④</sup>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

---

① 在英译文中“德国的”被删除。——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混乱”，而是“分裂和衰败”。——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而是“普遍不佳的名声”。——编者注

④ 在英译文中“作为联邦的”被删除。——编者注

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这些小邦的未来将会怎样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要求得到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要求得到德意志帝国的遗产。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的紧邻关系对各小邦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以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使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 100 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经精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sup>①</sup>在这种时候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于是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各个宫廷充斥着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公众中散发神秘的小册子,宣扬俄国是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 1779 年的泰申和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 1805 年战争爆发时,稍微懂一点事的人想必都会明白,问题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利茨城下被打败,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sup>35</sup>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他们以往的生存方式<sup>②</sup>中

① 指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生存方式”,而是“政治制度”。——编者注

最恶劣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会战、埃劳会战、弗里德兰会战和 1807 年的蒂尔西特和约。<sup>36</sup>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彼此意见分歧以及卖身投靠,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封冻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迫使斯德哥尔摩发生暴力政变并将芬兰让与俄国。<sup>37</sup>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同拿破仑的关系濒临决裂时,沙皇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奥布,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这样就在 1814 年实现了叶卡捷琳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sup>①</sup>。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标,照旧是沙皇格勒。在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sup>38</sup>,拿破仑曾明确地答应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容许他瓜分土耳其,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 1806 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sup>39</sup>但是,如果说下面这句话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那么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靠混乱来维持着。壮实而平凡的士兵,壮实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

---

① 在英译文中“芬兰归我,挪威归你”被删除。——编者注

乱才得以补救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不能使之屈服,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sup>①</sup>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sup>40</sup>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sup>41</sup>,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丰富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不需要金钱。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sup>②</sup>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sup>③</sup>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太西方化了,以致没有钱就无法生存。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蒂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能看清时局,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边,改组波兰,并在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沙皇格勒”,而是“波斯普鲁斯海峡”。——编者注

②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自己的原料产品”,而是“本国产品”。——编者注

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而基础又不稳固，再也无法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把波兰人的忠告当做耳边风，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途中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霸权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sup>42</sup>以后，莱茵联邦<sup>35</sup>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大约 18 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出卖的土耳其，于 1812 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sup>39</sup>，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sup>43</sup>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沙皇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回报。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只是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sup>44</sup>，因为后者的胜利毕竟从来没有能够推翻法兰西帝国。

俄国以前从来没有占据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捷琳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辩白——，那么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比萨

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sup>①45</sup>是波兰人的。在这里不再是对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同族部落进行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会议桌上的波兰”，而是“波兰王国”。——编者注

##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sup>24</sup>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sup>①</sup>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反而借助这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sup>46</sup>，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是要利用对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经商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保持着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通常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与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也并非不

---

①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显然是为了迷惑沙皇”。——编者注

相适应；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无法忍受。相反，自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希腊人的贸易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这种贸易便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缺少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sup>①</sup>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sup>47</sup>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必须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做好了准备。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愤；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sup>48</sup>。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这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其所能地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sup>②</sup>。它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资金、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sup>49</sup>及西方其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不和”。——编者注

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罗保、莱巴赫、维罗纳的会议<sup>50</sup>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而与此同时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方的希腊之友加倍活动。愚蠢的欧洲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受到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sup>①</sup>，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sup>②</sup>；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纳，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夏多勃里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有约束力的诺言来予以加强）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少数几次中断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sup>③</sup>。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

---

①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而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就会向欧洲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天然的敌人。”<sup>①</sup>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sup>②</sup>,俄国企图得到欧洲的崇高许可,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但是,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于 1825 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措-迪-博尔哥(1825 年 10 月 4 日(16 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 年 10 月 18 日(30 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睬欧洲,甚至不理睬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这显然是俄国外交界的普遍看法。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具有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拿破仑这样叫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有他们的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并对希腊的起义者感到厌倦。他无所事事<sup>③</sup>,前往南方的塔甘罗格附近旅行,在没有通铁路之前,当时那里几乎与世隔绝。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

① 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大部分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第 52—53 页。——编者注

②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被删除。——编者注

③ 英译文在“他无所事事”之前加有“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编者注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sup>①</sup>;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而没有受到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都派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里诺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 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显然是在警告它不要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sup>②</sup>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2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意志力的表示”。——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率领俄国军队”。——编者注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sup>①</sup>（毛奇《俄土战争》第 390 页）。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两公国事务的新口实。<sup>51</sup> 多瑙河两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sup>52</sup> 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 *karczma zajezdna*<sup>②</sup>；在这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利用这些优势以前，七月革命<sup>53</sup> 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暂时收起自由主义的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sup>54</sup>，这次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我不来详细谈 1830—1848 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以土耳其的保护者的身份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里的侵袭，派遣 3 万军队去波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sup>55</sup> 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此外，它在 1840 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一夜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反俄同盟变成反法同盟，<sup>56</sup> 并且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sup>③</sup> 以及用组织规程<sup>57</sup>（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① 赫·毛奇《1828—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第 390 页。——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后面作了注解：“（餐馆）”。——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

章)①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多瑙河两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这是经过 20 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的。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次严重挫折:当康斯坦丁大公 1830 年 11 月 29 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②的报告原本和大使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副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 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③。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 1834 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利用它们的分裂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 1848 年二月革命<sup>58</sup>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次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蔓延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

---

① 在英译文中括号里的话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把农民更多的工作时间置于贵族(农村土地贵族)的支配之下,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英文版第 10 章第 218—222 页。”恩格斯在脚注里引用的是《资本论》第 1 卷 1887 年伦敦英文版,在正文里引用的是该卷 1883 年汉堡德文第 3 版。这两个版本章节划分不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2—276 页。——编者注

② 卡·瓦·涅谢尔罗德。——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 1825—1830 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

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sup>①</sup>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根本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两公国<sup>59</sup>,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有了借口重新侵入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

不仅如此。奥地利,即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又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确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唤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接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sup>60</sup>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作出了裁定,他在确信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对沙皇政府的目的有用之后,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sup>61</sup>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难道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

---

<sup>①</sup> 在英译文中不是“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而是“懦弱的低能儿”。——编者注

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不应得的福分；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克里木战争爆发了；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衷于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sup>62</sup>。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回报，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奥尔绍瓦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sup>①</sup>，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sup>②</sup>但是这出喜剧以无数的钱财和100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联军的头批队伍刚在保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两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无情的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真正的战争。这样一场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sup>③</sup>，因为俄国是通过普鲁士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会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

---

①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喜剧《错中错》的标题。——编者注

② 参看皮·博马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3幕第11场。在英译文中，“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这句话前面补充有法文原文：“Qui trompe-t-on ici”。——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这场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

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危險。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恰好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且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这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虚假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安营扎寨；虚假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真正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虚假的战争最有利，对真正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边疆的据点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资源匮乏，便反过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侵略者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毫无顾忌地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不足、粮草给养很差的队伍在行军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他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sup>63</sup>

他的继承人<sup>①</sup>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sup>29</sup> 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热，用不断征服新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

---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使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使自己丢了丑。随之出现了惊人的觉醒。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大大地醒悟，沙皇过于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因此，再要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已进一步发展了；除贵族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有教养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种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不可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么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且在进攻方面同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俄国不赌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sup>64</sup>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受到政府本身的支持。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

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sup>①</sup>。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sup>②</sup>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sup>③</sup><sup>65</sup>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sup>④</sup>却由于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像在温室中一样<sup>⑤</sup>发展起来;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使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无法平静下来。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做虚无主义<sup>66</sup>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积聚力量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sup>⑥</sup>;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sup>28</sup>,并且建立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sup>67</sup>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铁路和大工业”,而是“铁路、蒸汽机和现代工业”。

——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即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③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④ 在英译文中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⑤ 在英译文中此处加有“人为地”。——编者注

⑥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

定为俄国向奥地利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付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sup>68</sup>，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背沙皇的意志，也违背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sup>69</sup>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sup>70</sup>他以此使沙皇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放弃了自己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sup>71</sup>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sup>72</sup>；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受了侮辱之后仍然忠贞不贰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了力量。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sup>①</sup>一边，直接钳制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精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被送入德国。

---

①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这个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sup>①</sup>。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sup>73</sup>，但是一旦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就足以使法国立刻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sup>②</sup>。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战争期间他在外交上<sup>③</sup>支持德国<sup>74</sup>。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俄国沙皇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不过这种能力如今已遭到破坏。当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在国外丧失这种威望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sup>④</sup>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sup>⑤</sup>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sup>⑥</sup>作战——这场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种族战争。

①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英译文中，由此到本段末尾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而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起，到“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止。

——编者注

② 在手稿片断中此处有“从而导致1870年的战争”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在外交上”，而是“从侧面”。——编者注

④ 在手稿片断中此处加有“直接”。——编者注

⑤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掠夺”，而是“扩张”。——编者注

⑥ 在手稿片断中不是“同时对俄法两国”，而是“对结盟的俄法两国”。——编者注

新德意志帝国为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阿尔萨斯—洛林<sup>75</sup>，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彼此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特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sup>76</sup>

尽管如此，巨大的胜利似乎还是获得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sup>77</sup>被暂时破坏；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被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国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国；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比萨拉比亚领土被收复了；在亚美尼亚新的重要的阵地被占领了；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努力；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精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sup>①</sup>——暂时地为俄国守护着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我们房屋的钥匙”<sup>78</sup>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

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sup>79</sup>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sup>①</sup>要采取最后的重大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开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断粮来围困前者或后者(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sup>②</sup>。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 150 年来力图避免

① 在英译文中“沙皇政府”被删除。——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即使没有那种它曾长期享有的、而按照 1856 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两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这个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曾确实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各个敌对集团;长期保持中立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到那时,英国的海军优势将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表现出其全部的威力和影响,试问除此之外还需他求吗?”——编者注

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sup>①</sup>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绝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夙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目前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的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

---

①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 1857 年的印度起义<sup>80</sup>以后,早在 1840 年就已开始的对突厥斯坦的征服<sup>81</sup>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 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药杀水上建立了据点;1868 年合并了撒马尔罕,1875 年合并了浩罕,把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梅尔夫的艰难的进军;1881 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泰佩;1884 年梅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朱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 1857 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突厥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势不可挡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德海峡的前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 500 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sup>82</sup>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对抗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越来越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获得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即俄国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不再有任何收获。正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列夫纳城下获得胜利的<sup>83</sup>,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土地比萨拉比亚,现在他们很难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齐斯莱塔尼亚部分,自己行使统治权。<sup>84</sup>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sup>①</sup>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亚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笃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坎南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

的帝国里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sup>85</sup>以后<sup>①</sup>，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不会为了克里特岛和亚美尼亚而再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核心问题。俄国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从 1856 年开始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俄国日益西方化；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sup>②</sup>，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瓦解——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显现出来。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成立了，政府只有用越来越野蛮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做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罗斯民族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做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蠢事了。1848 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俄国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就只等为革命打开大门的时机了。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衷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

---

① 英译文中在这句话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sup>86</sup>。”——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而是“现代制造业、蒸汽机和铁路的发展”。——编者注

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么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热衷于把新的侵略看做是扩大俄国市场的手段。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sup>87</sup>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sup>①</sup>，而随后它又被迫取消这些地方自治机关，<sup>88</sup>从这个经验中保证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俄国的国民议会哪怕仅仅是为了克服最严重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欧洲当前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 1 000 万到 1 500 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武器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最后成为胜利者。<sup>89</sup>

---

①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县参议会)”。——编者注

只有当俄国局势发生变化,使得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sup>①</sup>将失去他的所有反法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奥地利还是意大利都不会有丝毫的兴趣为俾斯麦<sup>②</sup>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谁都不喜欢它<sup>90</sup>,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甚至连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都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也将是没有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以便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会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个由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复合体的存在就会失去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国皇帝”。——编者注

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继续存在,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瑙特人<sup>①</sup>、希腊人<sup>②</sup>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碎块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用所谓的解放这些民族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么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残害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在战争中站在沙皇一边,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以及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会到什么是恐怖了<sup>91</sup>。因此,与沙皇结盟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么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②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亚美尼亚人”。——编者注

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权势的跌落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那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关于不断增加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sup>①</sup>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sup>②</sup>。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也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的坚固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sup>③</sup>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的危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sup>④</sup>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西方”,而是“西欧”。——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

④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sup>①</sup>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sup>②</sup>，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必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1890年2月底于伦敦

---

①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最好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 437 000张<sup>92</sup>，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sup>93</sup>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为他们提供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展开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工人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编者注

##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sup>94</sup>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1878 年德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sup>93</sup>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报刊被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些组织的尝试都被当做“秘密结社”而遭到惩罚;党员因此被判处的徒刑加起来超过了 1 000 年。尽管如此,德国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 1 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运进了德国,并分发出去,数以千计的小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成功地进入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九名议员)<sup>95</sup>和许多市镇代议机关,其中包括柏林的市议会。党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 2 月 20 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 20 个席位,也就是说,在 20 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社会党人还在 58 个选区进入了决选投票,这意味着,在 58 个选区里,社会党人在所有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就是居第二位的,而重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票数,我们只能做大概的估算。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 1871 年不超过 102 000 张,

1877 年 493 000 张,1884 年 550 000 张,1887 年 763 000 张,1890 年他们可能得到不少于 1 250 000 张选票,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sup>92</sup>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 1887 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 1 000 000 人:民族自由党<sup>96</sup>1 678 000 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sup>97</sup> 1 516 000 人,保守党<sup>98</sup> 1 147 000 人。在这一次,中央党将保住自己的选民,保守党失去了相当多的选民,而民族自由党则失去了非常多的选民。这样,社会党人在选民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但是却完全赶得上,甚至会超过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

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可以说,它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下面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

年轻的威廉由于自己颁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保护会议的诏令,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sup>99</sup>俾斯麦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给自己年轻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安静地等待威廉二世因为喜欢扮演工人之友而陷入窘境;那时俾斯麦就有机会作为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sup>①</sup>出场了。这一次俾斯麦没有对选举的进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一旦年轻的皇帝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就会将其解散的无法驾驭的帝国国会,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而社会党人的巨大成功可以帮助他在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提出一个动听的口号举行大选。狡猾的首相现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谁都无法驾驭的帝国国会。威廉二世很快就会认识到,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

---

① 原文“*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贵族和资产阶级目前的情绪，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目标甚至毫无实现的可能。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自己的原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欺压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这样，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所有敌对的党派就会把一切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应运而生，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上司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就会采取行动，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到那时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贵族；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并且准备一旦皇帝想摆脱他，就把他抛弃。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但是它不再信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内部争吵<sup>100</sup>成了众所周知的事。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而皇帝也难保不产生危险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这两人中的哪一个呢？明智的人正在丧失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相信 1871 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稳定不变的信念，这个在老威廉做皇帝、俾斯麦执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可动摇的信念，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的不断加重，由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理的关税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对于战争，而且是全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所始终抱有的和不断加深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用，使得农民、小商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少数从政府所建立的垄断中获利

的人除外)越来越疏远政府了。当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乎不可战胜的三头政治的时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斯麦自己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而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绔子弟,而且还是宫廷阴谋家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极为沉重的压迫了。过去那种相信局势稳定不变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的了。所以,虽说这一届帝国国会看起来难以驾驭,但是下一届帝国国会恐怕会比它更难驾驭得多。

因此,俾斯麦很可能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么甚至赤色幽灵这个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特性——不顾一切地蛮干。如果他觉得合适,他可能挑起暴动,尝试一下少量“放血”会产生什么作用。但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参加过军。他们在军队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迄今为止帮助他们抵制了一切想要激起他们暴动的挑衅。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大约写于 1890 年 2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90 年 3 月 3 日《纽卡斯尔每日纪事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今后怎样呢?<sup>101</sup>

1890年2月20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容克和金融巨头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sup>102</sup>无非就是这样的联盟)正在自食其果。烧酒税、食糖出口补贴、谷物和肉类的关税像变魔术般使千百万的钱财从人民的口袋流进容克的口袋;正当德国工业凭自己的力量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关税,而实行这种关税很明显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倾销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整个一系列间接税的重担压在较贫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几乎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充军备的开支,赋税增加到了令人不堪重负的地步;随着军备的不断扩充,世界战争的危险也日益临近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万德国人“倒下去”,因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侵占<sup>75</sup>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裁人;新闻出版界空前腐败,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腐败的新闻出版界系统地向人民群众倾泻大量耸人听闻的谎言;贪赃受贿的警察当局利用收买或胁迫使妻子背叛自己的丈夫,儿女背叛自己的父亲;以前在德国几乎闻所未闻的暗探诱捕手法现在屡见不鲜;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时期;一切权利都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贵的帝国法院的无耻嘲弄;由于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整个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全部权利。所有这一切曾经大行其

道，而且这样的时期由于德国庸人的怯懦持续得够久了，但是现在就要结束了。卡特尔多数派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那就是挑起暴动。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新的多数派吗？啊，向往此事的人是有的，而且不仅仅是政府当局。在自由思想党人<sup>103</sup>中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党人得势；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执政能力的幻想，又死灰复燃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党，因为自由思想党还不具备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结成联盟的条件，而后者是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么中央党<sup>97</sup>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地区自己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有利的赋税。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们力求比政府可以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就会重新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一个道地的天主教政党，也像任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能同中央党组成新的卡特尔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普鲁士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的，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势力最为强大。聚集在中央党周围的其他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还有：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阿尔萨斯派。<sup>104</sup>一旦中

央党成为执政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行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前一派的先生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将再也不能在自己的选民面前抛头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有利。这个道地的反普鲁士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地的普鲁士主义统治的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台。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党不是由民族自由党<sup>96</sup>人组成的，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sup>105</sup>的政党。可见，这种暂时的联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卡特尔，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吗？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如果俾斯麦想这样做，他就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哪怕是片刻的不和，尤其不应当到处张扬这种不和。<sup>100</sup>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头政治——俾斯麦、毛奇、威廉——在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稳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威廉不在世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别人叫他退休呢，还是主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皇位的年轻的威廉则以他短时期内的全部政绩，特别是以他著名的诏令<sup>99</sup>表明，殷实的资产阶级庸人无论如何不能信赖他，同时也表明，他不希望受任何人的控制。庸人所信赖的人已经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赖。相信 1871 年建立的帝国内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经死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后一根支柱——庸人——动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有用吗？

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使人民，而且也会使帝国诸侯不再有义务遵守届时将被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政变将意味着帝国的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无法预料的。如果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帝国。<sup>106</sup>但是，是谁的帝国呢？是他自己的还是敌方的？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不断发生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倍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恐怖的情况下举行新的选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几年。可是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知道，俾斯麦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廉不是也说过吗：如果遇到最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场杀光？<sup>107</sup>所以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刚赢得了胜利，他们正是凭着自己坚韧顽强的毅力、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赢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也是出乎意料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震惊。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以自然进程般的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增加；暴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无济于事；一支人数不断增长的突击队一直在向前挺进，越来越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已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斯麦从致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暴动，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各种外部

环境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社会民主党人发扬自身那种令人赞叹不已的大无畏精神，当整个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都有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般地为他们效劳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自我克制，而自己冲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的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枪林弹雨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大约写于 1890 年 2 月 26—  
28 日

载于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论反犹太主义<sup>108</sup>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私人信件

……然而您所说的反犹太主义<sup>109</sup>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弊多于利，这一点我要请您认真考虑。反犹太主义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吕蒙先生的著作<sup>①</sup>虽然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要高明得多，但也只引起一点点昙花一现的轰动，毫无影响可言。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既反对犹太人的资本，同样也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即使德吕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鼓吹反犹太主义的，是一些收入 1 万马克、支出 2 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么它是在做它分内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人的还是行洗礼的人的，反

---

① 爱·德吕蒙《犹太人的法国。当代史评论》1886 年巴黎版第 1—2 卷。  
——编者注

正都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都化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这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花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威斯敏斯特公爵<sup>①</sup>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95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现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披着伪装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就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的。资本越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越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越接近灭亡。因此，对我们

---

① 休·鲁·格罗夫纳。——编者注

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来说,我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能够真正得到飞速发展,而决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再则,反犹太主义还完全歪曲事实。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嘶力竭地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sup>110</sup>,——我们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当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自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因为投身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斯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说实话,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情愿做犹太人,而不愿做“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4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  
第19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1卷翻译

##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sup>111</sup>

摘自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如果在伦敦这儿，下星期日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示威<sup>112</sup>，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归功于艾威林夫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新工联中最优秀的煤气工人非常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因为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他们已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日还很不巩固。对他们来说，和煤矿工人一样，最主要的是要争取到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马克思-艾威林夫人作为银镇女工的代表参加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sup>113</sup>理事会。煤气工人和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sup>114</sup>提出示威的倡议，在较小的工联<sup>115</sup>和激进俱乐部<sup>116</sup>（它们日益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工人俱乐部，另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格莱斯顿俱乐部）中得到大批拥护者。事情做得光明磊落，它们建议主要由旧工联（熟练工人）的代表组成的工联伦敦理事会<sup>117</sup>参加计划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工联理事会眼看回避不了，便企图通过夺权活动来左右形势。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海德门）达成了协议，并且抢在别人的前面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预定5月4日使用海德公园。事情是这样，凡是要在海德公园举行比较大的集会，必须事先向公共工

程委员会主席申请,由他确定需要设置讲坛的数目以及其他问题。因为在规章中也有规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内不能召开两个集会,这些先生们就认为,他们现在是主宰,在垄断公园之后,就能指挥原来的委员会<sup>119</sup>。他们预定了七个讲坛,让给社会民主联盟两个,自以为这样就能挽救对社会党人公正的表象,同时保住一个社会党的同盟者。

因此,他们决定,只有工联组织,才能在游行时举旗并推选演说人,政治性社团不得这样做。他们修改了决议,从中删去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而只谈通过工联的活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他们制定了游行程序、路线等等,这时才召集代表开会,而且只召集了工联组织的代表。马克思-艾威林夫人没有获准参加会议,理由是她本人没有在她所代表的那一行业中工作。一项把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问题重新列入决议的修改方案根本没有获准表决和讨论,说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明确地向代表们暗示,工联理事会是占有者;在5月4日公园是属于它的,如果他们对此不称心,他们可以走开。

原来的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是第二天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艾威林到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儿去说,如果在同一时间不给他们的委员会安排足够数量的讲坛,那就会大闹起来。幸亏是托利党人<sup>3</sup>掌权(要是自由党人<sup>4</sup>就会敷衍搪塞,什么也不会答应),他们不能在工人中树敌过多,于是答应给艾威林七个讲坛,这就使工联理事会的先生们不得不让步,因为要是发生冲突,他们的软弱无力就会立刻暴露无遗。

原来的委员会开始积极活动,详细地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和路线,并且一完成就抢先公布出来。昨天(4月29日)艾威林和希普顿会

---

见并商定了一切问题,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冲突,星期日的集会将是这里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写于 1890 年 4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5 月 10 日《纽约人民报》第 11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sup>120</sup>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sup>①</sup>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sup>121</sup>,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sup>122</sup>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 年代初<sup>②</sup>由《钟声》印刷所出版。<sup>123</sup>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 年 1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

---

① 指《〈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② 应为 1869 年。——编者注

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致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sup>①</sup>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sup>124</sup>,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sup>②</sup>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sup>65</sup>,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sup>125</sup>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sup>126</sup>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

<sup>①</sup>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Sozialdemokratische Bibliothek.

XXXII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  
Vierte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sgabe.

Mit einem neuen Vorwort von Friedrich Engels.

—————●●●●—————  
London.  
German Coöperative Publishing Co.  
114 Kentish Town Road NW.  
1890.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扉页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sup>127</sup>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sup>128</sup>,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sup>58</sup>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sup>129</sup>。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sup>115</sup>,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sup>130</sup>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sup>①131</sup>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sup>②</sup>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

①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② 指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至1887年在斯旺西,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sup>132</sup>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sup>133</sup>和法国的傅立叶派<sup>134</sup>,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sup>135</sup>,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sup>136</sup>。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sup>137</sup>,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sup>138</sup>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sup>139</sup>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5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  
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1卷翻译

## 伦敦的 5 月 4 日<sup>140</sup>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sup>112</sup> 它还有助于证实各个国家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大家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整个大陆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隆重，而在奥地利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隆重；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诸侯领地和各斯拉夫诸侯领地的工人分裂成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言，1890年5月1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作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至今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断言巴黎无法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5月4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了不起的是：1890年5月4日，从40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顾5月4日以前的历史。

大约在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

头<sup>141</sup>——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年4月1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Gas Workers' 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sup>113</sup>,目前会员总数达10万人。这个工联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sup>142</sup>主要就是在它的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甚至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联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联现在也迅速地振作起来。然而这些新工联与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带有排他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为自己造成了一种来自非行会工人的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医疗互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尤其对“可诅咒的”社会主义避之唯恐不及。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联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罢工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而煤气工人的工联甚至纯粹是这样的组织;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爱·马克思-艾威林女士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sup>116</sup>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sup>143</sup>——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3英镑。去年冬天在同样也是位于东头的银镇举行的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sup>144</sup>;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

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一次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sup>145</sup>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有保障的。因此,工人们热烈响应艾威林夫人提出的为争取在伦敦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而举行巴黎代表大会<sup>139</sup>决定的五一节活动的建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其他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sup>119</sup>,负责为此目的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 5 月 1 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尝试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 5 月 4 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大度地对工联伦敦理事会<sup>117</sup>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且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联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都一样多,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为每个小时的加班支付更高的工资,譬如说,支付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的工资。因此,这关系到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硬性规定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这样一个团体,它俨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十分坚定地同法国的可能派<sup>146</sup>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联盟,还派代表团

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sup>147</sup>所决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来说,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接管此事,如果节日活动不在5月1日而在5月4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在自己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它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这两个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对中央委员会耍了一个花招,虽然这种花招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被认为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是欧美的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委员会(Board of Works)提出申请,并就活动的具体细节与之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驶入草地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而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5月4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而且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5月4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独占,他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工联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工联理事会宣布,只有工联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社团以及政治俱乐部不得

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工联理事会事先拟好了提交给会议的决议，其中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删除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工联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工联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 15 年的时间没有摸过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们对于他们所耍的花招很气愤。示威似乎已最终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对此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委员会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耍花招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收起了嚣张的架势，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示威的具体安排进行商谈。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充分认识示威的性质和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亚于它们共同对示威的基本思想的敌视）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那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一次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 月 4 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

软弱无力但又热衷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愿再听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sup>148</sup>，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卑劣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看得出，在这次两边同时举行的集会上，哪一边生气勃勃，哪一边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 10 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 10 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差，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回家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尾巴和投票工具达 40 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终于觉醒过来，开始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行动。1890 年 5 月 4 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立足于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

1836—1850 年的宪章运动<sup>149</sup>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1848—1880 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社会主义团体应运而生,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一直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差不多总是类似于 1849 年巴登运动<sup>150</sup>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 1 名、军官 11 名、号兵和列兵各 1 名。<sup>151</sup>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地位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军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从而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小团体不复存在。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免不了会有摩擦,然而运动将继续发展。不久以后,比有些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大约写于 1890 年 5 月 6—  
10 日

载于 1890 年 5 月 23 日《工人  
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 答复的草稿<sup>152</sup>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该报 1890 年第 105 号(8 月 31 日)发表的告别辞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sup>①</sup>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sup>153</sup>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么这些大学生的一个主要机关报的原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不能不使我看清真相。原编辑部和我“共同希望”——也就是说,我和它共同希望——以奥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只得到少数德国工人的支持,而以原编辑部为代表的“原则性立场”则将得到多数德国工人的支持。这就是说,原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我得为此亲自向它追究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欲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著作家先生们挑起的争

---

① 《致本报读者》,载于 1890 年 8 月 31 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105 号。——编者注

吵。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见。如果爱争吵的先生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先生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时候,我曾惊讶地问自己: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庆祝五一节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由五个人组成,他们居住在四个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sup>154</sup>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它的意见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sup>155</sup>

国会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确实表现得不够灵活。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是个别人的问题,不能归罪于全体。国会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sup>156</sup>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sup>157</sup>也同样犯过此类程序上的错误,巴枯宁派的先生们立即抓住这点,当做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派的委员会<sup>158</sup>那里。巴枯宁派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秘密的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国会党团曾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国会党团。<sup>159</sup>如果国会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

员会真的做了对党有严重危害的事情的话,今天我还会这样做。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sup>①</sup>

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以前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1 卷翻译

---

<sup>①</sup> 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

##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sup>160</sup>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笔者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累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现在的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会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sup>①</sup>

原编辑部的这些话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和它“共同”去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sup>153</sup>的性质还可能怀疑的话，那么当看到有人竟极端无耻地企图

---

<sup>①</sup> 《致本报读者》，载于1890年8月31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105号。——编者注

宣布我支持这些先生们的阴谋时，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已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一直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東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作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161</sup>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贸然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也不会不受到惩罚，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先生们的确已经取得独特的经验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国会党团或者说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乐意去滤出蚊虫，那也决没有道理要德国工人为了对此表示感激就吞下骆驼。<sup>162</sup>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看待自身的重要性,看待党内事物和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们能记取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9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1卷翻译

##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读者的告别信<sup>163</sup>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多次向其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发生变化。然而，一家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一家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可以通过报刊发挥作用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与之对话的人。

第一次是 1848 年到 1849 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真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从党在维登代表大会<sup>164</sup>上重新恢复并且此后“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重新开始斗争时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sup>165</sup>,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sup>166</sup>统统不在话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汇票一样准;德意志帝国邮局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人手里,任何一个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当时在德国有 1 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 1848 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的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 12 年的过程中一直非常及时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 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始终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准确无误地进行,我这个老革命者的心里总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为推销这个报纸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是值得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

级报刊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充分反映出我们的工人日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轻松的幽默。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绝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 1885 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四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的和国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 月 2 日禁令发布，而在 4 月 2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中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sup>159</sup>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sup>167</sup>正如 1830 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如今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 1830 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条件是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圣洁无瑕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 12 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已经破产，俾斯麦已经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

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有关“合法”手段的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重要。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来应对局面。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但是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酷爱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给自己的敌人帮这个忙的。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实力地位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得到 20% 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有 80% 的选票。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 20% 对 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 25 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过彻底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版。为应对这种局面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

---

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意志帝国下一次将坚持不了 12 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9 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9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sup>168</sup>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年9月)<sup>169</sup>,比利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工联出席可能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还没有确定。<sup>147</sup>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么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举办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们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真诚被愚弄了,1891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动<sup>170</sup>,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那么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大会。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拒之门外；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这种状况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sup>171</sup>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权限，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接受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分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促使他们不去严格执行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使自己动弹不得，而我们的对手却能够活动的境地。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作出种种新的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涉嫌制造分裂的人在工人们看来始终是错误的。因此，如果在 1891 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新的尝试肯定是要做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设满圈套(我们很熟悉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公众不能看透其中的弊害,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联合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sup>①</sup>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依靠:(1)法国集体主义派<sup>172</sup>和布朗基主义者(尽管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投奔布朗热主义者阵营<sup>82</sup>而减少了);(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sup>173</sup>; (6)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从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中获利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 (3)比利时人;(4)荷兰人;(5)巴塞罗那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利人;(8)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

---

<sup>①</sup> 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见本卷第95页)前的6段在手稿中用竖线划掉。——编者注

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1889年更庞大得多的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么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仍然在沿用至今的体制上无所作为，那么，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减少。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裂“丑事”至今还严守中立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了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睿智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专横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在其中能够发挥先进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么，作为他们队伍中最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绝不是可能派。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 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1889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

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必须确定。

(2)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规章、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议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束。

(3)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比例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提出一定的比例,但这不是我的事情)。

(4)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待确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式和议程的草案,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写于 1890 年 9 月 10—15 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1 卷翻译

##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sup>174</sup>

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 9 月 16 日的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sup>①</sup>。我在上面看到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用‘大学生骚动’<sup>153</sup>来指称我们反对派,那么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同他自己和马克思本人不同的观点;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么恩格斯只需看一看他本人 1887 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sup>②</sup>中所写的内容。”

我同德国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已经使我积累了许多极其离奇的经验。然而,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持有过不同的观点云云。对于“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用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来指称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根本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问题同他对

---

① 这号报纸现已无法找到。——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话。因为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郑重”<sup>①</sup>的通信来烦扰读者。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伯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在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时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sup>②</sup>,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几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答复他说,我不能介入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

① 双关语:德文“Ernst”(恩斯特)是姓,作为普通名词又有“郑重”的含义。  
——编者注

② 海·巴尔《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载于1890年5月28日《现代生活自由论坛》(柏林)第17期。——编者注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部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部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sup>175</sup>

第二,挪威在最近 20 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sup>13</sup>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于同一水

平的。

而在挪威，掺杂着少量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 17 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伟大运动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点点大工业，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轮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 1720 年前后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旧有的停滞状态毕竟开始运动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与堕落的德国小市民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人**。<sup>①</sup>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了解清楚。”

---

① 在恩格斯 1890 年 6 月 5 日致保·恩斯特信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与德国的小市民妇女相比也不知要好多少倍。”——编者注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sup>①</sup>里。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当做纯粹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这正是我责备那些先生们对这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的一个例子<sup>②</sup>。接着我通过他自己所举的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把以德国为样本的小市民阶层的公式套用于挪威,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事先而且是以他本人为例证明了我同样用来责备那些先生们的话:“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sup>②</sup>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像受辱的贞女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要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鲁莽而自信地大声喧嚷,似乎在空洞的喧嚷背后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并且抱怨别人可耻地侮辱了他的纯洁的感情。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信中抱怨巴尔先生“极端无耻地对待了他”!受辱的贞女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十分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答案了。被误解的君子也在马格德堡《人民呼声报》上质问曾经恰如其分地警告过他的老布雷默:“在什么地方?”<sup>176</sup>

---

① 保·恩斯特《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载于1890年5月14日《现代生活自由论坛》第15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

每一声叹息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还想更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那好吧，例如，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sup>①</sup>的文章中，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而完全自动地演进的，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的摆布。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可以不用再回答更多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终于穷尽了的时候，他又声称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既然我们这样的人跟不上趟，就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能让人给他自己开点什么药吃一吃。

另外，恩斯特先生还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么恩格斯只需”云云。

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报》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sup>②</sup>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

---

① 保·恩斯特《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载于1890年8月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2号附刊。——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德国拥有多数。而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只想提出这样的论断:国会党团“部分地”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又是这个被误解的君子,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于他。但是,如果说不仅在国会党团中,而且在整个党内都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有谁会提出异议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此,那么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注意这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国会党团中乃至在党内占多数还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等待这些古怪而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反对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的活泼快乐的斗争<sup>177</sup>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种小资产阶级因素日益失去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的国会党团并不那么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扔到废物堆里去,而更危险得多的是高谈阔论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集团,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判断经济和政治形势时不能毫无偏见地权衡现存各种事实的轻重和参与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强弱,所以他们想强迫党接受一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泰斯特勒先生公开阐明,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阐明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12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种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

了。但愿这一事实能让保尔·恩斯特先生明白,为什么我极力反对把我同这类集团的分子混为一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写于1890年10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10月5日《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1卷翻译

##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sup>178</sup>

在我 70 岁生日之际,我收到了这么多真挚的关怀,这么多意想不到的荣誉,很遗憾我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亲自一一作答。来自各个国家,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的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般飞来。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 11 月 28 日如此友好地挂念我的新老朋友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不应该归功于我,不应该算做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能发誓,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以求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那些荣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写于 1890 年 12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12 月 5 日《柏林人民报》第 284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sup>179</sup>

公民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 70 岁生日之际对我的亲切祝贺。

请你们相信，我将把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奉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但是，你们，以及我们在德国、英国、奥匈帝国、俄国——总之，在一切地方的弟兄们所打的胜仗，构成一系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变得年轻起来。而最使我高兴的是，法国无产者和德国无产者不顾我们堕落的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叫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永久地建立起真诚的兄弟情谊。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sup>180</sup>我希望看到，这一同盟，这一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欧洲同盟的核心，将由三个国家的无产者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写于 1890 年 12 月 2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90 年 12 月 25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4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 《人民言论》编辑部<sup>181</sup>

布 达 佩 斯

1890年12月3日于伦敦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11月26日的来信里对我70岁生日的祝贺。

我深知,你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一天给予我的荣誉,绝大部分只是由于我是马克思的仍在世的代表,因此,请允许我把这一切作为荣誉花环敬献在马克思的墓前。你们尽管放心,我会竭尽全力地工作,以求今后在他面前无愧于心。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地邀请我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sup>182</sup>。可惜我不可能亲身赴会,但在12月7日和8日我的心将同你们在一起。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因此产生两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和一个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牙利,正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纪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人政党如今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

它就是国际性的政党,其中包括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请你们向这个年轻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0 年 12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12 月 14 日《工人纪事周报》第 50 号,并用匈牙利文载于 1890 年 12 月 14 日《人民言论》第 50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1 卷翻译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sup>183</sup>

1890年12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为你们上月28日给我的贺信中的良好祝愿,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稍晚了一些。我同你们一样深为遗憾,我的朋友马克思未能亲眼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这种势不可挡的发展,他为奠定这一运动发展的基础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但愿你们的愿望实现,胜利在望!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90年12月11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手稿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7卷翻译

致 G. 布卢默<sup>184</sup>

汉 堡

1890 年 12 月 27 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以受 596 000 名德国工人委托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的名义给我的亲切的贺信，已由施廷茨莱先生转给我了。我无需刻意向您表白，人们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想到我，这使我多么高兴。可惜，我不能向现在又回到德国各地的代表们表示感谢，所以我只好向代表大会主席<sup>①</sup>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真诚地保证，只要我还有一份力量，我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载于《对 1890 年 12 月 8—11 日在柏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决议的说明》1891 年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37 卷翻译

---

① G. 布卢默。——编者注

#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sup>185</sup>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写于 1890 年 12 月初—1891 年  
2 月初

载于 1891 年在汉堡出版的小  
册子：弗·恩格斯《布伦坦诺反  
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  
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翻译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sup>①</sup>里,我曾经认为有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于1872年在柏林《协和》杂志上首先发动的<sup>②</sup>,1883年剑桥的塞德利·泰勒先生又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sup>③</sup>。这位匿名作者——泰勒先生已经揭露就是路约·布伦坦诺先生——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附的文件中,编号第12号<sup>④</sup>)里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简短说明,根本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复我,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他果然在一本小册子——路约·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出版社,1890年版——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多,是因为它向我们详细地“兼”论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问题根本没有关系。我只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一再声称劳工保护立法和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但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现。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谈过几百遍,不过,我们有很多的保留。第一,首先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工商业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8—170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06—212页。——编者注

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sup>①</sup>，这是可笑的夸大之词。第二，——其他次要的保留就不说了——无论劳工保护立法还是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必须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关系。雇佣工人群众注定终身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所以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工保护、工会的抵抗、补缀性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倒这些夸大之词，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它只提到了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往来答辩的文件，而没有谈到后来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对整个论战作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sup>②</sup>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3)塞德利·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4)我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驳；(5)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诺的议论中删去了所有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而只是“论进步问题”等等的地方。

---

① 路·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年柏林版第7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1872年3月7日柏林《协和》杂志第10期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对1864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篇文章说,马克思在这篇宣言中捏造了出自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的一处引文。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文字收入附录,文件第1号<sup>①</sup>。《协和》杂志的文章也收入附录,文件第3号<sup>②</sup>。后面这个文件提出的控告如下: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只有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诺)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

① 见本卷第163—16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8—170页。——编者注

马克思于1872年5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10期。<sup>186</sup>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文件第4号<sup>①</sup>)中指出，这句话不仅在1870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sup>②</sup>，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发表之前就在1864年伦敦出版的《兑换理论》<sup>③</sup>一书中被引用，最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包含着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与他所引用的这句话完全相同的句子：“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sup>④</sup>如果说《汉萨德》<sup>⑤</sup>中没有这句话(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只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关于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句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

当时隐姓埋名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1872年7月4

---

① 见本卷第170—174页。——编者注

②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伦敦)第47期。——编者注

③ 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编者注

④ 威·尤·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35号。——编者注

⑤ 指《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年伦敦版第3辑第170卷。——编者注

日《协和》杂志，文件第5号<sup>①</sup>)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时永远不会有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说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句话的地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有的倒霉的话本身来说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掩盖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被《泰晤士报》的报道证实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这位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他的控告来说，这一证据已经是相当“确凿”，而且日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拼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理论》所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说什么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马克思根据的是《兑换理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明这句话是格莱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它们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在也不能下定论。这些东西不过是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冒险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各种骂人的字眼来为自己壮胆，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毅然决然地说了如下这番话：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从第 7 版第 5 版(应为“栏”)第 17 行起,是这样报道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人们对马克思“无耻地撒谎”感到吃惊,他竟然还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等等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我刚刚描述的增长(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增长就是上文所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于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用自己的食指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因为《汉萨德》中没有所以他就硬说是马克思增添的话,从而证明了正是他自己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之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 6 月 1 日的《人民

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sup>①</sup>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是“增添”，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句子”，“完全是捏造的”。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并且意思“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句子正好相反”。于是，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道：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意思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sup>②</sup>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迥然不同的“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相信，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报》或《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

① 忒伦底乌斯《兄弟》第5幕第3场。——编者注

② 德文“Stirne”有“额头”的意思，也有“厚颜无耻”的意思。——编者注

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有产阶级”。

最后,这位义愤填膺的匿名作者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 257 页<sup>①</sup>):简直‘可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

<sup>①</sup>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第 257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281 页。——编者注

## 二

马克思在他的答辩(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6号<sup>①</sup>)中十分宽厚，他认真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利教授、《兑换理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谈。但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句子。根据《晨星报》，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sup>②</sup>。

根据《晨报》：

“这种增长〈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sup>③</sup>

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对手来说，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的”。

---

① 见本卷第180—190页。——编者注

② 威·尤·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伦敦)第2219号。——编者注

③ 威·尤·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报》(伦敦)第22418号。——编者注

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来说却不然。他的表现得一如既往地厚颜无耻的答复(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文件第7号<sup>①</sup>),马克思从未见过,因为在7月11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过《协和》杂志。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战》1890年版)中才读到这一答复<sup>②</sup>,因此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谈谈它。

“他(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颠覆计划的人都感到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先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颜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关系从句,从这个关系从句中可以看出,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无法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也和表述同样内容的那句“增添”的话意思相反。至于那个“干脆删掉了的关系从句”,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耐心等待片刻,他就一定会看到。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颠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太担

① 见本卷第190—193页。——编者注

② 路·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年柏林版第21—23页。——编者注

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马克思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它的用法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原话如此!>。”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发明这一格言的耶稣会<sup>7</sup>会士与匿名的布伦坦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格莱斯顿确实说过的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简直可耻”。

那就让我们把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段话的报道都列举出来,以此彻底搞清楚这个所谓的“增添”吧。<sup>187</sup>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一财富问题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述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sup>①</sup>

---

①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每日电讯》(伦敦)第 2439 号。——编者注

《先驱晨报》：

“我可以说明，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级。”<sup>①</sup>

《晨邮报》：

“我可以说明，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如果我相信，它的益处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级的财富的增长。”<sup>②</sup>

《每日新闻》：

“我可以说明，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如果我相信，它的益处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级的财富的增长。”<sup>③</sup>

《旗帜报》：

“我可以说明，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以十分

---

①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先驱晨报》(伦敦)第 25630 号。——编者注

②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邮报》(伦敦)第 27872 号。——编者注

③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5282 号。——编者注

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贫民阶级。”<sup>①</sup>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确凿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转述了这个和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完全相同的句子。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以一种“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派驻议会的一整套记者班子。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此外，总的来说，他们是无党派的，因为他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隐瞒的话的上述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sup>3</sup>人，也有辉格党<sup>188</sup>人和激进派。根据其中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另外四家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无可辩驳的证人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强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是《汉萨德》不像这些晨报那样无可辩驳。《汉萨德》的报道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照惯例”应该根据《汉萨

---

<sup>①</sup> 威·尤·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旗帜报》(伦敦)第 12069 号。——编者注

德》进行引证。

八个可靠的证人对一个可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更是以此证明马克思“增添”了这个句子！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 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颜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那个“增添”的句子进行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sup>①</sup>)中,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这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句子,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问题。因为,既然这篇报道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它说的就“同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意思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句子。因此,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的原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要做的已经不再是否认有这个句子,而是要断言它的意思和它所说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声明,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sup>②</sup>,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越发放心大胆地在这个暧昧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

---

① 见本卷第175—18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

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7号<sup>①</sup>转载在这里。

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sup>②</sup>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说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27年之后的今天,大概连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某个“关系从句”。相关段落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2章第7页上<sup>③</sup>。布伦坦诺认为,马克思删掉这个关系从句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税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之所以限于有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

关于《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关系从句,是由以下这些文字构成的:“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

他认为,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顽固地——删掉这些非常

---

① 见本卷第190—193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173、185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重要的文字,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里所说的增长仅仅是**应纳所得税的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为反正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在成立宣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the taxable income〉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则增加了……”<sup>①</sup>

除了**应纳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有别的什么“应纳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关系从句”给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只是**应纳税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西?也许(看来的确是)布伦坦诺认为,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同时还向读者大发一通关于英国所得税的议论,而且在其中对所得税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件第6号)<sup>②</sup>,并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第7号)<sup>③</sup>,那么他就是对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进行捏造”,就是给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中“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这个“增添”的句子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么,难道这个句子在实质上谈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因为只有有产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一边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谎,一边又自己从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① 见本卷第165、165—16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3页。——编者注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应纳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次攻击(文件第3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 taxable 一词译为“应纳税的”<sup>①</sup>。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驳中“删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刻起直到他1890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莱斯顿在这里谈的只是应纳所得税的收入,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造”、“无耻地撒谎”、“简直可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sup>②</sup>中证明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句子不是他“增添”的,此外,他还驳斥了匿名作者的这样一个蛮横的论断,即在这个唯一的争论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一有争论的句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至于格莱斯顿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毫不相干。

相反,在成立宣言——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第4页<sup>③</sup>上,就在那个“声名狼藉的”句子

① 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0—190页。——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伦敦版的页码,应为第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7页。——编者注

上面几行,明确写道,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通知下院说: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 1872 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 5 号<sup>①</sup>)起,至 1890 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可称之为“无耻地撒谎”的巧妙手法——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改善的断言。而在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 1890 年《我和……的论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抛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那个增添的句子确实是格莱斯顿的原话,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即为布伦坦诺〉说话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克思篡改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说什么马克思硬说格莱斯顿说过,财富大大地增长了,但是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莱斯顿则明确地说,工人的状况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协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75—180 页。——编者注

顺便提一句,至于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布伦坦诺先生想必是因为第一他是匿名的,第二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所以便自娱自乐起来: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么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意味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查找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已经展示过他精选的文雅之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引文”、“简直可耻”等等,确实是在以发人深省的方式“承认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明确无误的标志。

## 四

我们的大型政治历史剧<sup>189</sup>的第一幕就到此结束了。虽然不是枢密大臣但也神秘莫测的布伦坦诺先生,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奢望能做到的事情。诚然,他在所谓“增添”句子的问题上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道新的防线,并且在这条防线上他有最终话语权,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德国的大学教师圈子里说,阵地守住了。于是,他便可以至少在与他同类的人的面前吹嘘,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献方面将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自己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无所知;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11年,而且这11年是他的成就越来越大的11年,是他在世界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11年,是他的贡献越来越得到普遍承认的11年。

布伦坦诺先生及其同伙明智地防范着,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戳穿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也不让他知道他其实早已死去。但是当1883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受不了了。于是,塞德利·泰勒先生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8号<sup>①</sup>)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没有和埃米尔·德·拉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夫莱秘密商定(看来似乎如此),那么这件事就是泰勒自己挑起的。他的装腔作势表明他多少意识到自己干的是件毫无把握的事情。他说,在他看来,“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马克思的〉这种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大谈声名狼藉的马克思随即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他在结尾部分说: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有争论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要证明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那个所谓马克思“增添”的句子,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个句子;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个句子,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利·泰勒先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的报道也同样载有那个“增添”的句子。

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9、10和11号<sup>①</sup>)首先证明，塞德利·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打算要坚持最初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完全是次要问题”。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们向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那么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直接在布伦坦诺先生的第二道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那个句子？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被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原意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好尚各异。就引证本身来说或者就引证的目的来说，这一个人认为不重要的，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sup>3</sup>人的引证永远不会使自由党<sup>4</sup>人满意，自由党人的引证也永远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的引证则永远既不会使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满意，更不会使这两者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95—197、197—200、200—205页。——编者注

告,那么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利·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转折,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第一次背弃布伦坦诺的是,他抛弃了布伦坦诺最初的和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最初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再一次背弃布伦坦诺的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只引证《汉萨德》,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sup>①</sup>——弃置一旁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用这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很粗糙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第一封信的是,他不再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手头从来就没有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在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不久,他便到英国博物馆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11号<sup>②</sup>)哪怕增加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① 德文“sittlich”意为“高尚的”,“Sitte”意为“惯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0—205页。——编者注

## 五

第三幕。文件第 12 号<sup>①</sup>，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了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利·泰勒先生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先生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1890 年柏林版。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转载了他在《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现在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马克思的答辩，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无论愿意与否都不能不谈一谈。

首先我们发现，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上同样援引了成立宣言中的句子，接着断言，“和卡尔·马克思的说法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纳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那段有争论的引文上面九行）。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 1 号<sup>②</sup>）和布伦坦诺先生

---

① 见本卷第 206—212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63—165 页。——编者注

的论断(文件第 13 号<sup>①</sup>)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所以布伦坦诺先生明知违背事实,仍不得不力图蒙骗自己的读者,说什么马克思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说的只是“应纳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直接驳倒了第一个控告。

在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顺应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从马克思先前进行的那些论战来看,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的声誉”而希望布伦坦诺先生隐瞒自己的名字!这需要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这位先生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他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件事就让他自己以及《协和》编辑部去解决吧。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12—215 页。——编者注

秘密。毕竟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刊物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烦。他自己开始放肆地“攻击”起来，先是用黑体字突出关于“增添”的控告，然后又大骂“无耻地撒谎”、“简直可耻”，等等。由此可见，不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在这里显然是写错了。不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很可能会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隐姓埋名的布伦坦诺很可能会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库利埃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被他们的对手——容克、神父、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俗之作”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诸如此类的“丑角式论战”的典范著作中得到了太多的享受，以至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向下拉到德国大学式论战的战场上去，那里流行的无非是由纯粹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恶毒中伤和极端无聊乏味的空话。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再次骗过了自己的读者,因此现在可以放肆地对他们大放厥词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格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sup>①</sup>,像墨鱼那样用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抓住毫无意义的小事不放,竭力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个句子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除了说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连这第二个阵地,我们也已经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彻底地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此时典型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鱼那样把水弄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

耶稣会<sup>7</sup>会士常说:Si fecisti, nega.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就矢口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理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有争论的

---

<sup>①</sup> 《柏林,8月12日。卡·马克思先生……》,见1872年8月15日《协和》(柏林)第2年卷第33期第263页。——编者注

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用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紧紧“抓住”，并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至必须盯紧了，抓牢了，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问题”，即那个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从眼前和手中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sup>①</sup>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先生迫切希望的“弄模糊”告终。随后他又就那个出名的关系从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关系从句据说是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而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便再次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他断言，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两人之间的唯一争论点，即那个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我们面前的这份自我辩护也同样在乱喷墨鱼的墨水。首当其冲的自然又是《兑换理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向我们喷射过来，众所周知，马克思和它没有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生和火药的发明没有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表示，不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sup>②</sup>，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具有极大的弹性，因而远不是什么铁的规律。既然在喷射墨水，于是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把哈雷代表大会<sup>190</sup>、李卜克内西和倍倍

① 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 173、185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13 页。——编者注

尔、格莱斯顿 1843 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联——一切可以扯上关系的，都牵强附会地牵扯进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不怀好意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人们还认为，有一大群墨鱼在这里帮他“瞒天过海”。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论断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放弃这一论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现在〈布伦坦诺〉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汉萨德〉》误导了……那么，虽然人们会感到惊奇，他竟相信这样的材料〈绝对可信〉，但是错误至少会得到纠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为了把问题弄模糊，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把事情弄模糊的墨水，以便盯住和抓紧真正的争论的问题。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消息。事实上，他遭受了值得怜悯的挫折，以致如果不向我们哭诉他所有的不幸，他就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起初《协和》为了自己刊物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美好的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那家专业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公众对这种争论不感兴趣。”

这就是这位品德高尚的人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的善良

---

愿望由于人们的墮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我们这位被埋没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部,恐怕还需要些时间。

## 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理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谈论这一新的乱喷墨鱼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并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没完没了地讨布伦坦诺先生的欢心。

在这篇控告中,在引文结束后,他天真地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也就是说,布伦坦诺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然而,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么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发起进攻,说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给那段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以便再次用喷射墨水的办法把最初的争论点,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弄模糊;他不再攻击这句话,转而攻击塞·泰勒先生曾经援引过的《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的那段“假引文”只可能出自《兑换理论》,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

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 14 号 b<sup>①</sup>)。

布伦坦诺先生硬说,《晨星报》的报道的开头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I must say for one etc.)。于是,他以此断言,前面关于 1842 年到 1852 年和 1853 年到 1861 年应纳税的收入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理论》。

“他很看重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反正是无法监督他的”!但是别人有办法监督他,而且他们发现,在《晨星报》上的确有这段话。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把《资本论》中的那段话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德文都写出来,以飨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by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第 639 页;第 2 版第 678 页;第 3 版第 671 页;第 4 版第 617 页注 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① 见本卷第 216—219 页。——编者注

翻译成德文就是：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 6%——这在 10 年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sup>①</sup>

在布伦坦诺先生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理论》，而不是《晨星报》。在并列栏中，他用那个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可见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捏造”，那么这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在引文的开头进行了“捏造”，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小心翼翼地不再断言马克思在这段引文的中间“增添”了一句话，那么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删掉了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sup>①</sup>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第 44 卷第 751 页。——编者注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束。在用一个逗点断开之后，接着是下面的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载的是：“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把句子从中间截断了，“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 7 号<sup>①</sup>）中就已经称这段引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版本”。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是一句十分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么不管用一个“可是”给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尾巴，这一尾巴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毫无意义”，那么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先生。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谬误的《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我不敢断定，极富和极贫之间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句号。而正是在这个句号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加了一个句号，那么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诺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90—193 页。——编者注

先生根据这个句号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说什么马克思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那么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很粗糙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号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句号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让布伦坦诺先生去和格莱斯顿先生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两个干巴巴的句子（文件第 16 号<sup>①</sup>），关于这两个句子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 17 号<sup>②</sup>）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个干巴巴的句子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证实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

① 见本卷第 221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21—223 页。——编者注

改，——我虽然比他年轻 12 岁，对于 27 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么，《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一点放在一边，那么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权威性。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们就完全陷入了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什么权威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格莱斯顿先生在自己的话被引证时，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对我们来说，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忠实地还是不忠实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来说，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未参与争论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人。

## 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 1863 年预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sup>①</sup>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至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段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理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来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来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68—169 页。——编者注

增长,如果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虽然这些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4月17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单纯的资本增长对工人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sup>①</sup>,这对演讲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深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单纯的资本增长”!

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到了一句话,发现这句话揭示的内容令人很不愉快,他拿来《汉萨德》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令人很不愉快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向他指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都有这句话。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

---

① 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173、185页。——编者注

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可见，整个这场争论，纯粹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利·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没有弄明白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弄明白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论述清晰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但是，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装腔作势、复杂和费解的语言，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么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晨报，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很粗糙的”报道中，偷偷地换掉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而代之以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这就是：资本的增长会降低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对工人有利。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财富的增长，即他所认为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一时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

何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 27 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威。而且不管怎样，这与我们无关。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纳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仅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纳税的收入；所以，这是单纯的资本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现在看马克思引证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sup>①</sup>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没有人再提成立宣言了，全部攻击都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sup>②</sup>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唯一可以指责马克

① 见本卷第 165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编者注

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原本毫无意义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分享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这是一件给人深切而难以估价的安慰的事情。我不敢断定，极富和极贫之间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sup>①</sup>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个直白的正面论断，这两句话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故作庄重的空话中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增色不少。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么我们从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最近 20 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增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编者注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sup>①</sup>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段话,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给他们每人赠送一册成立宣言,就像赠送给塞德利·泰勒先生那样。

注意: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6号<sup>②</sup>)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这段话列入他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7号<sup>③</sup>)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而且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穷困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史无前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

①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0—190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0—193页。——编者注

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工商业处于良好,甚至中常状态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自己不到一年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1864年4月7日发表的下一篇预算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么呢?”<sup>①</sup>

但是,马克思紧接在1863年预算演说之后就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1864年4月7日宣布,他在1863年4月16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

---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说中引证一些话: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的人数下降到了84万。‘其中不包括靠慈善机构度日和从私人救济中得到帮助的人……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挣扎的工人。’在伦敦东头<sup>141</sup>的一个教区里,13 000人中有12 000人经常处于赤贫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头,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不到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自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在许多地方工资提高了,但是在其他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云云。而这首哀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史无前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其中的引文引自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见《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年伦敦版第3辑第174卷第587—588页。——编者注

存在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幸福状况是子虚乌有的,那么马克思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甚至对格莱斯顿先生来说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演讲人承认,虽然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演讲人这样的自白对马克思来说就足够了。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么他的反驳就会没完没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吧。<sup>191</sup>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 1861 年共有农民 1 098 261 人,其中作为雇工生活在农场的有 204 962 人<sup>①</sup>。从 1849 年到 1859 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1863 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4 年》):

“雇用农业工人的费用被固定在仅能让他活命的最低水平上。”<sup>②</sup>

根据同一个报告,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物供给(尤其是在八个被

---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 1861 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 1863—1867 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编者注

②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242 页。——编者注

点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量。而格莱斯顿先生政治上的支持者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在1866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sup>①</sup>),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是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的农奴,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1770—1780年)的先辈差得多,比14—15世纪的短工更是差得远。——因此,在“农民”问题上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1866年的议会报告<sup>②</sup>。1861年联合王国有565 875名矿工,其中在煤矿做工的有246 613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8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14—15小时。矿山视察制度纯粹是开玩笑:3 217个矿井只有12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故。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根据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sup>③</sup>,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共有396 998人。其中机械钳工有7万到8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成立已久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1859年和1860年重新开始的工商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同业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伯明翰及其郊区就有1万名女工和

---

① 詹·埃·索·罗杰斯《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10页。——编者注

②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66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编者注

3万名18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匠(26130人)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456646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外还要加上12556名印花工)是工人的主体。1863年4月,正是棉花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当时(1862年10月)60%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2—3天;5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依靠济贫所或救济委员会的救济度日,而(1863年3月)135625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瓦茨《棉荒实况》1866年版第211页)。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听说自己竟史无前例的幸福,一定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儿增多了。

至于一系列较小行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up>①</sup>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12万工人,其中只有4000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人(其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超负荷地工作;在大都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15万工人中只有1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童工和青年女工大量超负荷地工作;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4万人,几乎全是劳累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370218个缝制外衣的女工和制帽女工,380716个缝制内衣的女工,以及——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380个男工,其中有273223个鞋匠和146042个裁缝,其中 $\frac{1}{5}$ 或 $\frac{1}{4}$ 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在这125万人中,充其量有

---

<sup>①</sup>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恩格斯引用的数据出自第1、2、4、5号报告。——编者注

30%为私人顾客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商、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被叫做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超负荷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谈到工人的“史无前例的”幸福,造纸业(10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 000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15 000工人)、玻璃制造业(15 000工人)、印刷业(35 000工人)、假花制造业(11 000工人)等等行业的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140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应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以使他们免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损健康的超负荷劳动。

最后,领取由公共资金支出的救济金的赤贫者的数目在1863年为1 079 382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1863年无疑生活很差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了:按整数计,农业短工为110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469 000人,缝纫女工和制帽女工为751 000人,裁缝和鞋匠——除去30%——为401 000人,花边业工人为15万人,造纸业工人为10万人,织袜业工人为12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较小行业的工人为189 000人,最后,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为1 079 000人。总共有工人4 549 000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1863年还是工商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各行各业已经完全从1857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史无前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40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

是在 1863 年,从中受惠的只有在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丝纺织业中从业的工人,共约 27 万人,而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染色业中,法律保护只是一纸空文。此外,在只需要男劳力的行业和往往还需要技能的行业,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商业情况良好的时期为自己争得了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男工的重体力劳动的行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确实有明显提高,虽然把这一提高说成是“史无前例的”还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体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只把强壮的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

同上述 450 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领取救济金的赤贫者相对的,是 27 万境况好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 376 000 名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只有余下的三分之一,即 18 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 000 名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一般来说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吸血鬼(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超负荷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 20 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能够说其状况随着工商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的工人也难以凑够 100 万;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们从工商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体来看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换言之,由于劳动力在性别和年龄上参差不齐,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超负荷劳动所抵消。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么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而之所以要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正是因为到 1863 年为止的最近 20 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史无前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终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富人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强达到,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1863 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史无前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的那些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抱怨的任何东西。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的引证是正确的。

# 文 件

## 一

### 被指控的引文

#### 第 1 号 成 立 宣 言<sup>①</sup>

第一版用的标题:《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弗利特街波尔特巷 10 号蜂房报社 1864 年出版。定价一便士。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宣言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市各类工人和农村短工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Such are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Parliament in 1864, during the millennium of free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

<sup>①</sup>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恩格斯下面引用的文字参看该卷第 5、7—8 页。——编者注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has improved in a degree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Upon these official congratulations jars the dry remark of the official Public Health Report:

‘The public health of a country means the health of its masses and the masses will scarcely be healthy unless, to their very base, they b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sperous.’

Dazzl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statistics dancing before his eyes,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laims in wild ecstasy: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dds Mr. Gladstone,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sup>192</sup>

翻译成德文就是：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 Public Health Report(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sup>①</sup>

---

① 到这里为止的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翻译的，以下至本文件结束的德译文引自 1872 年 1 月 17 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第 5 号所载的《卡尔·马克思的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第一部分。——编者注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 第 2 号 《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版第 670—672 页<sup>193</sup>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列颠国民户籍总署署长<sup>194</sup>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sup>(101)</sup>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sup>(102)</sup>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 20 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

(101) 《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11 页。

(102) 格莱斯顿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说。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103)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 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 1851—1853 年三年间上涨了 20%。在随后的 1863—1865 年三年中,肉、奶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104) 格莱斯顿在 1864 年 4 月 7 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平达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

(103) 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104)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 年伦敦版第 260—273 页。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sup>(105)</sup>

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sup>(106)</sup>

---

(105) 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著作家<sup>195</sup>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

（《兑换理论》1864 年伦敦版第 135 页）

(106)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 年伦敦版第 67、82 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 二

##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 第3号 控 告

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sup>①</sup>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至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第3辑第170卷第243页及以下各页）：

“1842—1843年的每英镑7便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在那里只是对150英镑及150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对总数为15600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一区域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1860—1861年的应征税收入为22100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机制有

<sup>①</sup>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转载于1872年1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编者注

什么改变或者征税方式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常作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毋宁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 6 500 万英镑,也就是说,竟达上述区域国内应征税总收入的 $\frac{2}{7}$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 1853 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 1853 年开始(这一年征税起点发生了变化)。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至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虽然这些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单纯的资本增长对工人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分享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这是一件给人深切而难以估价的安慰的事情。我不敢断定,极富和极贫之间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么我们从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最近 20 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增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 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只有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

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 第4号 马克思的答辩<sup>①</sup>

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44号

一位朋友<sup>②</sup>从德国给我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第10期，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任性逻辑轻率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显得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语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在格莱斯顿的眼皮底下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实在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① 马克思的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的标题为《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成立宣言》第 6 页<sup>①</sup>）。（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上的一篇轰动一时并被伦敦各家报刊纷纷评论的文章<sup>②</sup>中，伦敦某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 518 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s Mr. Gladstone observed,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区写的、不仅在成立宣言发表以前，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前就已出版的专著吧。它的名称是：《兑换理论。1844 年银行法》，1864 年伦敦威尔柏克街 30 号托·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出版。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 134 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

---

①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 年伦敦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编者注

②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 1870 年 11 月 1 日《双周评论》（伦敦）第 47 期。——编者注

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的另一段话，他在这段话里胡说什么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 20 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暗示，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种无耻的空话与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appalling 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对比<sup>①</sup>。

《兑换理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引用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 4 月 17 日发表了 4 月 16 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 1863 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确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 7 版第 5 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

①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诌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 638—639 页）中曾予以批驳。”注文中出现的页码指马克思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1—672 页。——编者注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sup>①</sup>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他就有点惊恐。

意大利！意大利！<sup>196</sup>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绝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sup>197</sup>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关于这位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咬文嚼字、笃信宗教、诚惶诚恐地展示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情怀的资

---

①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easy classes’和‘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两个用语，是由韦克菲尔德最早使用的，指的是有产阶级中确实有钱的那部分人。”韦克菲尔德的相关著作作为《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第1卷。——编者注

产阶级英雄的笑料。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工厂主的经营管理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sup>①</sup>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生意伙伴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伪造了原文，而且还伪造了引文。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彻底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

<sup>①</sup> 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 第 5 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 年 7 月 4 日《协和》杂志第 27 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 3 月 7 日本刊第 10 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尤其是经常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如果当今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保持不变，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对于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那位伦敦先知无人能比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正确的信念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上<sup>①</sup>马克思曾试图反驳。

---

<sup>①</sup> 《协和》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了差不多整整三个月之后。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刚刚两个星期之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

但是我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驳倒关于恶意引证的指责。他的辩解方式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毋宁说是正好证明了这种恶意。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至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文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善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以别人的引文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号)上的一篇轰动一时并被伦敦各家报刊纷纷评论的文章中,伦敦某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对每一位询问者所说的那样,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而只是指出,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纳税的收入8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证明方式!人们用一份捏造的材料欺骗某个对我们的不诚实一无所知的人,后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转述,然后人们就利用这一转述,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实,来证明这份材料是确实的,而且自己是诚实的!——马克思继续辩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区写的、不仅在成立宣言发表以前,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前就已出版的专著吧。它的名称是:《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威尔柏克街30号托·考特利·纽比出版社出版。

---

保持沉默’。《人民国家报》如此急于读到对它的主人和导师的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另外,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有关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版面有限,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编者注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 134 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这种令人陶醉的……’,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兑换理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引用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 4 月 17 日发表了 4 月 16 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这本书(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本粗俗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根据《汉萨德》引用的。不过,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引用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这句话是他自己编造的。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的风格来判断,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 1863 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理论》加以比较,马克思的引文的这个来源就一目了然了。在《资本论》第 639 页,尤其是在注 103 中,对这一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的引述一字不差的毫无意义的版本。马克思对于这个版本的引文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援引的布瓦洛的文句也已经有了;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了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明明知道真相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也是撒谎?我们认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理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真相,或者至少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马克思先生无疑十分了解,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对于那些初看起来含有矛盾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要通过解释去除矛盾,如果对一段话无法这样做,那最好是对这段话进行考证,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于一篇特别是由于资料详实和论述清晰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说,尤其需要这样做。最后,如果作者没有认真地去考证,而是蓄意地把构成那个版本的引文所

含矛盾的一半的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作为对有产者的控诉抛给全世界的无产者,那么这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单是出于普通教育、科学和责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那个版本的引文了,而他竟然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对他来说是尤其不能宽恕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就转载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转载,至少也是忠实于原意的。其次,在演说发表之后不久,格莱斯顿就一字不差地将它收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年伦敦版,在该书第403页上,演说的内容与我们援引的一模一样。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找到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些演说在必然很粗糙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从第7版第5版第17行起,是这样报道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其数据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sup>①</sup>,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给我们深切的并且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悉,最近20年来英国工人

<sup>①</sup>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他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德文引文中删去了最后这个关系从句,然后加上这样的话:‘他(格莱斯顿)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这种增删也是为了故意使读者误解格莱斯顿的话的意思。按删去的关系从句以及整个上下文来看,演说的意思是:从所得税的材料看出的财富的增长只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只有收入在150英镑以及150英镑以上的人才要缴纳这种税),至于工人阶级,我们知道……”——编者注

的一般状况已经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掌声)”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3月7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报道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句子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完整的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德》中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于1864年才问世的诽谤性小册子《兑换理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一本默默无闻的诽谤性小册子向我们提出一段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是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的引文同他的一样,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他的被弄模糊了的引文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意思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可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请读者来判断,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竟是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

话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sup>①</sup>发表在 1872 年 7 月 11 日《协和》杂志第 28 期上，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 第 6 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sup>②</sup>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在 7 月 4 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句话，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 10 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完全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协和》说：

“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强加于格莱斯顿。”

我从现在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理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

① 路·布伦坦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二部分》。——编者注

② 马克思答路·布伦坦诺的第 2 篇文章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编者注

的引文,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此之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没有断言,这句话是他自己编造的。”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生意伙伴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绦带,声称每盘绦带有 36 埃勒<sup>①</sup>,而实际上只有 24 埃勒,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 12 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这 12 埃勒”。增添的绦带是这样,那么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sup>②</sup>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理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学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句子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理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另一个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① 埃勒是德国旧长度单位,1 埃勒约合 0.667 米。——编者注

②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366 页。——编者注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个版本的引文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 639 页<sup>①</sup>上我的评论针对的是格莱斯顿演说中的这一段话：“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关于这段话我评论道：“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这些“评论”在《兑换理论》中是根本没有的。

“……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援引的布瓦洛的文句也已经有了。”

“而且”我也引证了布瓦洛，这样一来，就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理论》中摘录下来的！而实际上在《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理论》的作者“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了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

① 指马克思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672 页。——编者注

《协和》非常谨慎，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摘引了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段话，但不知道它本来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是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sup>①</sup>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对每一位询问者所说的那样，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也没有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大。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资料。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从上面引述的他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来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至《星期六评论》<sup>②</sup>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sup>③</sup>。

---

① 爱·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伦敦)第47期。——编者注

② 指匿名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2日《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伦敦)第30卷第785期。——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张冠李戴。”——编者注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段可疑的话，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阐述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的最令人信服、最有力的一个文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用短短 12 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真希望我有篇幅来容纳我从宣言中所作的大量摘录！”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资料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纳税的收入 8 年来增加了 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竟然成了《协和》的证据，可以精确地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那位伦敦的生意伙伴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也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 10 和 27 期）。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固守的观念是，只有收入低于 100 英镑的人才免缴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句子，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

*cumstances* 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韦克菲尔德的话解释说,“*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思是“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韦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die ungemächliche Klasse*”[“不太富裕的阶级”]<sup>①</sup>。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以为,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相信它的读者有足够的智力,可以认识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有产阶级看成是“优良条件”,但是并非这个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的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也是把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认定格莱斯顿说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认定他所说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捶着自己充满信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

---

①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185页)。”——编者注

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他的读者！

我已经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所改善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了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故技重演。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紧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宣称，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最近20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述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

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黄金时代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的问题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代言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代言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sup>①</sup> 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 一

摘自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里完全没有

## 二

摘自《汉萨德》1863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8 日议会议事录第 170 卷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

<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编者注

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虽然这些数字对确定一般真相(!)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单纯的资本增长对工人阶级来说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装腔作势的、费解的、复杂的Circumlocution Office(繁文缛礼局)<sup>①</sup>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吧。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就够了,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我所描述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篡改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都不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The augmentation

<sup>①</sup> 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

is an augmentation)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来说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其演说的半官方的《汉萨德》版本中偷偷地删掉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生意伙伴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教养”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臣民见识。<sup>198</sup>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该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来说至少和《协和》相当——说过下面这句

有分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à seculorum”<sup>①</sup>？

卡尔·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伦敦

## 第7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

###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27期上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颠覆计划的人都感到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癖性只能说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段引文，即成立宣言中那个曾经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句子是捏造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来很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承认：在载于《汉萨德》的格莱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段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句子！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中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首先，这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只是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的话。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表明《兑换理论》是自己引文的依据，那么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转载这段引文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证那个有争论的句子，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们从

---

① 马克思在他所加的注中对这句话的翻译是：“你永远是一头驴子。”——编者注

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话，这从《协和》第 27 期上可以看到。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sup>①</sup>这一情况，想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几个字！！

马克思找来的想要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掉了那句有争论的话的第二个证据是：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理论》一书引证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摘引他的引文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主要证据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639 页，尤其是在注 103 中，对这一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的引述一字不差的、毫无意义的版本。此外，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理论》第 134 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顿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理论》是马克思引文的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理论》中所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明确指出了《兑换理论》的作者就是引用布瓦洛的文句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最后，至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 640 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理论》第 135 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么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己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理论》。这样他自己证明了：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摘引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而对于下面这一主要论据，也就是认为他对格莱斯顿演说引述的是那个与《兑换理论》的引述同样的、毫无意义的版本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预算演说做了篡改。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

---

①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引自成立宣言的这段话，是他从成立宣言中一字不差地照抄下来的。不过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没有加引号。”——编者注

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还会更加激起《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的钦佩之情。即使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他所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一书的作者韦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格莱斯顿说的是,他相信这种增长不是只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那部分人”,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所有这些解释,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一新的编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韦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不太富裕的阶级是什么用意,格莱斯顿演说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顿所谓的“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翻译的这个报道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关系从句,从这个关系从句中可以看出,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无法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外。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克思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关系从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在形式上更为简明扼要,而《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则是一字不差地记载。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那个关系从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他很看重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反正是无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全文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以为,我们引的《泰晤士报》的话是他的译文!! 另一方面,他自然只字不提我们指出(在第 28 期)的这样一点,即马克思所谓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断同官方确定的

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核对,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sup>①</sup>。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它的用法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新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治学严谨,依靠它来维持《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我们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曾说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只有当收入在100英镑以下时才免缴这种税。实际上根据1842年的法律,所有150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纳税,而在1853年纳税收入下调至100英镑,但是对新纳税的收入有优惠,税率较150英镑以上的收入为低。后来在1863年享受优惠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低于200英镑(不包括200英镑)的人,并且以下面这样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100英镑为止(包括100英镑在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60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理解,马克思先生很愿意借机躲避那些指证他捏造的人。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么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意味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

<sup>①</sup> 路·布伦坦诺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话。关于这两个报道,请参看附录。”——编者注

## 三

## 塞德利·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德译文)

## 第8号 塞·泰勒的攻击

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甚至像埃米尔·德·拉夫莱教授这样卓越的政论家也被误导,根据德文来源转述了这段引文,并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此作了更正——早在1864年就出现了,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家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将它们掩埋起来的报纸的合订本中发掘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诚实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利·泰勒  
(1883年)11月26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上述文章刊登在1883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11月30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有被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爱·马克思又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利·泰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日》1884年2月号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sup>199</sup>

### 第9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1884年2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利·泰勒先生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自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1864年就出现了,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先生的信,从“使人特别惊异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斯顿先生描述了1853年和1861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1872年3月7日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其中说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1872年6月1日和8月7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4月17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4月17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4月17日《晨报》:

“上面所说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很快就被”他的“巧妙的攻击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在“垂死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说即使引文不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是“怀着恶意”,是“狡猾的断章

取义”，等等。恐怕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11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辩。而且，这或许也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说：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将它们掩埋起来的报纸的合订本中发掘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完全赞成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上关于这个有争论的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应该留待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的确切性引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且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诚实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忠实于您

爱琳娜·马克思

1883年11月30日于伦敦

## 第10号 塞·泰勒的反驳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了，她显然有权利发表答辩。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格拉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对于这个看法，我却

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内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报上说我公开表达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sup>①</sup>,所以我不得不请求贵报用两栏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 1863 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1863 年 4 月 17 日

《泰晤士报》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 10 年中,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增加了 6%;但是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

《资本论》第 2 版

第 678 页注 103<sup>②</sup>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sup>199</sup>中,该附函这里没有收录。”——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1 页。——编者注

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商品的价格。然而,给我们深切的并且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小,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着重强调的那两段话的意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看法是: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后面“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应纳所得税的收入<sup>①</sup>。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工人的一般状况”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像马克思博士书中那种引人注目的样子,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把格莱斯顿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词句任意拼凑起来,让人们误认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sup>①</sup> 塞·泰勒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 1842—1853 年 150 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缴所得税,而 1853 年以后是 100 英镑以下免缴所得税。”——编者注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译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惊叹。

阁下，我忠实于您

塞德利·泰勒

1884年2月8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 第 11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争论点在于，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说过某一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问题实际上在于，

“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1872年3月7日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作者先引证了国际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演说中有关段落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话做了归纳；最后，他在结尾说：

“格莱斯顿提出这一事实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论断的范围，而马克思却利用这一事实把‘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在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问题仅仅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和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没有读过。那将如何呢？这个人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投书，莫名其妙地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诋毁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面的诚实，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就不能不成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我父亲在1872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写圣乔治——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马克思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至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明明知道真相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父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1872年7月4日《协和》第27期第210页）。尽管如此，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不

限于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都好像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争论点在哪里,那么难道塞德利·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今日》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一条引文。阵地再一次发生了转移,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把《资本论》第 678 和 679 页上引证格莱斯顿演说中的那段话,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德》的报道中的同一段话并列放在一起。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因此,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而他自己提供的论据却使我们相信,他本人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一页即第 210 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很粗糙的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来说,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增添的那句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有,其他日报的报道中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句话不仅被“匆忙地修改”了,而且被整个“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

伦坦诺所谓的“必然很粗糙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着重强调的那两段话。在第一段话里他承认：

“的确，和后面‘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教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自相矛盾，但是，如果本着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么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和这种真正的信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先生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顿先生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教徒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么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如果是，那么他就说过：如果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段话是一段常见的套话，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些套话，尽管每次词句略有不同。下面摘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些套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紧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

了’。最后,他宣称,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知道,这种改善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改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述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黄金时代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的问题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代言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代言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满意,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的这段话,在成立宣言第 5 页上是全文引证了的——就在有争论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责的不就是这个宣言吗?难道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关于原始出处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那里听到任何合理的话一样不可能吗?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 679 页)上注 105 所指出的问题。的确,看来很像是马克思出于“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

---

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 四

###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sup>①</sup>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 1843—1845 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现在用的都是英文原文。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6—44 页。——编者注

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sup>①</sup>);马克思大概把书名写错了<sup>200</sup>。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sup>②</sup>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了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sup>③</sup>即第3版第670—671页上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sup>186</sup>,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sup>④</sup>。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90页。——编者注

② 即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1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70—174页。——编者注

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绝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sup>197</sup>。”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

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sup>①</sup>，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件事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8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料地使

<sup>①</sup> 见本卷第180—190页。——编者注

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sup>①</sup>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sup>201</sup>，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sup>②</sup>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作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

① 指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② 指塞·泰勒。——编者注

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sup>①</sup>，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

---

<sup>①</sup> 这里引用的是《资本论》第1卷1890年德文第4版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2页。——编者注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利·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利·泰勒先生也觉得够了。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 20 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 年 6 月 25 日于伦敦

### 第 13 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1890 年柏林版第 3—5 页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交了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

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1871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第2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参看该书第2卷第241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减少未来对劳动的需求这个至今仍不绝于耳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们。那时我想起了这段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多人那样以国际宣言上的话和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639页上的相应的地方为依据。我查阅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然指出，1842—1861年期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么我们从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看到，最近20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增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在现存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请当时在柏林出版的《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3月7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顺应编辑部为了它的刊物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从马克思先进行的那些笔战来看，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引文，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书中借用了那句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1864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辩论录看议会，对〈交易所和J.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补充》，伦敦威尔柏克街30号托·考特利·纽比出版社1864年出版。这是一个变态的瑟息替斯<sup>①</sup>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

<sup>①</sup> 指亨·罗伊。——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诗句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误导了,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确的引文,那么,虽然人们会感到惊奇,他竟相信这样的材料,但是错误至少会得到纠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订正引文而取消宣言的这个卓越的论点,在宣传鼓动方面可能会很难堪。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自曝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宣传手段,而不愿承认自己已被证实的错误。<sup>202</sup>所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式论战的粗俗之作来攻击那位在英国生意伙伴的协助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用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抓住毫无意义的小事不放,竭力把争论的问题弄模糊;而最后他就逃之夭夭,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论战”<sup>①</sup>。他始终没有对我刊登在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上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1872年3月7日、7月4日和11日以及8月22日《协和》上的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史第二版<sup>②</sup>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塞德利·泰勒先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的,她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上不仅为她的父亲的诚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① 《柏林,8月12日。卡·马克思先生……》,载于1872年8月15日《协和》(柏林)第2年卷第33期第263页。——编者注

②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年不来梅增订第2版。——编者注

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错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那家专业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公众对这种争论不感兴趣。恩格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所表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第617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好像这家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那些被《兑换理论》删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的预算演说中谈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对照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兼论……问题”等等。——弗·恩格斯）

#### 第 14 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sup>①</sup>

（a）摘自《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4页。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我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

---

<sup>①</sup> 路·布伦坦诺《我与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年柏林版附录第24—26页。——编者注

地受了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

“最近 20 年来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史无前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确定《兑换理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 639 页所作的论述之间的关系,还应该注意下列情况。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用引自《兑换理论》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来反驳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反驳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的预算演说;《兑换理论》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 1864 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几页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话(第 234 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请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这些话和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第 640 页、第四版第 618 页上的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没有转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理论》完全一样,转述的是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并且在这里他也仍然没有注明《兑换理论》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 1864 年 4 月 7 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是引文的出处。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布瓦洛的文句)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布瓦洛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兑换理论》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

(b)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第 617 页上,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加上了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论的地方已经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 8—9 页上。虽然在第 13 页上已经同与《汉萨德》意思完全一致、只是为了便于报纸刊载而文字更为简明扼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对比:①

1863 年 4 月 17 日  
《泰晤士报》

1863 年 4 月 17 日  
《晨星报》

《资本论》第一版  
第 639 页注 103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inclusive,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s nearly as we can make out,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by 20 per cent. That is a fact so strange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 This intoxicating aug-

① 《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 198—199 页和第 165—166 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的引文大致相同。——编者注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Now,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is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er,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y which in the business of production comes into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labour. (Hear, hear.) But we have this profound, and, I must say, inestimable consolation, that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extreme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but the*

*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But that augmentation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which go to the general consumption. So that we have this profound, and I almost say, inestimable consolation,—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Hear, hea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are less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but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话所表明的,《兑换理论》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has improv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a degree which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which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and of any age. (Cheers.)”*

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that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it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Cheers.)”

在这里把句子从中间截断,加入了布瓦洛的文句;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马克思绝不是从《晨星报》引的这段引文,而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被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后,一字不差地从《兑换理论》引来了这段引文,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汉萨德》中都没有,而只有在《兑换理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疏排<sup>①</sup>的句子,正是亨利·罗伊,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话——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给他。

###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 议会报道摘录<sup>②</sup>

《先驱晨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

① 本卷用的是斜体。——编者注

② 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译文,见本卷第 123—125 页。——编者注

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i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晨邮报》。I may say,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每日电讯》。I may say for one, that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alarm 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question to wealth takes no cognis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stated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每日新闻》。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旗帜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 第 16 号 格莱斯顿致信布伦坦诺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第 49 期

### 简 讯

路约·布伦坦诺教授在《德国周报》第 45 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这次论战主要涉及格莱斯顿在 1863 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sup>①</sup>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 月 22 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 月 28 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的特点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结果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宜的。

奥·阿·<sup>②</sup>

## 第 17 号 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

1891 年《新时代》第 13 期第 425 页

### 关于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的问题<sup>203</sup>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

① 这两封信没有找到。——编者注

② 奥·阿伦特。——编者注

谈到路约·布伦坦诺先生以他最喜欢的匿名的方式对马克思发动的攻击——他控告马克思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出版社，1890年版——中作了答复。我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相应的反击。

在此期间，1890年12月4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49期上又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布伦坦诺先生的简讯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这两封信全文刊登出来。那么这就充分证明，这两封信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么只发表这两句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先生的话整个说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布伦坦诺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话的价值，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莱

---

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在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恩格斯

##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sup>204</sup>

这里刊印的手稿<sup>①</sup>——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sup>205</sup> 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sup>190</sup> 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政治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 15 年以后的今天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

---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编者注

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sup>206</sup>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

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sup>①</sup>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写于1891年1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① 最后这两段文字恩格斯写在一张纸条上,粘在校对稿的右边,并标注了插入位置。——编者注

##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sup>207</sup>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sup>①</sup>。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②</sup>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sup>208</sup>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

---

①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治？对蛊惑者的迫害<sup>209</sup>不是换成了非常法<sup>93</sup>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 20 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 1 500 万或 2 000 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 1870 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 月 28 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 5 月 30 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 1789 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 50 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 1848 年。属于议会反对派<sup>210</sup>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sup>211</sup>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 1830 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

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 1848 年的六月起义<sup>127</sup>。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 1871 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 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sup>212</sup> 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sup>213</sup> 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 1814 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

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 1815 年又经割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争<sup>72</sup>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 1870 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sup>214</sup>,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sup>215</sup>。

必然的后果就是 1870 年 9 月 4 日的巴黎革命<sup>216</sup>。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 月 31 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

战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sup>75</sup>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

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sup>①</sup>。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 000法郎(4 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sup>②</sup>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押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

---

① 引自《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90号。——编者注

② 参看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发布的命令,见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32号。——编者注

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sup>①</sup>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5月3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

<sup>①</sup>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主墙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服从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

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sup>129</sup> 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sup>130</sup> 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 1 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sup>①</sup>第 3 篇）。

---

① 皮·约·蒲鲁东《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68 年巴黎—布鲁塞尔—莱比锡—里窝那新版。——编者注

其实在 1871 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sup>①</sup>;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sup>②</sup>,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sup>146</sup>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sup>172</sup>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sup>217</sup>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

① 参看本卷第 232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3 章。——编者注

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

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sup>①</sup> 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持，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

<sup>①</sup>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第257节。——编者注

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sup>218</sup>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子于伦敦

写于 1891 年 3 月初 — 3 月  
14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28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sup>219</sup>

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正好20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领导的资产者和地主们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梯也尔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外敌侵犯，后来还要更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战胜起义的巴黎，地主和资产者们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巴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压垮并被解除了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20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被剥夺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要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

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当东京佬<sup>①</sup>敢于觊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我们在巴黎看到了这种情况;<sup>220</sup>现在我们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俾斯麦的继承人<sup>②</sup>要求帝国国会拨发经费,以使用金钱收买军士来巩固军队中的服从精神,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在军士中有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太多了!<sup>221</sup>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那么旧世界的末日显然就不远了。

让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吧!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让位或者死亡吧!无产阶级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3 月 17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91 年 3 月 25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27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① 茹·费里。——编者注

② 莱·卡普里维。——编者注

##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一书的西班牙文版<sup>222</sup>

给何塞·梅萨的信

1891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萨：

从您本月2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译本即将出版，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说，我们是热烈赞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搜寻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武库。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那么，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娓娓动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残存的唯一的蒲鲁东派<sup>130</sup>，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sup>217</sup>。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议会里和你们的报刊上也有这类共和派，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蒲鲁东的思

---

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使用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意志的正确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3 月 24 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西班牙文载于 1891 年底在马德里出版的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 劳动权利国际群众 大会的委员会<sup>223</sup>

[18]91年4月9日

亲爱的公民们：

万分遗憾，我不能够应你们这样盛情的、对我说来这样荣幸的邀请来参加你们在本月12日举行的大会。20年以前，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的职务<sup>224</sup>，我觉得同你们的国家有特别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遗憾。这个国际从那时以来在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上，它是始终存在着的；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大了；它现在是这样强大，以致1864—1875年的旧的正式形式，对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红旗下的千百万欧美工人说来，已显得太狭窄了。<sup>①</sup>我同你们一道，希望你们4月12日的大会将把新的战士队伍引导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来；希望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

---

① 在草稿中此处删去了两句话：“是的，朋友们，我们在过去的2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来迎接胜利的那一天。”恩格斯将这两句话略作修改后用做致词的结尾。——编者注

人同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弟们——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的联系作强有力的推动；最后，希望大会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

2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有把握的胜利。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弗·恩·

1891年4月9日于伦敦

写于1891年4月9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册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891年单行本导言<sup>225</sup>

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sup>226</sup>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一点并未实现，因为当时接连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sup>227</sup>，德累斯顿、伊瑟隆、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起义<sup>228</sup>——使报纸本身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sup>229</sup>

《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发行量至少应当是1万册，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修改地重印呢？

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sup>①</sup>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在 1859 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 1849 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 1849 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 1891 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工人对最艰深的经济学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有教养的人”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

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

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在经济学中被称做“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商品的价格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在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经济学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给这一商品追加一个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价值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采用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

《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sup>①</sup>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居民中的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445页和第44卷第47—102页。——编者注

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3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借此让他一天工作比如说12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盘算的:

假定我们的这个工人——一个钳工——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20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他所占的份额计算,值1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3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24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27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费用多3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3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马克——就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27马克当中,有21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经按这一价值额降低了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6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12小时的劳动创造了6马克

的新价值。因此,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3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3马克,假使我向他要6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12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6小时内创造的是3马克,即工人劳动12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12小时,而他当做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sup>230</sup>,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

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sup>①</sup>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有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3节<sup>②</sup>)。

那么,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一天的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马克,——至于他是以计日工资还是以计件工资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15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4—205页。——编者注

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6马克的价值,那么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12小时内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2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 $2\frac{1}{2}$ 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25分尼。12件就是3马克;要得到这3马克,工人必须工作12小时。资本家从12件商品上得到30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24马克外,还剩下6马克,从这6马克中,他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3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6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6小时(在12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6小时。

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

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了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一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

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社会的这种状况日益显得荒谬,日益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的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现在工人们正日益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一点,明天(5月1日)和星期日(5月3日)<sup>231</sup>将在大洋两岸都得到验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写于1891年4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sup>232</sup>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万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

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sup>233</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写于1891年5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 (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sup>234</sup>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sup>①</sup>早就希望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sup>②</sup>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

---

① 约·狄茨。——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样大的印数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其他类型的书籍的出版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编者注

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年贝内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现在的这个德文本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sup>①</sup>

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sup>235</sup>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照母亲计算,因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

<sup>①</sup> 由昂·腊韦翻译、劳拉·拉法格校订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文版1893年在巴黎出版。——编者注

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年版)<sup>①</sup>一书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sup>②</sup>的出版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照母权制——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古代经典著作的无数段落中,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由“淫游”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

---

① 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  
——编者注

②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利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利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sup>①</sup>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这时,阿波罗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

<sup>①</sup>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编者注

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美妙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信仰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的事情。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性关系杂乱的尚未认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

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振振有词的推论。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事实,即这种对立即使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乃至一切场合,它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

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此毫不相干,因为这些观念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与此有关。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个妻子,即—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种缺少虽然由—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sup>236</sup>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这些正是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sup>237</sup>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早在1847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sup>238</sup>,也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想象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

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而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然后就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该说依照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第 140 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 146 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反驳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麦克伦南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他那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见地通观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步都成为不可能。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

要多于他的研究<sup>①</sup>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一系列男子共同占有一列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sup>②</sup>)则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种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是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了解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情况。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有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在这些岛屿上，与这种婚姻形式并存而流行的亲属制度，则是一种只有用更为原始而如今业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集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sup>③</sup>一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

①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中不是“研究”，而是“发现”。——编者注

②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能够成立,麦克伦南的精巧设计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间的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凯撒关于布列吞人每10个或12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然而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他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被攻破。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作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不过这

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日罗-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得到十分明确的阐释。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

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目前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史前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窃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恰恰应该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书尽可能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成绩来敷衍一下;对他的叙述中的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顽固地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看来是一贯受到压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sup>①</sup>。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史前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令英国的史前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应用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要依赖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

<sup>①</sup>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91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sup>239</sup>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史前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史前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一种规矩,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到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再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在打破这些教条时,又是用一经说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彷徨于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怎么会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非把摩尔根冷漠地撇在一边不可,那么他还有一个实在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用类似傅立叶使用的方式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就罪有应得,麦克伦南愤然地责难“他根本厌恶历史方法”<sup>①</sup>,而且日内瓦的教授日罗-特隆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sup>②</sup>。可是要知道,这位日罗-特隆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解救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

---

① 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伦敦—纽约新版第250页。——编者注

② 亚·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日内瓦—巴黎版第464页。——编者注

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 14 年了,这 14 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家的公认。<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 年 6 月 16 日于伦敦

写于 1891 年 5 月 20 日—7 月  
初和 8 月底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41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① 我于 1888 年 9 月从纽约返欧途中<sup>239</sup>,遇到一位罗切斯特选区的前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份住在罗切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曾在华盛顿国防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介绍,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加以关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四版准备札记<sup>240</sup>

第 37 页<sup>①</sup>。家庭(群婚制——一般情况——男人仍处于群婚状态——还从未真正地尝试专偶制。)<sup>②</sup>

杂乱的性关系。怀疑这一点现在已成时髦。出现父母和子女结婚的例子,可以看做退化吗? 很难。——动物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哺乳动物呈现了一切形式,甚至猿猴也是这样。关于类人猿我们了解什么? 难道这些材料比传教士关于蒙昧人类的材料更可靠?<sup>③</sup>

关于易洛魁人的氏族<sup>④</sup>。 氏族第 19 页。正是氏族超出了目的,证明兄弟姊妹婚姻被排除,而这种排除或是无意识地自然发生的,或是由

① 恩格斯在本文标注的页码都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 1 版的页码。——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83—84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46—51 页。在这段文字以及从“普那路亚家庭被当做典型形式”至“不消除妇女经济上的依附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的这几段文字上,除“第 40 页。当骑士睡在……”之外,恩格斯划有“/”或“\”的标记。——编者注

④ 这几个字恩格斯写在左边页,没有标注所要插入的位置。——编者注

4. 57.  
Familie (Burggraf) - Abtinal die ...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discussing family and social structures.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continuing the discussion.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including a small diagram or list.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with a small square stamp containing the number '57'.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including a list of numbers.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including a list of numbers.

Handwritten notes in German, including a list of numbers.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手稿



宗教观念促成的。<sup>①</sup>

普那路亚家庭被当做典型形式，因为它完全符合那种亲属制度。但是可能不断偏离，而且肯定发生过偏离。群婚随生活条件而变化。普那路亚家庭最适合大的共产制家户经济（美洲印第安人）。在不可能有普那路亚家庭的地方（澳大利亚）有其他形式。克洛基和库米德。澳大利亚的级别。向氏族过渡。

然后是关于群婚的一般情况。<sup>②</sup>

第 27 页。南美洲仍然存在群婚。<sup>③</sup>

第 28 页。为个体婚制赎罪。姑娘们在结婚前的自由。<sup>④</sup>

第 29 页。是家庭公社的还是氏族的亚伯拉罕。<sup>⑤</sup>

第 39 页。德意志人没有完全的专偶制，因为他们贫穷，没什么可继承的。<sup>⑥</sup>

第 40 页。当骑士睡在……<sup>241</sup>

第 43 页。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仅仅 = 无产者在法律上的平等——不消除妇女经济上的依附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sup>⑦</sup>

男人仍是群婚——1. 群婚制，2. 奴隶制和多妻制，3. 卖淫和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2—53、105—106 页。——编者注。

② 以上两段文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8—61 页。——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65、67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83—84 页。——编者注

⑤ 同上，第 70 页。——编者注

⑥ 同上，第 86 页。——编者注

⑦ 同上，第 90—92 页。——编者注

通奸。<sup>①</sup>

至于我们的庸人如此热衷的专偶制的未来，只有当男人也实行专偶制，而女人不再需要出卖自己，一个习惯于严守婚姻原则的世代成长起来，不再有淫游行为时，才能谈论它的未来。那时就会见分晓。那时女性也会摆脱主要束缚——对后果的担心。<sup>②</sup>

第 188 页。日罗-特隆第一版中的猿猴。<sup>242</sup>

动物家庭中的忌妒，人类群婚中的忌妒。<sup>③</sup>

群婚——包括多妻制在内的奴隶制——卖淫和通奸。<sup>④</sup>

写于 1891 年 6 月中—7 月初

原文是德文

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9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9 卷翻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92—9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93—94、100—101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49—50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86 页。——编者注

#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sup>243</sup>

写于 1891 年 6 月 19—27 日

第一次（没有《第一部分的附件》）发表于《新时代》杂志 1901—1902 年第 20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现在这个草案<sup>244</sup>大大优于以前的那个纲领<sup>245</sup>。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sup>131</sup>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掉了;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 一 绪论共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想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冗繁和拖沓。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那也无妨。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时期难于对新参加进来的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这种教育,那么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

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将随函附上<sup>①</sup>,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sup>②</sup>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三个词是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因为在我国,即使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这样说,要是我,就用最常用的词来表达一切。不过我认为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第二段。**我会在这里加上:“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加上:“……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这些先生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丝毫增加。而在一个纲领中,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它也行,但现在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当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

---

① 见本卷第294—295页。——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发表的版本中这里还有一句话:“第一部分的附件是我对草案的建议。”杂志编辑部给这句话加了一个脚注:“很遗憾这个附件找不到了。”——编者注

Zur Kritik des Entwurfs der Programm-Entwürfe 1891

2388 a

Der Entwurf des Programms ist ein sehr wichtiger Punkt in der Gesch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e. Er ist die Grundlage für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r Partei. Die Programm-Entwürfe von 1891 sind ein wichtiger Schritt in dieser Richtung. Sie zeigen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einer reinen Arbeiterpartei zu einer Partei, die sich für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einsetzt.

H 69

1. Einleitendes. Die Sozialdemokratie ist eine Partei, die sich für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rklasse einsetzt. Sie ist die Partei der Zukunft. Die Programm-Entwürfe von 1891 sind ein wichtiger Schritt in dieser Richtung. Sie zeigen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einer reinen Arbeiterpartei zu einer Partei, die sich für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einsetzt.

Kritik des Entwurfs des Programms

Die Programm-Entwürfe von 1891 sind ein wichtiger Schritt in dieser Richtung. Sie zeigen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einer reinen Arbeiterpartei zu einer Partei, die sich für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einsetzt. Die Programm-Entwürfe von 1891 sind ein wichtiger Schritt in dieser Richtung. Sie zeigen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einer reinen Arbeiterpartei zu einer Partei, die sich für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einsetzt.

2388 b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第一页



正确,不致产生歧义。

如果这段结尾是模仿国际章程的绪论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sup>①</sup>。体质衰退已经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上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慷慨激昂的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占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应当从经济上去说明。但是“个人占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原因在于那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第二,属于这种个人占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什么?是第三类个人占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占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这类个人占有者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534页。——编者注

把两者联结起来,这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如果这里只需举出资本家,那么上面也只需这样提就够了。如果要详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根本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我以为这一点要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慷慨激昂的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惋惜,要是我,就不这样说,而只讲一个简单的事

实：“由于城乡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sup>①</sup>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属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场、矿井”，见第一段。“私人生产”，见前面。我会这样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会像第一部分附件中那样说。<sup>②</sup>

第八段。我不会说“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身”。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建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① 见本卷第 294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95 页。——编者注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适宜于”，我看不如删去。“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一切意思都可以包括在内：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包括了它的各个部分，完全没有必要作特别说明，我认为这样会冲淡印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把话题转到具体要求上去，那么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大力支持一切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不如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sup>①</sup>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

##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大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多得到些达到主要政治目标所需的不同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绝不能达到。帝国宪法<sup>165</sup>，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纯粹是 1850 年普鲁士宪法<sup>246</sup>的抄本，而 1850 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这个宪法在宪法冲突<sup>247</sup>时期证明，政府可以用它为所欲为。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做“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赖茨-施莱茨-洛本施泰因<sup>248</sup>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毫无意义。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着手去解决。这样做多么有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sup>249</sup>，

而不去考虑,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紧迫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就是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突然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难道还要重演当年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宣称保护关税问题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因此谁想怎么投票都行<sup>250</sup>,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衷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sup>148</sup>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

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大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在今天的意大利也同样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消除。——只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保留权利<sup>251</sup>依然存在，而例如图林根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sup>252</sup>，看你怎么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划分为若干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现在正钳制着德国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

和国将是一个进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法律体系同时并存。在小国瑞士,联邦制共和国早已成为一种障碍,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一大退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每个州都有它自己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不分大小,都以州为单位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从下面进行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它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sup>253</sup>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远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政府顾问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不多。我之所以谈到这

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同时也以此说明,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搬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没有这两项我们也总是要前进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讨论过,没有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的,并且至少可以间接地作为对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县和市镇通过依据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讨论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不如你们在当地好作出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区别,那么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有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的?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议机关的决议,应当加以补充。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资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6)“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略去,归入前一条。

(8)和(9)这里我提请你们考虑:这两条要求对 1. 律师, 2. 医师, 3. 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有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有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托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 而这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呢?

(10)这里,我会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起削弱作用的解释或论证。

### 三 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得到保障以防止国家的侵犯。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半数，那我们就上当了。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只要工人中出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不商定在争论的时候两个半数分别表示意见，那么，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好得多。

我请你们在定稿之前再参照一下法国的纲领<sup>254</sup>。在那个纲领里，正好对于第三部分来说，有些东西似乎写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sup>255</sup>可惜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找出来了，它也有许多方面写得很好。

## [第一部分的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沉沦、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据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

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正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压倒,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sup>①</sup>。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身。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sup>②</sup>,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由于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

① 在手稿中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沦为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尾巴”。后来被恩格斯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sup>256</sup>

1891年6月26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sup>257</sup>，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感谢；同时请接受我的歉意，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大会；我谨在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大会各项工作取得成功。<sup>①</sup>

自从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在海恩费尔德<sup>258</sup>重新站稳脚跟以来，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起点的最好保证。

我们党具有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仅是它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sup>②</sup>，不仅是它今年在奥地利就像去年在

---

① 这封贺信恩格斯以私信形式寄给了维·阿德勒，编辑在发表时对文字做了少量改动。在信的草稿中，从“1891年6月26日于伦敦”到本段结束的文字是：“亲爱的阿德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人通过你盛情邀请我参加这次大会，我请你向他们转达我最真诚的感谢；请转达我的歉意，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大会；并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大会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外部胜利”。——编者注

德国那样彻底结束了非常状态<sup>259</sup>。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量的，尤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都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而其他所有由有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在这样的困难面前都是无能为力踌躇不前的。当法国和德国的有产阶级怀着势不两立的仇恨相互攻击<sup>①</sup>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行动起来<sup>②</sup>。而在你们奥地利，当各诸侯领地的有产阶级由于盲目的民族纷争而丧失最后一点点统治能力时，你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将向它们显示出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纷争的奥地利的面貌，一个工人的奥地利的面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sup>③</sup>

写于 1891 年 6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1 年 7 月 3 日《工人报》  
第 27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① 在草稿中不是“怀着势不两立的仇恨相互攻击”，而是“陷入势不两立的争吵”。——编者注
- ② 在草稿中不是“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行动起来”，而是“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却手携手地一致行动”。——编者注
- ③ 草稿中没有署名。——编者注

##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 欧洲局势<sup>260</sup>

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sup>261</sup>

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sup>262</sup> 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代表大会<sup>206</sup> 的决议在过了 19 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开大门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骤证明大家对局势看得是何等的清楚。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表决结果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sup>263</sup>

多梅拉·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空话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

成为“战斗”的政党、重视“事实”的政党的阶级。<sup>264</sup>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 欧洲局势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sup>265</sup>其他国家的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1 150万百升，黑麦歉收为8 700万或1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影响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抓住这个时机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sup>①</sup>）。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

---

<sup>①</sup> 格·瓦·普列汉诺夫《1890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载于《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9年卷第2册第47—51期。——编者注

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照例在为时已晚的时候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派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乡绅”<sup>①</sup>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派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派失去自己的阵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派。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那些有可能执政的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么，在 1898 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

---

<sup>①</sup> 原文“ruraux”，是对 1871 年 2 月 12 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中的保皇党多数派的蔑称，他们主要由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商人组成。恩格斯在此用这一称呼来指德国容克。——编者注

---

25 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么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9 月 2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91 年 9 月 12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51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 草稿片断<sup>266</sup>

德国的资产阶级总是很晚才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这次恐怕也是姗姗来迟。但是，不论是早是晚，社会主义者们都要做好准备。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sup>267</sup>

如果和平不被破坏，那么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机会来了。因为，一场席卷欧洲战争会改变一切。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政府无力对付社会主义。但是，一场战争，正如如今非常可能发生的那样，一场以德国为主战场供 1 000 万到 1 500 万士兵交战的战争，足以在 6 个月内使这个国家倒退到三十年战争<sup>13</sup>结束后的虚弱状态。在 1648 年，新教资产阶级的革命虽然在荷兰、瑞士、苏格兰和英国都取得了胜利，却在战败的德国被镇压了；德国的新教代表的不过是王侯们决定自己的臣民的信仰的权利。如果战争爆发了，而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打击也不会比 1648 年的德国新教所遭受的更糟，如果战争确保了社会主义在别的国家取得胜利，这就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大发生的。

我们要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敢于面对现实，不论它是好是坏。欧

洲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大约写于 1891 年 10 月 13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致《人民之友》编辑部<sup>268</sup>

1891年11月13日于伦敦<sup>①</sup>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人民之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参加大会，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终究要出版才行。因此让这封信来代表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们光荣的纪念日表示祝贺。我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治安法的限制下，像《人民之友》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了解你们<sup>②</sup>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排除万难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是十分光荣的，因为奥地利的出版法认为，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是没有危险性的，它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经费施加压力，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话。如果说布吕恩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内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而且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么，

---

① 在手稿中为“1891年11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里加有“在这10年当中”。——编者注

这就是现在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又一证明。

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再一次对此表示最大的喜悦,因为正当青年捷克派资产者和老年德意志派资产者<sup>269</sup>到处相互争吵的时候,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却团结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和祝贺你们。

你们的老头 弗·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11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1 年 11 月 25 日《人民之友》第 2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 声明的附函<sup>270</sup>

阁下：

兹对一项凭空炮制的无耻之极的诽谤<sup>271</sup>作出答复，随信寄上<sup>①</sup>，请予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竟允许自己的外国通讯员发表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的诽谤性报道，对此我感到遗憾。

您的忠实的

写于 1891 年 11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俄文第 1 版第 28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

① 见本卷第 307—308 页。——编者注

##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sup>272</sup>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阁下：

贵报巴黎通讯员在贵报今天早上发行的那一号上，除对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的家庭作了其他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外，还讲到，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司法部长<sup>①</sup>曾下令逮捕最近在里尔当选为议员的保尔·拉法格先生。<sup>271</sup>这位通讯员接着继续写道：

“据说当时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库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于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sup>②</sup>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务来驳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诬蔑性的指责。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格先生同他的妻子<sup>③</sup>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sup>④</sup>在巴涅尔-德吕雄的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官事先向他透露了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当日，拉法格就骑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sup>273</sup>那时马克思夫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不可能插手并

---

① 茹·阿·斯·杜弗尔。——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

③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④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所谓武器库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其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自我牺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是忠实于您的仆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月17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写于1891年11月17日

载于1891年11月26日《每日  
纪事报》第926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歌咏团<sup>274</sup>

托 登 楠 街

1891年11月28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sup>①</sup>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在今天晚上为我71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朋友<sup>②</sup>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现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写信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计划表示遗憾。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有生之年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

---

① 路·考茨基。——编者注

② 爱·艾威林。——编者注

事稍有所闻,我就会及早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请求你们取消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计划,我只能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把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 50 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忠实于你们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1 年 1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俄文第 1 版第 28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sup>275</sup>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我衷心感谢你们在我71岁生日之际给我的良好祝愿。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91年12月1日

第一次发表于柏林《德国工人  
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  
1970年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卷翻译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英国版序言<sup>276</sup>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 1845 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 24 岁,所以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没有使他感到羞愧。这本书于 1886 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sup>①</sup>和一篇附录<sup>②</sup>。那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

---

①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特征的那些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显得过时了，无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待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段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sup>277</sup>的废除以及随后进行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sup>278</sup>。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经济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不过是最大的一个，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最终，前一时期未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起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相比之下 1844 年的

状况现在已经显得原始和微不足道了。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来说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只要能在任何地方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保持竞争活力还有用处。于是,实物工资制<sup>279</sup>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sup>280</sup>,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其他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在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中更具优势。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大的工厂主,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可以更为迅速而有效地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 of 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并且成了实际的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期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端中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

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他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sup>281</sup>。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1844年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sup>①</sup>的报告中

---

① 《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1号报告》1885年伦敦版。——编者注

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并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sup>282</sup>,“老板”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12 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sup>283</sup>的报道时,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sup>①</sup>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

---

①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矿业无产阶级》一章。——编者注

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它的英译本已经出版<sup>284</sup>)已经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真正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

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经以《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sup>①</sup>为题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照录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 40 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其内容如下:

“40 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侵占这些地区<sup>②</sup>。城市

① 恩格斯《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② 《反谷物法鼓动》,见《评论季刊》(伦敦)1843 年第 71 卷第 141 期第 273 页。——编者注

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sup>285</sup>；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道义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sup>286</sup>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改革法案<sup>287</sup>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法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

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思想比较狭隘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sup>4</sup>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sup>149</sup>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几乎所有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sup>288</sup>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选区的法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就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sup>289</sup>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议会法令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

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主要使用或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sup>290</sup>,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sup>141</sup>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

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 10 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

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sup>①</sup>

但是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它必须持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是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只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

---

<sup>①</sup>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编者注

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sup>133</sup>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

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这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好，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弗·恩格斯

1892年1月11日

大约写于 1892 年 1 月 7 —  
11 日

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德国的社会主义<sup>291</sup>

法文版写于 1891 年 10 月 13—  
22 日,德文版写于 1892 年 1 月  
6—19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1—1892  
年第 10 年卷第 1 册第 19 期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2010 年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有多么彻底地摆脱了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sup>217</sup>——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狂热的影响。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50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sup>①</sup>

---

① 开头的这两段话是恩格斯专门为德文版而写的，发表于《1892年工人党年鉴》的法文原文中没有这两段话。——编者注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sup>①</sup>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sup>136</sup>。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 年 1 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sup>②</sup>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经受住了考验<sup>③</sup>。

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 1862 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利益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贷款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 1848 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纯粹的共和派的<sup>④</sup>《国民报》的那一派<sup>292</sup>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

---

①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纯粹”一词。——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都经受住了考验”，而是“都做到了全力以赴”。——编者注

④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纯粹的共和派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sup>①</sup>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激情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sup>②</sup>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主要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下,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sup>③</sup>原则的工人政党<sup>293</sup>。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sup>131</sup>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sup>④</sup>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与拉萨尔派相互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

---

① 在法文原文中“它”后面有“在舞台上的出现”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而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宣言》”。——编者注

④ 在法文原文中在“转到”的后面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秩序党<sup>①</sup>面前,这种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 1875 年进行了合并<sup>205</sup>。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远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么承蒙俾斯麦在 1878 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sup>93</sup>,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sup>294</sup>,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我们党<sup>②</sup>在其历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波折、斗争、失败和胜利呢?当普选权<sup>③</sup>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和十多万选民;<sup>295</sup>现在它有 35 个议员和 150 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 1890 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 11 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 年时,秩序党的议员<sup>④</sup>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则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未来力量的代表<sup>⑤</sup>。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

---

①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而是“资产阶级议员”。——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我们党”,而是“德国党”。——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普选权”后面有“在 1866 年”这几个字。——编者注

④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的议员”,而是“资产阶级议员”。——编者注

⑤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未来力量的代表”,而是“代表未来力量的先进部队”。——编者注

并在 11 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农村地区<sup>①</sup>，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                    |                      |
|--------------------|----------------------|
| 1871 年·····101 927 | 1884 年····· 549 990  |
| 1874 年·····351 670 | 1887 年····· 763 128  |
| 1877 年·····493 447 | 1890 年·····1 427 298 |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 1895 年选举中至少得到 250 万张选票；而到 1900 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 350 万至 400 万<sup>②</sup>。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 年保守党<sup>98</sup>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 1 377 417 张选票；民族自由党<sup>96</sup>人得了 1 177 807 张选票；德国自由思想党<sup>③103</sup>得了 1 159 915 张选票；中央党<sup>④97</sup>得了 1 342 113 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拥有 250 万张以上

①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农村地区”，而是“旺代<sup>296</sup>”。——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增加到 350 万至 400 万”，而是“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 1 000 万选民中的 350 万至 400 万”。——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自由思想党”，而是“进步党人（激进派）”。——编者注

④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中央党”，而是“天主教徒”。——编者注

选票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sup>①</sup>的主要力量绝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 25 岁才能成为选民,而 20 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 1900 年,这支以前德国最具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命中注定那样不可阻挡地<sup>②</sup>日益迫近。柏林政府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点,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待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现在确实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sup>297</sup>的时候。相反<sup>③</sup>,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sup>267</sup>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对旁观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又有什么用呢?暴力能够粉碎一个有限地

---

①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德国社会主义”。——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不可阻挡地”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相反”一词。——编者注

区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 200 万至 300 万<sup>①</sup>人的党。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sup>②</sup>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sup>③</sup>。

---

①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200 万至 300 万”，而是“200 万”。——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而是“反革命暴力”。——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和更巩固”这几个字。——编者注

##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和平环境中继续发展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其结果会怎样呢?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气的、令人厌烦的、同一个伟大民族<sup>①</sup>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阿尔萨斯—洛林<sup>75</sup>,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会战<sup>214</sup>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今天的欧洲局势。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

---

①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一个伟大民族”,而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  
——编者注

“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或者是<sup>①</sup>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sup>②</sup>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sup>③</sup>，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

---

① 在法文原文中此处加有“短暂休兵之后”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编者注

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石勒苏益格和阿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阿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阿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sup>①</sup>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么，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sup>②</sup>。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瓦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

①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从“这两个国家”开始的这句话为“这两个国家尤其会因遭到破坏而付出代价”。——编者注

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么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sup>①</sup>,永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sup>②</sup>。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和约<sup>36</sup>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 30 年来的不断战斗<sup>③</sup>,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sup>④</sup>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

---

①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无力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而是“无力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战斗”,而是“努力”。——编者注

④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世界上”这几个字。——编者注

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直到最后一个人<sup>①</sup>，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么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他们<sup>②</sup>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体俄国人的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sup>③</sup>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 1793 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sup>298</sup>。1793 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

---

①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直到最后一个人”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在法文原文中这里有“已经争得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无疑”一词。——编者注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sup>①</sup>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sup>299</sup>,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期间不能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10年或15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

<sup>①</sup>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向全世界”这几个字。——编者注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sup>①</sup>上的这篇文章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sup>300</sup>,而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至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sup>265</sup>。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上遭到了失败<sup>301</sup>,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扬扬地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此次高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

① 指《1892年工人党年鉴》1892年里尔版。——编者注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由这场社会革命引起的慢性病,这个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sup>①</sup>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6 页。——编者注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绝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 1861 年垮台了。<sup>302</sup>但又是怎样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 1810 年到 1851 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sup>303</sup>的方法；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sup>65</sup>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缴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缴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工业的市场，而家庭工业

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中间商或英国式的吸血鬼摆布，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30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sup>①</sup>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sup>304</sup>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深刻得多。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旋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么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场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官吏训练得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的县种上了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没有东西可吃,后来则由于同样无可辩驳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sup>305</sup>

不无名气的乔万尼·博维奥在今年2月2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员,说他们太轻视政权形式问题。这一点我倒确实并不在意;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1892年1月16日的《社会评论》)<sup>①</sup>,把同样的指责加在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尤其是我个人的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不久将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什么错的。恩格斯竟然根据数字(而我早就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据)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为期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sup>②</sup>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

---

① 指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330—335页),以《德国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胜利》为题载于1892年1月16日《社会评论》(米兰)第2期。——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想<sup>136</sup> 去呢？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真是这样吗？…… 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能谈论它。可以说，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出形式，但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形式。”

对此，我的答复是，我决不承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 1848 年 1 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这里，我冒昧地采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只有确实成为一名“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一丝一毫怀疑。

整个忠于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皇帝会从社会党中选出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大臣就无法指望得到自己政党的支

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博维奥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老实说,这却使我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太天真了。

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让人们明白,照他看来,德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这一经济革命将怎样进行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自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出形式”。可是,如果明天由于某种出乎意料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执掌政权的职责,那么我会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纲领。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维奥说的。我很想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这样一句“蠢话”记在我们账上。

另外,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能够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于2月1日的《社会评论》)<sup>①</sup>发表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费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

---

<sup>①</sup> 指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第二部分(见本卷第336—346页),以《德国社会主义党与和平》为题载于1892年2月1日《社会评论》第3期。——编者注

为一谈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2月6日

写于1892年2月6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4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2010年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共产党宣言》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sup>306</sup>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sup>45</sup>，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的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

---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sup>289</sup>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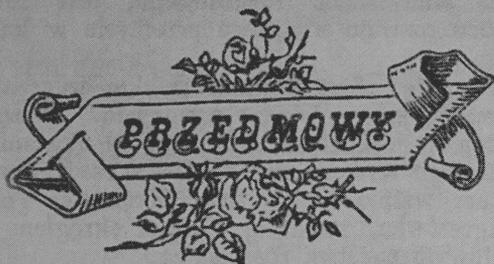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写于1892年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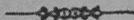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波兰文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Przedmowa do 2<sup>go</sup> wydania polskiego



EN fakt, że nowe wydanie „Manifestu Komunistycznego“ stało się potrzebnem, pobudza do różnych uwag.

Najpierw godnem jest zaznaczenia, że Manifest w ostatnich czasach stał się do pewnego stopnia probierzem rozwoju wielkiego przemysłu na lądzie europejskim. W miarę, jak w pewnym kraju wzrasta wielki przemysł, wśród robotników tego kraju wzmaga się pragnienie wyjaśnienia swego stanowiska, jako klasy robotniczej w obec klas posiadających, rozszerza się wśród nich ruch socyjalistyczny, i rośnie popyt na Manifest. W ten sposób ilością egzemplarzy Manifestu, w języku krajowym rozszerzonych, można z dostateczną ścisłością mierzyć nie

tylko stan ruchu robotniczego, lecz również stopień rozwoju wielkiego przemysłu w każdym kraju.

Tak więc nowe wydanie polskie oznacza stanowczy postęp polskiego przemysłu. A że ten postęp w ciągu dziesięciu lat od ukazania się ostatniego wydania miał miejsce w rzeczywistości, o tem wątpić nie można. Królestwo Polskie, Kongresówka, stała się wielkim okręgiem przemysłowym państwa rosyjskiego.

Gdy wielki przemysł rosyjski rozsiany jest sporadycznie — częś nad zatoką fińską, częś w guberniach środkowych (Moskwa i Władimir), to znowu nad Czarnem i Azowskim morzem, — polski przemysł skupił się na stosunkowo małej przestrzeni i korzysta zarówno z wygod, jak i niedogodności takiego ześrodkowania. Wygody uznali konkurujący fabrykanci rosyjscy, żądając przeciwko Polsce ceł ochronnych, bez względu na swe gorące chęci przerobienia Polaków na Rosyjan. Niedogodności — dla polskich fabrykantów i rosyjskiego rządu — ujawniają się w szybkim rozroście idej socjalistycznych wśród polskich robotników i w coraz większym popycie na Manifest.

Lecz szybki rozwój polskiego przemysłu, przerastającego o głowę przemysł rosyjski, jest swoją drogą nowym dowodem niespożytej siły żywotnej polskiego ludu i nową gwarancją przyszłego odrodzenia narodowego. Odrodzenie zaś niezależnej, silnej Polski jest sprawą, która nietylko Polaków, lecz wszystkich nas obchodzi. Szczere współdziałanie międzynarodowe ludów europejskich jest możliwem tylko wtedy, gdy każdy

##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sup>307</sup>

1892年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天已经过去21年了。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真正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sup>308</sup>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sup>①</sup>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sup>129</sup>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以后，国际也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员！”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

---

<sup>①</sup> 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手稿中，此处加有“国际”一词。——编者注

毁了。<sup>309</sup>

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sup>①</sup>,到今天已经过去 21 年了。1871 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他们当了士兵,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 1871 年要更加强大 20 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sup>②</sup>;响应我们号召的,现在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老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1871 年在公社的巴黎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同巴黎公社社员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写于 1892 年 3 月 17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92 年 3 月 26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79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231 页。——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句话为“当初的几百人如今变成了几千人”。——编者注

---

---

## 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sup>310</sup>

对于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话:在法文本中误作霍普金斯(第 45 页)的这个名字,现已改正为霍吉斯金;在同一个地方,威廉·汤普森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更正为 1824 年<sup>①</sup>。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的文献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3 月 29 日于伦敦

写于 1892 年 3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sup>①</sup> 威·托·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 年伦敦版。——编者注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年英文版导言<sup>311</sup>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sup>205</sup>，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 *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

# SOCIALISM

## UTOPIAN AND SCIENTIFIC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EDWARD AVELING*

*D.Sc.,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SWAN SONNENSCHN & CO.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扉页



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sup>312</sup>，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sup>313</sup>，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和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sup>①</sup>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sup>314</sup>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sup>②</sup> 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sup>284</sup>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① 恩格斯《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② 参看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编者注

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sup>①</sup>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及英国“体面人物”<sup>②</sup>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sup>315</sup>。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sup>316</sup>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

---

① 本文的德译文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在德译文中，从开头到此处的这7段文字被删去。——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①。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②;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对手,即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唯灵论的领域制服这种唯灵论,唯物主义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智之物;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了理智所特有的无所顾忌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

---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人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语词;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在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不过,德译文中在“物质的痛苦”后面加了一句话:“物质的基本形式是物质所固有的、产生种的差别的、活生生的、个体化的本质力量。”——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后面加了一句话:“物理运动让位于机械运动和数学运动。”——编者注

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里斯特列也同样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自然神论<sup>317</sup>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sup>①</sup>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sup>318</sup>

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呢。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sup>319</sup>,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sup>①</sup>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sup>133</sup>。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sup>②</sup>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至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sup>320</sup>。我时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编者注

② 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编者注

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sup>321</sup>，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 200 年前已经走得比今天的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sup>①</sup>“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价值，那时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何他的《论天体力学》<sup>②</sup>只字不提造物主，对此，拉普拉斯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

① 在德译文中，括号里的话被删去。——编者注

② 指皮·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8—1825年巴黎版第1—5卷。  
——编者注

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sup>①</sup>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绝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sup>②</sup>。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

①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被删去。——编者注

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sup>①</sup> 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sup>②</sup>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不管何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

---

① 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参看他的《逻辑学》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二编《本质论》。——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而是“在各个事物背后”。——编者注

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時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sup>①</sup>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sup>②</sup>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sup>③</sup>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

---

① 在德译文中没有“显然”一词。——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人物”。——编者注

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sup>①</sup>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sup>②</sup>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sup>③</sup>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sup>④</sup>,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

---

① 在德译文中,在本段之前,恩格斯把英文用语“middle-class”(“中等阶级”)译为“Mittelklasse”(“中等阶级”)。从本段开始,直至以“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一句起首的那一段结束(见本卷第373页),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class”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ürgerthum”(“资产阶级”);后面,恩格斯又把“bourgeoisie”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没有“成功地”一词。——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逐渐”一词。——编者注

④ 在德译文中不是“物理特性”,而是“特性”。——编者注

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率先振臂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sup>①</sup>搏斗。

资产阶级<sup>②</sup>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sup>322</sup>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sup>③</sup>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分子的要求。<sup>323</sup>他的宿命论的

---

①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艰苦”一词。——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欧洲资产阶级”。——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帝的中央政权”。——编者注

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路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打开大门,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派已变成诸侯<sup>①</sup>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派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sup>②</sup>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sup>③</sup> 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小诸侯”。——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为:“无论如何,只是由于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得以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得以被送上断头台。”——编者注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sup>①</sup>。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sup>②</sup>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斗争,以自由党历史学家誉为“光荣革命”<sup>324</sup>的<sup>③</sup>较为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sup>④</sup>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转变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sup>325</sup>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sup>⑤</sup>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

---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此处加有“1689年的”。——编者注

④ 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到“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见本卷第376页)这句话为止(个别地方除外),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class”(“中等阶级”)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⑤ 在德译文中没有“间接地”一词。——编者注

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尊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sup>①</sup>学说,不仅震撼了中等阶级<sup>②</sup>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于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适合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的宗教。它随同霍

---

① 在德译文中这里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②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恩格斯把它译为德文词“Mittelstand”(“中间等级”)。——编者注

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sup>326</sup>,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派<sup>327</sup>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sup>328</sup>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

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sup>329</sup>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吉利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只有英吉利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sup>①</sup>,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sup>②</sup>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保存了好几个世纪”,而是“原样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没有“海外”一词。——编者注

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sup>330</sup>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sup>331</sup>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本能<sup>①</sup>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调整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种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sup>287</sup>，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sup>277</sup>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

---

① 在德译文中没有“本能”一词。——编者注

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sup>①</sup>的法律。<sup>332</sup>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sup>285</sup>,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sup>333</sup>。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

---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禁止工人结社”,而是“禁止结社自由”。——编者注

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sup>①</sup>，从美国输入了奋兴派<sup>334</sup>，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做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sup>②</sup>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那个王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sup>③</sup>，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sup>213</sup>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等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sup>4</sup>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

① 乔·特朗布尔。——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整体”，而是“阶级整体”。——编者注

③ 在德译文中没有“即1848—1851年”。——编者注

开演说<sup>①</sup>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sup>②</sup>,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sup>③</sup>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sup>④</sup>

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

---

① 参看《福斯特先生在布拉德福德》,载于1871年10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7184号。——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不是“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而是“他说”。——编者注

③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德译文为“Bourgeois”(“资产者”)。——编者注

④ 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都受到控制,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们也没有觉察,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40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10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便询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维系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

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sup>335</sup>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sup>149</sup>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要求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sup>188</sup>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sup>3</sup>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镇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sup>①</sup>,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sup>336</sup>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

① 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

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sup>①</sup>，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等阶级<sup>②</sup>。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sup>337</sup>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sup>③</sup>——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了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奋兴派<sup>④</sup>，从崇礼派<sup>338</sup>直到“救世军”<sup>320</sup>。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sup>⑤</sup>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

---

① 见约·曼纳斯的诗集《英格兰的托付》1841年伦敦版第24页。——编者注

②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德译文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③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德译文为“Bourgeois”（“资产者”）。——编者注

④ 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持各种奋兴派”，而是“以从事各种可能的宗教鼓动”。——编者注

⑤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体面的英国庸人”。——编者注

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sup>339</sup>,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sup>①</sup>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sup>340</sup>,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来说,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材!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

---

① 在德译文中没有“每逢星期日”。——编者注

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sup>341</sup>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sup>141</sup>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化为乌有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 25 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

如果德国的中等阶级<sup>①</sup>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sup>②</sup>,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写于1892年4月4—2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① 英文原文为“middle-class”,德译文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

——编者注

② 在德译文中没有“毅力”一词。——编者注

##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sup>342</sup>

1892年5月31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希望代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sup>343</sup>。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活动自由，对于奥地利工人能够克服限制他们的活动空间的无数障碍，争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我们无疑要给以高度评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进；当前最独具特色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工人运动到处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2年5月3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6月10日《工人报》第2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卡尔·肖莱马<sup>344</sup>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了一座新墓,在墓前哀悼的,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肖莱马于 1834 年 9 月 30 日生于达姆施塔特;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德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 1858 年移居英国,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当时的英国提供了不只一种大展宏图的机会。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衷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史密斯当助手,后来给不久前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sup>345</sup> 化学教授的罗斯科当助手。1861 年,担任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被聘为欧文斯学院正式的实验室助手。

在 60 年代,他完成了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选择最简单的有机物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原本仅由碳和氢构成的物质,若用其他简单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完全不同性能的另外的物质;这种仅由碳和氢

构成的物质就是烷烃,石油里就含有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烷烃,从烷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醚等等。我们现在关于烷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烷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他还发现和制取了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烷烃。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深入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也就是说,研究了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以及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拒绝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60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烷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确立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他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一直怀着很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阶段<sup>131</sup>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

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但他仍留在曼彻斯特,还是尽可能地谦虚为人。后来情况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新设了有机化学的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他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价值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荣誉当做是自然之事,因而也就淡然置之。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sup>239</sup>然而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1890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1891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sup>346</sup>,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今年2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出家门,从5月起便卧病在床;6月27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瑞士去达姆施塔特。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总之,他母亲<sup>①</sup>和他兄弟<sup>②</sup>家遭到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他在那里的住所也遭到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

① 菲·肖莱马。——编者注

② 路·肖莱马。——编者注

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住了手：同英国发生外交纠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施塔特成为一大丑闻而告终，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 500 票。<sup>347</sup>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墓前献了花圈，花圈上系着红饰带，写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7 月 1 日于伦敦

写于 1892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

载于 1892 年 7 月 3 日《前进报》  
第 153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sup>276</sup>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 1845 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 24 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 1887 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 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sup>①</sup>是根据美国版序言<sup>②</sup>写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至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

---

① 见本卷第 312—326 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编者注

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会战<sup>348</sup>以后,连那条德国市侩的老规矩也声誉扫地了,那条规矩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sup>277</sup>的废除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sup>278</sup>。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

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产品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sup>279</sup>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sup>280</sup>，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

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他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目前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

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sup>281</sup>。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1844年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当然,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sup>①</sup>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

---

① 见《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1号报告》1885年伦敦版。——编者注

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sup>282</sup>，“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sup>283</sup>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sup>①</sup>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

---

①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矿业无产阶级》一章。——编者注

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一篇文章<sup>①</sup>

<sup>①</sup> 恩格斯《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sup>①</sup>。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sup>285</sup>;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sup>149</sup>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sup>286</sup>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sup>287</sup>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

① 《反谷物法鼓动》,载于《评论季刊》(伦敦)1843年第71卷第141期第273页。——编者注

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sup>4</sup>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sup>149</sup>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

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sup>288</sup>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sup>289</sup>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

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木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

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sup>290</sup>,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sup>141</sup>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危机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10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

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sup>①</sup>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

---

①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编者注

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是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sup>133</sup>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1885年所写的文章。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

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

的前辈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这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成员正在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至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sup>①</sup>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料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个工人候选人<sup>②</sup>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sup>③</sup>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一心要把自己的工人本色淹没于自由主义海洋，以求得别人宽恕的人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很不光彩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

① 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②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③ 乔·豪威耳。——编者注

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到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写于1892年4月底—7月2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sup>349</sup>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休止的妥协,造成一种充满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形势由于有相当多的好处,实际上为人们所容忍,可是它的逻辑上的荒谬却使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政党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诡辩、歪曲,以致纯粹用空话来支吾搪塞。于是,在政治领域里就培植出一种重复神学护教论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词句和欺人之谈、把神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到世俗的土壤中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sup>3</sup>就自己给道道地地的自由党<sup>4</sup>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教论也就从普通人的意识中得到一种它在别国所得不到的论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纽约里宣扬的教义正相矛盾,这有什么关系?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吗?英国宪法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它毕竟存在着,<sup>350</sup>因此就是真实的!

[18]92年9月12日

---

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或者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

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领域,在美国特有的投资场所,以及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sup>351</sup>。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一场特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中。

大约写于 1892 年 9 月 12 日和  
随后几天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sup>352</sup>

亲爱的同志们：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9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的。

根据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1893年召开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sup>353</sup>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联书记威廉·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sup>354</sup>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就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帕涅尔同志（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答说：1893年已经有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要召开，一个在苏黎世，另一个在芝加哥<sup>355</sup>；苏黎世临时委员会已经邀请工联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所以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而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表

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同英国工人相比，大陆上的工人组织涣散、软弱无力；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论(wild theories)承担责任，等等。只是在此之后，才宣读了我们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信。

最后，以 189 票对 97 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并且通过了一项提案：“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就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侮辱。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在感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因而让老的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我们希望这些比较明智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改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决议的侮辱。我已经将格拉斯哥事件告知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希望他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因为法国的同志们过几天就要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sup>356</sup>，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第一次反击。

而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sup>224</sup>，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于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知西班牙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写于 1892 年 9 月 16 日

原文是西班牙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的  
补充材料<sup>357</sup>

补充材料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书记。<sup>224</sup>

(2)《状况》<sup>①</sup>的新版。1892年版。

(3)《路·费尔巴哈》<sup>②</sup>。1888年斯图加特版。

大约写于1892年10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俄文第2版第50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

## 美国的总统选举<sup>358</sup>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天命，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指的是使人的一切愿望和追求终成泡影，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认识自己本身即将灭亡的必然性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它们今天结合于世界市场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来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我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sup>①</sup>。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美国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

---

① 《前进报》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7月《新时代》。”恩格斯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这种垄断的束缚；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 and 道德禀赋，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关税已成了工业的桎梏，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说，如果美国实行了贸易自由，那么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场上击败英国。

果然，1892年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为贸易自由开辟了道路。<sup>359</sup>麦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sup>360</sup>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不合理地抬高一切进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许多本地商品的价格，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部分销路，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内市场则已经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保护关税制度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组织的垄断势力支配市场，从而剥削国内的消费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度造成的持续的国内工业危机，只有使自己向世界市场开放，为此它就必须摆脱保护关税制度，至少要摆脱像现在这样不合理的保护关税制度。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舆论上的大转变，证明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它就会——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于英国——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竞争。在所有的市场上，英国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和钢铁产品，将被迫投入一场同美国产品的竞争，而且最终要遭到失败。美国的棉麻织品现在就已经在排挤英国货。读者想知道，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奇迹，使得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工人经过短短一年光景就从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激烈的反对者转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吗？<sup>361</sup>那就请翻开今年10月的《新时代》第2

期第 56 页,在那篇文章<sup>①</sup>里你们会看到,美国的棉麻织品正一步一步地把英国货挤出中国市场;英国货的进口在 1881 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赶上美国货,而在 1891 年只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世纪的临近,一切关系都在变化。如果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将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的强盛苟延残喘,而无产阶级则饿肚皮的<sup>102</sup>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前一条出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水平已经大大超出了可以容忍这一点的程度。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度在美国的废止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最终胜利。

而德国呢? 1878 年已经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德国,现在正由于它愚蠢地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渐丧失这种地位,它现在是否会仍旧顽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税来给自己关上——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美国竞争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之门呢? 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以美国为榜样,还是仍旧消极地等待,让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和大工厂主结成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卡特尔<sup>102</sup>强行压垮呢? 目前的情况是,德国正要投入一场工业竞争,对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最强盛的国家,它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偿还了巨额战争债务,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税款;而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

---

<sup>①</sup> 《美国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载于《新时代》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56 页。——编者注

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用难以承受的新的军费负担<sup>362</sup>压垮德国的经济力量,它们会不会最终认识到这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干成一件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于它太狭隘,太怯懦,它只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它的戏已经彻底演完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2 年 11 月 9 日—14 日  
之间

载于 1892 年 11 月 16 日《前进  
报》第 26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sup>363</sup>

1818年5月5日生于特里尔,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当过律师,后为司法顾问。从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亨利希·马克思于1824年同全家一道放弃犹太教而改信新教。<sup>364</sup>卡尔·马克思在特里尔文理中学毕业后,从1835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以后又攻读哲学;1841年,他在柏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论述的是伊壁鸠鲁哲学。<sup>365</sup>同年,他迁居波恩,打算在波恩大学谋求一个教职;但是,政府对他在这所大学讲授神学的友人布鲁诺·鲍威尔百般刁难,鲍威尔最终被大学解聘<sup>366</sup>,这个事实使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在普鲁士的高等学校里是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的。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莱茵激进资产阶级年轻一代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人,在自由派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的同意之下,决定在科隆创办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纸;马克思和鲍威尔也被列为有才干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可少的许可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领到了,于是,《莱茵报》就从1842年1月1日起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了一些长篇文章,从波恩寄给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有:一篇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批评文章,一篇关于摩泽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林木盗窃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sup>①</sup>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

<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第六

该报的领导,并移居科隆。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对派性质。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该报先是受到双重的,后又受到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书报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区长官复查,最后还要由专门从柏林派来的冯·圣保罗先生检查),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禁止该报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报纸以此为代价获准缓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查禁了。<sup>367</sup>

于是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阿尔诺德·卢格在《德国年鉴》大约同一时间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sup>368</sup>燕妮是马克思青梅竹马的女友,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订了婚。1843年秋,这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踟躇于黑格尔哲学和政治激进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则投身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从而转向了社会主义。1844年9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两人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性著作(随着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他们同布鲁诺·鲍威尔也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

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编者注

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大的德文周报的编辑工作,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拙劣。普鲁士政府以此为借口要求基佐内阁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这个要求得到满足;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不久之后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以及《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此外,马克思有时还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文章。<sup>369</sup> 1848年1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sup>370</sup> 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春加入了这个团体)。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许许多多经作者授权的和未经作者授权的德文版本,并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

当1848年二月革命<sup>58</sup>爆发并且在布鲁塞尔也引发了人民运动时,马克思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马克思重返巴黎,于是马克思又回到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首先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反对组织军团的儿戏,因为这给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经成为累赘”的外国工人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组织起来的比利时军团、德国军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堕入预先设置好的陷阱,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为400名失业的德国人争取到了和参加军团的人同样的路费,使他们也得以返回德国。

4月间,马克思迁往科隆;在他的领导下,《新莱茵报》于6月1日开始在科隆出版,该报在次年5月19日出版了最后一号;编辑们面临着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鲁士国民被驱逐出

境的危险。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鲁塞尔期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sup>371</sup>在该报存在期间,马克思曾经两次被陪审法庭传讯:1849年2月7日被控违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动武装对抗政府(在1848年11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宣判无罪。<sup>372</sup>

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6月13日示威<sup>373</sup>以后他被迫作以下的选择: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起来,或者是再次离开法国。不言而喻,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于是他移居伦敦,并且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1848年至1849年》<sup>①</sup>阐明了这几年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许多书评和政治述评。在前一著作发表后不久,他又撰写了该著作的续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1869年和1885年在汉堡重版)。科隆发生的重大的共产党人案件<sup>128</sup>,促使他撰写了又一本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近一版于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从1852年起马克思担任《纽约论坛报》的驻伦敦通讯员,并且在许多年当中可以说是该报欧洲栏的编辑。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则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而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论述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文章,而且往往是完整的系列文章。其中的

---

① 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1—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编者注

军事文章——论克里木战争、印度起义等——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有几篇<sup>①</sup>曾经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他才停止为《论坛报》撰稿。

1859年,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福格特展开论战,这场论战由意大利战争<sup>69</sup>引起,以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而结束。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进行了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有了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可是,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如何阐述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的一切细节;迄今保存下来的手稿<sup>374</sup>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这样,他没有继续出版那几个分册,而是直到1867年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在汉堡出版)。

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初稿——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到机会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作。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sup>129</sup>成立了。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②</sup>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朱泽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的、以“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

① 指马克思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的第1、2、3、4、5、7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获得通过;<sup>375</sup>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国际的领导地位。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被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需指出一点:马克思成功地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绪论,在这个章程之下,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得以团结一致地合作共事;协会的和谐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才遭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完全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果继续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同他们同流合污的蒲鲁东分子的斗争。不值得为此花力气。因此,当海牙代表大会<sup>206</sup>在形式上取得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之后,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这样就保证了协会继续存在下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须在欧洲恢复协会的时刻到来。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经过时了;运动大大超越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

人通信,他们遇到重大的事情,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马克思请教。他越来越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顾问。但是,尽管如此,这时马克思得以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上来,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使《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的撰写具有前人从未企及的完善性。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很可惜,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1881年12月2日他的夫人<sup>①</sup>去世,1883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sup>②</sup>去世,就在同一年的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静静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都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sup>③</sup>

现在把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详尽地开列如下:

1842年在科隆《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摩泽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该报1842年10月至12月的社论。

在《德法年鉴》(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合编,1844年在巴黎出版)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

---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181 Marx Karte T 18 B. 1 0 (5X1)

- 1/ Bekleidungsartikel, aber Familien Angelegenheiten
- 2/ Artikel über die Provinzialverwaltung, Preussische Verfassung in Rhein. Zeitg. 1842.
- 3/ da in Briefen Marx, Preussische: Einleit. zur Kritik der Preuss. Verfassungsges. 3. Jahrgang. 1844.
- 4/ in d. Preuss. die preuss. Familien Angelegenheiten 1845
- 5/ Kleinstädter in Preuss. Provinz 1848.
- 6/ Briefe in d. Rhein. Zeitg. 1846-47.
- 7/ Kleinbürgerliche Kritik, Reproduction der preuss. Verfassung des Rheinl. Provinz. 1847.
- 8/ Kleinbürgerliche Kritik, Preuss. Provinz 1848.
- 9/ Briefe Preuss. Provinz der Rheinl. Provinz, London 1848, Preuss. Briefe 1848,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0/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1/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2/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3/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4/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5/ Briefe in d. N. 47, 48,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 16/ Revolution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 in Stuttgart "The Peace" (Lange) 28 June 1858 in London 14 April 1857.
- 17/ Briefe in d.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57 in "Das Volk", London 1857.
- 18/ Briefe in d.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57 in "Das Volk", London 1857.
- 19/ Briefe in d. Rheinl.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57 in "Das Volk", London 1857.
- 20/ Inaugural address in London 1858, alle Publikation in G. R. die mit der Civil Service France 1871, in Preuss.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74
- 21/ Das Kapital, I, Preuss.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74,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 22/ (Preuss.) Das Kapital, II, Preuss. Provinz, Preuss. Provinz & Kritik. (Lange)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 23/ "Das III. Band (III. Teil) des Kap. mit 1895 erschienen.

H 72

恩格斯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44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sup>376</sup>

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德文版,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西班牙文版,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英文版,1888年在波士顿出版。德文版,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

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最新德文版,1890年在伦敦出版;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译本。

在《新莱茵报》(1848—1849年在科隆出版)上发表的文章及社论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最新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译本。<sup>377</sup>

《两个政治审判案》,1849年在科隆出版(包括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

《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共出六期。其中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1848年至1849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和每月述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第三版1885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译本。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巴塞尔出版(该版被没收);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新版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

1851年至1862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几篇关

于帕麦斯顿的文章于 1856 年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增订本)。

1856 年 6 月至 1857 年 4 月在设菲尔德和伦敦出版的《自由新闻》上发表的《18 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辉格党<sup>188</sup>大臣们对俄国的长期卖身投靠)。

在《人民报》(1859 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关于 1859 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sup>378</sup>。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在柏林出版。1890 年出版波兰文译本。

《福格特先生》,1860 年在伦敦出版。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 年在伦敦出版;此外还有总委员会发表的所有文章,其中包括 1871 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新德文版 1891 年在柏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7 年在汉堡出版;最新第四版 1890 年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

《资本论》第二册,1885 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俄文译本。第三册将在 1893 年问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2 年 11 月 10 日—23  
日之间

载于 1892 年《政治科学手册》  
耶拿版第 4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sup>379</sup>

《人民论坛》发表了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写一篇短文予以驳斥。

虽然作者<sup>①</sup>表面上似乎尽力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阐述自己的主题,但实际上,他的叙述却正中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下怀,与这些先生们自己的叙述如出一辙。譬如说,他对巴枯宁派的材料旁征博引,对巴枯宁派的日内瓦对手们所公布的材料则引用得很少,至于伦敦总委员会的材料,那就根本只字不提了。

我只从一篇文章(11月12日第十篇)中举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谎言。

说总委员会1871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sup>157</sup>,“只有瑞士无政府主义各支部没有接到通知;但是,它们得悉这一意图”云云。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公开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无二致;这次会议没有在报纸上宣扬,也没有邀请记者到场。

汝拉各支部当时公开与总委员会对抗,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正

---

<sup>①</sup> 路·埃里蒂埃。——编者注

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独裁者”马克思的建议当选的。尤其要指出的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部的联系;他早在1871年3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被它们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 说代表会议

“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法院路附近一家名为蓝柱的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一段话,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sup>①</sup>巴黎的第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的)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sup>380</sup>

日内瓦代表大会<sup>138</sup>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主,就在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在日内瓦被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断言,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如此。总委员会受这次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71年出版了章程的英

<sup>①</sup>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6页。——编者注

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文本<sup>①</sup>，此举当然令巴枯宁主义者大为扫兴，他们的招摇撞骗行径也就收场了。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改动记在上面的那份章程<sup>②</sup>，这些改动只限于章程的条文本身，完全没有涉及绪论部分。

此外，说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于日内瓦委员会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里，我对作者的真正意图产生了一些怀疑。他究竟是识字还是不识字。如果说他识字，那么他在代表会议的决议里只能够读到：(1)撤销汝拉委员会(擅自使用)的罗曼语区委员会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给原先的日内瓦委员会；(2)敦促汝拉方面妥善解决他们同日内瓦方面的争端；(3)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么他们应当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sup>381</sup>因此，代表会议所做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内瓦方面和汝拉方面拥有各自的自主权。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要么真正是，要么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对可怜的被诽谤的无政府主义者羔羊的话全都深信不疑。对于这些先生们认为最好不谈的事情，我们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他对整个争端的内幕也一无所知。在巴枯宁创建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sup>158</sup>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同盟<sup>382</sup>，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领导权弄到无政府主义者手里。这个秘密的同

---

① 分别指《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年伦敦英文版、1871年伦敦法文版、1872年莱比锡德文版。——编者注

② 这份留有马克思手迹的章程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盟在汝拉、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党羽广布。总委员会最先是从小西班牙获得这方面的证据,后来又从日内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无辜的阴谋有关的章程和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海牙代表大会在 1872 年才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sup>206</sup>为搞清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的始末,以便纠正目前正在冒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所作的歪曲,可以读一读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 年伦敦和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874 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 11 月 15 日于伦敦

写于 1892 年 11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2 年 11 月 19 日《柏林人民论坛》报第 47 号附刊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sup>383</sup>

[18]92年11月30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衷心感谢同志们的友好祝福。愿协会将来到我的年龄时，能像我现在这样感到幸福。

致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92年11月30日

第一次发表于柏林《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1970年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1970年第10期翻译

##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sup>384</sup>

最近有些唯理论的民族志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这篇我译自旧历 1892 年 10 月 14 日的莫斯科“Russkija Vjedomosti”（《俄罗斯新闻》）的报道<sup>①</sup>是值得一读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群婚，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性交的权利还在盛行，而且肯定了这种群婚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姊妹结婚而组成的，而在库页岛上，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的所有姊妹结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有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自由发生性的关系。可见，它跟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的丈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这篇报道也证实了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四版第 28—29 页<sup>②</sup>所讲的话：群婚绝不像我们的庸人的惯于妓院的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们，并不是公开过着庸人暗中所过的

---

① 《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载于 1892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新闻》（莫斯科）第 284 号。——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 年德文第 4 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60—61 页。——编者注

那种淫荡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我们现在还可以遇见的例子来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一夫多妻制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许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许可而已。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在逐渐消亡，那只不过证明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这种婚姻形式很少能见得到，也可证实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是相似的，其基本特征甚至是相同的。关于库页岛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记载，大部分都适用于印度的德拉维达部落、南太平洋各岛屿发现时岛上的土人，以及美洲的红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安·杨楚克 10 月 10 日（旧历；新历为 10 月 22 日）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上宣读了施特恩堡先生关于吉里亚克人<sup>385</sup>的有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生活在库页岛的很少被人研究的部落，这个部落还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段<sup>①</sup>上。吉里亚克人不懂农耕和制陶术，主要靠渔猎为生，用投入炽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家庭和氏族制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弟也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sup>②</sup>的子女通通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众所周知，北美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法<sup>③</sup>，不过在他们中间，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这种称呼法却是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状况的标识。直到现在每一个吉里亚克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享有丈夫的权利，至少人们并不认为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编者注

②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亲属”。——编者注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编者注

行使这些权利是被禁止的事情<sup>①</sup>。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群婚<sup>②</sup>的残余,颇似本世纪上半叶还在桑威奇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这种形式的家庭和氏族关系<sup>③</sup>是吉里亚克人的整个氏族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父亲的一切兄弟(血统较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sup>④</sup>、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sup><?></sup><sup>386</sup>、由他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女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生活遵循下面的原则。氏族内部绝对禁止通婚。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转嫁给死者的同胞兄弟或名义兄弟<sup>⑤</sup>当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我们没有穷人,谁有需要,哈里<氏族>就来养活他。’氏族成员还通过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等联系在一起。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不受非本氏族的人的侵害。<sup>⑥</sup> 报复的手段是血族复仇,<sup>⑦</sup>但是在俄罗斯人的统治下,这一手段的使用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氏族也收养其他氏族的人,但这只是一些罕见的个案。通例是死者的财产不得出氏族。在这一方面,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一项有名的条文: *si suos heredes non habet, gentiles familiam habento*——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sup>387</sup> 吉里亚克人生活中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有氏族的参与。在不久以前,即大约一两

- 
-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被禁止的事情”,而是“罪恶”。——编者注
- ②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编者注
-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关系”,而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编者注
- ④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统较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所有亲等的)”。——编者注
- ⑤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兄弟或名义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弟”。——编者注
- ⑥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非本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 ⑦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报复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代以前,氏族长者还是氏族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几乎仅限于主持宗教仪式了。氏族成员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过,同氏族人即使不生活在一起,也会互相惦记,互相来往做客,互相提供帮助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自己氏族的墓地。氏族生活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生活,给他们的性格、习俗和制度,都打上了非常显著的烙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长久维护同氏族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sup>①</sup>时的团结一致,和十几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之,他们几乎总是生活在人群当中,这一切使吉里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做客。好客的美好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困难的年月中,当吉里亚克人自己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有把握地去做客,而且常常可以在那里吃住很长时间。

在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中间,几乎完全没有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里亚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一间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耻心,如果他被揭露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亚克人中间,杀人事件是十分罕见的,而且几乎都是由于盛怒,而从来不是出于贪图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sup>②</sup>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曾长期隶属于汉化了了的满族人<sup>388</sup>,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移民<sup>③</sup>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德。不过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上的吉里亚克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承受文化上坏的东西。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一些,因此有可能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开始有所影响了。他们走村串户地做生意,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打工,而每个从谋生处返回故乡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城市里打工而且机遇变化无常,愈来愈使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的那种原始平等遭到破坏。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

②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

③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

施特恩堡先生的论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法律制度<sup>①</sup>等方面的材料。该文将在《民族志学评论》(Etnografitscheskoje Obozrenie)上全文刊载<sup>②</sup>。”

大约写于 1892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4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①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编者注

② 列·雅·施特恩堡《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载于 1893 年《民族志学评论》(莫斯科)第 2 期。——编者注

##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sup>389</sup>

[18]92年12月9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们：

衷心祝贺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正因为你们长期坚持斗争，所以你们能够隆重地举办这个美好的庆典。

奥地利境外也有不少人赞赏你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毅精神。你们的过去也是我们大家未来的保证。

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庆典。

再一次表示祝贺，无产者的庆典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万岁！

永远忠于你们的

弗·恩格斯

写于1892年12月9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78年3—4月  
《党史出版》第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sup>390</sup>

尊敬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纷<sup>391</sup>表示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宜出面解决，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我也没有能力解决。我只能表示愿望，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意见分歧和<sup>①</sup>消除分裂的危险。

衷心祝愿党代表大会获得成功。

你们的 弗·恩·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2 日或  
3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① 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留住帕·恩格尔曼同志这样一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

##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 不久前的行径<sup>392</sup>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说什么警察当局破获了一个极其卑鄙的阴谋。据说有几个“俄国虚无主义者”<sup>66</sup>密谋要把那个温和的所有俄罗斯人的沙皇和君主<sup>①</sup>送上西天;但是警察当局有所戒备,“谋杀案的凶犯”被抓住了,俄罗斯祖国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国虚无主义者”之所以荣膺这样一个称号,只是因为同俄国人的关系是虚无的,也就是说两者毫无关系。这仅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统治下出生的波兰人;他们非常安静而规矩地居住在巴黎,决没有幼稚到要去搞暗杀阴谋,——有理智的人现在都知道,干这种事是警察当局的专长。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波兰姓氏不得不公之于众,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连警察当局也觉得暗杀和阴谋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了。警察当局不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讯社和路透通讯社说,这些人只是即将被驱逐出法国。

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

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部长、参议员、众议员——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巴拿马丑闻<sup>393</sup>:有的是受贿

---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人,有的是同谋犯和包庇者。然而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公众对他们这一方面的齷齪活动已经关注太久了。他们想:世人说我们以骗人勾当败坏了共和国的声誉,这种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我们让他们看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们能够大大地超过已故的俾斯麦。俄国公使馆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们就来证明我们强烈希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给它,不仅把档案,而且连波兰人也一道,要是有必要,则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给它!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而自取灭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它的继承者已经等在门外:它的继承者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在大搞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危险;它的继承者将是社会主义者。然而法国现今的统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他们讨好官方的俄国,央求它的恩宠,他们舔它的长靴,他们在这帮俄国窃贼面前低三下四,他们把沙皇奉为法国的真正主宰和法国政治的领导者,——而沙皇自己却处于软弱无能的境地,根本不能给法国以任何实际的帮助。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sup>265</sup>将持续若干年;国内的资源已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财政状况简直是糟糕透顶。不是法国需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没有法国的道义支持就会完全丧失活力。只要这些法国资产者稍微有点理智,他们无需用金钱和战争就能够迫使他们的俄国同盟者去做一切。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屈服于它,并且让自己被利用来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甚至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sup>394</sup>也是没有做过的。可是他们还自以为很精明;他们没有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们这些蠢人!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是亨利四世说过的话,当时他以改信天主教换得了巴黎投降。La

---

France vaut bien une Marseillaise——很值得为法国奏一次《马赛曲》，这是亚历山大三世说过的话，当时他在政治上束手无策，毫无出路，而海军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奉献给他<sup>395</sup>。

写于 1893 年 1 月 9 日或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3 年 1 月 13 日《前进报》第 11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sup>396</sup>

### 一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美丽的意大利坚持不懈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马案件<sup>393</sup>的国度——美丽的法兰西，也不亚于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且有韦耳夫基金<sup>397</sup>的国度——贞洁的日耳曼尼亚<sup>398</sup>。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在托斯卡纳，一家在那不勒斯，一家在西西里，还有两家在罗马，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通用的支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 1892 年 12 月 31 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到 1893 年 3 月 31 日。

早在 1889 年，由于这种银行特权必须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有令人不安的流言四处传播，克里斯皮内阁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经营情况。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尔维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吉尼作为专家协助他。孔西利奥发现

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尔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据的副本，在阿尔维西死后，落到了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得到授权的人的手中，由此而爆出了意大利人所说的 Panamino，即小巴拿马骗局。

当时克里斯皮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尔维西的报告搁置起来。阿尔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丑事抖搂出来，但是每一次都被人堵住了嘴。后来，当曾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为了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作了一个大肆美化罗马银行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尔维西不要以揭露来损害他和国家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尔维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斯皮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现在执政的乔利蒂内阁上台。但最终的银行法——其中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就像在儿童游戏“火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相传，直到12月21日，最后一点火星因有人擅自爆料而最终被无情地踩灭了。

还在1892年12月6日，乔利蒂曾授意提出一个关于把银行特权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一些令人不快的流言不脛而走，说在银行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因此乔利蒂在12月21日只要求把该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3月31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议员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宣读了阿尔维西关于罗马银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吉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库存现金进行核查的结果的专门报告中的若干段落。于是丑事就暴露出来了！非法超额发行的银行券达900万法郎<sup>①</sup>；银行的现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样做虽

---

<sup>①</sup> 此处及以下数值的货币单位在恩格斯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中均为“里尔”。——编者注

然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却是银行章程所禁止的;有价证券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据;179个特权人物从银行基金中支取了7300万借款,其中仅19个人就支取了3350万。在银行的债务人中,有借款超过100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400万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等等。科拉扬尼没有提到别的名字,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说出来的要多,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进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尔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其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达1200万,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内却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皮内阁时期下过调查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乔利蒂、克里斯皮和鲁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表现得多么义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被人揭露拿好样品给人订货,却用次品交货的时候,也不会如此义愤填膺。

同一天,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5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的银行券,而银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下跌了100法郎。然而在大臣们发表豪言壮语之后,到傍晚时,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事情已经过去了。

## 二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讲出来

的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拉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出于家长般的温情，批准发放了近 900 万的贷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家银行的管理总的来说体现了“家长般的温情”——*patriarcalmente*；家长般的温情到如此程度，竟然把本来用做工商业优惠贷款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法兑现的抵押发放出去，有的还是凭不断延期的票据甚至未结算的往来账户，发放给了那些把工业理解为纯粹投机的人。家长般的温情到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 150 位本届众议院议员，成了银行账本上赫然在列的债务人，其中大部分是显然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有的甚至还是纯粹靠借债度日的人。阿尔维西的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员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借款额高达 50 万—60 万法郎。在这些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的人<sup>①</sup>和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马尔迪和马尔提尼；格里马尔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 25 000 法郎。这已经够精彩了，但这些都是 1889 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根本称不上是小巴拿马骗局，而只不过是 Panaminetto，即小小巴拿马骗局。

在科拉扬尼的发言的推动下，诸如此类的事情（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夸大其词的谣言），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公众中流传开来。人们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数 1 400 万中提取了 900 万以上），并且对它的银行券持不信任的态度。政府感到，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多年来一届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的事情——整顿银行和纸币——，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1 月初开始

---

<sup>①</sup> 梅·加里波第。——编者注

启动把两家罗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构的谈判,同时内阁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未经仔细检查就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失;因此它设置障碍,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任变成了恐慌。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100万以上的存款,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50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的股票在科拉扬尼发言后跌到670法郎,1月15日的牌价只有504法郎。在意大利北部,人们开始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银行券。

这时又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结果的流言蜚语。诚然,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1月13日他还了400万法郎,14日又还了60万,15日还了余下的200万。诚然,行长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那不勒斯信使报》显然是在暗指国王<sup>①</sup>——偿还了大臣格里马尔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然,激进立宪派议员福尔蒂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款的。但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更有甚者,有消息说,重新检查的结果表明,只有权发行7000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共发行了**13300万银行券**;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债权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4900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1893年1月3日才开出的普通收据领取了2500万(1月21—22日的《世纪报》<sup>②</sup>)。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只是因为:总

① 翁伯托一世。——编者注

② 《罗马银行丑闻》,载于1893年1月21—22日《世纪报》(米兰)第9627号。——编者注

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拉扎罗尼男爵专门为此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原物归还；不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在此期间已经把罗马银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此时事情的揭露已经闹得满城风雨，150个议员的姓名被或多或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内阁是知道这件事的，它们为了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交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盗用公款的事，它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但有意识地加以隐瞒，因而就默许了继续盗用公款。

与这一切相比，终于在1月19—20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发表的比亚吉尼的报告<sup>①</sup>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骗局确有其事。

### 三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干过欺骗勾当、挥霍浪费过银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握有公权力，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公权力。一旦刀子架到他们所有人的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这岂不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吗？一个共犯者作出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刽子手的崇高决定。这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也是鲁维埃、弗

---

<sup>①</sup> 《比亚吉尼关于罗马银行的报告》，载于1893年1月19—20日《那不勒斯信使报》第19号。——编者注

洛凯和弗雷西内之流把莱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莱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把刀子架到脖子上”（照沙尔·莱塞普斯的说法），来为他们从巴拿马骗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经费。同样乔利蒂和格里马尔迪也把自己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前任曾向汤隆古勒索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马尔迪的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饱经世故的意大利老江湖，在骗人行当中绝不是像曾不得不为雷纳克之流设计巴拿马骗局的沙尔·莱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的没有经验的新手。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4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情”<sup>①</sup>，——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做交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据说他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鞭长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仓促地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小巴拿马案件中的情形也同法国在巴拿马案件中的情形一样，人们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证明文件完全消失。所以汤隆古认为，为安全起见，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 and 揭露事实真相的文件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法官手里，而只能保存在梵蒂冈。

---

<sup>①</sup> 这里套用了海涅《〈还乡曲〉补遗》中的两句诗。——编者注

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内阁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后者根据协议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将每张票面价值为1 000 法郎的股票按450 法郎付款给股东；内阁认为，这样一来那些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就不会被公之于众了。这样的协议一达成，可敬的汤隆古就遭殃了——也就是说，领略到在资产阶级政治中屡见不鲜的忘恩负义。从1月16日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哨；1月19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议会报》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起来，但是希望他们明白，他们打错了算盘……如果想要我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么我就不得不把丑事揭出来……他们不是想毁掉我吗？届时我要公开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一再说这些钱我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occorrono)。而且我有证据……总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垮台了，那么跟我做伴的大有人在。”<sup>①</sup>

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1月25日被带往雷季纳·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我死在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sup>②</sup>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们

---

① 载有汤隆古这次谈话的《议会报》已经找不到了，不过1893年1月21—22日《晚邮报》(米兰)第21号有关报道也转述了这次谈话。——编者注

② 《汤隆古被押送至监狱》，载于1893年1月25—26日《晚邮报》第25号。——编者注

那样百依百顺,不用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乞求宽大判决。虽然汤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是“一名七十高龄的真正的胸甲骑兵”<sup>①</sup>;他过去的一切证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金匣子将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里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请看好戏!

然而就在1月25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也闹开了。乔利蒂只能对他的150名议员高声叫喊鲁维埃曾对自己的104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话: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开会!也确实如此。克里斯皮和鲁迪尼所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法庭上。<sup>399</sup>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巴拿马案件和小巴拿马案件以及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抵抗,不花费大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金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用不可告人的方式去谋取资金。想必深谙此道的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哪里取用。”<sup>②</sup>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

---

① 《罗马银行的破产》,载于1893年1月22—23日《世纪报》(米兰)第9628号。——编者注

② 参看《根据1863年11月1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省议会两院的辩论速记记录。第二议院》1864年柏林版第3卷第533页及第2卷第811页。——编者注

---

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22 —  
29 日

载于 1893 年 2 月 1、2 和 3 日  
《前进报》第 27、28 和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1893 年五一节致 奥地利工人<sup>400</sup>

奥地利的同志要我在他们的五一节报纸上给他们写几句话。我能向他们说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他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们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 1890 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们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五一节意味着什么。他们做到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同样做到，甚至也无法效仿。

的确，五一节在奥地利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在德国，1890 年可以举出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阅，<sup>92</sup>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1892 年 5 月 1 日恰逢在普选权基础上举行市镇选举，这次选举也给工人带来巨大胜利<sup>401</sup>；在那里，5 月 1 日这一天人们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工作，而不是举行庆祝活动。可是在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工人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等情况，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国议会回答质询时所作的说明<sup>402</sup>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丝不苟地坚持举行五一庆祝活动时，他们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这一节日主要是国际的事务；因此也

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节日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事务,而且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事务;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条件地始终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大约写于 1893 年 1 月 30 日—  
2 月 12 日之间

载于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  
祝 1893 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致意大利读者<sup>403</sup>

###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sup>404</sup>,其中一个处于欧洲<sup>①</sup>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sup>289</sup>。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

---

① 本文的法文草稿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没有“欧洲”一词。——编者注

BIBLIOTECA DELLA *CRITICA SOCIALE*

**CARLO MARX e FEDERICO ENGELS**

# IL MANIFESTO

DEL

##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DI

**FEDERICO ENGELS**

*Centesimi* 115

MILANO

Uffici della **CRITICA SOCIALE**

*Portici Galleria, N. 23*

1893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扉页



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sup>①</sup>,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sup>②</sup>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吉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吉兆一样。

《宣言》<sup>③</sup>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

---

① 在草稿中,此处加有“匈牙利”。——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此处加有“欧洲”。——编者注

③ 在草稿中不是“《宣言》”,而是“《共产主义宣言》”。——编者注

---

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 1300 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

写于 1893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

载于 1893 年在米兰出版的意  
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欧洲能否裁军?<sup>405</sup>

写于 1893 年 2 月 13 日—3 月  
28 日

以一组文章(没有序言)的形式作  
为社论载于 1893 年 3 月 1—5、7、  
9 和 10 日《前进报》第 51—56、58  
和 59 号,并于 1893 年 4 月底出  
版附有序言的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序 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 1893 年 3 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案<sup>406</sup>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除非常备军及时改组为以全民武装为基础的民兵,否则,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因为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对目前的各国政府来说和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任何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么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与其说用来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用来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现役期(这是我的中心论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途径。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议的政府的性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现役期作为起点,那么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选择短得多的期限了。

我提出对全体青年男子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的民兵制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谈。

弗·恩格斯

1893年3月28日于伦敦

整个欧洲以空前规模扩军备战,已经有 25 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力和战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都竭尽全力要压倒对方。恰好在此刻,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巨大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大量兵员和缴纳巨额赋税义务的各阶层民众都在呼吁裁军。而且各国扩军备战都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有的国家是新兵不足,有的国家是缺钱,也有国家二者兼而有之。要想走出这个死胡同,除了进行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战争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我敢断言: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之后,配备有预备军和后备军的普遍义务兵役制<sup>407</sup>——甚至就是在当时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相对于可以找人代服兵役的征兵制<sup>408</sup>的优越性,最终得到了证实。大陆各国都采取了这种制度<sup>409</sup>,并对它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坏处。基于兵员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由于阿尔萨斯—洛林被

兼并，使得法兰克福和约<sup>75</sup>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蒂尔西特和约<sup>36</sup>对普鲁士那样。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法国给地方部队配备了由年龄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军；德国则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恢复了非常国民军。<sup>410</sup>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至达到自然的年龄极限，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招兵员额，并相应地建立新的教官队伍；但是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经观看过 1891 年在香槟举行的大演习的英国军官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赞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他们在这方面持论公允，但他们一致指出，有太多青年士兵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队。在德国，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句话，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接近能力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具备服役条件的男子在他可以服役的整个年龄段内都要为国防出力。而在 1870 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革命性的变化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象中实现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现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越来越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对于服役年限，还是对于所有具备服役条件的青年都要服兵役，现在都不会有人反对了，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也只有社会民

---

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完全付诸实施。

因此,要满足裁军需要,就只剩下一个着力点了,这就是现役期。其实,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德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我认为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有个条件,即一旦大家确认这个期限有可能缩短,就要立刻缩短,并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标。我坚持认为,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 二

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队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战争环境中的战斗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是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870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长期服役的帝国步兵刺刀冲锋的法兰西狂暴<sup>411</sup>，以及沃尔特和色当城下骑兵冲锋的威力；而在施皮歇恩城下，他们同样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至用数量处于劣势的兵力就能把对方同样装备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的阵地。<sup>412</sup>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么各国军队的战斗能力的对比关系将保持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可能突然袭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现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还是无足轻重的；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国的军队各自如何利用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这两国军队的人数之比将与两国居民的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

最终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尺。那时就不会有像 1813 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sup>413</sup>;这种便宜事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各国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可说的,因为,由于缺钱,各国都不得不对一部分新兵只“匆忙地”训练几个月。这样就不得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大量传统的繁文缛节抛在一边,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把一个个体格健全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所需要的时间是那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这一点如何让训练德国补充兵的军官们感到惊异。<sup>414</sup>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军官断言,服役期和德国的补充兵几乎相同的后备军,优于常备军。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没有常备军中浪费在传统的、因而被奉为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时间也就不会被白白浪费。

1888 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术性的战斗队形仅仅局限于必要的方面。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奥地利人从 1859 年起就已经推行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的操练;黑森-达姆施塔特人几乎同时组建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合成的各种营纵队,而在 1866 年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合理的队形。<sup>415</sup>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被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因为在 1870 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战方法的连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示意图<sup>①</sup>,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

<sup>①</sup> 恩格斯提到的这个示意图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家”<sup>416</sup>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死板的军事操练，使得已经明令废除了的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校场操练作为对抗自由放任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忽然间成为完全必要的了。这无非是说，秩序和纪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正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做合理的操练，更何况到那时外国军官再也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给士兵的技能——如果他们还没有掌握这种技能的话——是整整站两个小时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似乎这样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营区警戒勤务训练条例之下，在有各种治安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做军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连队中的勤杂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么，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吗？——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新兵，服役期当然是长些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事情可做。假如马匹饲料定量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马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正常的体力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中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额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

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精练重要的东西，去掉多余的东西，以此来弥补服役期缩短的不足，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人们经常以此作为论据，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么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愿兵或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 50 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吹捧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扔进垃圾堆，而且做这些事的都是同一批权威；此外，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认为毫无用处；我曾屡次看到，最久经考验而又备受赞扬的习惯和组织，在敌人面前却被证实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常看到，每一支军队都有其因袭下来的特殊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为下级官员、普通士兵和群众而定的，是由高级官员来维护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一到战场就会完全化为乌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所以我要奉劝大家，绝对不要相信军队方面的“专业意见”。

### 三

这是多么奇特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官正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大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普弗格拉本使用过的六磅滑膛炮或七磅榴弹炮<sup>417</sup>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弹仓枪之间，似乎相隔有几百年之久；而这还并非是终点，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做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对无法预测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这种无法预测的因素。

40年前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300步；在这个距离上一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1500—1800步的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600—1000步，火炮的有效射程最远是3000—4000步。而新的、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的射程却接近于火炮，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3到5倍；因此，一个装备弹仓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不过现

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将不得不经受这种威力的是谁,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越来越快地不断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我们要面对的却是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的老弗里茨<sup>①</sup>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并把条例奉为神明,按照条例,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甚至还不要求去除士兵制服上的发光钮扣和金属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有胸甲——总算没有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进枪林弹雨,他们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还是拿那些虽然极其庸俗、但却因此越发受到尊崇的带穗肩章,而不是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做祖国祭坛上的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朝气蓬勃、勇敢无畏的人物,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这种人物不够多,断言渴望摆脱在20年和平时期内又盛行起来的陈规陋习和死板的军事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此外,我在上文试图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

---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西,而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么,所有兵种现在就可以实行为期两年的服役期。但是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说明:不当安于两年。其实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两年服役期的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说,首先缩短到18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一年,然后……?未来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就从这里开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保持欧洲和平都是必要的,那么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流亡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sup>418</sup>,我感到惊异而高兴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很好,但遗憾的是,仅止于此。这些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添置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常常是不好的。这些器械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终于认真地利用这些器械,难道是要要求过高吗?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柔韧灵活的时候,有计划地认真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20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骼、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和柔韧性,难道是要要求过高吗?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劳动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畸形,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影响各不相同,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畸形。先使人们变成畸形,然后在服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如果在中小学以及业余进修学校中及时预防这

种畸形现象,士兵的素质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样的认识高度是官员们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的构成和运动。中小學生天生就站得直,走得正,特别是如果他们有体育课的话;而我们的新兵是什么站相,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站立和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练会,其容易程度是在军队中闻所未闻的。有些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对中小學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很难做到,但中小學生只要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会。如果在夏季有充分的时间用于野外行军和训练,那么这无论对中小學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整整几个月服役时间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尤其适宜用来教会中小學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學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专门的军事训练,——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士军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心弦。普鲁士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安置退役的军士?到现在为止是用他们去当宪兵、边防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中,直至不起眼的角落,到处都要安插有权任文职的军士。总之,你们千方百计地给军士们安排职位;你们固执地把他们放在他们不适合的岗位上,让他

---

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工作；难道现在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多少懂点行并且能做出一些成绩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不是让他们去教读、写、算，而是去教体育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生都是有益的。而且，军士们一旦脱离了隐秘的兵营而置身于众目睽睽的学校操场，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管辖，那时，我敢打赌，即使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我们的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年学生也会教他们改邪归正。

## 四

下面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通过国际协议普遍而均衡地逐步缩短服役期限,这样的建议是否有可能被接受。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那么,这个建议能否由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一种值得花力气去做的规避协议的做法都是隐瞒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监督协议的实施情况。如果让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服役,那么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就各个国家而言,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样的协议,把它当做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关于俄国,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谈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法国一旦签署并且批准协议,那么毫无疑问,它总的说来应该是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我们承认,有产阶级和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不过,这样的破坏永远不会有多大意义,否则巴黎就宁可宣布废除协议了。而德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欺诈宽宏大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尽管法国作出种种值得称道的努力,力求使 1870 年的失败不会重演,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更多得多的优越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的优势,现在已经达到 1 200 多万,而且差距还在逐年扩大。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 70 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仔细的检验,在这方面出现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经受到实践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军队也都具有这些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而且是在一个就此而言要错综复杂得多的组织中来试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志愿兵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sup>419</sup>,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服役一年的士兵从军队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从政治方面看是缺点的东西,从军事方面看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从人口比例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兵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政治上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对大多数已经受过充分的通识教育的青年人再进行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训练。1866 年的战争<sup>72</sup>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特别是从 1871 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的、差不多是过度的关照。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这些军官同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么,这些军官总体上在军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备军和后备军中,受过军官训练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由于具有军官充裕的独特优势,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编组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根据李希特尔的说法(见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sup>①</sup>),——据我所知,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法,——每1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1个机动的预备团、2个后备营和2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3个营就可以提供10个营,换句话说,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的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企及的短时间内完成。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多;可是要为根据正式公告建立的新部队配备干部应当是够了。这位军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编成的成问题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法国所能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感到缺少军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

<sup>①</sup> 《老一套的诡计》,载于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柏林)第278号。——编者注

## 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国是否遵守关于均衡地逐步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用考虑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 1 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它所拥有的军事进攻力量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德国的 5 000 万人口集中在 5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我们从军事上加以考虑的最多 9 000 万至 1 亿的俄国人口，根据保守的统计，散居在 3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德国人因为人口密度大得多而取得的优势，还由于他们拥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 1 亿人能比 5 000 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新兵，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只有贵族和城市居民有望成为军官；但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合适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

制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达到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sup>8</sup>

第一，要把一个普通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的成败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进攻来决定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是仍处于半共产主义的公社<sup>65</sup>，在城市是劳动组合<sup>420</sup>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连环保，即伙伴之间互相担保；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团结协作则万事大吉，另一方面，单打独斗则孤立无助。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补偿了俄国士兵的不少欠缺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显而易见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协同作战，因为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行动，随机应变，同时保持同整个部队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合群本能，而只有通过发展每一个人的智力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所达到的那种“个人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阶段，我们才能看到实现这种协同作战的先决条件。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最大优点的这种特质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

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么俄国又如何能做到呢？在俄国，只有有文化的居民才能被培养为胜任的军官，这部分居民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但是，俄国的士兵，甚至是受过训练的士兵，却需要比任何别国的军队都更多的军官。

第三，大家知道，在俄国，官吏贪污和盗窃成性，而且往往军官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一有战争就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归休的预备役军人和民军<sup>①</sup>（后备军）归队，需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但是，如果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sup>②</sup>之手，那又怎么能够一切顺利呢？在俄国进行动员——这将是一场滑稽剧。

总之：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征集沙皇所需的任意数量的士兵，让他们服随便多长时间的现役。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目前的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做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科夫诺到卡缅涅茨的全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处于自己境内的充满敌意的地区，陷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几次败仗，战场就会从魏克瑟尔河转移到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与德军结盟

① 原文为“Opoltschenie”，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② 原文为“Tschinowniks”，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

的波兰军队；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么这也将是它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纯军事方面的状况，我们看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而且，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1861年的农民解放<sup>302</sup>以及与之有关的——一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一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性的。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债券提供的补偿，这些债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此事完结之后，新的铁路为他们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让人砍伐林木出卖，在卖得的钱还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奢华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耕种的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差；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的庄园在产出上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占用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由本人用现金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现金——分期支付利息和偿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经济状况全面恶化外，又加上突然强制性地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民受到

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吃公社的人)和 kulaki(高利贷者)变本加厉的剥削。而且所有这些都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新的大工业,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大工业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工业生产,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用于出售手工制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劳动依附于资本家“包销商”,要么更坏,依附于资本家包销商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古老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突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必然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sup>①</sup>

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延续了 20 年之后,其他一些后果也显现出来。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严重的水灾;但到夏天河流却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位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谷物的根系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一代人之久。

1891 年的饥荒<sup>265</sup>使这一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 1891 年起俄国始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毁掉了农民大部分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牲畜,并使他们债台高筑,而高额债务必然要摧毁

---

<sup>①</sup> 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新时代》杂志 1891—1892 年第 19 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sup>421</sup>中已经谈到了。

他们最后的承受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走投无路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债度日，国家尤其要靠借债度日。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40亿马克。它在国内借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人们既不知道它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了。40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经使西欧的金融市场完全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一点；总数5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3亿，其余2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sup>301</sup> 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要发行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有人说这个国家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愚蠢，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皇<sup>①</sup>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想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

---

<sup>①</sup>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

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出口已经遭到了破坏。现在主要的出口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的沙皇和大资产阶级的官方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 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虐待士兵现象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那么逐步缩短服役期对于军队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虐待士兵现象近年来呈蔓延之势，在军中已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现象是死板的军事操练和校场操练的对应物；普鲁士军队只要得到一段和平时期，就会在军中普遍推行这两种操练，而虐待士兵现象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等。虐待士兵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sup>422</sup>的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不得不毫无怨言地忍受容克军官们的一切虐待和侮辱。尤其是那些没落的贵族穷光蛋和寄生虫，他们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为数不少，现在还在充当虐待士兵的恶棍，在这方面只有喜欢硬充容克的虚荣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与他们比肩。

折磨士兵的行为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没有完全消除。但是以前它比较少见，比较轻微，有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后来，一方面需要教给士兵越来越多的科目，另一方面又没有想到把过时的、失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些无用的废物抛弃掉，从那时候起，军士就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多得到默许的权力，可以采用只要他认为合适的

任何训练方法；同时，军士受命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教给自己班里的士兵，并且效果要令人满意，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的申诉权纯粹是一个笑话，常见的旧普鲁士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确信，在西部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大城市居民的团队中，虐待士兵现象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对等回应。在使用前装滑膛枪的情况下，演习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块小石子放入枪管，使它落到空包弹上，因此常见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由于疏忽大意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隆青年，在1849年就是这样死于别人本想射向他的长官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那么难以觉察了；军队中自杀事件的统计数字<sup>423</sup>因此成为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一旦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实弹，自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旧的做法是否又会死灰复燃，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时有发生；要知道，这对取胜是没有多大好处的。<sup>①</sup>

英国军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1891年在香槟演习时法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

---

① 文章在1893年3月9日《前进报》第58号连载时删掉了这一段文字，代之以下列按语：“（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从前受虐士兵的走投无路所常常引发的后果。尽管他的叙述是客观的，但我们没有登载出来，因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从客观转述事实的警世之言中读出试图引起这种事实再度发生的意图。——编辑部）”在后来的单行本中恢复了这段话，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编者注

像报刊上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采用杖刑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sup>213</sup>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长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些做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自己未来的敌人逆来顺受地让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们一定会十分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会有人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正是 1813—1815 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且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们现在却反而日益接近 1806 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sup>424</sup>，当了法国的俘虏。

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人们有如此之多的高谈阔论！可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这些因素！

## 八

我们在前文假定，均衡地逐步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提出了这个建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在奥地利军队中，人们似乎比在德国军队中更坦率得多地谈论正在部分部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许多奥地利军官直率地说，只服役几个月的后备军是一支优于常备军的部队；至少有一件事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有人肯定地告诉我，后备军的一个营在24小时内就可以做好战斗准备，而常备军的一个营则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组织都是新建立的，人们反而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何，在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渴望减轻军事负担，而他们本身的经验就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期限。

意大利也会举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sup>425</sup>要么将瓦

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那么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议，它丝毫不会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能改善这种状况。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不过 20 年，这在某些方面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也包含着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容易地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反抗。所有的军队在打了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国，更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彻底变革的状态，所以法国也能比任何其他国家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 27 年统治使德国理所当然地受到各个国家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不遵守以致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sup>426</sup>，吞并阿尔萨斯—洛林<sup>75</sup>，以卑鄙的手段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sup>427</sup>，——所有这些都和实现“国家统一”毫无关系。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图别国领土的坏名声；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抛弃了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可是仍然企图用一切手段把

兄弟般地统一“从埃奇河到梅梅尔河”<sup>①</sup>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佛兰德、瑞士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所谓“德意志”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德国沙文主义者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目前的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决定提出我们的建议，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作为和平的捍卫者出现。它会宣布自己准备率先进行裁军，而这样做对曾经发出扩军备战信号的国家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不信任一定会变为信任，厌恶一定会变为同情。不仅三国同盟是和平同盟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抵消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被挑剔出来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他们是一股最为强大的势力——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如果有朝一日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只要它稍有理智就会明白，它所面临的形势绝对不允许它发动战争。不管法国如何表现，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遭到各个小国的反对，遭到英国的反对，而且它甚至没有把握取得俄国的援助，哪怕是取得俄国的这样一种传统援助，即俄国

---

① 这是套用霍·冯·法勒斯莱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先挑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又背弃它们。

我们不要忘记，下一次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如同与俄国被敌国领土隔开的法国一样，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而海路是由英国绝对控制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舰队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挨饿，粮食补给就会被切断；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了巴黎饥饿<sup>428</sup>，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sup>4</sup>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本人又是俄国人的朋友。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在上述形势下，甚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么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加入德国的敌人一方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不断扩充军备而引起的战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议的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主地逐步缩短服役期限，并为实施民兵制度做好准备。

是鼓足勇气迈出可以摆脱困境的这一步呢？还是坐等法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获得荣誉呢？

##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sup>429</sup>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sup>①</sup>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可谈呢?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诚的育儿所”<sup>②</sup>,那么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再是温顺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sup>337</sup>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再是顺从的工联和合法进步派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sup>149</sup>时代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无疑地已经重新行动起来了。这里现存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

---

① 手稿中没有“对德国工人”这几个字,而且手稿中此句之前原有下面一段话没有登出(可能是在誊抄时略去,也可能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变而删掉):“当我要把这封信寄给准备出五一节专刊的德国报纸的时候,在柏林,军事法草案<sup>406</sup>危机爆发在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草案被否决,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一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定,人们所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但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节将在什么情况下来庆祝还不得而知,那么,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编者注

② 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声称<sup>①</sup>,英国工人不是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只是想对它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工人群众已经觉醒,越来越认识到,他们要想得救,与其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靠工人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首先争得政治权利<sup>②</sup>,争得议会。这在1892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三名候选人<sup>③</sup>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20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强大力量。这就使工人们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sup>④</sup>

在英国,即使目前选举权受到限制,工人也至少在150个选区里占了绝对<sup>⑤</sup>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sup>430</sup>获得通过,他们就将在200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筹备工作。协商第一次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大家同心协力,积极热情。

---

① 手稿中此处加有“他们的话实际上不无道理”。——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而是“争得政治权力”。——编者注

③ 詹·基·哈第、约·白恩士和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④ 手稿中这里还有一句话没有登出:“现在几乎任何一场补选,能否胜出都取决于工人如何投票。自由党失去了两个议席,因为他们不重视工人。教训是深刻的。”——编者注

⑤ 手稿中没有“绝对”一词。——编者注

---

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庆祝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3月13日

写于1893年3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3年4月底前进报社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sup>①</sup> 手稿中不是“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而是“无可争辩地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编者注

##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sup>431</sup>

回忆 1848 年的一件往事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sup>432</sup>会晤布拉格书商博罗施,他是奥地利国民议会中波希米亚德意志党团的领袖。博罗施痛心地质问了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敌视。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博罗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团结在一起了。”

波希米亚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们理解到了: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级就其内在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恩·

于伦敦

写于 1893 年 4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3 年 4 月底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 年五一节》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sup>433</sup>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顺序。至少在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5月1日是跟在5月2日后面的。过去西班牙工人纪念5月2日<sup>434</sup>,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1日。

从5月2日到5月1日,——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际上,1808年5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一方面是马德里的人民。<sup>①</sup>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错综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反对法国革命,<sup>②</sup>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不得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白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只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任其摆布,才能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势

---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人民是侵略者。在马德里人民后面的是愚痴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杂!”——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直接产物就是拿破仑”。——编者注

变得错综复杂了。

然而从5月2日到5月1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5月1日标志着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面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经在握。前进！

写于1893年4月13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于1893年5月1日《社会主义者报》第373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尽管如此<sup>435</sup>

1893年五一节致法国工人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sup>①</sup>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sup>②</sup>的意义,在法国<sup>436</sup>无疑是、在德国<sup>437</sup>很可能是、在英国<sup>438</sup>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将号召无产阶级占领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占领新的阵地。<sup>③</sup>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sup>④</sup>而在某些方面<sup>⑤</sup>受到些许

- 
- ①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有两份手稿保存了下来。在第1手稿中没有“欧洲”。——编者注
- ② 在第1手稿中此处加有“游行”。——编者注
- ③ 在第1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夕,无能的政府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急于想引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sup>439</sup>”——编者注
- ④ “由于普选的临近”在第1手稿中为“由于要致力于我们所期待的普选”,在第2手稿中为“由于我们所期待的普选的影响”,可能是由茹·盖得改为“由于普选的临近”。——编者注
- ⑤ 在第1和第2手稿中不是“某些方面”,而是“某些地方”。——编者注

影响,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不安<sup>①</sup>。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恰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争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得过早吧。

我们还要同他们在选票箱旁见面,以后还要在波旁王宫<sup>440</sup>见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月14日于伦敦

写于1893年4月14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93年4月23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3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sup>①</sup> 在第1和第2手稿中不是“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不安”,而是“又能有什么坏处呢?”——编者注

##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编辑部<sup>441</sup>

1893年6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sup>①</sup> 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在晚年甚至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毗邻亚洲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

---

<sup>①</sup> 在恩格斯的信中，“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编者注

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sup>442</sup>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sup>①</sup>

你们的 弗·恩格斯

写于 1893 年 6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保加利亚文发表于  
1893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  
第 3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① 这句口号在原信中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编者注

##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sup>443</sup>

致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893年9月18日于柏林  
大格尔申街甲22号

尊敬的同志们：

收到你们13日的来信时，我们正要离开维也纳，因而未能立即回信。

很遗憾，我们只是在旅途中匆匆地路过你们的城市，因此我们未能满足你们的愿望，去拜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会见那里的同志们。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都对此深表遗憾，但是，旅行计划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便更改。而且，由于当时布拉格已处于紧急状态<sup>444</sup>，所以你们的愿望也会因为其他障碍而无法实现。

衷心祝愿捷克工人运动取得成功！

你们忠诚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3年9月18日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1981年  
3月24日《红色权利报》

原文为德文

中文根据恩格斯的手稿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第27卷翻译

##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sup>445</sup>

谨向党代表大会<sup>446</sup>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最真诚的祝愿！

恩格斯

写于 1893 年 10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  
莱茵河畔科隆代表大会记录。  
1893 年 10 月 22—28 日》1893  
年柏林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sup>447</sup>

1893年1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73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率先举起的传统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93年12月1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sup>448</sup>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我不能应邀出席，因为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93年12月19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罗马尼亚文载于1893年12月31日《劳动报》第43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前言<sup>449</sup>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按时间顺序提供几段资料。

1873年2月9日,国王亚马多厌倦了他的西班牙王国;他——第一个罢工的国王——退位了。12日<sup>①</sup>,共和国宣布成立;接着在巴斯克各省又一次爆发了卡洛斯派<sup>450</sup>起义。

4月<sup>②</sup>10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6月初开会并在6月8日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11日组成以皮-马尔加尔为首的新内阁。同时选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不妥协派被排除在外。当7月3日新宪法颁布<sup>③</sup>的时候,不妥协派认为,新宪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在7月5日至11日的几天之内,他们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的斯、阿尔科伊、穆尔西亚、卡塔赫纳、巴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sup>451</sup>7月18日,皮-马尔加尔辞职,萨尔梅龙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起义者。起义者的抵抗软弱无力,几

① 应为11日。——编者注

② 应为5月。——编者注

③ 应为7月17日新宪法草案颁布。——编者注

天工夫就被打败了；7月26日，由于加的斯陷落，整个安达卢西亚又恢复了政府的统治；差不多同时，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也被制服了；只有巴伦西亚在战斗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只有卡塔赫纳坚持住了。这个连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的西班牙最大的军港，在陆路方面，除了要塞围墙以外，还有13座独立的堡垒，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要避免破坏自己舰队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赫纳自治州”一直延续到1874年1月11日，最后，由于完全走投无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们在这里只谈一谈更为可耻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为比较详细地描绘出来作为对当代人的警示。

大约写于1893年11月底—  
1894年1月3日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sup>452</sup>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抨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佛我的抨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sup>453</sup>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sup>65</sup>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概论》<sup>①</sup>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

---

① 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编者注

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sup>454</sup>

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就是针对这种幼稚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远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难以估量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

Lettres de Frédéric Engels sur la Russie.

---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ерія II. — Выпуск III.

---

# ФРИДРИХЪ ЭНГЕЛЬСЪ О РОССИИ

---

1) Отвѣтъ П. Н. Ткачеву (1875 г.)

2) Послѣсловіе къ нему (1894 г.)

---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В. ЗАСУЛИЧЪ

---

ЖЕНЕВА

Типографія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А“, Route de Lancy, 6

1894

1894 年俄国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的扉页。  
书中载有《〈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由于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sup>①</sup>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说他在某些地方有弱点,他的视野有局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 and 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到,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sup>455</sup>

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

---

①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编者注

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sup>①</sup>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 131 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所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难道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

<sup>①</sup> 1 俄亩约合 1.09 公顷。——编者注

取得它的全部成果。”<sup>①</sup>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完全是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

<sup>①</sup>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43页。——编者注

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家庭公社（扎德鲁加<sup>314</sup>）中还存在着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 5 000 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 1800—1840 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

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

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所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还是它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122</sup>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大遭破坏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sup>52</sup>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加之捐税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更少、更差,自然使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物销售市场,同时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农民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

---

<sup>①</sup>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导致俄国公社解体。<sup>①</sup>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制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2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份在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sup>②</sup>,另一个著作家在《祖国纪事》上出来回答他<sup>③</sup>。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sup>457</sup>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

---

① 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sup>456</sup>

② 尤·茹柯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圣彼得堡)第9期。——编者注

③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于1877年《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编者注

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文章硬说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sup>①</sup>）马克思接着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sup>②</sup> 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801页。——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第44卷第17页。——编者注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sup>①</sup>

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sup>②</sup>

马克思在 1877 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sup>458</sup>。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有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

---

①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140—14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45 页。——编者注

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有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连根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sup>213</sup>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

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思想 and 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

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这几种关税提高 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拼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至在一定

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 1882 年<sup>①</sup>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sup>②</sup>、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大约写于 1893 年 10 月中—  
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

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  
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  
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编者注
- ② 原文为“mir”,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这个词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

##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1875)》序<sup>459</sup>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sup>460</sup>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sup>461</sup>,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 1859—1860 年就意大利战争<sup>69</sup>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我们所讲的福格特先生的身份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 1860 年的《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sup>462</sup>,描述西班牙 1873 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出过单行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并花费过多的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人的声明》<sup>463</sup>涉及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判断,这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对 1874 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sup>464</sup>，目前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sup>465</sup>。从 1880 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sup>466</sup>以来，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在 1887 年，在格雷维辞职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sup>467</sup>的卑劣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达成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的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对这场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sup>220</sup>

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行动，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后面这篇文章里，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指的是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真实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心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 1848 年的赖德律-罗兰式的人物和

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sup>131</sup>;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唯一得到他们公开承认的纲领要点。因此,对马克思和我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up>468</sup>,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sup>①</sup>。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对于我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封信,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细节了解得很不够;我怎么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用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欢用的说法)的真正堆积如山的文献呢?既然人们迫切希望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去尝试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未必给俄国公社指明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

① 见本卷第511—527页。——编者注

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瓦解,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写于1894年1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sup>469</sup>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sup>①</sup>，将在今年秋天问世。大家知道，第一册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的单独过程在这里将不再是各自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资本运动的统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单纯的环节来加以研究。既然前两册的每一册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内容来说，它们还需要补充，从形式来说，它们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册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第一个占有者并非一定是，或者甚至也并非通常是它的所有者。然而，剩余价值是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即在商人、放贷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进行分配，正是在这种分配中，资本的总运动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就是在社会的表层进行的。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册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册。第三册逐项分析了这一分配的各个规

<sup>①</sup> “正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这句话可能是卡·考茨基加上的。《前进报》的相关报道见本卷第705页。——编者注

律：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关系；同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一平均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下降的趋势；商业利润的单独分离出来；借贷资本的干预以及利润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贷资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统及其主要体现者银行和投机中心交易所；超额利润的产生以及这一超额利润在一定场合下转化为地租；获得这种地租的地产；作为结果——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之间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收入形式的所得者：工人、资本家、地主——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后一部分——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内容的简要概述足以说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前两册中必然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弗·恩·<sup>①</sup>

大约写于 1894 年 1 月 8 日或  
9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3—1894  
年第 12 年卷第 1 册第 16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sup>①</sup> “弗·恩·”可能是卡·考茨基加上的。——编者注

##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sup>470</sup>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sup>69</sup>，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它的胜利。它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产阶级<sup>①</sup>模式重组国民生产。它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sup>②</sup>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它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sup>471</sup>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sup>③</sup>——一方面受到陈旧的弊病的压迫，这些弊病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典古代（分成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畜所排挤）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的压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sup>④</sup>：“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整个西欧大陆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

---

① 本文的草稿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③ 在草稿中不是“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而是“工人”。——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中引文只写了开首3个单词，其余省略。——编者注

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sup>①</sup>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状况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sup>②</sup>,这些人的大多数<sup>③</sup>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始终<sup>④</sup>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目前<sup>⑤</sup>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8页。——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不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编者注

③ 在草稿中不是“这些人的大多数”,而是“这些人”。——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中没有“始终”一词。——编者注

⑤ 在草稿中没有“目前”一词。——编者注

换,卡瓦洛蒂这一帮重新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sup>472</sup>将会上台;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sup>②</sup>

因此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sup>③</sup>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社会的利益<sup>④</sup>看做分期付款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沿着自己道路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

---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章和第4章。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了“社会党人”。在草稿中,这段引文没有写出来。——编者注

③ 在草稿中不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中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经济的利益”。——编者注

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重新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sup>①</sup>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自由和活动场所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sup>②</sup>，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sup>③</sup> 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派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sup>④</sup> 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

---

① 在草稿中不是“共和主义者”，而是“马志尼主义者”。——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没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9—140页。——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中，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而我们要看看他们是否是认真的。”——编者注

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绝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声明,还是他们的阴谋,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从已经获得的阵地继续挺进,去占领新的阵地的十分激进的左翼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子——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sup>58</sup>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职位的错误。<sup>473</sup>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派<sup>①292</sup>组成的多数派作出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使他们自称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彻底陷

---

① 在草稿中此处加有“(《国民报》派的马拉斯特、巴斯蒂德、玛丽)”。  
——编者注

入瘫痪。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一般的策略<sup>①</sup>，在我的一生中<sup>②</sup>，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对我来说，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写于 1894 年 1 月 25—26 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以意大利文载于 1894 年 2 月 1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 3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 ① 在草稿中不是“至于一般的策略”，而是“至于我所提出的一般策略”。——编者注
- ② 在草稿中不是“在我的一生中”，而是“长期以来”。——编者注

##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sup>474</sup>

1894年3月18日于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3月18日<sup>308</sup>的即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恩格斯

写于1894年3月18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94年3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83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sup>475</sup>

1894年3月22日于伦敦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送来请柬，邀请我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会<sup>476</sup>，可惜，我不能亲自使用这张请柬。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到会的党代表们表示我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们工作顺利。

今年的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过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弹仓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武器。统治阶级——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么，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

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声欢呼了。

弗·恩格斯

写于 1894 年 3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非全文)1894 年 3 月 27 日《选民报》第 69 号,载于(全文)1894 年 4 月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sup>477</sup>

1894年5月15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sup>478</sup>的盛情邀请，我是5月8日接到的。很抱歉，由于当时有点不舒服，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今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匈牙利最近的运动<sup>①</sup>。在匈牙利，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不仅创建新的工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传统的农业方法，消灭独立的农民，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sup>②</sup>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捐客<sup>③</sup>，另

---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控制国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最为重要的部门。”——编者注

② 手稿中此处加有“少数”一词。——编者注

③ 手稿中不是“捐客”，而是“租地农场主”。可能是报纸编辑为了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对农业的影响，而将“Pächter”（租地农场主）改为当时在说德语的匈牙利人中很流行的带有贬义的法语词“Faiseur”（捐客）。——编者注

一方面是大批一无所有的无产者<sup>①</sup>。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我们不久前在霍德梅泽瓦沙海伊看到了。<sup>479</sup>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有朝一日也得要经受。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创造使新社会制度成为可能的条件,并使唯一拥有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的男女应运而生。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 1894 年 5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4 年 5 月 18 日《工人新闻》第 20 号,并译成匈牙利文  
载于 1894 年 5 月 18 日《人民言论》第 2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sup>①</sup> 手稿中不是“无产者”,而是“农村无产者”。——编者注

#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sup>480</sup>

写于 1894 年 6 月 19 日—7 月  
16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 300 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sup>481</sup>,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

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sup>482</sup>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sup>①</sup>;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sup>484</sup>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

---

①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sup>483</sup>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sup>129</sup>的一个地方支部。”<sup>485</sup>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到先例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sup>①</sup>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sup>②</sup>的时候，他的旧日的伤口，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伤口，能不迸裂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信，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 60 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信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

---

①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八卷集)1863—1883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即《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编者注

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sup>486</sup>：“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一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做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当他因此而身戴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狱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智者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sup>①</sup>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sup>487</sup>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引诱。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渴求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于现实中的精神王国的学说。”<sup>488</sup>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

---

①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16章。——编者注

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sup>489</sup>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

---

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sup>490</sup>，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sup>①</sup>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做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摒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sup>491</sup>。他的

---

① 指《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编者注

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sup>340</sup>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sup>492</sup>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sup>493</sup>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蒂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sup>①</sup>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sup>②</sup>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

---

① 这里关于《约翰启示录》的写作时间的表述与后文(见本卷第570、574页)不一致,可能是书写或印刷疏忽所致。——编者注

② 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

不计算在内<sup>①</sup>(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sup>494</sup>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sup>②</sup>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sup>495</sup>曾在基督纪元 2 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sup>③</sup>——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sup>496</sup>)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 164 年名王安条

---

① 厄·勒南《反基督者》,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73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358 页。——编者注

② 《荷兰莱顿公共古物博物馆的希腊纸草书》1843 年莱顿版。——编者注

③ 塔西佗《编年史》第 12 篇第 52 章和《历史》第 2 篇第 62 章。——编者注

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位署名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不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确的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sup>497</sup>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sup>①</sup>,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

① “阿拉法”和“俄梅戛”分别是希腊字母表的首末字母。参看《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章第8节、第21章第6节。——编者注

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品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奉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sup>①</sup>

---

①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章第9节、第3章第9节。——编者注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归附的先是 144 000 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 12 000 人,随后才是无数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 69 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

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 1848 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sup>136</sup>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sup>370</sup>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sup>130</sup>，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 1869 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一书中（第 303—305、367—370 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

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书信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 60 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为可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 144 000 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

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sup>498</sup>——德文译做“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sup>①</sup>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话,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狂热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

① 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 69 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sup>①</sup>,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

<sup>①</sup>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1 章第 28 节。——编者注

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审判权、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

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被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sup>①</sup>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

---

① 这里的6处引文分别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章第1、3节,第3章第11节,第22章第6、10、12(20)节。——编者注

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都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sup>①</sup>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sup>②</sup>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一脚踹翻盛满全能的神的炽烈怒火的酒醪，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

①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6章第10节。——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43节。——编者注

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 42 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 1 000 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做王。但在 1 000 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第 13 章第 7—18 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做第一，第二该是提比里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 68 年 6 月 9 日至 69 年 1 月 15 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

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 69 年 4 月 15 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 666 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 300 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1;b=2;g=3;d=4 等等。喀巴拉<sup>494</sup> 占卜术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 gematria——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 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 2 世纪末在 666 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 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sup>①</sup> 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sup>499</sup> 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 נֶרֹן קַסָר (尼禄皇帝)为希腊字 Nerôn Kaisar(尼

①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论》第 5 卷第 30 章。——编者注

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塔木德<sup>500</sup>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nun)=50; r(resch)=200; w(waw)代替 o=6; n(nun)=50; k(koph)=100; s(samech)=60; r(resch)=200; 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 Nero Caesar 作根据,去掉第二个 nun=50,我们就得出 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sup>482</sup>“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 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

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3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sup>499</sup>,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 000斯达第=2 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sup>①</sup>(勒南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sup>②</sup>)。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華,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

①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2章第2节。——编者注

② 厄·勒南《反基督者》,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73年巴黎版第4卷。——编者注

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sup>①</sup>。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做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sup>501</sup> 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sup>502</sup> 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 9 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sup>②</sup> 第 1 册第 227 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①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6 卷第 853 行。——编者注

② 雅·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1836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 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在路德的译文中写到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sup>503</sup>，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 68 年或 69 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

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信，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sup>①</sup>，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sup>504</sup>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的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sup>492</sup>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

---

①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信，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更晚时期的作品。”——编者注

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 致英国的工人和 社会主义组织<sup>505</sup>

亲爱的同志们：<sup>①</sup>

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sup>506</sup>将于8月29日和随后几天<sup>②</sup>在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们如能按信末所附地址<sup>③</sup>寄去几句贺词（用西班牙文或法文），他们将不胜欣喜。

1893年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sup>507</sup>通过了要求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决议，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的机关——议会委员会<sup>354</sup>——也列入寄发本邀请信的名单之中。<sup>④</sup>

本邀请信寄给：

- 
- ①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加有“1894年8月6日于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信的称呼不是“亲爱的同志们”，而是“亲爱的先生”。——编者注
- ②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不是“8月29日和随后几天”，而是“本月29日”。——编者注
- ③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此处加有“给他们的书记”。——编者注
- ④ 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号内；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者注

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同盟<sup>119</sup>，  
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  
独立工党<sup>508</sup>，  
费边社<sup>509</sup>，  
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sup>113</sup>。

尊敬你们的 弗·恩·<sup>①</sup>

贺词请寄：<sup>②</sup>马德里，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8 号，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写于 1894 年 8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 ① 在写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落款为“亲爱的先生，我是尊敬你们的弗·恩格斯”，后面附有收信人姓名地址“滨河路 276 号费边社书记爱·雷·皮斯先生”。——编者注
- ② 在写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此处加有“西班牙”一词。——编者注

##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sup>510</sup>

给卡·德拉瓦勒的信

亲爱的公民：

您8月30日的来信寄到伦敦，而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里<sup>①</sup>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sup>511</sup>人对我的盛情邀请。可是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sup>②</sup>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讨论，我就在此一并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的迫害，毫无疑问，非常法还将使他们遭受好几年的艰苦的磨难。<sup>512</sup>这有什么！别人也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饮无产者的鲜血，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50名社会党议员<sup>436</sup>。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12年中把社会党人置于非法状态，但

---

① 伊斯特本。——编者注

② 手稿中从本段开头到这里的文字在译成意大利文发表时略去了。  
——编者注

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sup>93</sup>，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

法国和德国工人已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在梯也尔、麦克马洪和俾斯麦遭到失败的地方，姓克里斯皮的也绝不可能获得成功。胜利属于我们<sup>①</sup>！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4 年 9 月 6 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非全文)载于 1894 年 9 月 22—23 日《阶级斗争》周报第 38 号；法文原文(全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人通信集(1848—1895)》1964 年米兰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翻译

---

①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你们”。——编者注

##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sup>513</sup>

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岛工人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sup>①</sup>

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立阶级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地狱。

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赐予西西里岛一个奴隶制。

中世纪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当今时代宣称它已消灭了这些桎梏，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些桎梏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奴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所有剥削形式中最残酷、最无情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剥削。

西西里岛的古希腊<sup>②</sup>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经歌颂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牧奴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天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民能够在哪怕是罗马分成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难道

---

①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你们的报纸——西西里岛工人的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向你们正在改组的党致敬！”——编者注

②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不是“古希腊”，而是“古代”。——编者注

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们坚定信心。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照亮各国被压迫阶级。而各地的被压迫者都在团结自己的队伍，他们跨越边界，跨越语言的差异，到处在寻求相互一致。国际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形成，——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将使它获得胜利！

弗·恩·

[18]94年9月26日

写于1894年9月26日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  
6月30日《解放》周报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sup>514</sup>

条件开列如下：

(1) 5 000 佛罗伦的借款以公司的名义，即以《工人报》的名义或以报纸所注册的公司的名义办理手续；收据由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出具。该款划拨到维克多·阿德勒博士的名下。

(2) 一切有关借款事宜，谈判、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本金，均通过贷款人的代表考茨基-弗赖贝格夫人和《工人报》的代表维·阿德勒博士办理。

(3) 借款期限定为两年，起始日期为 1895 年 1 月 1 日，借款不得提前索还。1897 年 1 月 1 日以后，借款可随时索还，并应于索还之日起一年内还清。

(4) 《工人报》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前还款。

(5) 借款年利率为 4%。

(6) 借款自 1895 年 1 月 1 日起分期支付；分期支付应尽可能根据《工人报》的意愿而定，最后一次支付不得迟于 1895 年 6 月 30 日。

写于 1894 年 9 月—10 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中文根据恩格斯的手稿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sup>515</sup>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

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sup>511</sup>正在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sup>512</sup>，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于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必须设法为它提供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对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指责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效法德国社会党人<sup>①</sup>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这种政策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我们回到中世纪”），其目的是建立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存的政体”<sup>②</sup>，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善良的好人。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么正是在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向他们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

① 在意大利文译文中，没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这几个字。——编者注

② 《社会党的政策》，载于1894年10月24日《改良报》（罗马）。——编者注

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宗旨的政党”,那么,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他们是在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我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同法国、比利时、瑞士<sup>①</sup>、西班牙,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党完全一样。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说到“阶级斗争”,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sup>②</sup>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sup>③</sup> 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一天到来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sup>④</sup>,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此外,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sup>⑤</sup>在 12 年非常法<sup>93</sup>期间所经

---

① 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草稿和誊清稿都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没有“瑞士”一词。——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不是“冲突”,而是“斗争”。——编者注

③ “自从原始公社……伟大动力。”这句话在草稿中原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而且现在还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恩格斯将这句话改为:“每个社会都由在利益上对立的各阶级组成。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阶级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在誊清稿上,恩格斯采用了最初的措词,只不过去掉了“而且现在还是”这几个字。——编者注

④ 在草稿中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编者注

⑤ 在草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

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斯皮。<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0月27日于伦敦<sup>②</sup>

写于1894年10月27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

① 在草稿中最后一句是：“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皮。”——编者注

② 在草稿中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注日期。——编者注

##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sup>516</sup>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sup>①</sup>10月25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sup>517</sup>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sup>518</sup>的决议,说“这些决议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明确赞同”。<sup>②</sup>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sup>519</sup>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福尔马尔所获悉的关于我的消息肯定是完全不准确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sup>518</sup>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sup>③</sup>的询问而写的,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

---

① 恩格斯原文为“朋友福尔马尔”,威·李卜克内西根据奥·倍倍尔的建议,在发表时改为“福尔马尔同志”。李卜克内西在1894年11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了恩格斯这一改动。——编者注

② 格·冯·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就“农业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议题所作的报告,载于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柏林)第250号附刊。——编者注

③ 大概是保·拉法格,参看恩格斯1894年8月2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

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sup>①</sup>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即在社会党人中,只有我们的法国朋友试图不仅永远保存小农私有者,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

可见,就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而言,我所说的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恰好相反。

但是,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那么,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更明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篇不长的文章,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sup>②</sup>。

弗·恩格斯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写于1894年11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sup>①</sup> 指恩格斯1894年9月下半月给劳拉·拉法格的信。——编者注

<sup>②</sup> 见本卷第589—613页。——编者注

# 法德农民问题<sup>520</sup>

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29 日

载于《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0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绝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够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把他们想象成 *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1848年二月革命<sup>58</sup>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超越所有其他政党，认识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雇农、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家庭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

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地租和徭役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赋税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而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赋役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

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背叛自己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sup>521</sup>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雇农)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

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sup>329</sup>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做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做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并且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有产农民来帮助，而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应对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

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sup>518</sup>上所通过的这个绪论以及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条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要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沦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的游手好闲的大地产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占有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sup>①</sup>

<sup>①</sup> 恩格斯可能译自《工人党的农业纲领》,这篇文章载于1894年11月《新纪元》(巴黎)第11期。——编者注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on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的小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

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 2102 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做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的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已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做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

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理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sup>522</sup>)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

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兑现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补充，这些补充来自新近作出的决议。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绝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 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做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 9 000 万英镑。其中有 1 350 万—1 400 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 7 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 9 000 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 120 英镑(3 000 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 1865—1875 年是 24 000 万英镑。<sup>①</sup> 假定现在每年是 3 亿英镑;9 000 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

<sup>①</sup> 罗·吉芬《资本的增长》1889 年伦敦版第 153 页。——编者注

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 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成本价格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甚至尽可能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绝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

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绝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sup>109</sup>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哪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

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 20 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sup>523</sup>,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地区,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晌,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

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

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sup>①</sup>,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

---

<sup>①</sup> 保·拉法格《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载于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第38号附刊。——编者注

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sup>524</sup>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他们可以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

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sup>525</sup> 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并且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迟疑。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

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題。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拼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能带来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

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sup>526</sup>,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四册<sup>527</sup>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sup>①</sup>。在《前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这一册的出版预告中写道,第四册即讲述理论历史的那一册的出版工作可能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少量的札记,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稿”。<sup>②</sup>

我们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至少,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的消息。据此可知,有一部标注日期为1861—1863年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计有四开纸1472页,其中第220—972页就是《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

---

① 这是卡·考茨基给本文加的标题。——编者注

②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载于1894年11月14日《前进报》(柏林)第266号。——编者注

---

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sup>①</sup>

写于1894年11月15—2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新时代》杂志1894—1895  
年第13卷第1册第9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sup>①</sup> 引自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4页。——编者注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sup>528</sup>

1894年1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祝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活到74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够再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写于1894年12月6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第1版第29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sup>514</sup>

在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划时代地向前迈进了一步!<sup>①</sup>这是它至少在报刊领域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像最近 15 个月<sup>529</sup>那样灵活地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适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并且又善于在常常是必要的时候适时地等待,也就是说<sup>②</sup>,善于因势利导,那么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1894 年 12 月 27 日于伦敦<sup>③</sup>

写于 1894 年 12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工人报》  
第 1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① 在恩格斯给维·阿德勒的这封信的手稿中,这句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话:“亲爱的维克多,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达我对他们出版日报的祝贺。”在《工人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而且在手稿中不是“划时代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而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编者注
- ② 在手稿中没有“也就是说”。——编者注
- ③ 在手稿中没有写“1894 年 12 月 27 日于伦敦”,落款是“您的”。——编者注

##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sup>530</sup>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绝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

<sup>①</sup>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 Die Neue Zeit.

Zeitschrift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

Unter händiger Mitwirkung

von  
Hr. Babel, Ed. Bernheim, Paul Lafargue, Will. Liebknecht,  
Fr. Mehring, F. R. Sorge u. A.

herausgegeben

von  
Karl Kautsky.

Dreizehnter Jahrgang. Zweiter Band.



Stuttgart.  
Verlag von J. G. M. Dietz.  
1902.

2217

nehmen wird. Es hätte keinen Zweck, das ganze Register der Möglichkeiten aufzuzählen, die dabei ins Spiel kommen. Man kann hier oder da Fragen hören über die Erfolglosigkeit, womit das staatenbewußte Proletariat dem neuen Staatsmanagement entgegensteht. Dabei ist nicht nur die Erfolglosigkeit in der Natur der Dinge begründet zu sein. Der höchste Wille verheißt noch einen gewissen Erfolg, sofern er nur ein weltlicher Wille ist, aber die höchste Wille allein, die wie betrauten him- und herantastet in völliger Hoff- und Willenslosigkeit — was bedeutet sie mehr als ein weltliches Willenslos? Die Arbeiter der Internationalen vorredt und links und rechts und in der Mitte haben sich seit Monaten so unaufhörlich blamiert, daß, wenn sie wirklich noch einen Zweckthats in die Welt setzen sollten, dieser Willenslos von Anfang an der Erfolg ausgingen würde. So zu sein wie ein Dichter und lächerlich wie ein Handwerker.

## Einleitung zum Heftdruck von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1850“.

Von Friedrich Engels.

(2004.)

Der imperialistische Rückschlag von 1851 gab einen neuen Beweis von der Ineffizienz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en jener Zeit. Aber er schickte nicht die Bedingungen los, unter denen sie reifen mußten. Die innere Krise führte die volle Entwicklung des neuen industriellen Aufschwungs, die Selbstständigkeit, die Kräfte zu beidseitigen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Strömungen nach außen abgelenkt, ergründete die Kräfte, merkt Monarchie, unter dem Vorwand, das „Nationalitätsprinzip“ zur Geltung zu bringen, Anstrengungen für Frankreich zu ergreifen (siehe, sein Nachfolger Bismarck adoptierte dieselbe Politik für Preußen; er machte keinen Unterschied, seine Revolution von oben 1866 gegenüber dem deutschen Bund und Österreich, und nicht minder gegenüber der preussischen Reichsversammlung. Aber Europa war zu klein für zwei Monarchien, und so mußte es die geschichtliche Krise, daß Bismarck den Monarchen stürzte, und daß der König Wilhelm von Preußen nicht nur das französische Kaiserthum herstellte, sondern auch die französische Republik. Das allgemeine Ergebnis aber war, daß in Europa die Selbstständigkeit und innere Einigung der großen Nationen, mit Ausnahme Preußen, eine Zeitlang geworden war. Freilich immerhin relativ reichlicheren Sorgen — aber immerhin so weit, daß der Entschlafungsprozess der Arbeiterklasse nicht mehr an nationalen Bewidlungen ein vorzeitiges Demuth gab. Die Lebendigkeit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waren ihre Triebkräfte wieder gemacht. Und wenn ihnen etwas sich schon drohend vor die Nase von 1848, das Proletariat, in der Internationalen.

Nach dem Kriege von 1871 verzeichnet Monarchie vom Schauplatz der Monarchie Wille ist vorhanden, so daß er nun wieder zum vordringen kommen kann. Den Rückschlag der Periode aber bildet die Kränkung von 18. Ein heimlicher Versuch von Thiers, der Pariser Nationalgarde ihre Kräfte zu helfen, viel einen begünstigen Aufstand hervor. Es zeigte sich wieder, in Paris keine andere Revolution mehr möglich ist, als eine proletarische. Der Erfolg fiel der Arbeiterklasse nach dem Sieg ganz von selbst, ganz ungenügend Jahre nach der in unserer Schrift geschilderten Zeit, diese Periode der Arbeiterklasse war. Einzelne ließ Frankreich Paris im Blick, daß

1895年《新时代》发表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sup>58</sup>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sup>531</sup>;从1848

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 and 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5—10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sup>①</sup>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时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个续篇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②</sup>第三版,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需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做“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

---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29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sup>①</sup>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主义宣言》<sup>②</sup>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sup>③</sup>及其他各种奖赏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整体即国家或市镇所有；其次，这些分配手段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它又再次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65—166页。——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编者注

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sup>532</sup>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sup>127</sup>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将进行长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拉拢,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

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已经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

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尚未理解,而只是刚刚模糊地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欺蒙,而是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至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

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之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那时存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sup>533</sup>，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像是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局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

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实现“民族原则”<sup>10</sup>，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866年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sup>534</sup>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sup>19</sup>，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sup>535</sup>，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以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sup>289</sup>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sup>129</sup>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

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征入伍,被编入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加之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整个军事领域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sup>75</sup>,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时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sup>536</sup>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从法国获得的数十亿横财,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

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这时，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sup>537</sup>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例。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国家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至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sup>①</sup> 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2页。——编者注

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示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简言之，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是这在起义的场合往往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

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侧翼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方面，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便会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不力。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年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sup>①</sup>

---

<sup>①</sup>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士兵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颠覆分子、抢掠者、分赃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而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增长不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借助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些军队不仅人数大量增加,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有较多服过役的士兵投到起义者方面,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没有按照警察命令预

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战中也就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支就都会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绝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sup>216</sup>和10月31日<sup>538</sup>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sup>①</sup>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终答应去当炮灰?<sup>539</sup>

这些先生们发出的恳求和挑战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sup>②</sup>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sup>540</sup>和滑铁卢会战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sup>①</sup>。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做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sup>②</sup>。在法国,虽然一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

---

①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且已经有 50 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sup>①</sup>和一个总统<sup>②</sup>。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sup>439</sup>,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sup>87</sup>,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包括在内,那里的贵族革命是 1755 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sup>541</sup> 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sup>③</sup>引申出举行政变的权利。<sup>542</sup>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 200 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

---

① 指沙·杜毕伊内阁、让·卡齐米尔-佩里埃内阁和沙·杜毕伊内阁(第二次组阁),分别于 1893 年 11 月 25 日、1894 年 5 月 22 日和 1895 年 1 月 14 日倒台。——编者注

② 让·卡齐米尔-佩里埃。——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sup>①</sup>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sup>②</sup>。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定时期内倒退:那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从长远来看,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sup>③</sup>就会推迟、

①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审读校对稿时添加的,写在校对稿第 10 页的左边页,并标明了插入位置。——编者注

②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③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 1895 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编者注

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sup>297</sup>，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sup>526</sup>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狂热地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sup>①</sup>、黑森选帝侯<sup>②</sup>、拿骚公爵<sup>③</sup>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sup>543</sup>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sup>④</sup>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草案，把这些草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而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

① 格奥尔格五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阿道夫。——编者注

④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2首。——编者注

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唯一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以君主的意志为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一般说来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sup>①</sup>

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它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法律,它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它散布在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

<sup>①</sup>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冯·克勒尔先生的那个反颠覆法草案所需要的那种法官,所以基督徒就干脆被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sup>①</sup>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至17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写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

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① 戴克里先。——编者注

##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sup>544</sup>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们三月份的庆祝活动了。由于常犯的老毛病又一次发作，虽说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静养，所以我又要被困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了。我祝愿你们的庆祝活动取得成功，希望它不会因我的缺席而减色。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写于1895年3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第1版第29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sup>545</sup>

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然而很遗憾我无法赴邀,因为给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参加任何集会。鉴于入场券可能对别人还有用,因此我不揣冒昧,将它随信奉还。

写于 1895 年 4 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附

录



##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条目<sup>357</sup>

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记材料编写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社会主义者, 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一个殷实的工厂主家庭, 曾从事商业, 但在青年时代就通过给报刊撰文和演讲, 宣传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不来梅当了一段时间的商行职员, 1842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柏林服役<sup>417</sup>, 尔后到曼彻斯特工作了两年, 他的父亲<sup>①</sup>是那里的一家纺纱厂的股东。1844年, 他为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撰稿, 同年返回巴门, 1845年出席莫·赫斯和古·克特根在埃尔伯费尔德组织的共产主义者会议并演讲。此后直到1848年, 他有时居住在布鲁塞尔, 有时居住在巴黎, 1846年同马克思一起加入后来的国际<sup>129</sup>的前身——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sup>370</sup>, 并代表巴黎支部参加1847年在伦敦召开的两次同盟代表大会。受同盟的委托, 和马克思共同起草致“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宣言》<sup>②</sup>, 在二月革命<sup>58</sup>前夕问世(1872年莱比锡新版)。1848年和1849年, 恩格斯在

①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科隆马克思主编出版的《新莱茵报》工作,该报被禁后,他在 1850 年还为《政治经济评论》<sup>①</sup>写文章。他曾参加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并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之战。<sup>150</sup>巴登起义被镇压后,恩格斯作为政治流亡者回到英国并于 1850 年再次进入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退出商界(1869 年)之后,他从 1870 年起居住在伦敦。他协助自己的朋友马克思推动 1864 年兴起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活动。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担任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书记。<sup>②</sup>他支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年莱比锡版;1892 年斯图加特新版)。这部著作虽有片面性,但具有无可争辩的科学价值。《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sup>③</sup>(1866 年<sup>④</sup>苏黎世第 2 版)是他的较大的论战性著作。此外还出版了下列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 年斯图加特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2 年<sup>⑤</sup>斯图加特第 4 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 年柏林第 4 版)。恩格斯还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以及第 1 卷的第 3 版和第 4 版;他还是《新时代》上许多文章的作者。——参考卡尔·考茨基发表于 1888 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布吕恩)上关于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13 页。——编者注

③ 即《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编者注

④ 应为 1885 年。——编者注

⑤ 应为 1891 年。——编者注

恩格斯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祝贺他 70 岁生日》(载于《新时代》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25 页及以下几页)。

大约写于 1890 年 3 月底 4 月初  
以及 1892 年 10 月上半月

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1893 年菜比锡、柏林和维也纳  
第 14 版第 6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关于弗·恩格斯 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 悼词的报道<sup>546</sup>

工人的老朋友

上星期,海伦·德穆特逝世了<sup>①</sup>,社会主义的党因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成员。海伦·德穆特 1823 年<sup>②</sup>元旦生于圣文德尔,父母是农民,14 岁来到特里尔的冯·威斯特华伦家。1843 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从 1837 年起到 1881 年马克思夫人逝世时止,除马克思夫人婚后的最初几个月之外,两位妇女始终相依相伴。1881 年 12 月马克思夫人逝世和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逝世之后,海伦·德穆特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料理家务。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都见证说“她深谙人情事理,品行正直无私,总是关心别人,为人可靠,天性直率真诚”。

恩格斯在她的葬礼上说,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甚至商量有关他的经济学著作问题。恩格斯说:“至于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

---

① 海伦·德穆特于 1890 年 11 月 4 日逝世。——编者注

② 应为 1820 年。——编者注

---

海伦与马克思及其妻子合葬于海格特墓地。

载于 1890 年 11 月 22 日《人民  
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1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条目<sup>547</sup>

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记材料编写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1837年到1841年曾从事商业, 最初在巴门, 从1838年起在不来梅做商行的见习生。1841年至1842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服役<sup>417</sup>, 之后于1843年<sup>①</sup>进入他父亲<sup>②</sup>在曼彻斯特开的公司<sup>③</sup>, 在那里工作到1844年。1845年到1848年, 他有时住在布鲁塞尔(同卡·马克思一起), 有时住在巴黎; 1848年到1849年5月, 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工作。1849年6月和7月, 他参加德国南部的起义<sup>150</sup>, 担任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副官。然后, 他再次短时间地逗留伦敦, 1850年返回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工作, 最初是当职员, 从1864年起成为股东。1869年他永远退出商界。从1870年9月起居住伦敦。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列出以下数种: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卢格和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第86—114页;《新时代》1890—

---

① 应为1842年11月。——编者注

②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欧门—恩格斯公司。——编者注





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236页及以下几页转载)。

(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恩·和卡·马·,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87年纽约英文版)。

(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还有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丹麦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英文版)。

(1848—1849年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和1850年在伦敦的《新莱茵报。评论》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

(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

(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

《德国农民战争》(根据《新莱茵报。评论》重印),在莱比锡共出三版,1875年出最后一版。

《论住宅问题》,三篇,1872年莱比锡第1版,1887年苏黎世第2版。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

(未署名)《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版。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1873年莱比锡版。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sup>①</sup>,1878年莱比锡第1版,1886年苏黎世第2版。

---

① 即《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编者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在苏黎世出第1、2、3版,1891年正在柏林印制第4版(还有法文版、俄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罗马尼亚文版、荷兰文版、丹麦文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苏黎世版,1889年斯图加特第3版(还有意大利文版、罗马尼亚文版、丹麦文版;法文版正在印行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于《新时代》1889—1890年第8年卷第2册;还有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罗马尼亚文版)。

《论法兰西内战》<sup>①</sup>(载于《新时代》1890—1891年第9年卷第2册第33页及以下几页)。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年汉堡版。

除此之外,他还为下列著作写了引言和序言等:

I. 用德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83年第3版;1890年第4版(关于布伦坦诺的序言)。《资本论》第2卷(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1885年版。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年斯图加特版(关于洛贝尔图斯的序言<sup>②</sup>)。

---

① 即《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见本卷第226—239页。  
——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49年),1885年苏黎世版(序言<sup>①</sup>)。

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885年苏黎世版(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苏黎世版(导言:《沃尔弗传》<sup>②</sup>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苏黎世版(引言:波克罕传<sup>③</sup>)。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sup>④</sup>),1891年柏林版。

## II. 用英文写的:

卡·马克思《资本论》,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弗·恩格斯编辑。1887年伦敦版(译文审阅并作序)。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8年波士顿—伦敦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sup>⑤</sup>,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①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② 即《威廉·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③ 《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本卷第246—255页。——编者注

⑤ 即《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编者注

弗·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7年纽约版(序言和附录,序言还出版了单行本:《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用英文和德文在纽约出版;英文本1887年在伦敦再版;德文本还载于《新时代》<sup>①</sup>)。

参考卡尔·考茨基发表于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布吕恩人民之友出版社)上关于恩格斯的文章;这一详细的传记还转载于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7年第45—50号(11月至12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祝贺他70岁生日》(载于《新时代》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225页及以下几页)。

编者

大约写于1891年4月下半  
月—5月初

载于《政治科学手册》1892年耶  
拿版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sup>①</sup> 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恩格斯的序言载于该报1887年6月10、17日第24、25号。——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

伦敦的 5 月 3 日<sup>548</sup>

路·考·5月4日于伦敦。长达12个月的工作昨天获得了回报,这种回报的非同寻常和令人振奋是无法描述的。昨天,人们亲眼看到一场盛大游行,它将英国工人群众团结在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旗帜之下,此时,不知内情的人所谓的不团结,冷漠地、几乎纯粹实用地看待五一节,“群众的非理性”,统统都像灰尘一样随风消散了。去年有两个分裂的委员会和两场分裂的游行;今年,**The London Trade Council**(工联伦敦理事会)<sup>117</sup>和**The Legal Eight Hours Demonstration Committee**(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委员会)<sup>119</sup>携手合作了。

这种携手合作实际情况如何,当然只能由那些深入了解这一热闹景象的内情的人判断。不过,“群众的非理性”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工联理事会的书记希普顿同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委员会携手合作了。而如果说游行活动进行得很出色的话,那么这只能归功于站在委员会身后的工人的热情,只能归功于委员会自身的灵活性,为了这项伟大事业,委员会甘于处理不断撂给它,特别是希普顿不断撂给它的各种私事和琐事。人们感到,今年的游行应该比去年的更盛大;人们觉得,无论如何必须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灵活性取得了成果,

“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的工联的卓越表现，给“熟练”工人的“旧”工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新的运动，两年以来根扎得越来越深，支持者与日俱增，虽然它还不是大陆上所理解的那种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它已经将各国工人的国际联合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之上，而且运动的社会主义色彩浓厚，以至于它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英国还存在着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派别，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就是其代表。遗憾的是，它不同联合委员会合作。虽然起初社会民主联盟同所有其他工人组织一样，派代表参加八小时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在后来为游行举行的会议以及实际工作中，联盟的三位代表都缺席了。联盟曾向工联理事会申请为自己的演讲人提供两个单独的讲坛。工联理事会同联合委员会不得不拒绝这一请求。实际上，为每个工人组织都分配一个甚或两个单独的讲坛，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联盟决定举行自己的集会。因此，除了 12 个呈一个巨大的弓形从北向南横穿公园排列的讲坛，还有社会民主联盟的 4 个小讲坛也吸引了为数不多的公众。这样一来，这个宣称自己是英国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组织，就把自己排除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外，而它自己的小型侏儒运动，相比之下也就原形毕露——一个宗派的运动。联盟的原则在纸面上显得冠冕堂皇；这些原则同各国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原则一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其中缺乏马克思的精神；这些原则被理解为人们必须信奉的僵死的教条，而不是从历史发展和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中得出的、工人阶级自己逐渐认识到的生动结论。因此，联盟连同它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正统教义注定会置身于群众运动之外，扮演荒漠中的传道者的角色，而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的庞大队伍不屑一顾地从它旁边走过。

各个组织的集合地点定在泰晤士河码头。在会员超过5 000人的所有工联组织中,“Navvies' and Bricklayers' Union”(挖土工和泥瓦工工联)通过抽签拔得头筹,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其他各个组织——要——列举它们是不可能的事——从各自的集合地点赶来:东边的迈尔-恩德,西南边的巴特西,东南边的伍利奇,北边的克拉肯韦尔-格林。从十二点到两点,它们陆续到达泰晤士河边,按照到达码头的先后顺序加入挖土工和泥瓦工的队伍。纠察队员戴着醒目的绶带和红袖章,有的骑马,有的徒步,忙得不亦乐乎。两点过后不久,游行队伍从码头出发了。工人的队伍穿过桥街、议会广场、维多利亚街、格罗夫纳广场,经过贵族居住的西区向海德公园角前进。马掌匠骑马开道,由无数工人群众组成的浩大的游行队伍,带着旗帜和乐队,挤满了街道。队伍当中,无数面或多或少带有艺术色彩的旗帜迎风飘扬,其中一些旗帜以其徽标和图像将工人的质朴表露无遗。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清楚地描绘这一场景;保守派的报纸也放弃了给出哪怕是大致正确的游行人数的尝试。人们必须亲眼目睹,而且即使亲眼目睹,也无法把这一场景向别人描绘清楚。我从自己所在的10号讲坛,看到工人们列队进入公园。在集会持续的两个小时当中,游行队伍川流不息,没有中断过一分钟。黑压压的密集的人群向前行进,从旁边经过,去往各个讲坛,排列好队伍,而后面新的人群又不断接踵而至。一条800米的道路(讲坛所呈现的弓形的弦)在整整两个小时中总是挤满了人,目光所及之处,人群黑压压的,简直数不胜数。甚至到集会结束时,还有新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地进入公园,而那时据说游行队伍还占据着半个码头。

现在谈谈公园里面的情况。正如之前所提及的,我们设了12个讲坛。单数讲坛属于工联理事会,双数属于八小时委员会。集会在

三点半开始。各个讲坛的演讲人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演讲人更多地是本着旧工联的精神演讲，而在另一部分讲坛上向群众演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演讲人、新工联的人以及所谓的激进派<sup>116</sup>，他们大都主张全力以赴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大部分演讲人强调，实现八小时工作日只是各国工人最终解放的第一步，如果这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他们也不会心满意足地就此罢手，而是会继续斗争，直到大多数人都赢得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条件。五点钟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集会声明，对全体工人实行国际八小时工作日是工人最终解放的第一步，兹要求各国政府实行八小时法定工作日。”<sup>①</sup>

对这份决议同时进行表决的要求是从第六讲坛发出的。艾威林博士在这个讲坛上作为整个公园集会的主席主持会议，这个职务于他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促成游行成功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主持了联合委员会的几乎所有会议。本该列出所有演讲人的名字。英国各家报纸都提到的最为重要的演讲人有：约翰·白恩士、肯宁安-格雷厄姆、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sup>113</sup>执行委员会唯一的一位女性）、威尔·梭恩、肖伯纳。

肯宁安-格雷厄姆曾因健康原因遵医嘱前往摩洛哥，刚刚从那里回来。他向听众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他唯一无法让自己的听众对八小时工作日感兴趣的的城市是摩洛哥的凯比尔堡。他竭尽全力阐明八小时工作日的益处，但奇怪的是，他的阐述受到了冷遇。后来他才了解到，那里很久以来就实行两小时半工作日——难怪，这些摩洛哥人

<sup>①</sup> 参看《海德公园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游行》，载于 1891 年 5 月 4 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9092 号。——编者注

对八小时工作日不感兴趣。

天气极好。5月1日和2日天气却非常糟糕，糟糕到足以使对游行的最强烈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这些人营养丰富，可以尽可能舒适地抵达海德公园，我们当然可以说：“天气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是如果想一想几十万工人，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或罢工者，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通常早晨九点半就要从他们的住所出发，以便按时抵达集合地点，他们怎么能经受得住倾盆大雨造成的突然降温，而不至严重伤害健康呢？但是正如前述，一切都非常顺利，天国里的警察和尘世间的警察一样，都如此充满爱心。一位演讲人<sup>①</sup>在热烈的欢笑声中说：“天公也是八小时工作日的拥护者。”必须说，他的话我们完全赞成。

路·考茨基写于1891年5月  
4日

载于1891年5月15日《工人  
报》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① 爱·艾威林。——编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

## 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sup>549</sup>

吉勒斯先生宣称,在艾威林博士打了他耳光之后,他也毫不犹豫地艾威林博士进行了相应的肢体惩罚,他的这一说法是个可笑的谎言。我证明,吉勒斯先生在脸上挨了重重的两耳光之后,直到他夫人赶来抱住艾威林并呼叫警察之时才恢复神志,抓住了打他的人的胳膊,但是力气很轻,对方毫不费劲就挣脱了。吉勒斯夫人表现出了勇气,她丈夫则给人留下了可悲的怯懦印象。

路易莎·考茨基

1891年9月22日于伦敦

路·考茨基写于1891年9月  
22日

载于1891年9月27日《汉堡回  
声报》第22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sup>550</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伦敦发来一封贺信，他在信中祝愿党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表示认同。

大约写于 1891 年 10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1891 年 10 月 14—20 日》1891 年柏林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2 年 4 月 1 日对 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sup>551</sup>

……最反对接见记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们破一次例，同我们谈一谈他的感想。

我们问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sup>552</sup>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细干的事，这些奸细企图败坏他们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炸事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又特别为某些政治集团的阴谋效劳。的确，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sup>553</sup>期间，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操纵的。的确，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们有些被引入歧途的朋友参加了运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马上退了出来。

几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铺被抢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讯表明，主谋是反犹太主义者<sup>109</sup>，他们竭力利用某些贫民的饥饿来迫使他们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安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sup>554</sup>，也是

使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细们的行径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出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一两个坏蛋愿意为警察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谁也不敢肯定说，他们是社会党里的人。”

## 俄国的外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荡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吗？譬如说，你们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一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说。“而且我并不相信马上就会发生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丝毫没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吗？”

“丝毫没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场面<sup>300</sup>（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地献殷勤）可以说是形迹可疑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却完全不同。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较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sup>265</sup>作斗争。

这个祸患并不是某种气候灾害造成的暂时性歉收的结果。这是俄国新的社会组织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sup>52</sup>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整团整团的人马在雪地里覆没。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

转折的开始。在彻底失败之后，在俄国的孱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之后，因自己帝国的悲惨状态而陷于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尽，别无出路。因此，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sup>302</sup>，这一解放成了在贵族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给了贵族。农民得到的则是劣地，而且数量非常不足；同时，农民还必须在 49 年内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这引起了什么后果呢？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纳地租，不得不欠下许多债；他们的死路太多而活路太少。一帮 Koulacs(高利贷者)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于是，他们欠下的债就越来越多，以致使他们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债款失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贷者不愿意放债时，农民为了弄到钱就只好出卖自己的收成，他们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而且连播种必需的种子也卖了，这样一来，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一饥荒反过来又给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没有耕畜，既不能耕地，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农业生产就长年受到破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经济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

是人为地创造作为中间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快地达到这点，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业并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然而，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品，所以它需要国内市场。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习惯于自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产许多木制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当林地转归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工业就趋于衰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结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于是农民一定得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饥荒降临了，它给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无法再买任何的工厂制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 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

“这么说，在您看来，俄国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说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所描绘的 17 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情景<sup>304</sup>，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身上，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也不是没有经过震荡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机，这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当前考虑得更多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债……”

“我正好想谈谈这批公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非常爱谈报

复的法国资产阶级，它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皇政府要的是 2 000 万金镑，但它得到的只有 1 200 万……<sup>301</sup>”

“据说，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给他们的受到俄国政府迫害的同道者报仇，曾经促成这批公债失败，是吗？”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论够多了，所以现在我能替他们辩护，反对说他们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

“这么说，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说过，经济状况不容许它作这种危险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看看俄国军队的组织，那我们会看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现役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预备兵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没有后备军官来补充军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军官呢？从哪个方面得到呢？”

我们的交谈人说：“在我们德国，后备军官比我们所需要的多 50%。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也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吗？”

## 强有力的法国

我们回答：“绝不。我们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军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的。”

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绝不会使我不愉快<sup>①</sup>。我并不想看到德国军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具有相同优点<sup>②</sup>的德国。你们的伟大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宣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sup>180</sup>那是真正的‘三国同盟’。”

“在结束谈话时，请允许我们说，您把俄国的状况描绘得有些阴暗了。”

“完全不是那样。您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吗？您知道，为了帮助挨饿的俄国农民，曾经决定从有余粮的高加索运来粮食。接着下了一道道有关的命令，把大批粮食运到一起，派车皮去装运。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去的空车皮集中得太多，造成了堵塞。粮食放在车皮旁边，而车皮却一动也不能动。沙皇<sup>③</sup>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派了一个将军到出事地点；这个军人大吹大擂，宣称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他能够弄走的只是几趟列车；大部分粮食都在原地烂掉了！下了动员令又会怎样呢？俄国的铁路本来就不那么多，而俄国的军官就连这么点铁路也不会利用。”

## 关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这个一切纠纷的根源会怎么样？您相信

---

① 恩格斯的两个手稿片断保存了下来。第一个片断与本段从这句话开始的文字大致相同。——编者注

② 在第一个片断中不是“优点”，而是“条件”。——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能同时使法国和德国都满意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吗?”

“我希望<sup>①</sup>,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办的事,就是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与下得到解决。相反,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是妨碍社会党人取得政权的唯一手段。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德国社会党人比资产者更关心民族生存。因此社会党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人<sup>②</sup>,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取 1793 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sup>③</sup>”

载于 1892 年 4 月 6 日《闪电报》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① 第二个片断从这里开始,不过第一句话不是“我希望”,而是“关于这一点,我在 1892 年的《工人党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清楚地向法国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你们从中可以看到”。恩格斯提到的这篇文章指《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 327—346 页。——编者注
- ② 在第二个片断中,这句话为:“因此,他们将反击一切侵略者,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编者注
- ③ 在第二个片断中,这句话后面是:“此外,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刚刚在国会发言中重申:对于德国社会党,不存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因为这个党十分了解自己在这一点上的国际责任。”——编者注

##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 (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 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 代表大会的声明<sup>352</sup>

鉴于八小时工作日已经写入了海峡两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并且在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sup>353</sup>上将研究该制度的实施;

鉴于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sup>261</sup>之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联要就这一特殊问题在伦敦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反对苏黎世大会,这就破坏了早先达成的国际协定;

鉴于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倡议是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sup>139</sup>作出的,并且工联只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才接受了这一决议;

鉴于国际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像格拉斯哥工联多数派所希望的那样,将工人倡议局限于八小时工作日这一单独问题;

由来自629个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法国工人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sup>521</sup>决定:它不会出席伦敦代表大会,并谴责格拉斯哥的反社会主义多数派企图通过组织伦敦大会在工人党中制造分裂,它邀请工联重返国际工人运动并参加苏黎世代

---

表大会。

写于 1892 年 9 月 24 日—28 日  
之间

载于 1892 年 10 月 4 日《社会主  
义者报》第 106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 (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 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sup>352</sup>

关于英国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作出的尽快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讨论能够以何种方式在国际上实现八小时法定工作日的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声明:

鉴于明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sup>353</sup>将同此前的巴黎大会<sup>139</sup>和布鲁塞尔大会<sup>261</sup>一样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东西,所以没有理由再专门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八小时法定工作日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只有通过立法途径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因此,政治性的工人政党至少同纯粹的工会组织一样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此外,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的工人,不管他属于哪个组织。

党代表大会希望,德国工会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不要同意专门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是派代表去参加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只有这个代表大会能够被视为有阶级觉悟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机构。

此外党代表大会还希望,英国工联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决议是错误的,放弃专门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并且同样派代表参加

---

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写于 1892 年 11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2 年 11 月 19 日《前进报》第 27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年3月18日纪念 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sup>555</sup>

恩格斯先生(马克思博士的得力助手)在他出席的那次集会上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他回顾了最近22年的历史,他说:

“在那一时期开始时,仅有的两个同国际有联系的英国人,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离开了国际,因为国际赞同公社所实行的政策,因为社会主义在当时还为人们所抗拒。<sup>556</sup> 1871年秋举行代表会议,会上第一次提出建立不同于并独立于所有其他政党的政党问题。<sup>157</sup>次年,英国代表在海牙站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反对议会活动。<sup>206</sup>那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1888年新工联的成立<sup>142</sup>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第一次导致独立工党的建立<sup>508</sup>,而这个党又必将把所有其他党派吸收进来。”他认为,这说明巴黎公社的教训没有付之东流,没有被忘记。

在集会上讲话的其他人当中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人(马克思博士的女儿)、弗·列斯纳先生(国际创始人之一)、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和J.康

678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 年 3 月 18 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

---

奈尔先生。巴黎公社永垂不朽!

载于 1893 年 3 月 25 日《工人选  
民》报第 1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 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sup>557</sup>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要马上补充说,我们社会党人对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益处。军事拨款没有被批准,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果。<sup>406</sup>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们,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都非常愤慨,中央党<sup>97</sup>和激进派<sup>558</sup>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有意强调一下他的话,补充说:“要知道,德国人民说:‘我们的士兵已经够多了!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现在,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已解散的帝国国会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新当选的、将要在立法机构任期五年的帝国国会议员们可能同政府相勾结,因为政府稍微借助于缓和的暴力就能让一项妥协的议案获得通过。但是,非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在这种

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会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很难说谁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1864 年在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sup>247</sup>就会重演。”

恩格斯的回答本身引出了我的问题——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经展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战争。

我的交谈人迅速地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在 1864 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到各邦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各小邦反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保障,它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我对此是持保留看法的,我要对您说的是: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各邦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致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强调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许多朋友已经说过,他们预见会有人破坏普选权。”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吗?我不认为会这样。也许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们一种审查和修订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sup>439</sup>。”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某些邦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会认可这种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被普鲁士政府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当前,谁会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即使这样,也有问题!……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

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切……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列夫纳是无能为力的……<sup>83</sup>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今天，战争的结局是那样难以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武器上的这一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到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今天，战争将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将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主要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向那些经营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拨付经费的手段，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运送给养的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

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双方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担心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 1890 年多获得 70 万张选票,也可能多 100 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 250 万张,也将是 225 万张。<sup>437</sup>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对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 150 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 80 名议员,而不是 36 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10 万居民产生一名议员。<sup>559</sup>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 6 名议员,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已经超过 150 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 16 名议员。另一个例子是:科隆现在已有 25 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 1 名议员。”

“所有的选区都会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 400 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

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 350 万张选票。而全德国的选民是 1 000 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 700 万。如果在总数 700 万选民当中有 350 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 1 000 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 150 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六个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 350 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则表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对我作了说明，原话如下：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sup>220</sup>，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

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 1893 年 5 月 13 日《费加罗报》第 133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1893 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电<sup>560</sup>

伦敦。祝贺五一节。奥地利无产阶级万岁！

考茨基<sup>①</sup>、恩格斯、弗赖贝格尔

写于 1893 年 4 月 30 日或 5 月  
1 日

载于 1893 年 5 月 5 日《工人报》  
第 1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① 指恩格斯的秘书路·考茨基。——编者注

\*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  
对英国《每日纪事报》  
记者的谈话<sup>561</sup>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访问了他，他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而喜气洋洋，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我们增加了 10 个席位。第一次投票时，我们获得 24 个席位，第二次投票时，我们的 85 位候选人有 20 位当选。我们得到了 16 个新的席位，失去了 6 个席位，这样，我们净增 10 个席位。柏林的 6 个席位中我们拥有了 5 个。”

“你们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们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提交选举报告，不过预计会有 200 多万票<sup>437</sup>。1890 年，我们得到了 1 427 000 票。请不要忘记，这些选票纯粹是给社会党人的。除了激进共和主义政党人民党<sup>562</sup>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提出了 391 个候选人，并且拒绝同任何别的政党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但是我们坚决拒绝任何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才这样有力。我们的人，除了我们党自己的纲领以外，没有义务支持任何政党

或任何措施。”

“可是，你们有 200 万选民，不是本来应当得到更多的席位吗？”

“这是由于有缺陷的议席分配办法。帝国国会成立之初，原定各选区平等，每 10 万居民选出 1 名议员；但是，原本选民人数就多寡不均，加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现在各选区的选民人数相差很大。这对我们非常不利。<sup>559</sup>就以柏林李卜克内西的席位为例吧。他在选区里得到 51 000 票，而这个选区的居民却有 50 万左右。”

“为什么你们失掉了 6 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们在 1890 年就认为不过是侥幸取胜。在吕贝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听说，许多工人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们应当会保住这个席位的。此外，不应忘记，商业萧条对我们的打击比对你们更厉害，我们不得不同每一个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有心人士已经找到办法将秘密投票化为乌有了。我们投票不像你们英国那样是在一张选票上划记号；而是每一个选民用他带来的选票投票。此外，商业萧条和 1892 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许多工人接受了公共救济，而这要剥夺他们一年的选举权。<sup>563</sup>”

恩格斯先生接着说：“但是，我们的失败比我们的胜利更让我引以为傲。在德累斯顿农村选区，在总共 32 000 票中，我们<sup>①</sup>得到的票数比所有其他党派都投票赞成的那位候选人<sup>②</sup>只少不到 100 票。在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选区的候选人是格·霍恩。——编者注

② 费·奥·汉尼兴。——编者注

奥滕森,我们的候选人<sup>①</sup>在总共 27 000 票中所得的票数,比那位也是得到所有其他党派支持的当选议员<sup>②</sup>只少不到 500 票。在斯图加特,我们的候选人<sup>③</sup>得到 13 315 票,只落后那位当选议员<sup>④</sup> 128 票。在吕贝克,在总共 19 000 票中我们只落后 154 票。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的同盟的。”

“现在请您谈谈,你们的政治纲领是怎样的?”

“我们的纲领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up>118</sup>的纲领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我想,你们的政策更接近费边社<sup>509</sup>的政策?”

“绝对不是”,恩格斯先生用十分强烈的语气回答。“我认为费边社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反对所有现存的政党并准备同它们作斗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像一个小纯粹的小宗派,而且像一个小纯粹的小宗派那样行动。这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不懂应该怎样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例如,它要求约翰·白恩士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打出红旗<sup>564</sup>,然而,这一行动会毁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争取到码头工人,反而会把他们重新推回到资本家的怀抱里去。我们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的纲领是纯

---

① 海·莫尔肯布尔。——编者注

② 奥·毛奇伯爵。——编者注

③ 卡·克洛斯。——编者注

④ 古·西格勒。——编者注

粹社会主义的纲领。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所有。诚然，我们接受任何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但只是把它作为分期偿还的债款，我们对此并不感谢。我们永远投票反对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在那些第二次投票时没有我们候选人的选区，我们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投票给那些承诺反对军事法草案、反对以任何形式增税和以任何形式限制人民权利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军事法草案将获得通过。<sup>406</sup>反对派行将彻底瓦解。事实上，我们是目前唯一真正的和强有力的反对派。民族自由党<sup>96</sup>归附了保守派。自由思想党<sup>103</sup>分裂成两部分，这次选举差不多把它彻底击垮了。天主教党<sup>97</sup>和一些小党派不敢冒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的风险，它们不敢抵抗，宁愿让步。”

“现在请您谈谈欧洲的政治形势，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对此将有哪些影响呢？”

“好吧。如果军事法草案通过了，那么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法国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身体不宜服役的人，都招募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作战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德国将一致行动。”

“那么，照此说来，欧洲的和平前景很渺茫吗？”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冲突，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和射程以

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革命,以致谁也无法预测,在这样的新条件下作战,正确的战术会是什么样的。这将是铤而走险。而将来在战场上对峙的军队,也将是如此强大,以致同未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我们赞成和平。我们始终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sup>75</sup>,在色当战役<sup>214</sup>之后,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sup>①</sup>,我们指出,德国人民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没有争端,我们要求体面条件下的和平,并且准确地预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一兼并会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和平造成长期威胁。我们的党在帝国国会里向来要求,应该给予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自己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机会——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在德国,或者并入瑞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么,您认为成立‘欧洲合众国’已经为期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思想正在欧洲各国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这时,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sup>②</sup>,上面标示着自从目前这样

---

①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编者注

② 这份图表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帝国国会成立以来,各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1877 年,我们得到 50 万票;1881 年,由于严酷的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我们只得到 30 万票;1884 年,55 万票;1890 年,1 427 000 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 200 多万票。”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1860 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 1760 年和 1810 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次,目前的商业萧条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比对你们那个年老的工业国家打击更大。因此,对工人的压迫也就更厉害。当我说工人的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职员、手工业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救方法,既然他们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很快就觉悟了并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组织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绝望。它之所以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很像你们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sup>565</sup>。此外,我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内就送到所有 24 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么,您希望很快看到——这是所有人都很好奇的——一个社会党执政的政府吗?”

“为什么不想呢? 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

1900 年和 1910 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才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我想,到那个时候,你们的人民恐怕将拥有这样一个政府,在那里,悉尼·韦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试图感化自由党。我们不相信能感化资产阶级政党。我们感化人民。”

载于 1893 年 7 月 1 日《每日纪  
事报》第 976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sup>443</sup>

如此热烈的欢迎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出于对那个人（他指了指卡尔·马克思的肖像）的尊敬。我正是和他一道开始了战斗：正是同他一起，我在 1843 年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sup>566</sup>

社会主义运动在后来的发展，是我们当时所无法想象的。那时我们只是孤军奋战，而今天你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让一切官方权力发抖。

还有一个日子，又过了 30 年，人们感到对国际<sup>129</sup> 不应该再抱有希望。那时，欧洲无产阶级遭受了一次让所有人都悲痛万分的挫折——巴黎公社的失败，那也是一段光荣的回忆。国际代表大会<sup>206</sup> 作出了如下两个决定：

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

第二，使欧洲无产阶级放弃变得过于狭隘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会导致无谓的牺牲。

国际就这样解散了。

从那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国际的重生，而重生的国际采取了一种

更加灵活、能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形式。请诸位想象一下,一个企图对欧洲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的总委员会;这是无法实现的。今日奋发的团结精神会做好该做的事,而代表大会要来完善已经取得的成果。

在这一新的形式下,国际不断壮大,日益巩固。此刻,它对未来充满信心。

让我们继续我们坚持至今的事业吧;让我们致力于统一,不要纠缠于琐碎的事情,要目光远大。

最后,我想对法国同志说几句话。

希望你们赢得这场重大的选举战役的胜利<sup>436</sup>;我祝愿你们获得和德国同志一样的成就<sup>437</sup>,如果你们的辉煌胜利能够让德国同志相形见绌,他们将头一个对你们表示祝贺。

国际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万岁!

载于1893年8月15日《正义报》第4962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32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sup>443</sup>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译成我热爱的德语。<sup>①</sup> 你们对我的热烈欢迎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以来,已经整整 50 年过去了。我们当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sup>②</sup> 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还有一个值得纪念

---

① 在《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中,开头的文字为:“男女公民们!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热爱的德语。”——编者注

② 在《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中,从“自从马克思”到“发表文章”的这段文字为:“自从马克思和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我们的第一批社会主义的文章从而加入运动以来,已经整整 50 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就从当时的小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编者注

的日子。1872 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sup>206</sup>。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这个决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会<sup>139</sup>、布鲁塞尔代表大会<sup>261</sup>和这次代表大会<sup>353</sup>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第二，国际停止以旧形式进行活动。当时是陶醉于光荣的公社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极点的时候。旧的国际如果继续进行活动，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牺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让各国无产阶级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应当秉承这种精神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的立场。松散的联合，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结合——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再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胜利。<sup>①</sup> 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的垮台表示惋惜。他们说，同警察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任何警察<sup>②</sup>、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

① 在《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中，下面还有一段话：“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里有很多英国代表出席，要知道他们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无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这里肯定有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地方，他们也可以学习学习。”这段话应该是恩格斯用英语发表的讲话的一部分。——编者注

② 在《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中，不是“任何警察”，而是“全世界任何警察”。——编者注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sup>①</sup>

载于 1893 年 8 月 15 日《前进  
报》第 19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① 在《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中，最后还有一段话：“（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祝贺声，欢呼声经久不息。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马赛曲》）。”——编者注

---

\*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sup>443</sup>

很遗憾,年龄也不允许我学习捷克文了。你们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社会的和民主的传统对我们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你们当中那些力求获得自决权的人<sup>567</sup>是正确的;他们的诉求是很自然的,对此我们应该赞同。可惜,他们对自然的社会运动表现得目光短浅。我们坚信我们会取得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胜利。请转达我对我们的兄弟们的问候!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 1893 年  
8 月 19 日《人民之声》第 15 号

原文是捷克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第 27 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 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sup>443</sup>

敬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你们对我的接待我当之无愧,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sup>①</sup>我只能说,可惜现在只有我有幸来收获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的热烈的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 50 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回报。我的最好的回报就是你们!<sup>②</sup>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顾及到我们。我们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强大的力量,比其他强大的力量更能起决定作用。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活,<sup>③</sup>我

---

①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开头这句话。——编者注

②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如果说我”到“就是你们!”的这段话为:“如果说我的确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能说的是,我不需要回报。我的回报就是你们!我的回报就是整个世界!”——编者注

③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没有一个国家”到“我们没有白活”的这段话为:“没有一个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力量,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比其他强大的力量都要强大。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得顾及到我们。”——编者注

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在德国,有人曾想用暴力来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意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sup>①</sup>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稳步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sup>②</sup>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sup>③</sup>。刚才一位讲演人<sup>④</sup>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低估。<sup>⑤</sup>敬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sup>⑥</sup>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sup>⑦</sup>,有人还领着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sup>⑧</sup>占领过的市政厅大厦富丽堂皇的拱廊。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人再低估你们了(掌声雷鸣)<sup>⑨</sup>。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惶恐,当时他们

- 
- ①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从“在德国”到“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的这段话为:“你们现在正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衡量党的影响力和优越性的唯一手段。最近 20 年的德国历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编者注
- ②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所有的执政者”,而是“富人”。——编者注
- ③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 ④ 卡·洛伊特纳。——编者注
- ⑤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这句话为“甚至在国外也没有人低估这个运动”。——编者注
- ⑥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敬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而是“今天我看了资产阶级”。——编者注
- ⑦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 ⑧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有人还领着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而是“我从议会走进你们最近曾经”。——编者注
- ⑨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报道说，<sup>①</sup>7 月 9 日无产阶级统治了维也纳<sup>568</sup>，而且统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sup>②</sup>

载于 1893 年 9 月 15 日《新自由报》第 10440 号和 1893 年 9 月 22 日《工人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 ①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不是“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惶恐，当时他们报道说”，而是“当维也纳的消息传来时，我看到英国报纸记者们面露惶恐之色”。——编者注
- ② 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没有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 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 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sup>443</sup>

同志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举办热情的欢迎会,我是当之无愧的。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维也纳已经说过的话。<sup>①</sup>这场欢迎会我认为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为了卡尔·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一个议会活动家,我的工作是在另一个领域,我主要是在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上一次看到柏林,已经是将近 51 年前的事了。<sup>417</sup>自那时以来,柏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它是一个居民不足 35 万的小小的所谓“王都”,靠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来维持。现在它已是一个拥有差不多 200 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维持的大都市了;今天即使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而且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呢,几个月以前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经受了检阅,党列队行进,获得了将近 16 万张选票<sup>437</sup>;柏林总共六个议员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领先于欧洲所有的大城市,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而且不仅是柏

---

① 见本卷第 696—698、700—702 页。——编者注

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革命。我有 16 年不在德国了。<sup>569</sup>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亲身体验过——从 1878 年起,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sup>93</sup>统治着,现在你们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驱逐出境的麻烦,要知道,那时候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全场欢动,有人喊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大的转变。在上二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农村居民;现在它已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从荷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烟囱。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不可遏止地增长感到震惊,他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同志们!我确信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 1893 年 9 月 26 日《前进报》第 226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sup>570</sup>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现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迟于今年9月问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册将完成整个著作的理论部分,到那时,有待完成的就只剩下最后一册即第四册了,第四册将对剩余价值理论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概述。<sup>①</sup> 第一册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第二册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产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货币。可见前两册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只是它在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留在这第一个占有者的手里;随后它就以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的形式在各个得益者中间进行分配;第三册所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好谈了。除了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第三册还研究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贷和银行、地租和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连同前两册研究过的题目,已把标题中所答应要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括无遗了。

写于1894年1月9日或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1月12日《前进报》第9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翻译

<sup>①</sup> 见本卷第614—615页。——编者注

## 弗·恩格斯 1895 年 1 月 1 日 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sup>571</sup>

在 10 月份选举结束的第二天<sup>572</sup>，在恩格斯堆满报刊的工作室里，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快步朝我走来，愉快地握住了我的手，用一种出于激动而略带颤抖的声音告诉我，我们的获胜公告给他带来了欣喜<sup>573</sup>……

亲爱的伙计，请务必转达给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就说他们，还有萨克森人，都是被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选中的人民，如果他们代表工人党出席下一一次的伦敦代表大会<sup>574</sup>，我将极为高兴同他们会面！

载于 1895 年 8 月 8 日《人民报》  
第 220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 弗·恩格斯 189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 同维·阿德勒的谈话<sup>575</sup>

他临终前几天跟我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时说,这个党一定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党,而其他所有政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都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在党内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还有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追随各种民族口号。但是,一旦无产者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一旦德意志、捷克和波兰的工人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就不再是德意志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并且毫不丧失自身的特性,而共同的利益会促使他们共同开展斗争。奥地利工人已经证明,作为人类,不同的民族可以生活在一起。没有必要挑动具有共同利益的民族互相残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证明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就是恩格斯临终前几天跟我阐述的道理。……恩格斯在小石板上向我写道<sup>576</sup>:“替我向奥地利人致意!”那时我就知道,他认为奥地利人将会勇敢而坚定地向前迈进。

载于 1895 年 8 月 20 日《工人报》第 22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32 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 注 释

- 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恩格斯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他们准备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政策,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制度是扼杀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凶,同时揭露了西欧反动势力同沙皇俄国互相勾结的反动目的。恩格斯通过考察 19 世纪欧洲局势的演变,揭露了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指出:“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见本卷第 50 页)恩格斯基于这一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指出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与西欧工人阶级政党能否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见本卷第 49 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形势以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范,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于 1889 年 12 月—1890 年 2 月,原文是德文,译成俄文后,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标题,在 1890 年 2 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伦敦)第 1 期刊登了第一章,其余两章刊登在 1890 年 8 月出版的该杂志第 2 期。在此期间,前两章用德文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 年第 8 年卷第 4 期。但是《新时代》编辑部未经恩格斯同意,擅自对文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歪曲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所做的评论。恩格斯在 1890 年 4 月 1 日给杂志编辑卡·考茨基和出版人约·亨·狄茨的信中,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后来这两章经重新编辑修改后与第三章一起发表在该杂志第 5 期。

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1890年《时代》杂志(伦敦)4月号 and 5月号。此外,还有三份恩格斯原始手稿的片断和一份打字稿的片断也保存了下来。本卷译文根据《新时代》杂志1890年第5期所载德文版翻译,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在恩格斯生前,这篇文章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先后以丹麦文、罗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全文或部分发表。这篇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分,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在一些德文报刊如1890年7月1日《选民报》(莱比锡)第113号上发表。——3。

- 2 从19世纪30年代初起,英国政论家、前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通过他的杂志《公文集》,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列强进行秘密外交活动的文件,其中许多文件揭露了多年来英国对外政策实际领导人帕麦斯顿的外交活动的内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致力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活动,在一些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中,如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西方列强和土耳其》(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13卷),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等文章中都引用了乌尔卡尔特公开发表的材料或文件。马克思撰写的一些文章也被乌尔卡尔特发表。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乌尔卡尔特,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并坚决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把他称作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的诬蔑性言论。——6。

- 3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188)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287)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277),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6、64、125、135、382、409。

- 4 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和皮尔分子即左翼托利党人组成,它在成立后取代了辉格党在英国两党制中的位置。——6、64、135、320、380、400、409、494。
- 5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枢密院在治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到了18、19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6。
- 6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伏尔泰《答〈三个江湖骗子〉一书的作者》中的名言:“即使不存在上帝,也应该创造出一个上帝来”。——6。
- 7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7、123、140。
- 8 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欧洲部分所有20—40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从1876年起,服役期分为5年现役和12年预备役。服役人员从适合服役的男子中抽签产生,所有40岁以下有服役义务的非在役男子都编入民军。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层社会的特权、扩大到有产阶级的各种权利、各阶层人民不平等的服役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妨碍了沙皇俄国以资产阶级国家为模型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施。——9。
- 9 指欧洲第六次(1813—1814年)和第七次(1815年)反法同盟战争。——9。
- 10 “民族原则”原本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路·波拿巴在《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一书中曾对其进行了论述。根据这一原则,每个民族都有权在其自然疆域内决定自己的命运——从文化自治直至独立。波拿巴当政后以“民族的保卫者”自居,试图利用这一原则来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43)的结果,但实际上常常用它来掩盖法国的沙文主义和霸权野心。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

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民族原则”进行过揭露和批判。——11、628。

- 11 立陶宛大公国建立于13世纪初,13—14世纪兼并东斯拉夫大片领土,到1430年时,今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先祖加上少数大俄罗斯人占据公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居住在公国90%的领土上。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在1385年签订克拉科夫合并条约,首次进行合并,并推行天主教。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两国曾数度分合。1569年卢布林合并条约签订,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一个贵族共和国。——11。

- 12 东方礼天主教徒是指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而成的东方礼天主教会的教徒。波兰和立陶宛的希腊正教会在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宣布与罗马天主教会合并。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正教会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但仍旧保持正教教会的仪式,而且礼拜仪式继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12。

- 13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2、99、302。

- 14 17—18世纪在封建贵族的波兰国会中实行如下原则: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这一原则又称为自由否决权。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即使所有其他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2。

- 15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1648年三十年战争(见注13)结束后签订的以下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这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与德意志诸侯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

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从前在阿尔萨斯的领地,它对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也得到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德意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12、18。

- 16 1873年底至1874年初,恩格斯就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作了一份摘录,其中有如下内容:“主要杠杆[是]支付手段的增加等等,后者由对诸侯们的贿赂,法国给巴伐利亚、奥地利和主教们的补贴等造成”。随后恩格斯援引了该书第206页的一些数据。——13。
- 17 指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相传是由彼得一世或他的后裔下令制订的一份计划。1812年,法国人沙·路·勒叙尔在《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19世纪初叶的发展》(1812年巴黎版第176—179页)中提到这份所谓存放在俄国皇帝的秘密档案馆里的计划的内容,说该计划设定俄国外交的目标是征服欧洲和夺取世界霸权。1836年,弗·加亚尔代在《骑士德翁回忆录》一书中声称,德翁曾在1757年将遗嘱的一份抄件带到法国。1859年,经格·贝克霍尔茨考证,所谓“遗嘱”是伪造的。——13。
- 18 塞米拉米斯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伏尔泰曾将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后来又将该称呼用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曾提及这一称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230页)。——14。
- 19 恩格斯这里大概是借用了黑格尔的说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所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地把“历史的讽刺”同黑格尔联系起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15、628。
- 20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

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16。

- 21 彼得堡同盟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于1764年3月31日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入侵时另一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双方承诺决不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在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中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彼得堡同盟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加强在波兰的势力的意图。——16。
- 22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17。
- 23 恩格斯在自用的路·霍伊瑟《从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到德意志联邦建立的德意志史》第1卷（1857年柏林第2版）的封里写有如下札记：  
 “18世纪‘开明’政治的三个试验：  
 （1）弗里德里希二世——几乎一事无成      ）      两人都是  
 （2）约瑟夫二世——失败                      ）      俄国的同盟者  
 （3）法国人民——将其付诸实施。”——17。
- 24 指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由法国代表沙·达来朗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43）上提出。“正统主义的”源于拉丁文“legitimus”，即“合法的”。这一原则的提出旨在恢复欧洲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推翻的那些所谓“合法的”王朝。——17、27。
- 25 泰申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在

- 泰申签订的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根据和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则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归普法尔茨选帝侯所有。泰申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后来在和约的一项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18。
- 26** 此处是指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两次战争均是俄国获胜。——18。
- 27** 美国独立战争即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年),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主力被击溃后在约克镇被迫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1783年9月签订了巴黎和约。——19。
- 28** 鉴于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妨碍中立国商船的航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0年3月11日发表了一篇宣言,首次提出武装中立原则,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悬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在这篇宣言的基础上,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结成武装中立同盟(1780—1783年),甚至交战国法国、西班牙和北美也加入同盟。以武装中立原则为基础,巴黎和会与会国于1856年4月16日签订了《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并将其作为巴黎和约(见注29)的附件。——19、38。
- 29** 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的宗主权,同意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19、36。
- 30** 指1793年和1795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1793年1月4日,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关于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同盟条约。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

的一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克）、托伦以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1795年10月24日，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圣彼得堡公约。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普鲁士。在第三次瓜分后的一百多年中，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19。

- 31** 指第一次反法同盟。1792年2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旨在对法国进行干涉的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以及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1793年公开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797年。——19。
- 32** 1783年夏，在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腓特烈港（芬兰）会晤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古斯塔夫想探明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进攻丹麦和兼并挪威的计划所持的态度。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时也力图 and 瑞典搞好关系。但是由于俄国尚未打算放弃与丹麦的联盟以及不同意瑞典兼并挪威，会见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20。
- 33** 吕内维尔和约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败之后奥地利代表德意志帝国与法国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确认了法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扩大的疆域，包括法国对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兼并。和约还承认法国对1795—1798年在它支持下建立的巴达维亚、海尔维第、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国的统治。——21。
- 34** 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代表会议（1801年10月经雷根斯堡帝国议会选举产生，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的解决莱茵地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实际上确认了法国和俄国于1801年10月缔结的秘密协定的有关条款。根据决议，总人口达300万的112个德意志小邦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普鲁士以及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以补偿这些德意志诸侯因莱茵河左岸领地被割让给法国而遭受的损失。——21。

- 35 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奥地利在这次战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签订了普雷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并于1806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军事政治联盟。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此后除普鲁士和奥地利外德国几乎所有的邦都加入了联邦,这些邦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22、25。

- 36 这里列举的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参加这次反法同盟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普鲁士于1806年7月同俄国订立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

耶拿(图林根)会战于1806年10月14日在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普军被击溃。

埃劳(东普鲁士)会战于1807年2月7—8日在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进行,这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一次极其惨烈的战役,拿破仑损失了大量兵力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弗里德兰(东普鲁士)会战于1807年6月14日在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进行,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告结束。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俄国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见注41)。拿破仑强行签订的掠夺性的蒂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23、339、466。

- 37 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1809年初横越波的尼亚湾的冰封地带。俄军入侵瑞典领土加速实现了瑞典贵

族反对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阴谋,这一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塔夫四世被推翻,此后不久,其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在腓特烈港(芬兰)签订和约,将芬兰出让给俄国。——23。

- 38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 1807 年 6 月 25 日于蒂尔西特和约(见注 36)签订前在俄罗斯和普鲁士边界的涅曼河的会见,以及 1808 年 10 月 12 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在前一次会见中,拿破仑同意了俄国对土耳其的多瑙河领地的吞并。在后一次会见中,为了在与奥地利交战时能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多瑙河流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23。

- 39 俄土战争从 1806 年开始,以 1812 年 5 月 28 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结束(1807—1809 年间曾一度休战)。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和外高加索大部分地区以及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和约确认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客观上有助于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 1804—1813 年塞尔维亚人民的起义。塞尔维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1811 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据 1812 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必须承认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 1813 年入侵俄国的机会,撕毁和约,对塞尔维亚发起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了土耳其的统治。后来由于塞尔维亚人的反抗,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不得不通过 1830 年苏丹发布的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23、25。

- 40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普鲁士外交大臣亚·施莱尼茨的“行动自由政策”一语。施莱尼茨在 1859 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埃蒙特对奥地利战争(见注 69)时期对各交战国的态度,即普鲁士既不卷入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24。

- 41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 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 1806 年 11 月 21 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

麦和奥地利等国。根据 1807 年的蒂尔西特和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 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24。

- 42 莱比锡会战是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见注 35)的瓦解,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25。
- 43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土耳其除外)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国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名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恢复中立;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 年 9 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25。
- 44 指阿·威灵顿在 1808—1813 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对法国军队的胜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1809 年的塔拉韦拉会战和 1812 年的萨拉曼卡会战,在这两次战斗中,威灵顿因采取了进攻性反击的战术而大获全胜。——25。
- 45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见注 43)的决定所吞并的波兰领土(波兰王国)。恩格斯有时也将这部分波兰领土称为俄罗斯的波兰。——26、351。
- 46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27。

- 47 这里的“两次起义尝试”可能分别指成立“赫特里”和“友谊社”。

1774年,俄国和土耳其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土战争告一段落。此后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希腊诗人康·里加斯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一个以解放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为目标的秘密爱国组织“赫特里”(Hetairie,意为“社团”)。后来里加斯被奥地利引渡给土耳其,于1798年被处死。

1814年,以尼·斯库发斯为首在敖德萨建立了秘密爱国组织“友谊社”(Philike Hetairia),以解放希腊、建立以君士坦丁为首都的大帝国为目的,会员遍及全国,成为希腊最大的秘密组织。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副官的希腊军官亚·伊普西朗蒂成为同盟最为杰出的首领。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希腊起义最初由“友谊社”发起。1821年3月7日,伊普西朗蒂率领一支5000人的队伍在摩尔多瓦发动起义。由于起义被镇压,伊普西朗蒂向希腊进军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希腊很快就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起义。1822年1月,在埃皮扎夫罗斯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镇压起义。1825年2月,埃及军队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击溃了陷入内斗的希腊人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半岛。神圣同盟各国起初对希腊起义抱观望态度。后来,英国、俄国和法国考虑到可以利用它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于是开始支持希腊,并给予军事援助。土耳其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失败后,于1829年9月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51),承认希腊独立。——28。

- 48 指1820—1823年在西班牙、1820—1821年在那不勒斯王国以及1821年在皮埃蒙特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镇压了这些国家的革命。——28。

49 烧炭党是 19 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最初在法国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成立,旨在争取意大利独立,推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其成员主要是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1817—1831 年间曾在意大利多次发动起义,仅 1820 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获得成功,一度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19 世纪 30 年代初,由于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镇压,烧炭党逐渐衰落,作为独立的团体已不复存在。

19 世纪 20 年代,以意大利烧炭党为榜样,在法国产生了同名的秘密政治团体烧炭党。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其宗旨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28。

50 这里列举的几次会议系神圣同盟 1818 年在亚琛、1820 年在特罗保(奥帕瓦)、1821 年在莱巴赫(卢布尔雅那)和 1822 年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其目的在于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29。

51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829 年 9 月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条约规定,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实际上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希腊同土耳其的联系仅限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颁布特别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32。

52 克里木战争是 1853—1856 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见注 29)而告结束。——32、520、667。

53 七月革命指 1830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 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 年 7 月 27—29 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

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32。

- 54** 指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又称波兰十一月起义。1830 年 11 月 29 日,华沙发生军事政变,引发了由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并有大量波兰官吏参加的人民起义,起义军一度赶走了沙皇俄国的军队。1831 年 1 月 25 日,俄军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下开始向起义军发起进攻。由于起义军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还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怀有侵略野心,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以争取农民的支持,起义军最终战败,于 1831 年 9 月 8 日被迫交出华沙。这次起义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产生了国际影响。——32。
- 55**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 1833 年 7 月 8 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登陆。这支登陆部队被派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卜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军队。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里。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沙皇俄国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了防御同盟,并且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该同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 51)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限定为八年。——32。
- 56** 1839—1841 年的土埃战争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英国害怕站在土耳其苏丹方面的俄国单方面干预冲突,同时又企图将法国孤立起来,因此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同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一起,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对苏丹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这一情况造成了法国外交上的孤立,法国迫不得已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援助,这意味着法国在近东问题上的政策遭到严重的挫败。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32。

- 57 《组织规程》是 1831 年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两个公国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所占领。《组织规程》的方案是由两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拟定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则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各城市的代表推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将政治大权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中。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即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与行政分离以及取消刑讯等。1848 年革命期间，该《组织规程》被废除。《资本论》第 1 卷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5—276 页。——33。
- 58 二月革命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 53）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3、71、420、538、591、621、647。
- 59 指 1848 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这两个公国的人民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力争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场革命在国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及沙皇俄国的联合武装镇压下遭到失败。——34。
- 60 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 1848—1849 年革命后日趋尖锐。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实际已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体——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谈判。
- 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华沙谈判中，他利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吵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但实际上站在奥地利一边，反对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意志各邦。11 月 29

日在奥尔米茨(捷克称做奥洛穆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普鲁士作出一系列让步,并同意加入由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实际上不得不放弃由它主导统一德意志的计划。——34。

- 61 1852年5月8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在伦敦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8月2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努力制造了障碍。1852年的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公爵克里斯蒂安(后来的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34。
- 62 “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在原文中为法文,这句在历史和传记文献中广为引用的话,据说是奥地利首相费·施瓦尔岑堡在德累斯顿会议(1850年12月3日—1851年3月15日)上讲的。这句话表明,鉴于在东方问题上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奥地利外交政策开始转向反俄。——35。
- 63 以上两段来自恩格斯未完成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草稿的一个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458—459页。——36。
- 64 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作为新任外交大臣于1856年9月2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这个通告中概述了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37。
- 65 公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38、67、344、481、511。

- 66 这里的虚无主义是对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革命民主运动的称呼。这一运动的参加者被称为虚无主义者,主要由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否定沙皇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批判农奴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称呼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俄语中逐渐消失,但是在西欧的文献中继续被用来指俄国革命运动的成员,到 80 年代这一称呼在俄国主要指民意党人。——38、441。
- 67 法国和俄国于 1859 年 3 月缔结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拿破仑第三承诺,对法国准备发动的对奥军事行动给予外交上的援助,一旦战争发生便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兵力,拿破仑第三则承诺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38。
- 68 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吞并领土和扩张势力的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一文(载于 1859 年 6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65 号)中详细摘引了这篇宣言。——39。
- 69 1859 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联合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他打着“解放”意大利的旗号,企图通过“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主义政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则希望在撒丁王国的领导下通过战争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法国和皮埃蒙特的军队获得几次胜利。但是,拿破仑第三对广泛开展的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心存恐惧,为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于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则仍归奥地利管辖。
- 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民族解放斗争很快打破了这一外交安排。由于得到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英勇战斗,1860 年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南意大利与皮埃蒙特联合,并于 1861 年建立了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成为意大利国王。1866 年收回威尼斯,1870 年攻占罗马,意大利最终实现了统一。——39、422、528、534。
- 70 1863—1864 年波兰民族起义期间,普鲁士的俾斯麦政府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 年 2 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国和普鲁士缔结了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

协定。——39。

- 71 1864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同丹麦之间的战争以丹麦战败而告结束,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见注72)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39。
- 72 1866年的普奥战争结束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多年争雄的局面,确定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等德国北部各邦以及三个自由市,同时普鲁士在国际上和意大利结成了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军事行动于6月和7月在波希米亚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同时展开。奥军于7月3日在萨多瓦惨败之后,奥地利便开始议和,最后双方于8月23日签订布拉格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由维也纳会议(见注43)建立的、联合了30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鲁士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39、230、478。
- 73 1865年10月,俾斯麦和拿破仑第三在比亚里茨会晤。拿破仑第三事实上同意了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并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当时拿破仑第三认为,即将爆发的普奥战争将会持续很久,他可以伺机插手,从中渔利。——40。
- 74 普法战争(1870—1871年)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亚·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有利于普鲁士的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40。
- 75 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后,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初步和约,将阿尔萨斯—洛林东部割让给1871年1月18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初步和约的这一条款。——41、55、231、336、466、492、629、691。

- 76 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是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以俄国的胜利告终后,俄国和土耳其于 1878 年 3 月 3 日在圣斯特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成立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它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缴纳贡赋),但由俄国占领两年;承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独立及其版图的扩展。和约的签订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因而引起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和约提交 1878 年 6 月 13 日—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进行审查。——41。
- 77 这里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由锡利斯特拉、鲁斯楚克、舒姆拉和瓦尔纳这四个要塞构成的四边形地区。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开始时,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41。
- 78 “我们房屋的钥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8 年 6 月和法国大使阿·科兰库谈话时的用语,科兰库在 1808 年 6 月 22 日给拿破仑第一的报告中转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41。
- 79 柏林和约是 1878 年 6 月 13 日—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签订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柏林和约对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见注 76)的条款作了修改,使之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俄国的占领期限缩短为 9 个月;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米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黑山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和约确认了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所承认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把 1856 年从俄国割让的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地区归还俄国,同时也认可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柏林和约使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加剧了战争的危险。——42。
- 80 指 1857—1859 年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起义由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 1857 年春的哗变引发,迅速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参加起义的既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相当一部分封建贵族。但是起义者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共同的目标,而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及宗教和种姓差别易于被殖民者利用,加之殖民者在军事上处于优势,起义于 1859 年 4 月最终失败。——43。

- 81 奥伦堡军事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1839年11月开始了侵略希瓦汗国(今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的5000人的俄国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缺乏准备。由于饥饿寒冷,大批士兵患病,人员折损一半,佩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伦堡。——43。
- 82 这里指1886—1889年以法国将军若·布朗热为代表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复辟君主制。  
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的实质(参看恩格斯1888年6月3日给劳拉·拉法格、1888年12月4日给保·拉法格的信)。
- 恩格斯在1889年9月1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了沙皇政府资助布朗热1500万法郎一事并提到了消息来源,在1890年1月23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44、94。
- 83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于1877年12月10日攻占了保加利亚北部城市普列夫纳(现名普列文)。——44、682。
- 84 1867年奥地利帝国成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塔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齐斯莱塔尼亚,包括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等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等地方。——44。
- 85 指美国记者乔·坎南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成的,1888—1890年发表在纽约《现代插图月刊》上。文章以真实材料为基础,揭露了沙俄政府在西伯利亚虐待政治流放者的暴行,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并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表。恩格斯可能阅读了1890年1月在柏林出版的一个德文本。——45。
- 86 1890年3月9日,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抗议沙皇政府虐待西伯利亚流放者暴行的集会,在致伦敦工人的呼吁书中提到俄国民意党人娜·康·西

吉达在西伯利亚的监狱被鞭打致死、她的三个狱友服毒自杀一事,英国议会下院 3 月 13 日的听证会也提到此事。大概根据这些材料,1890 年 3 月恩格斯在将本文翻译成英文时增补了这句话。——45。

- 87 指国民代表会议,又称缙绅会议,是 16—17 世纪俄国的等级代表机构。沙皇伊凡四世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以领主显贵为代表的封建割据势力和推行社会改革,于 1549 年 2 月召开第一次全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会议的召开也标志着俄国等级君主制度的形成。国民代表会议主要讨论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开征新税、外交问题等。在其历史上国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方式、时间、内容及组成人员屡有变化。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其作用逐渐减小。1684 年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18 世纪初被彼得一世废除。

19 世纪末期俄国社会产生了重新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要求,一些人希望通过召集这样的会议来限制沙皇的专制权力并推进政治制度改革。——46、637。

- 88 1864 年俄国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然而从 1866 年起,沙皇政府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在 80 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这种排挤更是变本加厉。——46。

- 89 从“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到“最后成为胜利者”这句话是恩格斯从《今后怎样呢?》一文的一个手稿片断修改而来,这个手稿片断保存了下来,相关内容从“要知道”开始,到“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结束(见本卷第 58 页)。恩格斯在 1890 年 1 月 23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46。

- 90 1874 年 2 月 16 日,赫·毛奇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自从德国人打胜仗以来“谁都佩服我们,可是谁都不喜欢我们”。——47。

- 91 恩格斯这里可能暗指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部分俄国革命者尤其是在民意党人(见注 458)中流行的恐怖主义斗争方式。1881 年 3 月 13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1887 年民意党又策划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但未能成功。——48。

- 92 在 1890 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得票数是 1 427 298 票,35 名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50、52、454。

- 93 非常法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亦称反社会党人法,由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50、51、55、89、103、227、256、279、332、390、580、585、630、692、697、704。
- 94 《德国1890年的选举》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2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分析了这次选举对德国政局的影响:“这次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位置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可以说,它将开创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见本卷第52页)后来的发展印证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言,选举结束后不久俾斯麦即黯然下台。
-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90年2月25日,英文原文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题发表在1890年3月3日《纽卡斯尔每日纪事报》(伦敦)第9945号,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是编者在按语中暗示作者是恩格斯。后来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丹麦文(译文有删减)发表在1890年3月17日《工人》(哥本哈根)第51号;有较多改动的德译文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为题发表在1890年4月6日《柏林人民报》第81号。——51。
- 95 指1878年德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有9人当选国会议员。——51。
- 96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成为大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巨头的政党,其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

的性质,因此该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52、57、333、690。

- 97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合并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主要是把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但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52、56、333、679、690。

- 98 普鲁士保守党是普鲁士大地主、高级军官、官僚上层分子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该党是从1848年革命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极右保皇派党团发展而来的。保守党人主张保留封建残余和旧的政治制度,其政策充满浓厚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为了维护普鲁士的国家特色和旧的等级秩序,普鲁士保守党人反对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德意志帝国成立(1871年)后,保守党人公开反对俾斯麦,并拒绝其“文化斗争”政策。1876年正式建立的德意志保守党开始采取实用主义的、亲帝国的保守政策,主要代表农业集团和部分中间等级的利益。在此之前,1866年温和保守派从保守党中分离出来组成“自由保守党”(1871年后改称“德意志帝国党”),该党维护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拥护俾斯麦的政策。——52、333。

- 99 指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于1890年2月4日颁布的两道诏令。

在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指示他向欧洲多个国家的政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1890年3月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禁止12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在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要求:进一步扩展劳工保险立法范围,审查有关工厂工人状况的管理条例的一些规定,并考虑就参与企业事务的工人代表机构的形式进行立法等。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表明,威廉二世试图采取不同于俾斯麦的策略,更加灵活地应对工人运动,同时也表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办法遭到了失败。——52、57。

**100** 在1890年1月24日的枢密院会议上,威廉二世阐述了他在劳工保护问题上的观点,这些思想是2月4日的两道诏令(见注99)的基础。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93)的问题,民族自由党把取消该法中有关驱逐的条款作为它赞成延长该法的前提,威廉二世为避免危及支持政府的各政党结成的卡特尔(见注102),对此表示不反对。俾斯麦则尖锐地表示反对,他坚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继续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皇帝和首相之间日益尖锐的分歧通过媒体的报道而公开化。——53、57。

**101** 在《今后怎样呢?》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20日的选举获胜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指出政府不择手段挑起暴动的可能性,告诫工人群众在敌人的挑衅面前保持“纪律和自我克制”,等待“冲锋的时刻到来”(见本卷第59页)。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90年2月26日至28日,发表在1890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10号。1890年3月14日《工人报》(维也纳)第11号对文章进行了转载。文章的最后一段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目前形势》为标题载于1890年3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61号,并被翻译为丹麦文发表在1890年3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哥本哈根)第68号。1890年3月29日纽约的德文报纸《自由》第13号也转载了文章的部分内容。——55。

**102** 这里所说的卡特尔是1887年1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支持俾斯麦政府的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为准备1887年2月的选举而组成的政党联盟。它们在各个选区推出共同的候选人,最后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和大资产阶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等等)。但是他没能在1890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93)的生效期限。加入卡特尔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1890年选举中的失败

(一共得到 132 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55、416。

**103**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 1884 年 3 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政府。——56、333、690。

**104** 韦耳夫派是 1866 年以后在汉诺威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主张在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下恢复韦耳夫王朝的汉诺威王国(韦耳夫王朝在汉诺威 1866 年被普鲁士合并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1869 年该派成立了保守主义的德意志汉诺威党,该党在 1871 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有 7 人当选议员。

波兰派和阿尔萨斯派分别指德意志帝国国会中从波兰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选出的议员。阿尔萨斯—洛林被并入德国后于 1874 年首次参加了帝国国会选举并选出了 15 名议员。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这些不大的民族党团不满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因此支持大的反对党,有时同中央党结成联盟。——56。

**105** “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讽指俾斯麦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中不得不屈服一事。俾斯麦在冲突之初曾于 1872 年 5 月 14 日在帝国国会宣称:“你们放心,我们决不到卡诺萨去,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然而 1878 年以后,俾斯麦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天主教让步,逐步缓和乃至取消了之前针对天主教所制定的法律措施。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卡诺萨之行的典故: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于 1077 年屈辱地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朝见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恳求教皇收回开除他的教籍的成命。——57。

**106** 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吕底亚王克罗伊斯在与波斯国王居鲁士进行战争前曾在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神托预言,如果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他将毁灭一个大帝国。克罗伊斯认为这个帝国是指波斯帝国,于是发动了战争,但最后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帝国被摧毁了——公元前 546 年克罗伊斯被居鲁士打败,吕底亚被波斯吞并。——58。

**107** 这是德皇威廉二世 1889 年 5 月 14 日在接见鲁尔地区罢工矿工的代时说的话。——58。

**108**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恩格斯 1890 年 4 月 19 日给奥地利银行职员伊·埃

伦弗罗恩德的复信。恩格斯在文中揭示了反犹太主义赖以产生的落后的社会基础,指出它是“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披着伪装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见本卷第 61 页)。

恩格斯这封信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信的部分内容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9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19 号,此后在 1890 年 5 月 13 日《柏林人民报》第 109 号、5 月 25 日《北方哨兵》(班特)第 21 号、5 月 25 日《纽约人民报周刊》第 21 期、5 月 24 日《伦敦自由新闻》第 21 号、5 月 28 日《劳动权利》(慕尼黑)第 315 号等转载,还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等在有关报刊上发表。——60。

**109** 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德国和奥地利迅速发展,不仅保守势力和天主教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具有反犹太主义的特点,左派和工人运动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逐步渗透,反犹太主义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展。90 年代在德国存在多个反犹太主义的政党,其代表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赢得 5 个席位。德国社会党和德国改革党以农村为目标开展反犹宣传,在 1893 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 16 个席位。——60、606、666。

**110** 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 年 8—9 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 年 11 月面包师的罢工和 1890 年 3—4 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提出的目标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62。

**111**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示威游行》一文摘自恩格斯 1890 年 4 月 30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文中介绍了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工人领袖筹备伦敦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经过,赞赏他们为挫败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争夺领导权、改变游行诉求的企图而作的不懈努力。

本文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10 日《纽约人民报》第 112 号,原信的一些文字出于发表的需要有所改动。文章的开头和末尾加有编者导语和评论,并加了现在的标题。本文还被译成英文以《海德公园。社会主义者在伦敦掌握领导权》为题,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17 日《工人辩护士报》(纽约)第 20 期。——63。

- 112 根据 1889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139),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积极筹备 1890 年的五一节活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奥地利、英国等国工人阶级在 5 月初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五一节活动。——63、74。
- 113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于 1889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建立。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杜西)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联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在各个阶层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联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联积极参与组织了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 142)。——63、75、578、662。
- 114 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成立于 1888 年 8 月,它是社会主义同盟(见注 118)的部分成员与同盟内占上风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分裂以后,以同盟的地方支部为核心成立的独立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弗·列斯纳等。在以后的几年中,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头(见注 141)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它是 1890 年伦敦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倡议者之一,它的代表参加了组织 1890 年 5 月 4 日海德公园群众集会的中央委员会(见注 119)。——63。
- 115 英国工联即英国工会。1824 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的熟练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3、71。
- 116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在自由党影响下产生的激进民主团体,其成员(所谓的激进者)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进一步增多。

1887年起爱·艾威林夫妇开始在伦敦东头的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鼓动,希望能促使英国工人运动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独立出来并形成自己的政党。恩格斯也因此密切关注激进俱乐部的发展并重视其政治作用。——63、75、662。

- 117**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在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领导人。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1868年工联代表大会成立后,由改良主义领袖领导的伦敦理事会向工人阶级传播自由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它在工联运动中继续占据有影响的地位,但已不再起全国中心的作用。——63、76、659。
- 118**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权长期掌握在以亨·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反对海德门执行的路线,为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联盟的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此后,虽然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影响得以加强,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不断出现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63、76、94、578、664、689。
- 119** 指1890年初为组织伦敦第一次五一节游行集会而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又称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游行委员会),由各工联、激进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及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委员会在1890年5月4日游行集会之后继续活动,目的在于贯彻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建立工人政党。1890年7月13日,以委

员会为基础成立了“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工人同盟”。——64、76、578、659。

- 120 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

这篇序言被收入1890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一书，这是《共产党宣言》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4个德文本。从“《宣言》有它本身的历史”（见本卷第71页）开始到结尾的这一部分还发表在1890年8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33号。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维也纳）第48号为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而写的社论转载了同样的摘录。序言还被收入经恩格斯同意在伦敦出版的《宣言》德文第5版和第6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宣言》第5版（1895年再版）以及1894至1895年出版的众多“第6版”也收录了这篇序言。序言还被译成罗马尼亚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捷克文、俄文等收入相应语言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66。

- 121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1882年）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本卷第511—527页）中指出了这点。——66。

- 122 由于恩格斯生前未能找到《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因此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引用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是他亲自从俄译文转译回德文的，译文与德文原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稍有出入。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恩格斯再次将俄文版序言的结束部分从俄文译回德文，该部分译文与德文原稿以及1890年的译文均有出入。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被找到。——66、520。

- 123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本1869年由日内瓦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其译者是否是米·亚·巴枯宁尚无定论。这一印刷所虽然与亚·伊·赫尔岑创办的、出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同名，但不是同一个印刷所。——66。

- 124 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

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见注 91),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67。

- 125 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 1885 年 8 月 29 日—11 月 7 日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1—11 号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 1886 年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68。
- 126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 1886 年 6—8 月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14—17、19—22 号上,同年还出版过单行本。这一译本是对何·梅萨 1872 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西班牙译本的重印。——68。
- 127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1848 年二月革命(见注 58)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 月 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在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53 页)——71、229、624。
- 128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警方提供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71、421。
- 129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

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国际工人协会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36卷第290页)。——71、235、355、422、549、628、647、694。

- 130** 蒲鲁东派(蒲鲁东主义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1、235、242、561。
- 131**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71、279、331、389、530。
- 132** 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等决议。恩格斯提到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第88期。——72。
- 133** 欧文派指欧文主义即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理论和实践的拥护者。欧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1824年,他前往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的“新协和

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最后破产失败。1829年返回英国后，他先在伦敦建立全国公平劳动交换商场，试图以此避免中间剥削，后又发起建立全国产业大联合，并在一些地方再次试验共产主义移民区等，但最后全部宣告失败。晚年他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验，并致力于工会运动。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年）、《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等著作中阐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但是他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传播可消除社会弊病、克服社会矛盾，把希望寄托在仁慈的统治者身上。欧文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80页）。——72、325、366、405。

- 134** 傅立叶派是傅立叶主义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的拥护者。傅立叶主义于1799—1803年期间初步形成。它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阶段；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在法郎吉中，人人都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比例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72。
- 135**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72。
- 136**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

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72、330、348、561。

- 137** 关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见注129)的《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6页)。——72。
- 138**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73、430。
- 139**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是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73、76、673、675、697。
- 140** 《伦敦的5月4日》是恩格斯亲自参加伦敦工人于1890年5月4日举行的庆祝五一节集会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现状,特别是新工联的建立和壮大,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派工人领袖同企图争夺领导权、改变集会诉求的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

盟的斗争经过。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次集会的意义,认为它标志着“从 40 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见本卷第 74 页),强调它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见本卷第 79 页)。

这篇文章大约写于 1890 年 5 月 6—10 日,发表在 1890 年 5 月 23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1 号,此后在 1890 年 5 月 29 日《选民报》(莱比锡)第 85 号(没有署名)、1890 年 5 月 31 日《柏林人民报》第 123 号(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五一节活动的部分)和 1890 年 6 月 1 日《工人纪事周报》(布达佩斯)第 22 号转载。——74。

**141** 伦敦东头位于当时伦敦的东部,是工人和贫民较为集中的区域。——75、156、322、385、403。

**142**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在 1889 年 8 月 13 日—9 月 14 日,是 19 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 3 万人,其他行业工人 3 万人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行动坚决、组织性强,因而他们关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各地捐来的罢工基金约 5 万英镑,其中仅澳大利亚就捐资 3 万英镑),并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罢工后成立了包括大批非熟练工人在内的码头工人工联及其他行业的工联即新工联;次年,参加新工联的工人总数增加了一倍多。——75、677。

**143** 指亨·海德门没有参加 1887 年 11 月 13 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示威一事。188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特拉法加广场上每日都有失业者举行示威集会,警察越来越严厉地进行暴力镇压,从 11 月 8 日起官方禁止在该广场进行任何集会。伦敦的激进俱乐部(见注 116)等组织呼吁 11 月 13 日(周日)在此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有近 10 万人参加,示威者与前来镇压的警察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几百人受伤,3 人伤重不治,一些组织者被逮捕。这一事件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75。

**144** 银镇罢工指 1889 年 9—12 月银镇(位于伦敦东头,见注 141)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的罢工,参加者有上千人。罢工的起因是银镇电缆厂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部分满足后又被取消。罢工工人要求普遍提高工资(包括加班工资和节日工资)。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由

于工人内部的不统一以及缺乏支持而失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罢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见注 113)的银镇女工支部,并几乎每日前往银镇做鼓动演说。——75。

- 145** 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2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罢工的起因是资方不遵守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联的会员等等。由于资方做了充分准备,大量使用工贼顶岗,同时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联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罢工最后失败。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76。
- 146** 可能派是19世纪80至9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原是法国工人党的一部分,以保·布鲁斯、贝·马隆等人为代表。该派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法国工人党起草的党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2—443页),反对党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实行革命的策略,主张通过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实行逐步改良的政策;主张党的每个地方组织都拥有根据当地情况随意修改党纲并实行“自治”的权利。1880年11月19日,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工人党放弃“一种学说的狭隘眼界”,为各种学说的拥护者打开大门,并公开宣布抛弃革命的学说,只争取实现某些可能的细小的改良,该派也由此得名“可能派”。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取消了由马克思帮助制定的纲领,同时赋予各选区制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并确定了党的新名称——社会主义工人联盟。1890年该党分裂,部分党员成立新党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902年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道合组为法国社会党。——76、236。
- 147** 由于法国的可能派和马克思派(见注 172)对于1889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在巴黎召开了两个平行的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7月14—20日)和可能派代表大会(7月15—20日)。  
关于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情况见注 139。——77、92。
- 148** 曼彻斯特主义也称自由贸易主义,指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曼彻斯特学派或自由贸易派的学说。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宣传自由贸易的中心。曼彻斯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该学派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认为对工业品的税收和对进口原料及粮食的关税是贫困的根源,把实行自由贸易、废除进口关税看作消除贫困的手段。

恩格斯用“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指旧工联因受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具有的改良主义性质。旧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限于经济领域,包括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改革等等。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参看注 115)。——79、288。

- 149** 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其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 1839 年、1842 年和 1848 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失败。19 世纪 50 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卷第 379 页)。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增订版第 36 卷第 292 页)。——80、320、383、400、401、499。
- 150**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 1849 年 5—7 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这次起义是 1849 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228)的重要组成部分。——80、648、652。
- 151** 根据恩格斯 1850 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论述,当时他们的队伍新增了两支部队:一支是朗根坎德尔营,该营只剩下“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罗伯特·勃鲁姆纵队”,约有 60 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86 页)。——80。
- 152**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恩格斯的一份保存下来的未完成稿。1890 年 8 月底,作为所谓“青年派”(见注 153)主要喉舌之一的《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被撤换。该报卸任的编辑部在 1890 年 8 月 31 日

第 105 号发表的告别辞中,把自己的下台说成是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该派早已不满的恩格斯遂决定撰写答复文章公开予以驳斥,本文是答复文章的草稿。恩格斯正式的答复文章见本卷第 84—86 页。

这一草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81。

- 153** 这里的大学生骚动指“青年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的批评。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 1890 年最终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年轻的大学生、著作家和一些地方党报的编辑(“青年派”的名称由此而来),代表人物包括保·恩斯特、保·康普夫迈耶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废除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社会民主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 年 10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81、84、97。

- 154** 1890 年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5 名执行委员分别为伊·奥尔(慕尼黑)、奥·倍倍尔(德累斯顿)、理·费舍(伦敦)、卡·阿·格里施(柏林)、保·辛格尔(德累斯顿)。——82。

- 155**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就庆祝 1890 年五一节给德国工人写了一份呼吁书,发表在 1890 年 4 月 15 日《柏林人民报》上。呼吁书答复了“青年派”提出的在 5 月 1 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有效的条件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的选举中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很可能进行挑衅,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 5 月 1 日。

1890 年 5—7 月汉堡的筑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由于时机不利,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工人不

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82。

- 156** 指 1890 年 8 月 8 日和 9 日在多个报刊发表、准备提交哈雷代表大会(见注 190)表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草案。草案提出,各选区设立党组织来替代以前的地方选举协会,党代表大会代表不再由协会按党员人数多少选派,而是每个选区无论党员人数多少都可以派出最多三名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受国会党团监督,与国会党团一起决定其成员的薪酬,执行委员会有义务监督党的地方机构。草案中的这些规定受到党员、特别是“青年派”(见注 153)的批评。恩格斯在 8 月 10 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草案修改后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82。
- 157**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年 9 月 17—23 日在伦敦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 2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0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总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决定出版国际工人协会 1866 年至 1869 年历次代表会议以及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权威版本。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委员会的暂时接受和开除支部的权力(留待下次代表大会决定)被纳入组织条例。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极其重要,该决议宣布,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一个重要阶段。——82、429、677。
- 158** 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等人于 1868 年 9 月 25 日在瑞士伯尔尼宣布成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年 10 月其中央局在日内瓦建立。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部分工人的支持,这些地区还建立了该同盟的支部。1869 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

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见注206)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82、431。

- 159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态度截然不同,国会党团就此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发表了声明。声明宣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无权在报纸上批评国会党团的活动,认为对党团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一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作出的决议,内容都是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派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击。党团的多数派被迫作了让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党内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实际上等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派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82、89。

- 160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是恩格斯论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怎样提高自身素养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见注153)的错误,指出他们在理论上宣扬的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奉行的是完全不顾党的实际斗争条件的冒险主义;强调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握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恩格斯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见本卷第86页)

这篇文章写于1890年9月7日,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为标题发表在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第37号;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转载了这篇文章;《萨克森工人报》

编辑部将这篇文章以《关于〈萨克森工人报〉》为标题发表在该报 1890 年 9 月 17 日第 112 号;1890 年 9 月 19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38 号、1890 年 9 月 23 日《纽约人民报》第 228 号和 1890 年 9 月 25 日布吕恩(捷克)的《人民之友报》第 18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外,1890 年 9 月 17 日哥本哈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20 号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丹麦文译文。——84。

**161** 恩格斯 1890 年 8 月 27 日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提到过马克思的这句话。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 10 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此外,恩格斯在 1882 年 11 月 2—3 日给爱·伯恩斯坦、1890 年 8 月 5 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提到过马克思的这句话。——85。

**162** 这里从圣经中借用了一句谚语:滤出蚊虫,吞下骆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3 章第 24 节)。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85。

**163**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参与党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党的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93)废除后应当采取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恩格斯这封告别信写于 1890 年 9 月 7 日—9 月中,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27 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终刊号。这封告别信还刊载于 1890 年 9 月 30 日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 9 期,同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又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 119 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 230 号(开头两段被删掉)。此外,这封告别信的英译文还被收入爱·艾威林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一文,发表在 1890 年 9 月 25 日

《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8903 号;1890 年 10 月 5 日该信被摘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雷焦艾米利亚)第 234 号。——87。

- 164** 维登代表大会指 1880 年 8 月 20—23 日在瑞士的维登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56 名代表。这是在 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克服了因活动条件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动摇情绪。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约·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行,批判了他们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的错误观点,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与右派的立场针锋相对,把 1875 年哥达纲领第二部分关于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意味着代表大会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对这次代表大会具有指导意义。——88。
- 165**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 1867 年 4 月 17 日批准的、而后在 1870 年 11 月根据德意志西南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不受帝国国会约束的帝国首相拥有广泛的特权。这部宪法保留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的特权。——88、287。
- 166** 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 1794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是一部

封建性质的法律。——88。

**167** 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发布了驱逐令,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编辑和工作人员驱逐出瑞士,报纸因此而迁往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89。

**168**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恩格斯为促进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国际团结而写的一篇文章。1889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7月14—20日)和可能派代表大会(7月15—20日),两个代表大会都委托比利时工人党筹备下一届代表大会。1890年9月比利时工人党邀请英国工联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此举危及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地位。恩格斯在收到沙·博尼埃1890年9月9日告知有关情况的信之后立刻撰写了本文。恩格斯在文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面临的困境,指出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实现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并进一步提出合并的四个必要条件。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相关决议中采纳了恩格斯的建议。

本文大约写于1890年9月10日至15日之间,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册,法文原文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92。

**169** 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6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460人,代表着140多万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92。

**170** 指由恩格斯提议、由爱·伯恩施坦执笔并经恩格斯修改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几篇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巴黎代表大会。致〈正义报〉编辑部》、《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这几篇文章揭穿了法国可能派(见注146)及其英国同伙社会民主联盟(见注118)在筹备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的阴谋活动。——92。

- 171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海牙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爱·伯恩施坦和沙·博尼埃作为顾问和观察员出席。法国的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承认1888年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授予可能派筹备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利,要求:(1)可能派必须同法国和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工人组织一起召开代表大会,使所有有关的代表都能受到邀请;(2)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在适合本国法律的前提下参加代表大会;(3)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和确定议程方面具有最高权力。如可能派接受上述条件,大会由他们召集,1889年7月14—21日开会;如可能派拒绝,则大会将由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党人负责召集,9月开会,直接组织工作由法国的马克思派承担。代表会议还对代表大会的议程提出建议。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遭到可能派的拒绝。——93。
- 172 指法国的马克思派,又称“盖得派”,是19世纪70—9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由茹·盖得领导的政治派别,原是法国工人党的一部分。该派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及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因此又叫“集体主义派”。法国工人党成立于1879年,在1882年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分裂,可能派和盖得派各自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能派组建新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盖得派则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盖得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但是,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制定维护小私有制和富农剥削的土地纲领《南特纲领》,迷恋议会斗争。1901年盖得派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派别组成法兰西社会党。——94、236。
- 173 指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888年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时形成的一个反对改良主义路线的少数派,该反对派1889年后的领导人为格·特里尔和尼·彼得逊,立足点是哥本哈根等城市以及工会,从1889年4月起出版自己的周报《工人报》。1889年秋被开除出党后,他们于1890年1月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94。

- 174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是恩格斯写的一篇批判“青年派”(见注 153)错误观点的文章。“青年派”代表人物保·恩斯特发表一系列文章,歪曲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声称恩格斯和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恩格斯不得不写了这篇文章予以严厉驳斥。恩格斯以恩斯特把关于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套到挪威小市民身上而得出的荒谬结论为例,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见本卷第 98 页)恩格斯还指出,“青年派”对政治经济形势不能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任由他们“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报刊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见本卷第 103 页)。

本文写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发表在 1890 年 10 月 5 日《柏林人民报》第 232 号。——97。

- 175 分别指 1814 年法国的立宪宪章和挪威的埃兹沃尔宪法。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路易十八于 1814 年 6 月 4 日颁布立宪宪章。立宪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的金融资产阶级得以与上层贵族分享权力,但广大群众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挪威议会于 1814 年 5 月 17 日在埃兹沃尔通过主要依据法国 1791 年宪法制定的宪法。宪法宣布挪威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年满 25 周岁、拥有一定财产和土地或有长期租佃权的男子(约占成年男子的 45%)享有选举权等。——99。

- 176 尤·布雷默在《人民呼声报》(马格德堡)上发表《理屈词穷》一文来反驳保·恩斯特。爱·伯恩施坦在 1890 年 9 月 22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提到这篇“几天前”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的文章,不过 1890 年的《人民呼声报》现在已经找不到了。——101。

- 177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活泼快乐的战争”这一用语,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奥在《历史月报。六月》(载于 1853 年 7 月 30 日奎德林堡《城乡人民小报》第 61 号)一文中最早使用这一用语。——103。

- 178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是恩格斯通过发行量很大的《柏林人民报》对来自德国各地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贺信做出的公开答谢。

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0 年 12 月 5 日《柏林人民报》第 284 号,随即在 1890 年 12 月 6 日《汉堡回声报》第 285 号、12 月 6 日《选民报》(莱比锡)第

247号、12月7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第7号以及12月9日《不来梅市民报》第189号转载。——105。

- 179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祝贺他70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贺信由保·拉法格署名,内容如下:

“亲爱的公民:

您和马克思是必将取得胜利的国际社会运动的理论家;您始终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我们祝您健康长寿,就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亲眼目睹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这封复信连同贺信一起发表在1890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14号,后来被翻译成德文以《弗·恩格斯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1891年1月9日《柏林人民报》第303号,并在1891年1月9日《工人新闻》(布达佩斯)第2号转载。这封信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1891年1月4日《正义报》(雷焦艾米利亚)第246号。——106。

- 180 参看昂·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了圣西门的这一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75页)。——106、671。

- 181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是恩格斯对匈牙利这两份社会主义报刊1890年11月26日祝贺他70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随贺信还寄来一份请柬,邀请他参加定于1890年12月7日和8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恩格斯未能与会,他的复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

这封信发表在1890年12月14日《工人纪事周报》(布达佩斯)第50号、《柏林人民报》第292号,并翻译为匈牙利文发表在同一天的《人民言论》(布达佩斯)第50号。这封信还被收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布达佩斯代表大会记录。1890年12月7日和8日》1891年布达佩斯德文版和匈牙利文版。——107。

- 182 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在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大

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 121 人(布达佩斯 87 人、外省组织 34 人)。大会讨论的问题有:匈牙利工人运动、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等。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海恩费尔德纲领(见注 258)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据大会决定,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07。

- 183**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是恩格斯对该理事会 1890 年 11 月 28 日祝贺他 70 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40 年 2 月 7 日由正义者同盟(见注 370)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 50 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见注 129)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后为英国政府查封。——109。

- 184** 《致 G. 布卢默》是恩格斯对德国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祝贺他 70 周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1890 年 12 月 8—11 日德国互助储金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共有代表 596 000 名会员的 335 名代表与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大会主席 G. 布卢默受大会代表的委托于 1890 年 12 月 18 日从汉堡致信恩格斯,向他致以迟到的生日祝福(恩格斯生日为 11 月 28 日)。恩格斯于 12 月 27 日撰写了此信表示感谢。这封信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对 1890 年 12 月 8—11 日在柏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决议的说明》1891 年汉堡版。——110。

- 185**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是恩格斯为回击讲坛社会主义者(见注 337)路·布伦坦诺对马克思的攻击而写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回顾了围绕马克思摘自威·尤·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而展开的争论的整个过程,驳斥了布伦坦诺等人对马克思所谓捏造引文的指责。恩格

斯还用实际资料说明了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著作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与论战有关的全部材料。

1864 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即英国“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差不多全都刊登了这句话,而在后来出版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1872 年 3 月 7 日,布伦坦诺在德国《协和》杂志第 10 期发表匿名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见本卷第 168—170 页),以《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为依据,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 1872 年 6 月 1 日和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和 63 号对这一诽谤进行了反驳(见本卷第 170—174、180—190 页)。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 1883 年 11 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见本卷第 194—195 页),爱琳娜·马克思在 1884 年 2 月和 3 月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对这些诽谤性言论进行了驳斥(见本卷第 195—197、200—205 页)。

1890 年 6 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4 版序言中回顾了上述争论过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7—44 页以及本卷第 206—212 页)。载有恩格斯这篇序言的《资本论》德文第 4 版出版后,布伦坦诺出版了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继续重复对马克思的有关指责。此前,布伦坦诺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德国周报》上发表了小册子的序言部分。布伦坦诺的这些举动除了回应恩格斯外还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在小册子中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从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改良的政党,他希望通过动摇马克思的学术声誉和科学权威,来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改良主义转变(参看路·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 年柏林版第 7 页)。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对布伦坦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澄清有关的事实,从而维护马克思的学术声誉,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打击。

恩格斯大约于 1890 年 12 月初开始动笔撰写这部著作。1890 年 12 月 12 日前后,他收到了威·李卜克内西寄来的 1890 年 12 月 4 日《德国周报》第 49 期,上面登有一则关于时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写给布伦坦诺

的两封信的简讯(见本卷第 221 页)。为此恩格斯在 12 月 12—13 日撰写了《关于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的问题》(见本卷第 221—223 页),预告他将对布伦坦诺的小册子进行答复。文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3 期。

这部著作大约于 1891 年 2 月初完成,同年作为小册子由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111。

- 186** 威·李卜克内西在 1872 年 3 月 30 日将刊载有路·布伦坦诺文章的《协和》杂志第 10 期(1872 年 3 月 7 日出版)寄给恩格斯,转交马克思参考使用,他认为马克思无论如何都应当对布伦坦诺的文章给予答复。恩格斯在 4 月 23 日和 5 月 22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都提到,马克思将很快撰写答复文章。马克思在 5 月 23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今天我把对《协和》蠢驴们的答复寄给李卜克内西。”——116、207。
- 187** 在保存下来的路·考茨基对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摘录中,恩格斯把这段文字标划出来,并在旁边写有批语:“关于这段话我们已经有了《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的报道。我还需要尽可能多的其他日报的报道,例如《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纪事晨报》(如果当时还存在的话)、《每日电讯》等等。”——123。
- 188**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1679 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 3)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 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参看注 148)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125、382、428。
- 189** 大型政治历史剧原本是指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粗俗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133。
- 190** 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废除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 年 10 月 12—18 日在德国哈雷举行。大会决

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柏林人民报》改为《前进。柏林人民报》，以接替《社会民主党人报》（已停刊）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由 12 人组成，其中 5 人进行原定工作，7 人负责监督；决定由各地党员选出的受托人负责地方党员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联系；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以取代哥达纲领。新纲领于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141、224。

- 191** 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有关摘录显示，为撰写以下至“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超负荷劳动所抵消”（见本卷第 161 页）这部分文字，恩格斯整理了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有关英国工人状况的统计数据。为此他参考了《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第 3 版中的相关论述，进一步查阅了马克思利用过的资料来源，如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从中摘引了更多的数据材料。——157。
- 192** 这段引文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都出现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8 页和第 44 卷第 751 页），而且文字几乎完全一致。这是因为马克思在 1864 年 10 月 20—27 日写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参考了他这年夏天刚刚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册的手稿（这部手稿现只留下一些片断）。成立宣言中使用过的数字材料和引文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基本上全都保留下来。——164。
- 19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750—752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本中，脚注（102）、（103）和（105）本来附有马克思引文的英文原文，中文本从略。——165。
- 194** 户籍总署署长是对主管英国户籍总署的官员的称呼。该署的职权是主管英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的整个系统，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165。
- 195** 这里所指的英国作家指《兑换理论》一书的匿名作者亨·罗伊，引用的诗文出自尼·布瓦洛-德普雷奥《讽刺诗集》第 8 首。罗伊在引用时并未提及诗文的作者，马克思在引用时把诗文的作者误作莫里哀，后来布伦坦诺和恩格斯在引用时均沿袭了这一错误，本卷统一将误作莫里哀的地方

改为布瓦洛。——167。

- 196 “意大利！意大利！”语出维吉尔的《亚尼雅士之歌》第3卷，是诗歌中的主人公阿卡特斯及其同伴在看到盼望已久的意大利海岸时发出的呼喊声。——173。
- 197 “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议员爱·拉斯克尔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速记记录上修改自己的发言一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尔在反对奥·倍倍尔的辩论中声称，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在11月13日的议会发言中揭露了拉斯克尔的这一行为。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被嘲笑的对象，由于身材矮小，被讽刺性地称为“小拉斯克尔”。——173、208。
- 198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狭隘的臣民见识”这一广泛流传于德国的用语，它源于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的名义写信支持格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而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识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189。
- 199 伦敦《今日》月刊1884年第2期在《国际大众运动纪事》这一栏目刊载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的同时，还刊载了她的附函：  
“关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记载，所以我十分犹豫，是否要利用这样的栏目来讨论一件私事。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来驳斥对我父亲提出的一项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者原谅我在这里谈一谈这件事情。去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塞德利·泰勒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我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歪曲了摘自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段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谤者通常都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不过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答复了这位匿名控告者，因为所谓的歪曲引文是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这封不过是旧事重提炒冷饭的信之后，立刻写了一

封信给《泰晤士报》。我经常读到英国报刊是如何的‘公正’的说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泰晤士报》，在一件私事上也许还能诚实以待吧，所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编者。没有结果。我便写信给我一直认为非常公正的报纸《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的狮子，自由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把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辩同时在这里刊登出来。”——195、198。

- 200 指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207。
- 201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2幕第4场中的一句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210。
- 202 在哈雷代表大会（见注190）上，威·李卜克内西就起草新纲领的问题发言时说道：“铁的工资规律，我们在哥达时就不得不思考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条所谓的‘规律’是从资产者的国民经济学中借用来的；这种表述拉萨尔为了鼓动的目的使用过，而且非常出色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比较易懂、鲜明，但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记录》1890年柏林版第167页）——214。
- 203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见注185。——221。
- 204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是恩格斯为发表马克思完成于1875年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手稿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这两篇文献通称《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而写的一篇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阐明了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原因和现实意义，指出：这两篇文献“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见本卷第224页）。序言还说明了他对手稿的少数尖锐词汇和语句有所删减的原因。

在1891年哈雷代表大会（见注190）召开之前，卡·考茨基就准备在《新时代》上组织系列文章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并请求恩格斯参与进

来。在大会的有关发言中,威·李卜克内西引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某些观点,但没有指明出处。在大会通过起草新纲领的决议后,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这两份文献公之于世,以反击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

这篇序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18 期。党的执行委员会中有人曾企图阻止这期杂志的发行,但没有成功。这篇序言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在 1891 年 2 月 6 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 34 号、1891 年 2 月 12 日《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 3 号、1891 年 2 月 18 日《选民报》(莱比锡)第 40 号、1891 年 2 月 21 日《工人权利报》(慕尼黑)第 8 号等报纸转载,还被译成法文刊登在 1894 年 1 月《政治经济学评论》(巴黎)第 8 年卷第 1 期。——224。

- 205** 指 1875 年 5 月 22—27 日在德国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两派在 1875 年 2 月 14—15 日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会上通过了哥达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爱森纳赫派代表威·李卜克内西为实现两派合并而在原则问题上对拉萨尔派作了重大让步,使得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纲领草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草案在作了几处不重要的修改后被通过,正式纲领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224、332、358。

- 206**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 1872 年 9 月 2—7 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 15 个国家的 65 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225、298、423、432、677、694、697。

- 207**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准备

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写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 246—255 页和第 256—257 页),《法兰西内战》的这个纪念版也是它的第三个德文版。恩格斯在导言中阐明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237、239 页)

这篇导言写于 1891 年 3 月初和 3 月 14 日之间,经恩格斯本人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第 28 期,后收入《法兰西内战》德文第 3 版(1891 年柏林版),到恩格斯逝世之前,已被译成波兰文(1893 年)、俄文(1893 年)、保加利亚文(1894 年)和英文(1895 年)发表。——226。

- 208** 指 1813—1814 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226。
- 209** 蛊惑者是对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 30 年代,由于受法国 1830 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227。
- 210** 议会反对派(1830—1848 年)是七月王朝(见注 53)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这一集团通常被称做王朝反对派。——228。
- 211** 指宴会运动,即 1847 年 7 月—1848 年 1 月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利用宴会形式进行的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

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半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出席总人数多达17 000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228。

- 212** 指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尔良王朝。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229。
- 213**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翌年1月14日颁布新宪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建立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终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细评述了这次政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229、380、490、524。
- 214** 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地区发生了普法战争(1870—1871年)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被击溃,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230、336、691。
- 215** 威廉堡是卡塞尔附近普鲁士国王的一座城堡。色当会战后,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随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禁于此。——230。

- 216 1870年9月4日,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巴黎的人民群众举行了革命起义,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230、635。
- 217 这里指的是1887年12月15日众议院中从温和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集团,90年代该集团以亚·米勒兰为首,称做“独立社会党人”。该集团除提出若干民主主义主张外,还要求合作自由和劳动自由,逐步实现财产国有化,以及将国有垄断产业转为公众服务、废除旁系亲属的遗产继承权等。——236、242、329。
- 218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原本写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他的这一用语极有可能针对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卡·格里伦贝格尔的有关言论。在1891年2月28日的国会发言中,格里伦贝格尔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意《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不过,恩格斯将文章寄给理·费舍之后,费舍在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将这一用语改为“德国的庸人”。因此这篇文章在《新时代》和《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发表时用的是“德国的庸人”。——239。
- 219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拉法格夫妇的请求为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集会而写的一封信。保·拉法格在集会上宣读了这封信。恩格斯在信中简要回顾了巴黎公社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剥削者在公社失败后掌握全部武装力量,但结果却是“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见本卷第240页),最后他祝愿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早日到来。

这封贺信写于1891年3月17日,发表在1891年3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27号,并被译为西班牙文载于1891年4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267号。——240。

- 220 1887年12月初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工人和民主力量在巴黎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和集会,反对前总理茹·费里做总统候选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费里最后不得不放弃候选资格。费里绰号“东京佬费里”,因1885年3月法国军队在越南北部东京的殖民远征中战败后费里内阁倒台而得名。

恩格斯积极评价反费里游行示威期间军队的表现,在1887年12月5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把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民和军队联合的胜利。  
——241、529、684。

- 221** 1891年2月27日和28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在讨论军事预算中有关军士奖金的条款时,首相莱·卡普里维要求提高军士的奖金,理由是“相较于对阵敌人,与社会民主党的巷战,我们需要更为优秀的军士”(卡普里维1891年2月27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1891年2月28日柏林《前进报》第50号)。资产阶级需要拉拢军士,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加强了。在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下,国会批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62%拨付此款。——241。
- 222**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是恩格斯1891年3月24日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何·梅萨的一封复信的草稿,寄给梅萨的誊清稿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从依据誊清稿翻译的西班牙文译文来看,草稿和誊清稿应该没有多少文字差别。梅萨从1872年起就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有一些章节的译文曾首次发表在第一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1872年4月13日第44号、10月5日和13日第68号和第69号。1891年3月2日,梅萨致信恩格斯,告知他已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请求恩格斯同意出版完整的西班牙文译本。恩格斯在这封复信中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见本卷第242页),并说明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于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扫清蒲鲁东理论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意义。

这封信的西班牙译文作为序言收入1891年底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1892年1月2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66号在为该书所做的广告中刊登了这封信从西班牙文译回的法文本。这封信的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1953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242。

- 223**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是恩格斯写给这次国际群众大会的贺信。1891年3月31日,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组委员致信恩格斯,邀请他出席拟于1891年4月12日在米兰召开的大会,并请求恩格斯为大会撰写一份声明以示支持。1891年4月2日,组委会又向恩格斯发出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和压迫的搏斗中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

一,如果您能来信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会,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来米兰参加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发表讲话,那么,对您的同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恩格斯未能参加这次大会,他于4月9日起草了这一贺信向大会致意。信在4月12日的大会上宣读。

这封贺信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册。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244。

**224** 1870年10月4日,经马克思提名,恩格斯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先后担任总委员会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244、412、413。

**225**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准备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写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226—239页和第256—257页)。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科学论述,对马克思这部著作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他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247页)恩格斯阐明了修改的理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恩格斯在导言开头部分,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单行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全部复述了一遍。

导言写于1891年4月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单行本出版以前,这篇导言曾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柏林)第109号附刊。19世纪90年代,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篇导言和马克思的这一著作一起曾在德国大量印行,广为传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入了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导言还另外以独立的论文形式发表在十多家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如1891年5月30日纽约的德文

报纸《自由报》第 22 号、1891 年 7 月 10 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米兰)第 10 期、1891 年 7 月 22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44 号等刊载了稍经删节的导言。——246。

- 226**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370)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58)爆发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246。
- 227** 1849 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俄国 20 万军队于 1849 年 6 月开进了匈牙利。——246。
- 228** 指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 1848—1849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 年 5 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 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 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 6 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 年 7 月,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11 卷)等文章中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246。
- 229** 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手稿,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封面上注明“1847 年 12 月于布鲁塞尔”。从内容上看,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这篇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未发现《雇佣劳动与资本》已定稿的结尾部分。——246。

- 230 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一致。(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08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68—221页)。——251。
- 231 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尼德兰等国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5月1日这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五一庆祝活动是在这一年5月的头一个星期日即5月3日举行的。——255。
- 23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准备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三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写的三篇导言中的一篇(另两篇导言见本卷第226—239页和第246—255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这个纪念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恩格斯在序言中概述了这部著作在德国以及被译成数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广泛传播的情况,并指出了这一版所做的几处重要补充,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
- 序言写于1891年5月12日,1891年9月载于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4版。1892年这篇序言被译为波兰文收入在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256。
- 233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的两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7—378页和406页。——257。
- 234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是恩格斯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1891年

德文第4版写的序言。在序言中,恩格斯以大量研究材料为基础,评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在原始社会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研究上的贡献和局限性。他高度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摩尔根对母权制的发现,认为这一发现对于原始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的这篇序言为正确理解《起源》提供了理论背景。

这篇序言大约写于1891年5月20日至7月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版出版以前,经恩格斯本人同意,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9年卷第2册第41期。1891年8月底,在第4版付印之前,恩格斯又对序言进行了个别修改,这些改动在本卷脚注中予以说明。载有本序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1891年以后以德文以及法文(1893年)、保加利亚文(1893年)和俄文(189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各种版本,都收入了这篇序言。此外,这篇序言曾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在1891年8月18日《劳动》周刊(布加勒斯特)第26号。——258。

- 235** 摩西五经指《旧约全书》的前5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传说这五卷皆由犹太人的先知和立法者摩西所作,故此得名。——259。
- 236** 这段引文摘自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伦敦—纽约版第124—125页。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最早于1865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收有《原始婚姻》的《古代史研究》第1版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在下面(本卷第267页)也提到这一版本。——264。
- 237** 马加尔人过去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264。
- 238** 路·亨·摩尔根的14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论》杂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他的著作《Ho-dé-no-sau-nee 或易洛魁联盟》1851年在伦敦出版。——264。
- 239** 1888年8—9月恩格斯曾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关于恩格斯在这次旅行中的见闻感受,参看《美

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和《美国旅行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270、271、390。

- 240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准备札记》可以看作是恩格斯针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第2章《家庭》而草拟的一个修改提纲。从札记的手稿看,它的产生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大约在1891年6月中旬,恩格斯开始着手第2章的修改工作,用铅笔写下该书第1版的页码,表示所要修改的位置,并在旁边记下修改要点;在修改过程中,他用墨水笔做了若干插入和补充(如以“第37页”开始的第一段文字,见本卷第272页);在此过程中,恩格斯还在札记的几个段落划下斜线,表示这些修改要点已经得到落实。这一章大约在7月初完成修改。

这篇札记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9卷。——272。

- 241 这是一首创作于1200—1250年间的著名的破晓歌的首行,作者可能是贝·德·阿拉玛农或戈·费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直接引用这首破晓歌,但谈到了这类诗歌的主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88页)。——275。
- 242 指亚·日罗-特隆《家庭的起源》1874年日内瓦—巴黎版第188页脚注1,那里认为类人猿通常是专偶制。恩格斯后来在1891年第4版中实际援引的是《家庭的起源》1884年修订版,书名改为《婚姻与家庭的起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78页)。——276。
- 243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认为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288页),而在实行反动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见本卷第289页)。他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近期目标是争取实现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特殊形式”(见本卷第 289 页)。他还揭露了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 288 页)。这篇文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890 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获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党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 1875 年的哥达纲领(参看注 205)。1891 年 5 月,威·李卜克内西着手起草新纲领。6 月,党的执行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把草案确定下来。6 月 18 日,执行委员会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把草案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收到后立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这个草案优于哥达纲领,并分别对草案的绪论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党的执行委员会吸收了恩格斯的部分批评意见,对草案特别是绪论部分作了修改(修改前与修改后的草案,见注 244),并于 1891 年 7 月 4 日把修正草案公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恩格斯的意见在讨论中一再在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中被提及并进一步获得认同。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斯坦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另一份纲领草案,发表在《新时代》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这一草案成为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写于 1891 年 6 月 19—27 日,在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找到了它的手稿(其中缺失《第一部分的附件》),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901—1902 年第 20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第一部分的附件》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这一部分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277。

- 244**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1891 年 6 月 18 日寄给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并受到恩格斯批判的纲领草案,以前一直以为丢失了,后来被找到并首次发表在柏林《工人运动史论丛》1968 年特刊第 173—174 页。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对这一草案作了修改,发表在 1891 年 7 月 4 日《前进报》第 153 号。草案以及修正草案对照如下(绪论部分各段的编号为编者所加):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

[修改前]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矿场、机器和工具、交通工具——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占有者阶级。

[第二段]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在个人占有者(垄断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的依附,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政治上无权利、社会贫困、身体衰弱和精神屈辱的基础。

[第三段]在个人占有者——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者——的统治下,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贫困越来越加剧,过剩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并使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导致危机和劳动中断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这使得工人状况更加恶化,带来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引发普遍的经济

[修改后]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工具——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占有者阶级。

[第二段]社会劳动资料,在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沉沦、政治依附的基础。

[第三段]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过剩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并使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导致危机和劳动中断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使得工人状况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

上的和政治上的没有保障,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

[第五段]通过消除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产生的原因而结束这种状态,并赢得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场、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工具——转变成社会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私人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共同生产,这一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

[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都以保持和巩固资本主义为它们的共同目的。

[第八段]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性的任务,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同样参与的社会性的

破产,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第五段]通过消除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产生的原因而结束这种状态,并赢得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工具——转变成社会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一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经而且还在进一步地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种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把国家置于私人企业主的地位从而把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身的、为了国库目的而实行的国有化制度。

[第八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

任务,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完成。基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布自己同所有其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把国家置于私人企业主的地位从而使工人承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双重奴役的、为了国库而实行的国有化制度。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支持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要求:

1. 凡年满 21 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在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中,均可在秘

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都以保持和巩固当今的社会基础为它们的共同目的。

[第九段]工人阶级在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利益;随着世界交通和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扩大,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国工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性的任务,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同样参与的社会性的任务。基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布自己同所有其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这样一种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支持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提出如下要求:

1. 凡年满 21 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在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中,均可在秘

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

2. 人民直接参加立法,即人民有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
3. 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4. 废除一切限制或压制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 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团体。
6. 学校的世俗性。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供应教学资料。
7. 普遍服役能力教育。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
8. 免费诉讼和免费司法援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 医疗和医药免费。
10. 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公共开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其他经济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1.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工保护法:

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为当选代表支付薪金。

2. 人民通过行使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国、邦、省和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税收每年审批,有拒绝纳税的权利。
3. 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4. 废除一切限制或压制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 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团体。
6. 学校的世俗性。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供应教学资料。
7. 普遍服役能力教育。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
8. 免费诉讼和免费司法援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 医疗和医药免费。
10. 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公共开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的其他经济政治措施。

(a)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 8 小时。

(b)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商业劳动。

(c)禁止夜间劳动,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而确实需要夜间劳动的工业部门除外。

(d)凡劳动方式对妇女身体有害的工业部门,禁止使用妇女劳动。

(e)禁止妇女和 18 岁以下青少年从事夜间劳动。

(f)每个工人每周一次最少 36 小时的不间断休息。

(g)禁止实物工资。

(h)帝国聘用检查员对包括家庭工业在内的所有作坊和工业企业进行监督。

2. 确保结社权不受企业主侵犯。

3. 帝国接管整个工人保险系统,参保人员起决定作用地参与管理。

为调整和监督劳动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成立帝国劳动部、区劳动局,并建立劳动委员会,其成员一半从工人中选出,一半从企业主中选出。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1.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工保护法:

(a)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 8 小时。

(b)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商业劳动。

(c)禁止夜间劳动,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而确实需要夜间劳动的工业部门除外。

(d)每个工人每周一次最少 36 小时的不间断休息。

(e)禁止实物工资。

2. 由帝国劳动部、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商企业进行监督,并调整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关系。

3. 农业工人和佣人与工商业工人平等。废除仆役制。

4. 确保结社权。

5. 帝国接管整个工人保险系统,工人起决定作用地参与管理。

——279。

245 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见注 205。——279。

246 1850 年普鲁士宪法是按照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议,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通过的宪法。它对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钦定宪法作了修订,消除了反民主的钦定宪法中尚残留的民主内容。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第一议院保留下来,按照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的

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只对国王负责;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的案件。1850年普鲁士宪法在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后仍然有效。——287。

- 247** 宪法冲突指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政府与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1860年2月,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准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拨款,开始实施计划中的军队改组。1862年3月,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政府遂解散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反动的俾斯麦内阁组成,同年10月,俾斯麦内阁再次解散议会,并完成了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拨付军费。直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见注72),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场冲突才得到解决。——287、685。
- 248**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邦国联成一个名称。这两个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邦分别是:属于罗伊斯长系大公的罗伊斯-格赖茨和属于罗伊斯幼系大公的罗伊斯-施莱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287。
- 249** 威·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见注190)有关纲领问题的总结发言中说:“现代国家正在长入未来国家,同样,未来国家在现代国家中也已初具雏形。”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说法一再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派别引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卡·考茨基在1891年3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种情况。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对他的这一说法作了解释。——287。
- 250** 1876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有关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争论只是有产阶级内部之间的斗争,与社会主义者无关,因此保护关税与否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将视具体情况个别地决定。这一决议导致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党团在有关关税问题的投票中出现分歧,如1879年5月17日,议员麦·凯泽尔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在帝国国会上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对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分析批判。——288。

- 251**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由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和德意志帝国宪法(见注165)确定下来。其中,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以及独立管理邮电的特殊权利。此外,巴伐利亚在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保留了独立性;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特别委员会。——289。
- 252**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图林根仍然存在1个大公国、3个公国和4个侯国,爱尔福特和卡塞尔则另属于普鲁士。不仅如此,图林根的这些公国、侯国和属于普鲁士的领土之间还互相交错分割,存在很多飞地。——289。
- 253** 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雾月十八日(11月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制度,宣布实行以自己为第一执政的专政。1804年,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国的皇帝。尽管后来制度发生改变,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甚至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也是如此。——290。
- 254** 指1880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茹·盖得和保·拉法格一起制定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在法国叫做马克思派或盖得派纲领,又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2—443页、第658—659页。——293。
- 255** 指1888年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纲领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西班牙文版。——293。
- 256**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应维·阿德勒1891年6月20日来信的请求而写的一封贺信。恩格斯未能接受阿德勒的邀请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的贺信于6月29日在大会宣读。恩格斯在信中高度评价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自188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258)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见本卷第296页),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能够实现不同民族工人间的团结。

这封贺信首次发表在 1891 年 7 月 3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7 号。1891 年 7 月 9 日《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 13 号、1891 年 7 月 10 日《前进报》(柏林)第 158 号等报纸对贺信进行了转载。贺信还收入《1891 年 6 月 28、29 和 30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891 年维也纳版。

恩格斯的这封信写于 1891 年 6 月 26 日,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别,因为这封信是以私信形式寄给阿德勒的,在转换为贺信时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恩格斯在没有保存下来的付印稿上作了少许改动。重要的文字差别在脚注中说明。——296。

- 257**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891 年 6 月 28—30 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93 名代表,其中包括来自奥匈帝国的匈牙利、波兰、意大利、捷克等民族的代表。这次大会是在奥地利废除了非常法(见注 259)之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参加争取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和 1891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外还讨论了关于工会和奥地利的社会改革等问题。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 1891 年 7 月 3 日的社论《在维也纳举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表大会工作时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表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党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296。

- 258** 1888 年 12 月 30 日至 1889 年 1 月 1 日在海恩费尔德(下奥地利)举行了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诸侯领地的社会主义者的 73 名代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由维·阿德勒起草、主要由卡·考茨基修改过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原则宣言》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据,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任务,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不过,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也基本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原则宣言》在 1909 年为

《维也纳纲领》所取代。——296。

- 259** 1884年奥地利通过了与德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注93)类似的所谓的“反无政府主义者法”。根据这一法律,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遭到迫害,它们的机关报刊遭到查封,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在罢工运动增长以及1890年和1891年奥地利工人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活动的压力下,这一法令于1891年6月被废除,但是法令的个别措施仍暂时保留下来。——297。

- 260**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恩格斯1891年9月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恩格斯肯定了1891年布鲁塞尔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261)的有关成果;在第二部分,他主要分析了俄国和德国的政治局势以及这种局势下的革命前景。

这篇文章发表在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51号,《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在发表时对信的内容作了少量删减改动,并增加了两个小标题。文章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十多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如1891年9月16日《前进报》(柏林)第216号、1891年9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哥本哈根)第222号、1891年10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奥斯陆)第114号等。——298。

- 261** 指1891年8月16—22日举行的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374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马克思派同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能派这一次未能分裂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劳工保护法、结社权、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工会运动、“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认为这次大会是马克思派的“全面的胜利”(见恩格斯1891年9月2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298、673、675、697。

- 262** 1891年8月16日,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问题时,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261)第二次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资格的决定。不过,大会并没有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一决定,在大约20个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一些被排除,但一些工会组织推举的无政府主义者仍得以继续参加大会。——298。

- 263** 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 23 名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和工联的代表出席了第二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新加入 5 名英国代表,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约·白恩士和罗·肯宁安-格雷厄姆后来也出席了会议,整个会议期间总共有 40 名英国代表与会。

大会通过了有关劳工保护法的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政党的统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利用这样的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状态”(《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决议》1893 年柏林版第 15 页)。英国代表对这一决议表示赞同。——298。

- 264**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无产阶级对待军国主义的态度。所有代表都同意,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但在反对战争的具体手段上存在分歧。决议案起草委员会提出,军国主义只有消除其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才能最终消亡。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共同行动,它的任务就是“坚持不懈而且坚决有力地反对一切战争的欲望和为这种欲望服务的决定,通过完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决议》1893 年柏林版第 26 页)。荷兰代表斐·多·纽文胡斯反对这一决议案。他提出,一旦宣战,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本国人民举行总罢工。最后,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在大多数代表的赞成下获得通过。——299。

- 265** 1891 年,由于持续干旱,俄国粮食严重歉收,20 个土地肥沃的省份发生饥荒。俄国逐渐禁止所有粮食出口,从而失去了与欧洲工业国的一个主要贸易项目。

不过,恩格斯预测的、当时也为人们所担心的德国的饥荒后来没有出现。据统计资料,当年德国的土豆产量约为中等年景的 95%,小麦和黑麦的产量还超过了 1881—1890 年间的平均值。——299、342、442、485、667。

- 266**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草稿片断》是恩格斯大约于 1891 年 10 月 13 日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几段文字(背面是恩格斯 1892 年 2 月 6 日给菲·屠拉梯的信的草稿)。这几段文字的观点大都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 327—346 页)一文中有所论述,不过,除了“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见本卷第 302 页和第 334 页)这句话之外,文字表述没有相同之处。

这一草稿片断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302。

- 267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逼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喊:“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302、334。

- 268 《致〈人民之友〉编辑部》是恩格斯于1891年11月13日为祝贺该报创办十周年而写的一封贺信。他在信中赞扬奥地利工人排除万难坚持办报的“坚毅精神和牺牲精神”(见本卷第305页),高度肯定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团结一致。

《人民之友》原计划在11月21日出版专刊并于次日举办庆祝活动,但该计划因当局禁止而未能实现。恩格斯的这封信刊载在该报11月25日出版的纪念号(第22号)上,该纪念号也被警察当局没收。1891年12月8日柏林《前进报》第287号在一篇揭露奥地利当局对待《人民之友》的行径的报道中转载了恩格斯的这封贺信。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存在少许文字差别,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在寄出去的誊清稿上作了少许修改,这些差别在脚注中说明。——304。

- 269 青年捷克派主要代表捷克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起初它是民族党的左翼,1874年分裂出来成立民族自由思想党,在90年代成为波希米亚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民族党保守主义的右翼老年捷克派不同,青年捷克派对维也纳中央政权的抗拒更为坚决,要求波希米亚各诸侯领地在各个领域分享应有的国家权力,要求各民族自治,提出把奥匈二元帝国改为奥匈捷三元帝国,并力图增强捷克资产阶级相对于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老年捷克派这个名称,把政治纲领与之相近的波希米亚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代表称为老年德意志派。——305。

- 270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是恩格斯随《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见本卷第307—308页)一文寄给该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891年11月17日。信的草稿保存下来,草稿下方空白处留有恩格斯记下的四列数字和运算,草稿的背面是恩格斯寄给该报的文章的草稿。这封信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俄文第1版第28卷。英文原文

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0年英文版第27卷。——306。

- 271** 指1891年11月17日伦敦《每日纪事报》第9261号发表的题为《拉法格先生案件》的匿名通讯。通讯污蔑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夫人为保护其女婿保·拉法格而向当局泄露了武器库的地点。

这篇带有敌意的报道产生的背景之一,是1891年11月8日拉法格在里尔当选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年五一节游行后,法国政府开始迫害社会主义者。7月,当局以煽动工人谋杀企业主的罪名判处拉法格一年监禁并处罚金。拉法格在狱中成功当选后于11月10日被提前释放。——306、307。

- 272**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是恩格斯为驳斥资产阶级的诽谤、维护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名誉而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写于诽谤性报道《拉法格先生案件》(见注271)发表的当天,即1891年11月17日,恩格斯将它与一封附信(见本卷第306页)一起寄给《每日纪事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891年11月26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9269号。——307。

- 273** 1871年8月,保·拉法格和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疗养地巴涅尔-德吕雄时,法国当局曾对他们进行迫害。关于此事经过可参看马克思1871年8月25日给纽约《太阳报》编辑查·德纳的信,以及马克思的女儿燕妮1871年9月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信。——307。

- 274** 在《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中,恩格斯婉拒了歌咏团为他71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的安排,并阐明:“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见本卷第309页)。恩格斯在信中还表达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这封信写于1891年11月28日恩格斯71岁生日当天,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俄文第1版第28卷。信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德文版第22卷。——309。

- 27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是恩格斯对该委员会给他的生日贺信的答复,写于1891年12月1日,首次发表在《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西柏林)1970年第10期。——311。

27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主体部分均以恩格斯1886年的文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为基础。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对他1886年的文章分别作了补充、删节和修改。在这两篇序言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它并不使作者感到羞愧。（见本卷第312页和第393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夺取了大部分执政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英国为世界工厂，以其他国家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的世界市场体系。“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见本卷第324页和第405页）这是自欧文主义之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但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德、美等国现代大工业的不断崛起，英国逐渐丧失作为其现存社会制度基石的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即使在工商业空前高涨的时期，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当景气消失之后，这种贫困就更为加剧，这是社会主义在英国重新出现的原因。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314页和第395页）。他简要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317页和第398页）。他告诫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407页）

英国版序言大约写于1892年1月7日至11日，除被收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伦敦版外，还被节选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在1892年4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8期、1892年5月6日《工人报》（维也纳）第19号、1892年5月10日《前进报》（柏林）第109号、1892年5月16日《人民代言者报》（维也纳）第15号以及1892年6月15日《社会问题》杂志（巴黎）第13期等发表。

德文第2版序言的主要部分由恩格斯译自英国版序言，恩格斯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一些修改。翻译工作可能始于1892年4月底，最后一段专为这一版而写的文字完成于7月21日。这篇序言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

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恩格斯新加的那段文字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1892年10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20期。——312、392。

- 277** 谷物法是英国从1815年起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从而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谷物法。曼彻斯特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33),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后来英国议会在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废除了谷物法。——313、378、393。
- 278**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些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313、393。
- 279** 1831年10月15日英国议会颁布了禁止用实物支付工人工资的法令,但由于缺乏完备的实施细则,工厂主们常常利用该法令的漏洞不予执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章对实物工资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314、394。
- 280** 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对纺织业的女工和青少年工人实行10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这一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314、394。
- 281**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大城市》一章。  
“七日规”是当时伦敦市中心七条街道交汇的地方,在这些街道居住的主要都是工人,以贫困而知名。——315、396。
- 282** 小宅子制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为工人提供住所(有时带有小块土地),房租从工人的工资中

扣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章对这种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316、397。

- 283** 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有近万名煤矿工人参加的罢工。罢工工人遭受极大的困难,不少人从住处被赶出。罢工期间还发生了冲突。最后资方退让,罢工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大部分得到了满足。——316、397。
- 284** 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恩格斯校订和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于1887年在伦敦出版。——317、362。
- 285**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49)的纲领性文件,包括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8年,宪章派三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但均以失败告终。——319、379、399。
- 286** 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并在伦敦集结大批军警对游行示威进行阻挠。宪章派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迫害。——319、399。
- 287** 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降低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319、378、399。
- 288** 1867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1884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英国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

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选举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320、401。

**289** 马克思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等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321、352、401、456、628。

**290** 莱·莱维和罗·吉芬都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著有关于英国工人工资及生活水平方面的论文或著作。他们认为,随着英国财富的巨大增长,工人的工资有了明显增长,工人阶级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322、403。

**291** 《德国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晚年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和原则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评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合法斗争、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了德国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应当采取的策略,同时指出,不定哪一天,德国政府“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见本卷第334页),反革命的暴力会推迟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恩格斯针对俄国、法国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阐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的态度,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德国,这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在这种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见本卷第340页)。恩格斯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

这篇文章最初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为《工人党年鉴》撰写的,文章写于1891年10月13—22日之间,载于1891年12月在里尔出版的《1892年工人党年鉴》。恩格斯在1892年1月6—19日把它译成德文,并增写了专门面向德国读者的前言和论述俄国发生饥荒的原因及其对俄国和欧洲的影响的结束语,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1—1892年第10年卷第1册第19期。本卷依据德文版翻译,与法文版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这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得到广泛传播,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多个社

会主义刊物在 1892 年先是刊载了译自法文版的译文,后来又刊载了德文版结束语部分的译文;这篇文章的德文版在 1892 年先后被译成波兰文、英文、瑞典文、保加利亚文、丹麦文、挪威文发表,并译成俄文在 1893 年发表。——327。

- 292** 纯粹的共和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国民报》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阿·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路·加尔涅-帕热斯。《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路·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330、538。
- 293**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于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331。
- 294** 指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出版斐·拉萨尔全集的决议。——332。
- 295** 从恩格斯提到的票数看,这里大概指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首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共获得 101 927 张选票(另参看本卷第 333 页),爱森纳赫派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国会议员。  
不过,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根据 1866 年 9 月颁布的选举法,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在 1867 年就开始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后在这一年的两次选举中当选为国会议员。——332。
- 296**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 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 1795 年被平定,但是在 1799 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33。
- 297** “合法性害死我们”是恩格斯引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出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

- 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企图。他们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从而恢复君主制。——334、639。
- 298** 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国)联军的人侵。——340。
- 299**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341。
- 300** 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为法国分舰队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场面公开证明了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之间的亲善关系。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和俄国有义务就国际政策问题相互之间进行协商;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双方应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一协定的签订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42、667。
- 301** 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利率为3%的1.25亿金卢布(5亿法郎)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在认购时超额了七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最后实际销售的公债只有大约9600万卢布。——342、486、670。
- 302** 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19世纪中叶,农奴制严重地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52)失败后,俄国革命形势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被迫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1861年2月19日法令》。该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地主不得买卖或赠送农奴;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活动,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奴要获得上述自由必须交付高额赎金。这次改革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仍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344、484、668。
- 303** 普鲁士王国于1807年10月9日颁布取消世袭人身依附关系的敕令,开始了农业改革的进程。后来又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法令。1850年3月2日的赎买法颁布后,农村所有土地都可转化为

农民自由经营,到60年代中,这一转化过程大致完成。关于19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情况,见恩格斯《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344。

**304** 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勒·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和皮·勒·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的有关论述,这两部著作均收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345、669。

**305**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是恩格斯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乔·博维奥发表在1892年2月2日《论坛报》(罗马)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博维奥在文章中对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第一部分(见本卷第330—335页)进行了攻击和歪曲。恩格斯驳斥了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轻视政权具体形式的指责,重申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指出:“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见本卷第348页)恩格斯还驳斥了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者将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的指责,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而这一经济革命如何实现,“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见本卷第349页)。

《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屠拉梯在博维奥文章发表的当天把这篇文章寄给恩格斯,并请他给予答复。恩格斯在2月6日用法文撰写了答复文章并随函寄给屠拉梯,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经恩格斯认可后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米兰)第4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乔万尼·博维奥》,意大利多家报纸予以转载。文章的法文原文经节选首次发表在《菲·屠拉梯与他人的通信(1880—1925)》1947年巴里版,全文作为影印件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论意大利》1955年米兰—罗马版。——347。

**306**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

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卷第351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见本卷第352页）。

这篇序言写于1892年2月10日，波兰文译文首次发表在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伦敦）第35期，后来收入《共产党宣言》1892年伦敦波兰文版。序言的德文原文首次载于《共产党宣言》1939年莫斯科德文版。——351。

- 307**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劳拉·拉法格的请求，为1892年3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21周年活动而写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国际性，指出21年之后，国际无产阶级联盟空前壮大，正在“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见本卷第356页）。恩格斯的贺信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写于1892年3月17日，发表在3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79号。贺信结尾部分作为影印件曾发表在1892年4月30日《画报》杂志（巴黎）第2566号，并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转载于1894年4月19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第8号。

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与发表的文本存在几处文字差别，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报》编辑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别在脚注中说明。——355。

- 308** 1789年7月14日是巴黎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狱的日子，这一天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792年9月22日是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1793年国民公会批准的革命新历（共和历）以这一天为新历元年元旦。

18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宣布成立的日子。——355、540。

- 309**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不久，法国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茹·法夫尔在1871

年6月6日的一封通告信中要求各国政府共同对付国际工人协会。此后几乎欧洲各国都开始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迫害。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1871年8月和9月多次会晤,商讨对付国际的共同措施;意大利政府颁布特别法令,禁止国际的活动。第一国际在各国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不得不停止在欧洲大陆的活动。——356。

- 310 在《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中,恩格斯说明,对于《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版和1885年德文第1版的两处笔误,德文第2版已经作了订正。这两处错误是奥地利法学家安·门格尔在《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中指出的。对于门格尔在该书中对马克思的攻击,卡·考茨基曾在恩格斯指导下撰写了《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予以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

本文写于1892年3月29日,载于《哲学的贫困》1892年斯图加特德文第2版。——357。

- 31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是一篇有丰富理论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以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简要回顾了17世纪以来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指出不可知论实质上是力图与唯心主义调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并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第一次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370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宗教执迷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先是打着宗教旗帜反对封建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后又用宗教对抗唯物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揭露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反动目的,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见本卷第385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

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见本卷第 385 页)

这篇导言写于 1892 年 4 月 4—20 日,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其主体部分曾被译为波兰文,载于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波兰文版。

恩格斯在 1892 年 6 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新时代》杂志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标题,刊载在该杂志 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 期和第 2 期。这个德文版还被全文译成意大利文和罗马尼亚文,分别刊载在 1892 年《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 21—23 期和 1892 年《社会评论》杂志(雅西)第 1 年卷第 8 期;1892—1893 年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115、116、118、119、120 号发表了德文版第 2 部分的法译文;1892 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塞夫利耶沃)第 3 期发表了从德文版第 2 段开始的保加利亚文译文。

导言的德文版除删去英文版开头的 7 段文字外,恩格斯在翻译过程中还作了少量修改。德文版与英文版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358。

- 312** 指欧·杜林的以下三部著作:《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 年莱比锡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 年莱比锡第 2 版(该书第 1 版于 1873 年在柏林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 年柏林第 2 版(该书第 1 版于 1871 年在柏林出版)。——361。
- 313**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361。
- 314** 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方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9 世纪后半期扎德鲁加逐渐解体。——362、518。
- 315** 唯名论者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该派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363。

- 316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观点,种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种子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363。
- 317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365。
- 318 参看《神圣家族》一书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三节《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恩格斯将引文从德文译成英文时作了不少修改。——365。
- 319 “自由思想者”一词最初在17世纪末用来指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到18世纪也指那些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拒绝服从任何权威的思想家。——366。
- 320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蒲斯创立于伦敦。1878年该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慈善活动并吸收教徒。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开展广泛的宗教活动,并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366、383。
- 321 “德国制造”是1887年英国出于贸易保护的动机要求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提供的产地标识,该标识最初对德国产品有歧视意味。——367。
- 322 指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这两次战争作了阐述。——372。
- 323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创立了加尔文教派。该教派的教义是“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加尔文教派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372。

- 324** “光荣革命”指英国 1688 年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 1689 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374。
- 325**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 1455—1485 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374。
- 326**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所著《论公民》一书序言。该书于 1642 年在巴黎写成,1647 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376。
- 327** 笛卡儿派指 17—18 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376。
- 328** 指 1789 年 8 月 26 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宣布拥有自由和财产等是每个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 年的法国宪法包括了这篇宣言。1793 年的雅各宾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是根据 1789 年的宣言起草的;1793 年的宣言被作为导言放在 1793 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共和国宪法之前。——376。
- 329** 民法典指拿破仑统治时期于 1804 年通过的法兰西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民法典》。广义的《拿破仑民法典》则包括 1804—1810 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适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

地区于 1815 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362 页)。——377、596。

- 330** 指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这些人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主要是联合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的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曾遭到英国寡头政治执政者的迫害。——378。
- 331**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1794 年 7 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378。
- 332** 1824 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通过一项法令,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有关法律。1825 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会的决定,但是却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即便仅仅为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进行鼓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行为而以刑事罪论处。——379。
- 333**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 277),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1846 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 1849 年。——379。
- 334** 奋兴派亦称教会复兴派,是英美等国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19 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该派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团体来巩固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奋兴派有时也泛指各种谋求恢复教会旧日威势的派别。——380。
- 335** 指 1867 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参看注 288。——382。
- 336** 指 1884 年英国第三次议会改革,参看注 288。——382。

- 337 讲坛社会主义是 19 世纪 70—90 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包括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383、495。
- 338 崇礼派是产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流派,因其创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故更流行的名称为皮由兹教派。该派的信徒主张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于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383。
- 339 在天主教的传统中星期五应该素食,因为据说耶稣是在星期五死去的。——384。
- 340 这是 1876 年 8 月 19 日德皇威廉一世在普鲁士楚黎绍(今波兰苏莱胡夫)火车站对前来送别的新教教士们说的话,后来成为名言。——384、555。
- 341 1890 年 9 月 27 日,路·布伦坦诺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全体大会上报告了他在利物浦工联年度代表大会(1890 年 9 月 1—6 日)的见闻。相当数量的新工联代表首次参加了这次工联代表大会。布伦坦诺承认,新工联在这次大会上占了上风。——385。
- 342 《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于 1892 年 5 月 31 日写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未能应邀出席这次大会,贺信于 6 月 5 日在大会上宣读,首次以《致奥地利党维也纳代表大会》为题发表在 1892 年 6 月 10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4 号。——387。

- 343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原拟在布吕恩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故改为 1892 年 4 月 17 日在林茨召开。但在 4 月 2 日,当局下令禁止大会在林茨举行,因此改址为维也纳。这次大会(1892 年 6 月 5—9 日)讨论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章程,对党纲作了补充,并首次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387。
- 344 《卡尔·肖莱马》是恩格斯为他和马克思的亲密朋友肖莱马写的悼文。恩格斯在文中回顾了肖莱马的一生,高度评价肖莱马杰出的科学贡献,并特别指出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见本卷第 389 页)。恩格斯在 1892 年 5 月底得知肖莱马的病情,曾于 6 月初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探病。肖莱马于 6 月 27 日去世后,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了 7 月 1 日的葬礼,并帮助处理了一些后事。
- 这篇悼文写于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发表在 1892 年 7 月 3 日《前进报》(柏林)第 153 号,并在 1892 年 7 月 7 日《黑森人民报》(达姆施塔特)第 150 号和 1892 年 7 月 15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29 号全文转载。文章还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杂志《日子》(索非亚)1892 年第 7 期。——388。
- 345 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1851 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欧文的遗产创办,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前身,当时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齐名。——388。
- 346 1891 年 7 月底至 8 月,恩格斯同肖莱马一起在威特岛度过了两个星期,并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后续旅行。——390。
- 347 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 1884 年,可能是由肖莱马本人告诉恩格斯的。另可参看恩格斯 1884 年 10 月 23 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
- 在达姆施塔特一大盖劳选区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 1881 年 10 月 27 日的初选中的得票数是 1 360,在 1884 年 10 月 28 日的初选中的得票数是 4 892。——391。
- 348 1876 年 5 月 10 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 40 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

“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以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会战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把这一事件称做工业上的耶拿会战。——393。

- 349**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是恩格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两段文字。第一段文字标注写作日期是1892年9月12日，可能是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见本卷第358—386页）所做的补充。第二段文字的写作时间不详。它在内容上与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有关，可能是恩格斯在收到该书德文第2版的样书后，即在9月12日之后不久写下的。不过，恩格斯当时正在加紧编辑《资本论》第3卷，第二段文字与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第30章所加的一个脚注内容相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554页脚注8），因此不能排除它是恩格斯在1892年11月之后写下的。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德文版第22卷。——409。

- 350**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其宪法是在不成文习惯法的基础上由若干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性判例等组成。恩格斯对英国宪法的评述参看他早年的文章《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409。
- 351** 指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原因包括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政府的通货膨胀和赤字政策以及外债过重等。危机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剧烈的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破产，总量达1.6亿比索的外债停止偿付。危机还造成阿根廷政治局势动荡。这次危机是189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它加深了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410。
- 352**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完成的3篇有密切联

系的文献。

1892年9月8日,英国工联在格拉斯哥召开第25届年会,通过了不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转而专门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认为工联的决议有损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和组织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后取得的主导地位。因此,他于1892年9月11日分别致信劳拉·拉法格和奥·倍倍尔,建议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尽可能多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采取统一行动,反对英国工联的决议。由于法、德、奥、西等国工人组织的反对,工联于1893年2月修改了格拉斯哥决议,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为上述目的而于1892年9月16日用西班牙文所写的一封信,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第1版第29卷。西班牙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

《法国工人党马赛第十次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法定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声明》是法国工人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发表的声明,以《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为题,载于1892年10月4日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106号,另载于《工人党马赛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892年9月24—28日》1892年里尔版。

《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1892年)反对工联提议召开的八小时工作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于1891年11月作出的决议,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前进报》第272号,并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记录。1892年11月14—21日》1892年柏林版。——411、673、675。

- 353** 指1893年8月6—12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原先抵制这次大会的英国工联也派了代表参会。围绕参加大会的条件问题,会议组织方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参会资格。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庆祝五一节问题、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问题、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等。在五一节问题上,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关于策略问题,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

来；在战争问题上，大会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参看注 264），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

恩格斯出席了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大会名誉主席身份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并发表了闭幕词（见本卷第 694—695、696—698 页）。——411、673、675、697。

**354** 议会委员会是 1868 年成立的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这一英国工会联合组织的执行机关；从 1871 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工联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议会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 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411、577。

**355** 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在芝加哥举行，大会的决议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并通过了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等内容的纲领。——411。

**356** 1892 年 9 月 19—23 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除了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和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外，还讨论了英国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352）。大会决定不参加工联发起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法国工人党马赛代表大会于 1892 年 9 月 24—28 日举行（见注 521），大会在关于英国工联格拉斯哥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上通过了与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类似的决议（见本卷第 673—674 页）。——412。

**357**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和《〈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的补充材料》是有关恩格斯生平和著作的两篇文献。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由恩格斯对该百科全书 1883 年第 13 版第 6 卷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进行修改补充而成。恩格斯在收到布罗克豪斯出版社 1890 年 3 月 20 日的来信，得知该百科全书要出第 14 版后，立刻着手对这一条目进行修改。两年之后，恩格斯又应出版社 1892 年 10 月 7 日来信的请求，对条目的校样

进行审订。这一条目载于 1893 年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出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第 14 版第 6 卷。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条目的补充材料》是恩格斯在 1892 年 10 月 7 日收到该条目第 14 版的校样后写的三点补充, 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 年俄文第 2 版第 50 卷, 德文原文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32 卷。——413、647。

- 358**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恩格斯获悉 1892 年美国选举的结果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分析了美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及其对世界市场特别是对英国和德国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于 1892 年 11 月 9—14 日, 作为社论发表在 1892 年 11 月 16 日《前进报》(柏林) 第 269 号, 转载于 1892 年 11 月 21 日《选民报》(莱比锡) 第 270 号和 1892 年 11 月 25 日《工人报》(维也纳) 第 48 号。文章还被翻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周刊《进步》(帕扎尔吉克) 1892 年 11 月 28 日第 3 期。——414。

- 359** 1892 年 11 月 8 日, 民主党人格·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虽然克利夫兰在第一个总统任期(1885—1889)就反对高关税政策, 但直到他的第二任期, 迫于 1893 年经济危机的压力, 美国才从 1894 年起开始实行新的关税税率。新税率虽然比之前有所降低, 但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415。

- 360** 1890 年 10 月 1 日美国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大大提高了棉毛织品、钢铁制品、玻璃等商品的关税税率, 一些商品的平均税率接近 50%。——415。

- 361** 1892 年 8 月, 英国兰开夏郡的多数纺织工人在秘密投票中赞成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415。

- 362** 指当时德国政府意图提高军事预算一事, 见注 406。——417。

- 363** 《马克思, 亨利希·卡尔》是恩格斯应《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传略, 这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为马克思写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传记。恩格斯在文中简述了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 详细列举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原文中“资产阶级实在不能接受的一些地方”在出版时被删掉(参看恩格斯 1893 年 1 月

26日给卡·考茨基的信)。

这篇文章写于1892年11月10—23日,载于《政治科学手册》1892年耶拿版第4卷。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1893年3月14日),1893年1月29日《前进报》(柏林)第25号、1893年3月17日《工人报》(维也纳)第11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还被译成法语、保加利亚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多种语言在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报刊上发表。

恩格斯在准备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整理了一份马克思著作书单,书单的手稿保存了下来(见本卷第425页插图),其内容如下(错误日期已更正):

**“马克思著作**

(1)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

(2)关于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和关于摩泽尔流域农民的文章,1842年在《莱茵报》上发表。

(3)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

(4)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5)1844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6)1847—1848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

(7)《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8)《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9)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0)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11)1849年在科隆出版的《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两篇辩护词。

(12)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1848年至1849年》(关于法国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评。

(1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第三版18[85]年在汉堡出版)。法文译本1891年出版。

(14)《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波士顿(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15)1851—1862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关于帕麦斯顿的若干篇(增订后1856—1857年在伦敦作为小册子出版)。

(16)《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在《自由新闻》(1856年6月28日—1857年4月1日先后在设菲尔德和伦敦出版)上发表。

(17)关于1859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的文章，1859年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表。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

(19)《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

(20)1864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发表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187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译本。

(21)《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1867年在汉堡出版，1890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

(22)(逝世后)《资本论》第2卷(第2册)，1885年由弗·恩格斯在汉堡出版，1893年第二版在印刷中。

(23)(逝世后)《资本论》第3卷(第3册)，将于1893年由弗·恩格斯在汉堡出版。”——418。

- 364**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816年从犹太教改信新教。亨利希·马克思的子女和妻子分别于1824年和182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418。
- 365**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他将论文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4月15日他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418。
- 366** 布·鲍威尔于1842年3月初失去教职。——418。
- 367** 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颁布了查封《莱茵报》的指令，要求《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起停刊。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签署日期是1843年3月17日，刊登在3月18日《莱茵报》上。——419。
- 368** 马克思于1843年6月19日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419。
- 369** 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过以下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载于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道德

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和94号)等。——420。

- 37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成为1848年革命时期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

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提出的立即发动革命的主张。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同盟中央委员

会迁往科隆。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28)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见注129)的活动。——420、561、647。

- 371** 1845年10月17日和11月10日,马克思两次致信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和特里尔市市长弗·达·格尔茨,申请脱离普鲁士王国国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359—360页)。1845年12月1日,普鲁士政府颁发了马克思脱离普鲁士国籍的证书。——421。

- 372** 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总编辑,和恩格斯以及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一起,因该报1848年7月5日第35号发表的《逮捕》一文而被控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1849年2月7日,科隆陪审法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词以《〈新莱茵报〉审判案》为题发表在1849年2月14日《新莱茵报》第221号。

马克思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同卡·沙佩尔和律师卡·施奈德第二一起,因签署了这个委员会1848年11月18日发表的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而被控煽动叛乱。1849年2月8日,科隆陪审法庭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马克思的辩护词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为题发表在1849年2月25日和27日《新莱茵报》第231和232号。

这两次审判都宣告马克思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词还收入1849年在科隆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恩格斯在1885年将马克思的第二个辩护词收入以《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为题的小册子,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2册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恩格斯为小册子撰写了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421。

- 373**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

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421。

- 374** 指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31 卷。——422。
- 375**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入选临时委员会,在 10 月 5 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即章程是由朱·马志尼制定、路·沃尔弗翻译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提出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性质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这个文件后来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遂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 10 月 20—27 日用英文拟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这两个文件于 10 月 27 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 11 月 1 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423。
- 376** 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和《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427。
- 377** 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版在恩格斯写作本文时还在准备当中,1893 年出版;这一著作的法文版在恩格斯去世前一直没有出版。1891 年 7 月 22 日巴黎《社会主义者报》将恩格斯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见本卷第 246—255 页)以《资本和工资》为题发表,这可能让恩格斯把这一导言的法文版误作著作的法文版。——427。
- 378** 指马克思发表在伦敦《人民报》上的《施普雷河与明乔河》和系列文章《偷梁换柱》。前者载于《人民报》1859 年 6 月 25 日第 8 期;后者连载于《人民报》1859 年 7 月 30 日及 8 月 6、13、20 日的第 13—16 期,由于《人民报》停刊,文章没有连载完。——428。
- 379** 在《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中,恩格斯驳斥了对第一国际的历史进

行歪曲的企图。恩格斯写本文的起因是《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6日开始刊载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埃里蒂埃没有全面研究有关史料，偏颇地主要以巴枯宁主义者的材料为根据，对第一国际有关历史的叙述不符合事实。因此，恩格斯决定不等他的所有文章登完即予以批驳。恩格斯大概在11月13日开始有关的工作，15日将这篇文章寄给倍倍尔（文章注明写作日期为11月15日），请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47号。埃里蒂埃在1893年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承认自己在写这组文章时对相关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全面。——429。

- 380** 国际工人协会的《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最初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最早的法文版1864年底由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翻译，1865年1月作为传单发表，并刊载于比利时和瑞士的多家报刊。该法译文中有些不准确和曲解的地方，后被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见马克思1870年1月1日写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3月28日写的《机密通知》）。——430。

- 381** 恩格斯转自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57）关于瑞士罗曼语区分裂问题的决议。

1870年4月在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最终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以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会址改设在拉绍德封；总委员会的支持者则继续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于是，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1870年4月初，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巴枯宁派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的伦敦代表会议批准了总委员会的上述决议案，并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431。

- 382** 关于巴枯宁的秘密组织，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初撰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431。

- 383 在《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中,恩格斯表达了对理事会给他 72 岁生日贺信的谢意。这封信写于 1892 年 11 月 30 日,首次发表在 1970 年《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西柏林)第 10 期。——433。
- 384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的前一部分是恩格斯撰写的引语,后一部分是恩格斯译自 1892 年 10 月 14 日莫斯科《俄罗斯新闻》第 284 号的一篇报道,该报道介绍了俄国人类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成果。恩格斯认为,这篇报道证实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中有关群婚制的理论,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是相似的,其基本特征甚至是相同的”(见本卷第 435 页)。恩格斯在翻译时删除了报道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段文字,并在个别地方对原文有所改动(如用《起源》的用语替换原有的用语)。
-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可能写于 1892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4 日之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434。
- 385 吉里亚克人是俄罗斯人对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入海口、鞑靼海峡靠大陆一边的海滨、鄂霍次克海南岸和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北部及中部的民族。——435。
- 386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问号,以示这里可能报道有误。在外婚制的条件下,母亲和父亲不可能在同一个氏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57—58、105—106 页),因此,这里不应该是“母亲”,而是“这些兄弟的父亲的兄弟”。这个错误只是出现在《俄罗斯新闻》的报道中,在雅·施特恩堡后来发表的详细文章中并不存在。——436。
- 387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该委员会受托编制法律,公元前 451 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发展和奴隶制国家形成的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

恩格斯这里的引文综合了十二铜表法第 5 表(有关继承和监护)第 4 条和第 5 条的内容。——436。

**388** 吉里亚克人居住的库页岛在历史上长期受中国管辖。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之后,库页岛被割让给沙皇俄国。——437。

**389**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写给该协会成立 25 周年庆祝会的贺信。该协会在 1892 年 11 月寄给恩格斯一封邀请信,邀请恩格斯参加 1892 年 12 月 11 日举行的庆祝会。恩格斯未能与会。这封信写于 1892 年 12 月 9 日,信的原件保留了下来,书写者为路·考茨基,恩格斯在信上署名。这封信首次发表在 1978 年 3—4 月《党史出版》(布达佩斯)第 2 期,同时发表在 1978 年 5 月《道路和目标》(维也纳)第 5 期以及 1978 年 5—6 月《工人运动史论丛》(柏林)第 3 期。

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是奥地利 1867 年新的结社法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工人协会,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协会成立于 1867 年 12 月 15 日,最初有 4 000 多名会员。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促进工人阶层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协会长期遭到监视和迫害,多次被解散后又重新成立。19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其他工人社团尤其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该协会逐步失去了原先的突出地位。——439。

**390**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对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见注 182)请他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的回复。恩格斯未能与会,他的这封信 1893 年 1 月 7 日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可能写于 1893 年 1 月 2 日或 3 日,首次以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册,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德文版第 22 卷。——440。

**391**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尖锐化。在党内占上风的温和派在 1892 年 12 月 20 日提议,罢免由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182)选举出来的以激进派为主的领导集团,开除帕·恩格尔曼等主要领导人。该决议在 1893 年 1 月 6—8 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遭到开除的激进派在 1894 年 1 月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此分裂为两个社会主义政党。1894 年 5 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见注 478)上,两党重新合并成一个政党。——440。

- 392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是恩格斯就 1893 年初巴黎警方逮捕波兰流亡者一事而写的评论文章。这次逮捕的始作俑者是俄国驻巴黎公使，俄国内政部也一直想方设法促使有关国家把俄国的革命流亡者作为所谓恐怖分子逮捕和引渡到俄国。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玛·门德尔森诺娃处得知此事。为了声援波兰流亡者，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法国和沙皇俄国日渐成型的同盟关系(参看注 300)，他在 1893 年 1 月 9 日或 10 日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 1893 年 1 月 13 日柏林《前进报》第 11 号“政治评论”栏目，没有标题和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恩格斯在 1893 年 1 月 16 日给门德尔森诺娃的信中承认自己是文章的作者。——441。
- 393 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场骗局，故也称巴拿马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 1879 年在法国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1888 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 1892 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真实的财政状况及其滥用所筹集的资金的行为，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内、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贿赂。1893 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被判罪的仅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441、444。
- 394 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大概是指 1850 年 11 月 29 日普鲁士在俄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同奥地利签订协议、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让步一事(参看注 60)。恩格斯在这里可能借用了宣传小册子《德意志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的标题，这一小册子 1806 年匿名出版，因其标题而著名。——442。
- 395 1891 年 7—8 月法国海军上将阿·阿·热尔韦指挥的分舰队访问了俄国喀琅施塔得(参看注 300)。1891 年 7 月 28 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圣彼得堡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仪式上演奏了当时法国的国歌、产生于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歌曲《马赛曲》。——443。
- 396 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案件》中，恩格斯通过分析一桩金融骗局揭露了

意大利统治集团的腐败。1892年底至1893年初,恩格斯主要致力于《资本论》第3卷论述银行和信用问题的第5篇的编辑整理工作,因此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恩格斯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安·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大量有关意大利罗马银行弊案的材料,以此为依据做了7页摘录笔记,大约在1月22—29日撰写了这篇由三部分组成的评论文章。有一部分笔记的摘录时间是在本文写完以后,表明恩格斯一直在跟踪事态的发展。

这篇文章连载于1893年2月1—3日柏林《前进报》第27—29号。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书信往来,为保护消息来源,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444。

- 397 韦耳夫基金原指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五世(来自韦耳夫王朝)在他的王国被普鲁士吞并(1866年)后于1867年获得的4800万帝国马克的补偿金。由于格奥尔格五世继续从事反普鲁士的活动,补偿金于1868年交由普鲁士的一个委员会托管。俾斯麦把这一不受议会监管的基金的巨额利息用于监控和防范所谓韦耳夫派(见注104)的反普鲁士活动,并用于支持和收买一些亲普鲁士政府的报刊和文人。1869年1月,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把韦耳夫派代理人称为“爬虫”,韦耳夫基金因此又被称为爬虫基金。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以及《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爬虫基金”一词指政府对报刊的贿赂和收买。——444。

- 398 “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是当时德国著名的惯用语,在当时的一些讽刺诗中常见到这一表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经常把德意志帝国称为“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的帝国”。

“贞洁的日耳曼尼亚”也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用语,它出自下面的事件:1877年3月22日,艾希斯费尔德的新教教士们为庆祝威廉一世八十寿辰举行了酒会并在酒会后聚众闹事。德国天主教杂志《日耳曼尼亚》报道了此事,随后4月15日柏林《前进报》第44号以《敬畏上帝和虔诚信教》为题转载了《日耳曼尼亚》的报道。——444。

- 399 在1893年1月26—28日的议会会议中,议员们就银行弊案对内阁官员进行了质询。有少数议员要求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确定银行弊案的责任人,但是在内阁首相乔·乔利蒂的建议下,多数议员决定将这一要求推

迟到三个月以后再讨论。——452。

- 400** 《1893年五一节致奥地利工人》是恩格斯应邀为维也纳的《工人报》和《人民代言者报》计划联合出版的五一节专刊而写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各国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服务于本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和任务。

这封信大约写于1893年1月30日至2月12日之间，具体日期不详，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为题，载于1893年4月中旬由工人报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的专刊《庆祝1893年五一节》。——454。

- 401** 在1892年5月1日和8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获得了10万张以上的选票，大约630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镇参议员，并在26个城市中占据了市镇参议会的多数。——454。

- 402** 指奥·查普卡1893年1月17日在奥地利帝国议会的有关言论。查普卡在回答议员质询时首次承认，地方当局很多限制工人结社权和集会权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把查普卡的这一承认称为奥地利议会里的“政治巴拿马”，将其同巴拿马丑闻（见注393）相提并论。——454。

- 403** 《致意大利读者》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卷第459页）

这篇序言写于1893年1月31日—2月1日，由屠拉梯翻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由蓬·贝蒂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新版。序言的法文原文首次发表于1958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年鉴》第1年卷。——456。

- 404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见注531)。——456。
- 405 《欧洲能否裁军?》是恩格斯应奥·倍倍尔的请求针对德意志帝国国会有关军事法草案(见注406)的讨论而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策略。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军队与其说用来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用来防御国内的敌人”(见本卷第463页)。工人政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废除这样的常备军,将军队从压迫的工具改造为“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见本卷第463页)。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德国通过改革军事训练方法和改良军队作风而不断缩短各兵种现役期的可行性,指出这样做不但可以在国内逐步减少常备军,而且还能引导其他各国以这种方式裁军,从而遏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使欧洲和平得到保障。这篇文章通过论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军队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论述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著作。
- 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写于1893年2月,作为社论分8篇连载于1893年3月1—5、7、9、10日柏林《前进报》第51—56、58和59号。3月28日恩格斯又为文章的单行本撰写了序言,单行本4月在纽伦堡出版。德国的多家报刊以及美国的德文报刊《纽约人民报》对文章进行了转载。——461。
- 406 1892年11月,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一个军事法草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增加8万人以上,原则上保留宪法规定的3年兵役义务以有利于增兵,但将现役期限缩短到2年(骑兵例外),追加军事拨款。草案从1893年1月11日起在国会军事委员会开始审议,4月24日被该委员会否决,5月6日最终被国会否决。同日,国会解散。6月,国会进行新的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提交新国会讨论,于7月15日以201对185票获得通过。——463、495、679、690。
- 407 普鲁士在1813年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后来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延续了这种制度。根据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11月的兵役法,凡年

满 20 岁的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兵役分为 3 年现役、4 年预备役和 5 年后备役。预备军是常备军的组成部分,炮兵后备军在战时编入常规军。

普鲁士后备军在 1813 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独立的民兵组建,1814 年成为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备军由服满现役和预备役的应征人员组成,和平时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战时才编入军队。后备军分两类,第一类后备军战时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用来担任警备勤务。1867 年北德意志联邦兵役法取消了第二类后备军,1888 年德意志帝国又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465。

**408** 欧洲的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预先免除了某些阶层和职业等的兵役义务,此外还有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465。

**409** 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分别于 1868、1872、1874 和 1875 年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关于俄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见注 8。——465。

**410** 法国的地方部队组建于普法战争期间,从 1872 年起成为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其职责是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地方部队由常备军及其预备军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组成,服役期为 6 年(1892 年以前为 9 年),此后还要在地方部队的预备军服役 6 年。

非常国民军在 1813—1814 年后成为普鲁士军事组织的一部分,后来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中继续存在。1875 年德意志帝国对非常国民军进行了部分调整,所有未在陆军(包括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或海军服役、年满 17 周岁到 42 周岁的应征人员都成为非常国民军成员,他们只有在受到外敌入侵、国家进入危急状态时才被征召。恩格斯这里说德国“恢复了非常国民军”,可能是鉴于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中没有征召非常国民军这一情况。——466。

**411** 法兰西狂暴指法国士兵在第一轮进攻时的猛烈冲锋。这一用语是 1515 年法国军队在马里尼亚诺(今梅莱尼亚诺)取胜后从意大利人中开始流行起来的。——468。

**412** 沃尔特(阿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 1870 年

8月6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 214。

在 1870 年 8 月 6 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佛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做福尔巴克会战。——468。

**413** 指由格·夏恩霍斯特创立、在 1808—1813 年实行的预备军制度。这里所谓的预备军既包括新征召来代替归休士兵、在军队内接受短期训练的士兵,又包括在服役较长时间后由新兵替换、离开现役的士兵。通过这一制度,普鲁士实际上规避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 36)将普鲁士军队限制在 42 000 人以下的有关规定。——469。

**414** 指 1892 年 12 月 13 日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军队;补充兵的服役期在 1874 年规定为 12 年。——469。

**415**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在 1866 年奥普战争(见注 72)中站在奥地利一边。1867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施塔特与普鲁士签订和约,采用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一部分领土加入北德意志联邦。——469。

**416** 恩格斯这里暗指 1893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帝国国会有关“未来国家”问题的辩论。辩论由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引发,他们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称其政治目标不能成立、无法实现。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一辩论以《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可参看他 1893 年 2 月 9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470。

**417** 1841 年 10 月 1 日至 1842 年 9 月 30 日,恩格斯作为一年制志愿兵(见注 419)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库普弗格拉本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472、647、652、703。

**418** 恩格斯从 1849 年起被迫离开普鲁士流亡英国。1860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恩格斯因父亲逝世而首次回到家乡巴门。——474。

**419** 一年制志愿兵制度自 1813 年即存在于普鲁士,后来在德国广泛实行。这种志愿兵只需服役一年,但是对于应征者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并要求自行

承担伙食和军备等的费用。——478。

- 420 劳动组合是沙皇俄国的小生产者为了共同的商业目的而采取的合作生产形式,常见于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渔业等。——481。
- 421 见本卷第 327—346 页。——485。
- 422 指废除农奴制(见注 303)之前的普鲁士。——488。
- 423 恩格斯这里可能指 1893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哦,军旅生活多么引人入胜!“暑假之家”纪实》对德国军队中自杀人数的统计。小册子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从 1883 到 1892 年,德国军队(不含巴伐利亚)平均每年约有 235 人自杀。——489。
- 424 指普鲁士军队在耶拿的战败,见注 36。——490。
- 425 三国同盟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而结成的军事政治联盟。1879 年德奥首先缔结军事同盟,1882 年意大利加入后,三国同盟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最初订为五年,后于 1887 年和 1891 年重新订立,并多次自动延长。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阵营,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意大利在 1902 年与法国签订了秘密条约,战争爆发时意大利宣布中立,此后又退出同盟并于 1915 年投入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协约国集团。——491。
- 426 北石勒苏益格在 1864 年德意志与丹麦的战争结束后归奥地利和普鲁士所有,但这一地区的哈德斯莱本、松德堡和阿彭罗德的居民主要是丹麦人。1866 年的布拉格和约(见注 72)第五条规定,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让给普鲁士,北石勒苏益格在全民投票同意的情况下重新并入丹麦。但普鲁士没有履行第五条规定的义务,1878 年在征得奥方同意后废除了这一条款。——492。
- 427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在普鲁士占有的原波兰领土上推行了一系列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加速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1872 年 3 月 11 日的教学监督法允许普鲁士官员对波兰神职人员以及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1872 年 10 月 26 日的王室法令以及 1873 年 10 月 27 日由波森省颁布的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森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学用语,波兰语作为教学用语几乎完全被禁止。——492。

- 428 普法战争时期,巴黎从1870年9月19日起至1871年1月28日投降止一直被德军围困,这导致巴黎城内食物严重短缺。——494。
- 429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是恩格斯应《萨克森工人报》编辑格·格拉德瑙尔的邀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节专刊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介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最新发展。  
这篇文章发表在1893年4月底在柏林出版的《五一节》专刊,发表时标注的写作日期为1893年3月13日。文章的草稿保存了下来,与发表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495。
- 430 指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1893年2月20日在下院提出的选民登记法修正草案和关于议员支薪的法律草案。选民登记法修正草案规定每个选民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可以在多个选区投票(按其住宅所在地、财产所在地等)。——496。
- 431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是恩格斯应邀为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五一节专刊而写的文章。恩格斯称赞波希米亚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指出“工人阶级就其内在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见本卷第498页)。  
文章写于1893年4月8日,原文是德文,由约·克拉普卡翻译成捷克文发表在1893年4月底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年五一节》,并被译回德文在1893年5月12日维也纳《工人报》第19号上转载。恩格斯的原文首次发表在《阿德勒文集》1922年维也纳版第1卷《维克多·阿德勒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498。
- 432 马克思于1848年8月27日至9月7日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到访维也纳,目的是加强同奥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促使他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希望筹集到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所需的经费。——498。
- 433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是恩格斯应邀于1893年4月13日为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的五一节专刊写的文章。文章由帕·伊格列西亚斯译为西班牙文,发表在1893年5月1日《社会主义者报》第373号(五一节专号)。法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499。
- 434 1808年5月2日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抗拿破仑法国对西班牙的统治。

起义虽然遭到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拉开了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的序幕。此后这一天成为西班牙人民纪念为祖国解放而牺牲的战士的日子。——499。

- 435** 《尽管如此》是恩格斯应邀于1893年4月14日写给法国工人的五一节贺信,发表在1893年4月23日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第135号(五一节号),标题可能是茹·盖得所加。这封信有2份手稿保存了下来,手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01。
- 436** 法国众议院的选举于1893年8月20日至9月3日举行,社会主义者阵营共获得约59万张选票,比1889年多42万张选票,并有50人当选为议员。——501、579、695。
- 437** 德意志帝国国会解散后(见注406),1893年6月15日和24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1 786 738张选票和44个席位,比1890年多出近36万张选票和9个席位。  
在柏林地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51 122张选票和2个席位,在第二轮投票中又赢得3个席位。——501、683、687、695、703。
- 438** 恩格斯预计英国可能提前进行的选举没有发生。英国下院直到1895年7月议会任期结束后才进行新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社会主义派别没有人当选。——501。
- 439** 比利时工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1890—1893年,由于民主力量的广泛参与,这一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1893年4月12日比利时众议院拒绝了实施普选权的提案,比利时工人党遂于4月13日号召进行总罢工,得到广泛响应。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比利时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按照这一法律,比利时年满25岁、居住期限满1年的男性获得选举权。该法律还规定了所谓多次投票制,即某些选民依其财产及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可以享有2张甚至3张选票。——501、637、681。
- 440** 法国众议院设在巴黎的波旁王宫。——502。
- 441**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是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1893年5月在塞夫利耶沃出版)后写给编辑部的感谢信。

恩格斯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看到“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见本卷第 503 页)的喜悦之情。

这封信写于 1893 年 6 月 9 日,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第 3 期,发表时的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信后附有编辑部长达 3 页的评述。这封信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 1953 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503。

- 442 1893 年 5 月在塞夫利耶沃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2 期刊载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并刊印了俄国劳动解放社最新出版的作品的具体书目。——504。

- 443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法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弗·恩格斯 1893 年 8 月 12 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以及《弗·恩格斯 1893 年 9 月 22 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是恩格斯最后一次在欧洲大陆旅行途中给社会主义报刊编辑部的信以及在社会主义者集会上的演说记录。

1893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作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隆,然后同奥·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此后又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看望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 8 月 12 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 353)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分别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他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于 9 月 9 日到达维也纳,9 月 11 日出席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有 600 多人参加而且想向他致敬的人还有很多。社会民主党又在 9 月 14 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有 2 000 多人参加,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9 月 15 日,恩格斯离开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于 9 月 16 日到达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22 日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有 4 000 多人参加,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恩格斯于 9 月 28 日

离开柏林,经鹿特丹返回伦敦。

《致捷克社会主义工人。致布拉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是恩格斯途经布拉格时因未能应邀访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写的一封致歉信。这封信大约写于1893年9月18日,首次以捷克文发表在1981年3月24日《红色权利报》(布拉格),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1981年捷克《新思想》杂志(布拉格)第4期。

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沙·维·雅克拉尔在他关于这次大会的第三篇报道的结尾处转述的恩格斯的法文闭幕词,发表在1893年8月15日《正义报》(巴黎)第4962号,并在1893年9月《社会主义评论》(巴黎)第105期转载,还被译为英文和保加利亚文分别发表在1893年8月27日《人民报》(纽约)第22号和1893年12月《日子》(索非亚)第12期;另一个是1893年8月15日《前进报》(柏林)第190号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中转述的恩格斯的德文闭幕词,曾在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的很多德文报刊转载,并被译成保加利亚文、意大利文、波兰文、瑞典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在相关国家的报刊发表。恩格斯的英文闭幕词没有留下较为完整的记录。《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1894年苏黎世版)收入了一个对恩格斯英文、法文和德文闭幕词进行了综合的文本,这个版本与《前进报》版本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弗·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是恩格斯在苏黎世大会闭幕当晚与3位捷克代表会面时的谈话记录,摘自参与会面的约·施泰勒发表在1893年8月19日《人民之声》(比尔森)第15号的关于苏黎世大会的报道。

《弗·恩格斯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自1893年9月22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第38号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报道的作者很可能是维·阿德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很多社会主义报刊甚至资产阶级报刊在关于恩格斯在这个城市的活动的报道中全文或部分转述了恩格斯演说内容,如1893年9月15日《新自由报》(维也纳)第10440号一篇题为《恩格斯和倍倍尔在维也纳的群众大会上》的报道就转述了恩格斯的演说全文,9月17日《前进报》(柏林)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演说的意大利文译文和罗马尼亚文译文分别刊登在

9月23—24日《阶级斗争》(米兰)第38号和9月19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第30号。恩格斯去世后,奥地利、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几家工人报刊再次刊登了这篇演说。《新自由报》的版本与《工人报》的版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

《弗·恩格斯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自1893年9月26日《前进报》(柏林)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10月6日《工人报》(维也纳)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4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第35号刊登了演说的罗马尼亚文译文。——505、694、696、699、700、703。

- 444** 1893年9月12日,奥地利当局以之前的青年游行示威为由宣布在布拉格及周边实行紧急状态。——505。
- 445**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是恩格斯的一封回电。1893年10月22日,根据奥·倍倍尔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向恩格斯发了一封电报致意,电文如下:“来到德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城市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和敬意。代表大会主席团。”恩格斯于10月23日回电,次日电文由保·辛格尔在大会上宣读。这封贺电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莱茵河畔科隆代表大会记录。1893年10月22—28日》1893年柏林版。——506。
- 446** 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于1893年10月22—28日召开,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它的支持的问题以及庆祝1894年五一节的问题,大会还讨论了奥·倍倍尔题为《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告。——506。
- 447**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对该协会(见注183)祝贺他73岁生日的来信的答谢,写于1893年12月1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第1版第29卷,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德文版第22卷。——507。
- 448**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写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希望从大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

产阶级”，希望他们在未来的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各种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 508 页）。

这封信写于 1893 年 12 月 19 日，曾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同月在法国卡昂一份大学生和高中生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发表（见让·龙格 1893 年 12 月 3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不过，这份报纸现在已经找不到了）；1894 年巴黎的法文杂志《新纪元》第 2 卷（3 月号）以《恩格斯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了这封信；同年 3 月 25 日—4 月 10 日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 8 号也刊载了这封信。这封信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发表：1893 年 12 月 31 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刊载了信的罗马尼亚译文；1894 年 2 月 18 日柏林《前进报》在有关大会的报道中发表了信的德译文；1894 年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民主党杂志《日子》（索非亚）第 4/5 期发表了信的保加利亚译文。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 22—25 日在日内瓦举行，这是继 1891 年布鲁塞尔大会后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 26 人。代表大会探讨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508。

- 449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见注 460）中收入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所写的前言。前言简要介绍了 1873 年的西班牙起义，以使人们了解该文的历史背景。

这篇前言大约写于 1893 年 11 月底至 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载于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并被翻译成波兰文发表在 1893 年伦敦《黎明》杂志第 12 期（1894 年 1 月出版）。——509。

- 450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企图恢复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力的反动集团，从 19 世纪

30年代起支持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后来又支持他的后裔,由此得名。它所依靠的主要是军阀、天主教僧侣和一部分地主。——509。

- 451 1868—1874年西班牙第五次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国王于1873年2月退位,议会宣布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73年7月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激进的联邦共和派,即所谓的“不妥协派”发动了武装起义,反对由共和派左翼领导的政府,主张把全国划分为许多小的自治州,因而这次起义也被称为自治州起义。起义主要发生在西班牙境内靠近地中海的地区。起义者夺取了许多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成立了独立的州政府。在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占绝对优势的巴枯宁派参加了几乎所有在起义中成立的州政府。——509。
- 452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见注65)命运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跋中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想法,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518—519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对这些国家给予积极支持。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指出:“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526页)在这种条件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

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 527 页)。在这篇跋中,恩格斯不仅回顾和介绍了自己在 1875 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而且还详细引述了马克思在 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判断,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预测,并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充分体现了他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这篇跋大约写于 1893 年 10 月中—1894 年 1 月 3 日之间,是恩格斯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参看注 460)时专门写的。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 528—531 页)中,恩格斯说明了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跋的原因。1894 年这篇跋同论文集的其他文章一起译成波兰文连载于伦敦《黎明》杂志。同年这篇跋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一起,由俄国劳动解放社的维·查苏利奇翻译、格·瓦·普列汉诺夫校订,作为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在日内瓦出版,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言。——511。

- 453** 指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 1874 年度〈人民国家报〉第 117 和 118 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1874 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8—98 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就是对特卡乔夫的答复。——511。
- 454**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三封信是他在 1854 年 1—2 月写的,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该杂志 1854 年第 3 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这段话转引自 1885 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 9 页。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512。
- 455** 这段引文出自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这篇文

章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5 期上。下面一段引文出自他的另一篇文章《评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在 1857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 7 期上。两篇文章均被收入 1879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 5 卷，总标题是《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 16—17 页上，下面那段引文在第 15 页上。——515。

456 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雅典氏族解体过程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第 132—137 页。——521。

457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是在该杂志 1877 年 10 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认为，当时马克思“写了这篇答辩文章，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恩格斯 1884 年 3 月 6 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恩格斯将这封信抄写了几个副本，并把其中一个副本附在 1884 年 3 月 6 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这封信曾在 1886 年《民意导报》杂志(日内瓦)第 5 期上发表，后来又由尼·丹尼尔逊译成俄文于 1888 年 10 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莫斯科)杂志上发表。——521。

458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以及民意党的领导机关。

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 年秋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 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该社的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村公社。他们在纲领中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农村公社完全自治等等。1879 年 8 月，土地和自由社分裂

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提出广泛的民主改革要求。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领导机关还宣称以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于1881年3月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下,民意党在1884年以后就瓦解了。——523。

- 459 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写的这篇序言中,恩格斯介绍了收入文集的各篇著作的内容,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见本卷第529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见本卷第530页)。

这篇序言写于1894年1月3日,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528。

- 460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有意将他在1871—1875年间为柏林《人民国家报》写的一些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结集出版,并与出版者海·施留特等人初步商定了小册子的篇目,但是该意图一直没有实现。大约在1893年10月中旬,恩格斯重新开始了小册子的有关工作。他通读了准备收入小册子的各篇文章,对其中的一些文章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就俄国有关问题研究了新的文献和材料,在此基础上他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撰写了跋(见本卷第511—527页)。另外他还为收入小册子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撰写了前言(见本卷第509—510页)。1894年这一论文集由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528。

- 461 马克思1860年出版了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文第2版第19卷)。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是对马克思这一著作的补充。——528。
- 462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发表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此后不久便印成单行本于1874年在莱比锡出版,标题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528。
- 463 指《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人的声明》是恩格斯在1894年将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的。——528。
- 464 指《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1894年将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的。——529。
- 465 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当选的布朗基主义者有爱·瓦扬、博丹、茹·绍维埃尔和瓦尔特。——529。
- 466 迫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压力,法国于1880年7月11日颁布了一项赦免巴黎公社成员的法律,使许多被流放的和流亡的公社成员得以返回祖国。——529。
- 467 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该派原领袖莱·甘必大宣称,只应在有利的时机实行有利的改革,故该派有“机会主义派”之称。——529。
- 468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载于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此后又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印成单行本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为单行本写了导言。恩格斯将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530。
- 469 《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是恩格斯在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即第三

册)前四篇的付印稿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说明了《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二卷的关系,扼要介绍了第三卷的主要内容,指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册”(见本卷第532页)。

这篇文章写于1894年1月8日或9日,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3—1894年第12年卷第1册第16期,并在1894年1月26日维也纳《工人报》第8号转载。——532。

- 470**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是恩格斯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论述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著作。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状况,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见本卷第536页)。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持这个伟大目标,把每一个进步的或革命的运动看做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步;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时要保持独立性,同时把农民看做“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见本卷第535页)。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一般策略虽然是正确的,但怎样把它运用于意大利,“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见本卷第539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安·米·库利绍娃和菲·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致信恩格斯,请他谈谈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在国内酝酿革命的形势下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26日用法文写成,经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并以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书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3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2月11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安科纳)第6号对其进行了转载。这篇文章的罗马尼亚文译文发表在1894年2月6日布加勒斯特《劳动报》第50号;德译文首先发表在1894年4月29日《纽约人民报周刊》第17期,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为标题刊登在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柏林)1894年7月12日第24号。1894年7月20日科隆《莱茵报》第127号刊登了可能由恩格斯

在前述德译文基础上校订过的新的德译文。这篇文章的草稿首次用法文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柏林版,文章的誊清稿首次用法文原文发表于1958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年鉴》第1年卷。草稿和恩格斯校阅过的德译文相较于誊清稿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34。

471 这里可能指1892年底到1893年初意大利的罗马银行弊案,恩格斯对此案的评述见本卷第444—453页。——534。

472 重新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步调一致。——536。

473 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罗兰、斐·弗洛孔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这三个《改革报》派代表以及机械工阿尔伯也进入政府。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538。

474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恩格斯为1894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23周年的集会而发的贺电。电文在集会上宣读,后来发表在1894年3月25日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第183号。——540。

475 在《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了争取普选权对于奥地利工人阶级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未能应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的贺信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宣读。

这封信写于1894年3月22日,首次发表在1894年3月27日莱比锡《选民报》第69号(发表时删去了第一段话),《土瓦本哨兵》、《汉堡回声报》等十多家德国报纸进行了转载。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全文收录了这封贺信。——541。

476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3月25—31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

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每年继续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541。

- 477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对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德文报纸《工人新闻》的编辑弗·赖施邀请他参加大会的来信的回复。赖施的来信写于1894年4月30日,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恩格斯5月15日才撰写复信,信寄到时该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因此信未能在大会上宣读。

这封信首次发表在1894年5月18日《工人新闻》(布达佩斯)第20号,同日其匈牙利译文发表在该党机关报《人民言论》(布达佩斯)第22号。1894年5月22日柏林《前进报》第115号、5月26日科隆《莱茵报》以及6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132号在有关的报道中转载了这封贺信。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草稿与《工人新闻》上的文本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43。

- 478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于1894年5月13—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391)分裂后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并决定将在布达佩斯出版的两家党报《工人新闻》和《工人》合并成一家德语机关报《人民呼声报》。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543。

- 479 指1894年4月22日的霍德梅泽瓦沙海伊事件。霍德梅泽瓦沙海伊及其临近地区的农业工人和小农长期遭受失业痛苦,处境极其艰难。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积极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宣传呼吁,并组织了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会员达2000人。1894年4月21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合会的宣传品,4月22日又逮捕了联合会领导人亚·散托-科瓦奇。上万名农业工人因此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科瓦奇,但是遭到警察和军队的开枪镇压,1人死亡,30多人受伤。此后联合会被解散,散托-科瓦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多年徒刑。——544。

- 480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和阐述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基督

教的演变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根据对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启示录》的分析,说明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属于社会底层的受苦受难的人,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只能在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恩格斯指出,基督教作为诱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必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这个世界宗教在产生 300 年之后便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恩格斯把原始基督教同现代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在产生时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原始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要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两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基督教诱使人们在天国中寻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斗争在现实世界中、在社会改造中实现解放。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对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感兴趣,他在 1841—1842 年间留下 3 本关于这个问题的笔记,包括他旁听柏林大学教授斐·贝纳里关于《约翰启示录》的讲座的课堂笔记、关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一书的札记以及关于埃·吕策尔贝格尔《对有关使徒约翰及约翰书的教会传统的荒谬性的考证》一文的札记。80 年代,恩格斯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 年)以及《启示录》(1883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和第 28 卷)等文章。晚年的恩格斯没有放弃他的这一研究。1890 年 8 月,他曾答应卡·考茨基,为《新时代》杂志撰写一篇有关原始基督教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1892 年夏,恩格斯一边养病,一边阅读了厄·勒南的著作和圣经。1894 年夏,他深入研究了早期基督教历史方面的若干新材料,并充分利用他过去有关这个问题的笔记、文章和参考文献,于 1894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16 日之间写下这篇文章。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2 期。1894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18 日《纽约人民报周刊》第 42—46 期对本文进行了连载。文章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成法文,发表在 1895 年 4、5 月《社会发展》杂志第 1、2 期。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 1929 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由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545。

- 481 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恩格斯和卡·考茨基1886年底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中对门格尔进行了批判。——547。
- 482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548、571。
- 483 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遭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881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于1883—1884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统一的马赫迪国家。1899年,英国殖民军趁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事和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征服了苏丹。——548。
- 484 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同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该派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扬·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该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4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548。
- 485 厄·勒南在《基督教起源史》(1866年纽约版第2卷第132页)中写道:“这种建立组织的努力表现出与最近的一些乌托邦实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基督教共产主义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主义则不然。”马克思在《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恩格斯在《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中都提到过勒南的这一观点。——549。
- 486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文字,可能不是安·肖特的译文,而是奥·保利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

13 卷第 1618—1620 页和 1622 页)。——550。

- 487 指威·魏特林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瑞士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见注 370)的支部。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一文中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551。
- 488 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 年日内瓦版第 VIII、IX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驳斥了库尔曼的“预言”。——551。
- 489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 1846 年和 1847 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 1841 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在政治上反映了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于 1847 年 3 月 30 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1859 年,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552。
- 490 蒂宾根学派即蒂宾根神学学派,是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裴·克·鲍尔创立的圣经研究学派,主要由一些自由派的新教神学家组成。该学派对早期基督教及其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并最早研究了《新约全书》的来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对圣经进行理性的评判时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指出圣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又力图把圣经中的某些说法作为历史的真实保留下来。但是事与愿违,这些从事研究的人竟使圣经的威信遭到了贬损。马克思在 1864 年 1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这一学派在荷兰的影响。——554。
- 491 布·鲍威尔对《新约》的考证,见他的下列著作:《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 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 年不伦瑞克版第 3 卷;《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0—1852 年柏林版第 1—4 卷;《使徒行传。保罗教义和犹太教在基督教会内部的调和》1850 年柏林版以及《保罗书信考证(分三个部分论述)》1850—1852 年柏林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

为符类福音作者。——554。

- 492**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埃及在希腊化时期和后来的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公元642年)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各种学术思潮的总称。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是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各种学派的聚集地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科学、文学和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述转向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深入研究,各种专门学科,如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都有长足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该派将古犹太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对犹太教及以后的基督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该派认为神灵的启示是最高的知识源泉,对圣经进行比喻性诠释,与侧重从字面和历史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安提阿学派相对。其主要代表是犹太学者斐洛·尤迪厄斯。斐洛不是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称他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1页)。斐洛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欧利根和普罗提诺。——555、575。

- 493** 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而得名(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ά,音“斯多亚”)。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555。

- 494**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方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来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557、570。

- 495** 诺斯替教派是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1—2世纪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犹太教、各种多神教以及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等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即通过神的起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将诺斯替教斥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557。
- 496** 《西维拉占语集》是根据古代周游四方的“女预言家”西维拉的占语编辑而成的。据传说西维拉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557。
- 497**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基督教会第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于325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了教会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由皇帝任免。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558。
- 498** 圣西门主义者的“肉体复权”主张与基督教教会的禁欲要求和彼岸观念相对立,要求实现现世的幸福,其中就包含以男女两性平等为基础的“需要的复权和肉体的愉悦”。——563。
- 499** 斐·贝纳里《对〈启示录〉第13章第18节中数字666(χξς)及其变体616(χις)的解释》,载于柏林《思辨神学杂志》1836年第1年卷第2册第205—206页。
- 恩格斯1841年9月至1842年8月在柏林服兵役时常去柏林大学听课,他在1841—1842学年的夏季学期旁听了柏林大学教授斐·贝纳里关于圣经研读的课程并作了课堂笔记。恩格斯在《启示录》一文中曾指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应归功于1841年贝纳里在柏林大学讲授的课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3页)。——570、572。

- 500** 塔木德是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释义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571。
- 501** 曾德—阿维斯陀是 18—19 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准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 9 世纪直到公元 3—4 世纪。——573。
- 502** 指公元前 6 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称“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 597 年攻占耶路撒冷以及公元前 586 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迫使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移居巴比伦。公元前 6 世纪 30 年代，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573。
- 503** 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3 章第 20 节，这里的推雅推喇人应为老底嘉人。《启示录》第 2 章第 18—29 节提到推雅推喇人，但与圣餐礼无关。——574。
- 504**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13 世纪的手稿，1643 年为冰岛主教斯维因松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 13 世纪初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图鲁逊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575。
- 505** 《致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是恩格斯应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帕·伊格列西亚斯的请求，就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一事，给英国 6 个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信的草稿。  
草稿大约写于 1894 年 8 月 6 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英文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0 年英文版第 27 卷。  
恩格斯寄给这 6 个组织的信中只有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保存下来，与草稿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77。

- 506** 1894年8月29—31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34个地方组织的29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对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党的报刊问题并批准了新党章。——577。
- 507** 1893年9月4—9日在贝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26届年度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承认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577。
- 508** 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英国政党。当时罢工斗争活跃,争取实行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深入开展。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以及受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该党的领袖是詹·基·哈第,其纲领包括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人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合作。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英国工党。——578、677。
- 509** 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他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办法即地方经济公有化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578、689。
- 510**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恩格斯对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书记卡·德拉瓦勒邀请他参加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来信的回复。代表大会原定于1894年9月7—9日在伊莫拉举行,但是由于警察当局1894年8月底颁发的禁令,大会未能如期召开(大会后来于1895年

1月在帕尔马秘密召开),恩格斯9月6日写信时显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恩格斯的贺信以及代表大会收到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贺信,在1894年9月10日该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贺信(删除了第一段)用意大利文首次发表于1894年9月22—23日《阶级斗争》周报(米兰)第38号。信的法文草稿(全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人通信集(1848—1895)》1964年米兰版。意大利文译文与法文原文之间的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79。

**511** 意大利社会党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从1893年起称为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为菲·屠拉梯等。该党坚决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主张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政治斗争。在九十年代该党虽然存在改良主义倾向,但还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579、584。

**512** 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了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意图推翻现存秩序的结社和集会活动,表面上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但实际上被当局用于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不久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止出版,许多劳动社会党党员和工人组织成员被逮捕、搜查和审讯。——579、584。

**513**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对西西里岛社会党活动家弗·科耳纳哥1894年9月18日来信的回复。科耳纳哥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尽管面临残酷迫害,西西里岛社会党将进行改组,并有望在1894年10月恢复出版因为西西里实施紧急状态而停刊的《社会正义》。科耳纳哥写道:“您,我们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句表示鼓励和赞同的话。您能不能给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1号上发表。您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于1894年9月26日写好这封信,但《社会正义》一直未能重新出版,信的意大利译文直到1895年6月30日才在《社会正义》的后继者《解放》周报(巴勒莫)上发表。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去世后,这封贺信被当作“恩格斯写给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被多家德国报纸翻译转载。1895年8月16日意大利《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16期也再次发表了这封贺信的意大利译文,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的话》。这封

信的法文草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意大利人通信集(1848—1895)》1964年米兰版。意大利文译文与法文原文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81。

- 514**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和《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为积极支持工人政党办报而留下的两篇文献。

1894年夏,恩格斯从维·阿德勒的信中得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准备把它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由周报改为日报,他对此表示支持并积极为之筹款。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提供了大量其他帮助。他把自己在狄茨出版社出版著作的稿费通过阿德勒捐给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还邀请其他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撰稿,他本人也在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是恩格斯在争取到伦敦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同意提供一笔约5 000佛罗伦的借款后草拟的借款条件。恩格斯在1894年12月14日给阿德勒的信中曾扼要介绍了借款条件的要点。借款条件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894年9月至10月初,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俄文第2版第50卷。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为该报从1895年1月1日起从周报改为日报而写的贺信。这封信写于1894年12月27日,恩格斯将它作为私人信件寄给阿德勒,委托他将该信作为贺信发表。贺信刊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维也纳)第1号。1895年1月10日《人民之友报》(布吕恩)第2号进行了转载。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下来,草稿与发表的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83、617。

- 515**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应《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屠拉梯的请求而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对意大利社会党人(见注511)的攻击,澄清了这些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指出意大利社会党人宣传阶级斗争并主张建立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见本卷第585页)

文章写于1894年10月27日,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米兰)第21期,发表时编辑部加的

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公开发表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最高领军人物寄给我们的这封信，以回击那些已经卖身投靠或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散布的愚蠢的谎言。”

这篇意大利译文很快被转译成多种语言发表。德译文发表于 1894 年 11 月 5 日《莱比锡人民报》第 30 号，并在 11 月 10 日《前进报》（柏林）第 263 号、11 月 10 日《人民哨兵报》（比勒费尔德）第 266 号转载；从这个德译文转译的丹麦文译文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14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哥本哈根）第 268 号；另外一个德译文首先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6 日《工人报》（维也纳）第 89 号，后为 11 月 21 日《纽约人民报》第 279 号转载；法译文发表在 11 月 10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212 号。

这篇文章的法文草稿和誊清稿保存下来。恩格斯去世后，屠拉梯曾在 1895 年 8 月 16 日《社会评论》第 16 期发表誊清稿前 11 行的影印件。誊清稿的法文全文首次发表于 1958 年在米兰出版的《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年鉴》第 1 年卷。意大利译文和草稿相较于誊清稿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584。

- 516**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是恩格斯为揭露格·福尔马尔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不实之词而作出的严正声明。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 517）上宣称恩格斯赞成法国工人党的南特纲领（见注 518），企图利用恩格斯的威望为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辩护，恩格斯因此写下这篇声明以及《法德农民问题》（见本卷第 589—613 页）一文予以驳斥。

这篇声明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 日，发表在 1894 年 11 月 16 日柏林《前进报》第 268 号，并在 11 月 18 日科隆《莱茵报》第 230 号、11 月 22 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3 号附刊以及 11 月 28 日《纽约人民报》第 285 号转载。《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记录。1894 年 10 月 21—27 日》（1894 年柏林版）在刊载福尔马尔的大会发言时，把恩格斯的声明作为脚注一起登出。——587。

- 517**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 1894 年 10 月 21—27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土地问题。该问题的补充报告人、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格·福尔马尔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

民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和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福尔马尔虽然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来说,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 1895 年五一节等问题。——587。

- 518**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894 年 9 月 14—16 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对 1892 年马赛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见注 521)进行了补充,这份新的土地纲领又称南特纲领。南特纲领进一步发展了马赛土地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公开宣称工人党应维护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等。恩格斯对南特纲领的批判参看他的《法德农民问题》(见本卷第 589—613 页)。——587、597。
- 519** 1894 年 11 月 4 日,与中央党(见注 97)关系密切的德国西部主要的天主教报纸《科隆人民报》第 656 号发表《〈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土地问题》一文,利用福尔马尔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言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诬蔑,文中也提到福尔马尔所援引的所谓恩格斯的话。1894 年 11 月 10 日《前进报》第 263 号发表《再谈党代表大会》一文对其进行了回击。——587。
- 520**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论述农民问题的一篇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法德等国工人政党内部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恩格斯高度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 591、592 页)。恩格斯对农村中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指出: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

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 606 页)对于有雇工剥削行为的大农和中农,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暴力的剥夺,而要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逐步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则实行剥夺,把他们的大地产转交给已经在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至于这种剥夺是否要以赎买的形式来进行,这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态度。恩格斯还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领袖格·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参看注 517)。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背景。随着欧洲一些工人政党更加深入地参加议会斗争,如何进一步争取农民的支持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90 年代初,德、法、奥、意等国工人政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日益尖锐化。法国工人党 1894 年通过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南特纲领(见注 518),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 517)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模糊认识。维·阿德勒、卡·考茨基等人纷纷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自己有必要“就农民问题发表更全面的意见”(见恩格斯 1894 年 11 月 12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这篇文章写于 1894 年 11 月 12—29 日,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特)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10 期,并在《纽约人民报周刊》1894 年 12 月 30 日第 55 期和 1895 年 1 月 6 日第 1 期转载。文章的波兰文译本以《农民问题》为标题发表在《黎明》杂志(伦敦)1894 年第 12 期,保加利亚文译本发表在索非亚的《日子》杂志 1895 年第 10/11 期。由于法国工人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一些领导人的抵制,文章的法译文和意大利译文在恩格斯生前未能发表,但是 1895 年 1 月 26/27 日《阶级斗争》(米兰)第 4 期发表了一篇较为详细地介绍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摘要。恩格斯去世后不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5 年 10 月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代表

大会之前,《前进报》在 1895 年 8 月 29 日、30 日和 9 月 1 日的第 201、202 和 204 号将这篇文章分三期重印。

1928 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这篇著作的中译本,译者是陆一远,书名为《农民问题》;1951 年 8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毛岸英翻译的《法德农民问题》单行本。——589。

- 521** 1892 年 9 月 24—28 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农村工作、党的现状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 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进一步高涨,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法国工人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存在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甚至对富裕的剥削阶层的利益作了某些让步。在 1894 年 9 月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影响的错误更加严重。——595、673。
- 522** 1894 年 4 月 7 日,汉·卡尼茨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由国家垄断谷物的进口并规定进口谷物的最低出售价格。这个提案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1894 年 7 月 14 日以 159 票对 46 票被否决。
- 在此之前,1894 年 2 月,加入法国工人党不久的让·饶勒斯在法国众议院提出了类似的提案。恩格斯在 1894 年 3 月 6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批评了饶勒斯的提案。——600。
- 523** 恩格斯这里可能指丹麦社会主义活动家路·皮奥在《关于我们的农业状况》一文中提出的通过合作社组织农业生产的思想,文章匿名发表在 1871 年 11 月 4 日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第 17 号。恩格斯在 1872 年 3 月中旬给皮奥的信中对文章给予很高评价,并积极帮助传播这篇文章。——607。
- 524** 1895 年在塞纳河畔罗米伊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对南特纲领进行修订。——610。
- 525** 农民同盟 1893 年在反对德国卡普里维政府关税政策的运动中成立。同盟由大农尤其是普鲁士容克主导,但也争取到了一些中等农民,到 1894

年已有 20 万成员,此后小农在同盟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盟的要求包括对农产品实行高关税保护、提高谷物价格、对农业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等。同盟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在选举中支持各保守政党或反犹太主义政党。——611。

- 526** 从 1894 年秋起,以普鲁士首相博·欧伦堡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开始鼓动制订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93)。帝国首相卡莱·普里维因拒绝这一计划而被皇帝解职。新首相克·霍亨洛埃-席林菲尔斯特受皇帝委托,于 1894 年 12 月 4 日向帝国国会提交了所谓的反颠覆法草案。草案对刑法作了补充和修订,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 年 5 月 11 日该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613、639。

- 527**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册》是恩格斯为纠正《前进报》关于《资本论》第四卷(即第四册)因为缺乏马克思手稿而无法出版的错误说法而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文中再一次谈到将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计划。不过,这一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写于 1894 年 11 月 15—22 日之间,匿名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4—1895 年第 13 年卷第 1 册第 9 期,发表时卡·考茨基给它加了一个标题:《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614。

- 52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恩格斯对该协会(见注 183)祝贺他 74 岁生日的贺信的答谢。这封信写于 1894 年 12 月 6 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616。

- 529**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自 1893 年 10 月以来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617。

- 530**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

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本卷第 622 页)恩格斯认为这一公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导言中,恩格斯详细具体地分析了 1848 年以来欧洲的经济状况,指出:在 1848 年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因此,1848 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符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的斗争策略。他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恩格斯号召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同时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见本卷第 637 页)。

1895 年 1 月 30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费舍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马克思 1850 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2、3 期上以《1848 年至 1849 年》为总标题发表的论述法国 1848 年革命的一组文章(共三篇)编成单行本出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恩格斯同意了 this 建议。他通读了校样,修正了一些错漏,又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第 5、6 两期合刊撰写的《时评。1850 年 5—10 月》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收录进来,并为单行本拟定了新的标题《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

恩格斯于 1895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6 日为单行本撰写了导言。1895 年 3 月 6 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见注 526)为由,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在 3 月 8 日的复信中表示,他尽可能考虑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严重担忧,接受他们的部分修改意见。同时,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受到一些损害,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他还告诫党的执行委员会不要在资

产阶级统治下的德国“立誓忠于绝对守法”，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1895年3月底4月初，载有这篇导言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在柏林出版。

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使恩格斯的观点遭到严重歪曲，似乎他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守法”。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气愤，在1895年4月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上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他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批评了《前进报》的这种做法，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随后《新时代》杂志1894—1895年第13卷第2册第27期和28期刊载了这篇导言。《新时代》大概以单行本所载导言的校样为底本刊载，因此《新时代》版保留了作者在单行本导言中所作的删改。

这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得到广泛传播，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文章还被译成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罗马尼亚文和法文等发表。

这篇文章的草稿和校样保存了下来。1924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中首次发表了校样中恩格斯应费舍要求修改和删除的文字。这些被删改文字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1924年10月31日维也纳《国际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通讯》第44期。这篇导言的草稿第一次全文发表在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30年莫斯科俄文版，草稿的德文原文首次发表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30年柏林德文版。本卷译文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章校样并参考草稿翻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单行本及《新时代》杂志所载版本中的删改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这篇《导言》的中译文曾收入1942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618。

- 531**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

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621。

- 532** 维也纳起义是指1848年3月13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起义。

关于米兰起义和柏林起义,见注404和注531。——624。

- 533** 指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见注212。——627。

- 534** 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见注72)中的胜利为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实现统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使俾斯麦以有利于普鲁士政府的方式解决了政府和议院之间长达数年的宪法冲突(见注247)。——628。

- 535** 小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628。

- 536**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预言出自他和马克思1870年8月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一封信。在这封应不伦瑞克委员会的请求而写的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所应采取的立场。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年9月5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引用了信的一部分,其中写道:“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629。

- 537** 西班牙共和国1873年宣布成立,普选权则在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1868年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1874年,西班牙共和国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630。

- 538 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以及阿·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开始同普鲁士人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决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选举。但是,当时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又存在意见分歧,这给国防政府造成可乘之机。它依靠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635。
- 539 恩格斯这里暗指普鲁士陆军大臣瓦·布·冯·谢伦多夫1895年1月10日在帝国国会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预言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冲突来临时将不敢走上街头。该发言刊登在1月11日《前进报》第9号有关国会的报道中。1895年5月11日,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中说明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谢伦多夫的发言之间的关系。——635。
- 540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636。
- 541 这里的贵族革命是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势力与贵族之间展开的长期斗争,这场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结束。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贵族以往享受的优待和特权得到确认,他们的一半地产享受免税待遇,他们应缴纳的商业和手工业税及其在国家开支中占有的份额被固定下来,贵族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637。
- 542 阿·冯·博古斯拉夫斯基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一书,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国内反对派,包括解散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加大对各类“不法行为”的惩罚,禁止各种社会主义的报刊等。——637。
- 543 暗指1866年普鲁士在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几个小邦的战争(参看注72)取得胜利后,兼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王国。——639。
- 544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是恩格斯因不能参加该协

会(见注 183)的活动而写给该协会理事会的致歉信。这封信写于 1895 年 3 月 11 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642。

**545**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是恩格斯因不能应邀参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会而写给英国独立工党(见注 508)执行委员会的致歉信。这封信写于 1895 年 4 月下半月,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 年俄文第 1 版第 29 卷。——643。

**546**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是伦敦《人民新闻报》1890 年 11 月 22 日第 38 号刊登的有关海伦·德穆特去世消息的一篇报道,文中援引了恩格斯 11 月 7 日在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部分内容,悼词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650。

**547** 《〈政治科学手册〉中的〈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条目》根据恩格斯提供的传记材料编写而成,这份传记材料大约完成于 1891 年 4 月下半月至 5 月初,遗憾的是没有保存下来。该条目刊登在《政治科学手册》1892 年耶拿版第 3 卷。

在恩格斯为该条目准备的材料中,有一份著作书单手稿保存了下来。这个书单大约写于 1891 年 4 月下半月至 5 月初,并在 1892 年作了少量增补。在书单第二页下方,恩格斯倒过来写有“我的不朽著作”等字样。手稿内容如下(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1)(与卡·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184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 年莱比锡版。1887 年纽约英文版。

(3)(与卡·马克思合著,未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 年伦敦版。有各种文字的译本。

(4)在《新莱茵报》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该报 1848 年 6 月 1 日—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出版。

(5)在《新莱茵报。评论》任编辑并曾代理马克思的主编职务,该杂志 1850 年在汉堡出版。

(6)《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 年汉堡版。

(7)《德国农民战争》,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根据[《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重印,[1850年]第1版,[1870年]第2版,1875年第3版。

(8)《论住宅问题》,三篇,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1872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第1版,1887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第2版。

(9)《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1875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版。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版。

(11)《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1874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版。

(1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根据《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重印,1878年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第1版,1886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第2版。

(1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1、2、3版均于1883年由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版)。

(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1886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第2版,第3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有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版,法文版在翻译中)。

(1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根据《新时代》重印,1888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

(4)(未署名)《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

(5)(未署名)《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贝伦德出版社版。

(16)《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1891年汉堡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引言:

(3)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序言,驳洛贝尔图斯)。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83年第3版和18[90]年第4版(驳路·布伦坦诺)。

(2)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序言(驳洛贝尔图斯),[18]85年。

(4)《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49年,根据[18]49年《新莱茵报》重印,1885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序言)。

(5)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重印本,1885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6)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根据1849年《新莱茵报》重印,[18]86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导言:威·沃尔弗的传记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7)西·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版(引言:西·波克罕的传记)。

(1)卡·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并由弗·恩格斯编辑,1887年伦敦桑南夏恩出版社版(校订译文并作序)。

(2)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于布鲁塞尔》,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8年波士顿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用德文载于《新时代》)。

(3)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1887年纽约洛雷尔出版社版(序言和附录。序言出版了单行本:《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用英文和德文在纽约出版,1887年伦敦里夫斯出版社重印,德文本还载于《新时代》[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1892年伦敦桑南夏恩出版社第2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写的)。

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0年5月(用俄文载于1890年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2册,用英文载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用法文载于《新思想》杂志,用罗马尼亚文载于1890年5—7月《现代人》杂志)。

(4)《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年伦敦英文版。”——652。

**548** 《伦敦的5月3日》是路·考茨基在恩格斯指导下撰写的关于伦敦工人1891年五一节集会的报道,发表在1891年5月15日维也纳《工人报》第20号。

1890年11月初恩格斯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去世,不久路·考茨基成

为新管家。她在帮助恩格斯料理家务的同时,还担任他的秘书,为他誊清稿件、记录口述内容、翻译文件等。不仅如此,路·考茨基还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开始为维也纳《工人报》撰写通讯,介绍英国的政治动态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前后共为《工人报》撰写了60余篇报道,这篇文章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能直接判断恩格斯指导和参与她写作的唯一一篇报道。

1891年5月3日,路·考茨基和恩格斯分别作为《工人报》和《新时代》的通讯员参加了伦敦的五一节集会。5月4日路·考茨基撰写了这篇文章,同一天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介绍了集会的情况。恩格斯给劳拉的信与本文在结构上类似,部分内容非常接近。恩格斯可能还通读了路·考茨基的报道并进行了一些增补(参看维·阿德勒1891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鉴于恩格斯对于这篇报道的指导和参与,本卷将其收入附录。——659。

**549** 署名路·考茨基的《反对斐迪南·吉勒斯的声明》是为帮助爱·艾威林驳斥斐·吉勒斯而写。

1891年8月22日,德国埃森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第23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散布严重损害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声誉的流言。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亨·海德门关系密切的吉勒斯被认为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或者消息来源,因此艾威林决定报复吉勒斯。1891年9月8日,在路·考茨基的见证下,在吉勒斯的家中发生了本声明所指的事件。随后艾威林在1891年9月11日柏林《前进报》第212号发表声明,宣布已经对造谣污蔑自己的吉勒斯实施了“肉体惩罚”。对此吉勒斯也以声明回应,表示他对艾威林也实施了肉体惩罚,同时否认自己是上述污蔑文章的作者。吉勒斯的声明被《前进报》拒绝,后发表在1891年9月17日《汉堡回声报》第218号。艾威林随即撰写反驳文章寄给《前进报》,但被拒绝发表。包含这篇声明的艾威林反驳文章后来发表在9月27日《汉堡回声报》第227号。

恩格斯历来坚决维护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声誉(参看本卷第307—308页,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606—607页)。由于吉勒斯散布的谣言涉及爱琳娜,他对此非常关注。鉴于《前进报》拒绝发表艾威林后来的反驳文章(其中包含这篇声明),恩格斯曾在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表示,声明是他亲自起草的。

由于只有声明的署名者路·考茨基是事件的见证人,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声明的写作难以确定,因此本卷将这篇声明收入附录。——664。

- 550 《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贺信》摘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1891年10月14—20日》1891年柏林版,其中概括性地转述了恩格斯大约写于1891年10月15日但没有保存下来的贺信的内容。恩格斯的贺信曾在代表大会10月17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宣读。——665。

- 551 《弗·恩格斯1892年4月1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是法国《闪电报》记者埃·马萨尔根据他与恩格斯的谈话而写的一篇报道。这次谈话是在恩格斯家中进行的。恩格斯在4月3日收到马萨尔的初稿后,对文章进行了大量修改。

这篇报道载于1892年4月6日《闪电报》(巴黎)第1227号。发表时编者将文章的标题从《可以保证的和平》改为《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主义者恩格斯的谈话》,给文章分节并加了小标题,还在文章前面加了按语。1892年4月16日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82号以《饥荒造成的和平》为题转载了这篇报道的大部分内容,4月26日《劳动报》(布加勒斯特)发表了《社会主义者报》转载文章的罗马尼亚译文。

有两个恩格斯修改文章时留下的草稿片断保存下来,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2卷,这两个片断与发表的文本的重要差别在脚注中说明。——666。

- 552 激进无政府主义者于1892年3月中下旬在巴黎策划了三起爆炸案,多人受伤。这样的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894年夏天。法国政府以此为由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由于法令条文模糊,它们不仅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666。
- 553 指1892年2月25—27日的柏林失业工人骚动。骚动期间,一些商店被洗劫,参与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2月27日发表《告柏林工人书》,呼吁工人不要参与其中。在3月19日的审判中,21人被判有罪。——666。
- 554 指1891年10月15日在罗马开始的对阿·契普里安尼等62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他们被控在1891年五一节期间煽动与警察的冲突。后来被

告在庭上证明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是由警方的暗探煽动起来的。——666。

- 555** 《记弗·恩格斯在伦敦 1893 年 3 月 18 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转述了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83)和布卢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见注 114)共同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 22 周年集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从 1892 年到 1894 年连续三年应邀参加了这两个机构举办的集会并发表讲话(1895 年的集会因病未能参加,参看本卷第 642 页),但只有 1893 年的这次讲话有公开报道。

1893 年 3 月 20 日,伦敦《每日纪事报》第 9680 号在题为《巴黎公社》的报道中首先转述了恩格斯讲话的内容,3 月 25 日伦敦《工人选民》报第 12 号转载了讲话内容。1893 年 3 月 25 日,伦敦《工人时报》第 149 号也转述了恩格斯讲话的内容,不过较《每日纪事报》简略。这篇报道的作者可能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她是该周报的编辑,同恩格斯一起出席了集会。《工人时报》对恩格斯讲话的报道如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决议表示支持,他回顾了最近 22 年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1871 年,国际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支持建立不同于并脱离所有其他政党的独立政党的决议。次年,英国代表在海牙站在无政府主义方面反对政治活动。在 1888 年以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那一年成立了新工联,运动从这里开始迅速发展,最终导致独立工党于今年 1 月在布拉德福德成立。这个新党正是国际的老会员们所期待成立的党。他敦促所有社会主义者加入这个党,并且相信,如果领导有方,这个党最终将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吸收进来。”——677。

- 556** 第一国际(见注 129)总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奥哲尔因为反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明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立场而在 1871 年 6 月退出国际。不过,当时国际总委员会中的英国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约·黑尔斯(担任总委员会总书记)等人,因此“仅有的两个同国际有联系的英国人”(见本卷第 677 页)这一表述是不准确的。恩格斯对当时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在《工人时报》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这一内容(见注 555),因此这个错误很可能出自《每日纪事报》报道的作者。——677。

- 557** 《弗·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是《费加罗报》记者发表的对恩格斯的访谈记录。恩格斯在访谈中评析了德国当

时的政局,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在选举斗争中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作了回答。他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 683—684 页)

这篇访谈记录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标题发表在 1893 年 5 月 13 日《费加罗报》(巴黎)第 133 号,以同样的标题在 1893 年 5 月 20 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 140 号转载,并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瑞典文、德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发表。1893 年 5 月 17 日,恩格斯致信弗·阿·左尔格,告诉他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这篇谈话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函寄去,并附带说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679。

- 558**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 103)中反对军事法草案(见注 406)的一部分人。另参看注 562。——679。
- 559** 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基本上沿袭了 1869 年 5 月 31 日通过的北德意志联邦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该法根据人口分布划分选区,当时一个选区大约有 10 万居民。但随着德国的工业化以及城市人口集聚区的产生和发展,各选区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对于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工业中心占优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旧的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尤为不利。例如,在 1893 年 6 月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中,德意志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候选人当选议员平均所需票数分别为 14 400 张和 15 200 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则需要 40 600 张。——683、688。
- 560** 《1893 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电》大概于 1893 年 4 月 30 日晚或者 5 月 1 日早上发出,5 月 1 日下午在奥地利工人举行的五一节活动上宣读,后来刊印在 1893 年 5 月 5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18 号。恩格斯此前已经提前就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写了贺信(见本卷第 454—455 页),因此这份贺电大概是由联署的路·考茨基(恩格斯的秘书)及路·弗赖贝格尔(后来成为路·考茨基的第二任丈夫)发起的。他们是奥地利人,与奥地

利工人运动以及《工人报》保持着密切关系。——686。

- 561 《弗·恩格斯 1893 年 6 月 27 日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是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的对恩格斯的访谈记录。恩格斯在访谈中评析了德国刚刚进行的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获胜对德国和欧洲政局将会产生的影响。采访的时间可能是 1893 年 6 月 27 日。

这篇报道发表在 1893 年 7 月 1 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 9769 号,发表时的标题是《德国的选举。对弗·恩格斯先生的采访》,后来被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文字在一些社会主义报刊和杂志上全文或摘录发表。——687。

- 562 指自由思想人民党,由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 103)分裂而来。德国自由思想党由于党内在军事法草案(见注 406)问题上的分歧,在 1893 年 5 月 6 日帝国国会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该党国会党团中以亨·李凯尔特和泰·巴尔特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组成新党自由思想同盟;而国会党团中以欧·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则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并反映了该党激进分子的情绪,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687。

- 563 德国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凡年满 25 周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但是选举法第 3 条列举了暂时失去选举权的几类选民,其中包括在选举前一年领取过救济金的人。——688。

- 564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白恩士在 1886 年 11 月 9 日伦敦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中首次举起了红旗而不是传统的黑旗,因此被称做“举红旗的人”。在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见注 142)期间,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希望白恩士在集会时也举起红旗以赋予集会政治含义,但他为了不给警方提供干预集会的借口而拒绝了这一要求。——689。

- 565 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指 1887 年英国议会两院通过的针对爱尔兰的法令,其主要目的是镇压爱尔兰人民追求自由独立的斗争。法令最重要的内容包括: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集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知情不报者将面临惩罚;爱尔兰的政治案件可移至英格兰审理,等等。——692。

- 566 《德法年鉴》只在 1844 年出版了第 1、2 期合刊。恩格斯在其中发表了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

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694。

567 可能指青年捷克派,见注269。——699。

568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3年7月9日组织的争取普选权的集会。集会在维也纳市政厅和厅前广场举行,有4万多人参加,集会的口号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702。

569 1876年8月初,恩格斯曾在德国海德堡短期停留。——704。

570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册》是最早公开发表的介绍《资本论》第三卷(即第三册)内容、预告该卷出版时间的文章,发表在1894年1月12日柏林《前进报》第9号,并在1894年1月14日《汉堡回声报》第11号、柏林《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0号以及1月16日科隆《莱茵报》第6号等转载。

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没有署名,大概是依据恩格斯的《关于〈资本论〉第三册的内容》(见本卷第532—533页)而撰写的。由于不能确定作者是恩格斯本人,本卷把这篇作者存疑的文章收入附录部分。——705。

571 《弗·恩格斯1895年1月1日同埃·王德威尔得的谈话》摘自王德威尔得在恩格斯逝世后写的悼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该文载于1895年8月8日比利时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布鲁塞尔)第220号,8月10日《前进报》(柏林)第185号转载了这篇悼文包括这次谈话在内的部分内容。——706。

572 恩格斯和埃·王德威尔得的这次会面不大可能发生在比利时议会选举(见注573)的第二天,即1894年10月22日。恩格斯曾在10月21日之后给王德威尔得写过一封信,祝贺他当选议员,而王德威尔得29日的回信也保存了下来。如果他们在22日见过面,就没有必要写信了。此外,王德威尔得在10月29日柏林《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5号发表的写作日期为10月22日的文章,标明的写作地点是布鲁塞尔,而不是恩格斯所在的伦敦。不过,可以确定他们两人在1895年1月1日见过面,恩格斯在1895年1月9日给维·阿德勒的信中曾提及王德威尔得对他的这次拜访,这个时间与王德威尔得《一名战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1936年巴黎版)的记述是吻合的,因此本文所记录的谈话很可能是发生在选举几周后的这次会面中。——706。

- 573** 1894年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首次根据1893年4月18日通过的新选举法(见注439)进行了参众两院的选举。比利时工人党获得近35万张选票(约占全部票数19%),在众议院中获得28个席位。埃·王德威尔得本人也当选为众议员。——706。
- 574** 指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比利时工人党派出19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埃·王德威尔得。——706。
- 575** 《弗·恩格斯1895年7月底至8月初同维·阿德勒的谈话》摘自1895年8月20日维也纳《工人报》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追悼会》的报道。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于8月19日晚举行恩格斯追悼会,3000多人参加。维·阿德勒在会上致悼词,并在悼词的结尾回忆了他在不久前与恩格斯会面时的谈话。阿德勒于7月21日到达英国的伊斯特本,探望在那里养病的恩格斯。7月24日他陪伴恩格斯回到伦敦,直到8月3日才离开。——707。
- 576** 恩格斯从伊斯特本回到伦敦后已不能讲话,只能通过用石板上写字与人交流。——707。

## 人名索引

### A

- 阿道夫(Adolf 1817—1905)——最后一位拿骚公爵(1839—1866),1866年公爵领地归普鲁士;卢森堡大公(1890—1905)。——639。
-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62、296、583、617、707。
- 阿尔比布,爱德华多(Arbib,Edoardo 1840—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议会议员(1879—1895)。——447。
-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Albrecht,Karl 1788—1844)——德国商人,曾因参加“蛊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类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551。
- 阿尔摩哈德王朝——12—13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朝。——548。
- 阿尔摩拉维德王朝——11—12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朝。——548。
- 阿尔维西·贾科莫(Alvisi,Giacomo 1825—1892)——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左翼代表;议会议员(1866—1879);参议员(1879年起);1889年曾调查罗马银行。——444—447。
-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467。
-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Sir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378。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

- 《疯狂的罗兰》的作者。——210。
- 阿伦特,奥托(Arendt, Otto 1854—1936)——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周报》的出版者(1888—1898);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85年起)。——221。
-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前后—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363。
- 埃德,埃米尔·德西雷·弗朗索瓦(Eudes, É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法国商业部门的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慈善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缺席判处20年要塞监禁,1872年改判死刑;流亡瑞士,后迁往英国;伦敦布朗基派革命公社成员(1872),后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233、529。
- 埃里蒂埃,路易(Héritier, Louis 1863—1898)——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429。
-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261—262。
-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亨利希·奥古斯特(Ewald, 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1875)——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格丁根七贤”之一,国会议员(1867—1875)。——569。
-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伴侣。——63、64、75、78、309、657、662—664。
- 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 86—161)——罗马皇帝(138—161)。——555。
- 安条克四世(名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 175—164)。——557—558。
- 奥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81、224。
-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86—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代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

- 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曾任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1860),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38。
-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569。
- 奥托(马可·萨尔维·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 32—69)——罗马国务活动家,卢蒂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南部)总督(执政者);69年1月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军推翻加尔巴,杀死加尔巴后被推为皇帝;69年4月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570、571。
-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的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677。

## B

- 巴尔,海尔曼(Bahr, Hermann 1863—1934)——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98、101。
-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瑞士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者。——258、260—264、267、269。
- 巴克兰,威廉(Buckland, William 1784—1856)——英国地质学家和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366。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

际。——66、71、225、423、429—432、511、561、648。

巴罗, 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活动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 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 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639。

巴斯蒂德, 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 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538。

巴斯特利卡, 安德烈(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巴枯宁主义者,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430。

白恩士, 约翰(Burns, John 笔名杰克 Jack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80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 90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 议会议员(1892年起), 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商业大臣(1914)。——407、496、662、689。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 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 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62。

白拉克, 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出版商和书商,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支部创始人(1865), 1867年起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对派;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的创办人(1871),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1871—1878)和《人民历书》(1875—1880)的出版者;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24、424、432。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7、20、21。

鲍格雷夫, 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杂志的出版者(1877—1883)。——323、404。

鲍威尔, 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 1839年后

- 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18、419、554—556、575。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23。
-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2—1871)——德国政论家,正义者同盟瑞士支部的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551。
- 贝纳里,弗兰茨·斐迪南(Benary, Franz Ferdinand 1805—1880)——德国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和神学家,1829年起为柏林大学东方语系非公聘讲师,后为副教授;旧约的注释者;1842年恩格斯曾旁听他的有关约翰启示录的讲座。——569、570、572。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81、141—142、173、208、224、331、469、505、587、631、680、688。
- 本格尔,约翰·阿尔布雷希特(Bengel, Johann Albrecht 1687—1752)——德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版者。——572。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积极参加60年代的民主运动,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1870—1871年是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英国报刊上为

- 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116、117、121、140、171、172、176、183、184、190—191。
- 比亚吉尼，古斯塔沃(Biagini, Gustavo)——意大利财政部官员，1889年曾调查罗马银行。——444、445、449。
-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11、13、18。
- 彼得三世(Петр III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16。
-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 [Bismar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9、40、42、47、50、52—55、57—58、89、226—227、230、241、300、321、332、336、337、339、352、401、442、452、492、493、579、580、586、623、624、628、631、639、640、680、692。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7、30。
-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657。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25。
-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后转向修正主义立场。——62、656、677。
-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

- 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364。
- 柏拉图(Platon [Plato] 约公元前 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555。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330—331、538。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80。
- 博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冯(Boguslawski, Albert von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90年代起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637、640。
-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376。
- 博罗施,阿洛伊斯(Borrosch, Alois 1797—1869)——奥地利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奥地利国会中德意志一波希米亚党团领袖。——498。
-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35、139。
- 博维奥,乔万尼(Bovio, Giovanni 1841—1903)——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反教权主义者;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大学教授。——347—349。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8年10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领;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 任教育学教授，“革命集中”的成员，1867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年）的参加者；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475。
-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345、669。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288、318、382、399。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233。
-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44。
- 布雷默，尤利乌斯(Bremer, Julius)——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雪茄烟工人；马格德堡工人组织的领导人。——101。
- 布卢默，G. (Blume, G.)——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12月8—11日在柏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主席。——110。
-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 Ludwig Joseph[Luj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111—123、126—153、155、157、168、178、180、191、193、194—198、201—203、206、207、210—212、215、221—223、385、403、656。
-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匠，后为工联官员；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书记（1875—1890），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内务副大臣（1886）。——407。
-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1636—1711)——法国诗

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读经台》的作者。——167、177、182、191、216、219。

## C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73。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29。

查理十二(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10。

查普卡·冯·温斯特滕男爵,奥古斯特(Czapka von Winstetten, August, Freiherr 1840—1917)——奥地利政府官员,内政部警务长官(1893)。——454。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66。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512、515、516、522、525。

## D

达尔布瓦,若尔日(Darboy,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1863年起为巴黎大主教,1871年5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233。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268、361。

达朗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27。

戴克里先(盖尤斯·奥勒留·瓦莱里乌斯·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245前后—313)——罗马皇帝(284—305)。——640、641。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460。

德拉瓦勒,卡洛(Dell'Avalle, Carlo 1861—1917)——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活动

- 家,职业是印刷工人;1892年为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和领导成员。——579。
- 德吕蒙,爱德华·阿道夫(Drumont,Édouard Adolphe 1844—1917)——法国政论家;写有许多反犹太人主义的书籍和文章。——60。
-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 [Democritus] 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363。
- 德穆特,海伦(琳蓿,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650、651。
-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5 前后—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文集》。——363。
-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德国出版商;社会民主党人,1881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狄茨出版社,即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1881年起为国会议员。——258。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博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188。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382。
-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376。
- 杜毕伊,沙尔·亚历山大(Dupuy, Charles-Alexandre 1851—192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教育部长(1892),内阁总理(1893、1894—1895和1898—1899)。——637。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307。
-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

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102、358、361。

多德威尔,亨利(Dodwell, Henry 死于178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365。

## E

恩格尔曼,帕尔(Engelmann, Pál 1854—1916)——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白铁工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90)和领导成员,1892年被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和领导人(1892—1894)。——440。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647、652。

恩斯特,保尔(Ernst, Paul 1866—1933)——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80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97、98、100—104。

## F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573。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Philip [Philippos]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382—336)——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565。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 [Philo Judaeus] 约公元前20—公元5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曾产生很大影响。——555、559、566。

费里,茹尔·弗朗索瓦·卡米耶(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内阁总理(1880—1881、1883—1885)；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241、529。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499。

丰唐,马里乌斯(Fontane, Marius 1838—1914)——法国作家,巴拿马运河公司

- 管理人员;1893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两年徒刑,后被宣告无罪。——450。
- 弗拉维王朝——罗马皇朝(69—96)。——555。
-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Freyberger, Ludwig 1863—1934)——奥地利医生,侨居伦敦,1894年同路·考茨基结婚。——686。
- 弗雷西内,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Freycinet, Charles Louis de Saulces de 1828—192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各部部长;多次当选内阁总理(1879—1880、1882、1886和1890—1892)。——450。
- 弗里茨——见弗里德里希二世。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3、16、17、19、54、473、613、635。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56。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802—1875)——黑森摄政王(1831—1847),黑森-卡塞尔选帝侯(1847—1866)。——39、639。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19。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2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34。
- 弗洛凯,沙尔·托马(Floquet, Charles Thomas 1828—1896)——法国政治活动家,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众议院议员(1876年起),议长(1885—1888、1889—1893);内阁总理(1888—1889);参议员(1894年起)。——449—450。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538。
-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39、549。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冯(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派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9—1880);多次当选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587、588。

福尔蒂斯,亚历山大罗(Fortis, Alessandro 1842—1909)——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律师,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1880年起);内阁首相(1905—1906)。——448。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422、428、528。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信徒,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167。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1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380—382。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56、270、563。

## G

盖布,威廉·莱奥波德·奥古斯特(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224。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569。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7、37。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368。

格奥尔格五世(Georg V 1819—1878)——最后一个汉诺威国王(1851—1866)。——639。

格拉古(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639。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639。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17、45、114—119、121—126、128—132、134、135、137、138、140—142、147—158、162、165—173、175—197、199—205、207—217、219、221—223、408、494。

格雷维,茹尔(Grévy, Jules 1807—1891)——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1879—1887)。——529。

格里马尔迪,贝尔纳迪诺(Grimaldi, Bernardino 1839—189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左翼”;议会议员(1876—1897);多次担任财政大臣。——447—448、450。

格罗夫纳,休·鲁普斯,威斯敏斯特公爵(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 1825—1899)——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大地主。——61。

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 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20。

## H

哈德良(普卜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117—138)。——555。

哈第,詹姆斯·基尔(Hardie, James Keir 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 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家;苏格兰工党创始人(1888)和领袖,独立工党创始人(1893)和领袖。——407、496。
-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511、522。
- 哈特莱,大卫(Hartley, 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365。
- 哈瓦斯通讯社(Havas)——1835年由查理·哈瓦斯创立的新闻和广告机构,1879年起为股份公司。——441。
-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化名约翰·布罗德豪斯 John Broudhuse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1881年是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领袖,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63、75、76。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62、450、495、563。
- 汉尼兴,费利克斯·奥斯卡尔(Hänichen, Felix Oskar 1865—1946)——德国商人和工厂主;德国改革党成员;国会议员(1893—1895)。——688。
-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 19世纪)——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157。
-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 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418。
-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书记(1865—1869),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议会议员(1885—1895)。——407。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511、512、522。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64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38、330、368、369、389、419。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442。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374。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374。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364—366、375—376。

霍恩,格奥尔格(Horn, Georg 1841—1919)——德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是玻璃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1895年起)。——688。

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奥古斯特·亨利希(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德国诗人和语文学家,曾任布雷斯劳大学教授(1831—1840);由于《非政治诗歌集》的出版而被解除职务,三月革命前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493。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57。

霍普金斯,托马斯(Hopkins, Thomas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57。

##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420。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原系德国人,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31。
- 吉尔斯,尼古拉·卡尔洛维奇(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俄国外交家,驻德黑兰(1863年起)、伯尔尼(1869年起)、斯德哥尔摩(1872年起)公使;曾任外交副大臣(1875—1882),外交大臣(1882—1895)。——7。
- 吉芬,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1876—1891),商业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322、403、602。
- 吉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论家,“民意党”党员;80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保皇派。——8。
- 吉勒斯,斐迪南(Gilles, Ferdinand 1856—1895)——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1887年起居住在伦敦,为《伦敦工人报》撰稿;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92年以前);90年代被揭露是一个警探。——664。
-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政论家,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勒洛克勒支部的创建人(1866),1868年起同巴枯宁建立联系,国际兄弟会的创建人之一;《进步报》(1868—1870)、《团结报》(1870—1871)和《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1872—1878)的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432。
-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372。
-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齐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公元前3—公元前69)——罗马国务活动家,60年代为西班牙塔拉戈纳省总督(执政者);尼禄死后,在68年6月被推为皇帝;69年1月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奥托趁机策动禁卫军把他杀死。——569—571。
- 加尔文,让(Calvin, 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372—373。

加里波第,多梅尼科·梅诺蒂(Garibaldi, Domenico Menotti 1840—1903)——意大利将军、农场主,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70—1871年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议会议员(1876—1900);朱泽培·加里波第的儿子。——447。

加瓦齐·洛多维科(Gavazzi, Lodovico 1857—1934以后)——意大利工业家、政治活动家;温和的教权主义者;1892年在揭发银行舞弊案中起了重要作用;议会议员(1892—1909);参议院议员(1910年起)。——446。

杰士卡,扬(Žizka, Jan 1360前后—1424)——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548。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ulich, 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3。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Constantin, Konstantin], Magnus, Flavius Valerius 约280—337)——罗马皇帝(306—337)。——555、558、641。

##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0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72。

卡尼茨伯爵,汉斯·威廉·亚历山大(Kanitz, Hans Wilhelm Alexander Graf von 1841—1913)——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9—1870),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85—1890)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9年起);代表大地主的利益。——600。

卡诺,玛丽·弗朗索瓦·萨迪(Carnot, Marie-François-Sadi 1837—1894)——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1894),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刺杀。——529。

卡普里维伯爵,莱奥(Caprivi, Leo Graf von 1831—1899)——德国国务活动家、

- 将军和军事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241、292、339、701。
- 卡齐米尔-佩里埃,让(Casimir-Périer, Jean 1847—1907)——法国政治活动家;内阁总理(1893—1894),第三共和国总统(1894—1895)。——637。
- 卡特赖特,埃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43—1823)——英国牧师、发明家和机械师,第一台获得专利的机械织布机的发明者。——378。
- 卡瓦洛蒂,费利切(Cavallotti, Felice 1842—1898)——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1873年起为议会议员。——536。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312、392、657、658。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267。
- 坎南,乔治(Kennan, George 1845—1924)——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旅行家;1885—1886年游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组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章中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44。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368、369。
- 康莫迪安(Commodian 3世纪上半叶)——拉丁诗人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宗教活动家。——556。
- 康奈尔, J. (Connel, J.)——677—678。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418。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33。
-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之一,《新时代》杂志编辑;后转向机会主义立场。——15、532、533、614、648。

-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 Louise 父姓施特腊塞尔 Strasser,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 Freyberger 1860—1950)——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女工报》编辑部成员,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890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卡·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309、583、659、663、664、686。
- 考尔德,威廉(Coward, William 1656 前后—1725)——英国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365。
- 柯林斯,安东尼(Collins, 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365。
-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将比较法学的方法运用于民族学和早期历史;写有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362。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288、382。
- 科柯斯基,赛米尔(Kokosky, Samuel 1838—1899)——德国政论家;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1891—1896年为《前进。柏林人民报》编辑)。——432。
- 科拉扬尼,拿破仑涅(Colajanni, Napoleone 1847—1921)——意大利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议会议员(1890年起);1892年在揭露银行舞弊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45—448。
-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 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557、569、570。
- 克勒尔,恩斯特·马蒂亚斯·冯(Köller, Ernst Mattias von 1841—1928)——德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帝国国会议员(1881—1888),曾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94—1895);推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641。
- 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公爵(Christian, Prinz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丹麦王位继承人(1852年起),丹麦国王(1863—1906),称克里斯蒂安九世。——34。
- 克里斯皮,弗兰契斯科(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 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60年代末起拥护立宪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87—1891和1893—1896);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的政策。——444—446、452、580、586。
-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杰明(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80年代起为激进派领袖,《正义报》的创办人;内阁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340。
- 克虏伯,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Krupp, Friedrich Alfred 1854—1902)——德国大工业家,位于埃森、世界最大的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612。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373。
- 克罗伊斯(Kroisos [Croesus])——吕底亚王(公元前560—546)。——58。
- 克洛斯,卡尔(Kloß, Karl)——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93年国会选举斯图加特选区的候选人,在复选中落选。——689。
-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w Adolph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40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647。
- 肯宁安-格雷厄姆,罗伯特·邦廷(Cunninghame-Graham, Robert Bontine 1852—1936)——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八十至九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后为苏格兰民族运动活动家;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议会议员(1886—1892)。——662。
- 孔斯坦,让·安东·厄内斯特(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 1833—1913)——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内务部长(1880—1881、1889—1892),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339—341。
- 孔西利奥,达维德(Consiglio, Davide 1836—1925)——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职业是银行经理,曾任那不勒斯银行总经理;议会议员(1867—1876);参议员(1881年起);1889年曾调查国民银行。——444。
-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 Georg 生于1812年)——奥地利江湖医生,自命是“预言家”;40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证实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551、

552。

库利埃,保尔·路易(Courier, Paul-Louis 1772—1825)——法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对者。——139。

奎尔奇,哈里(Quelch, Harry 1858—191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印刷工人和新闻工作者;民主联盟成员(1881年起);社会民主联盟成员(1884年起);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之一;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11。

##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 John 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活动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266—268。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笔名保尔·洛朗 Paul Laurent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医生和政论家;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298、307、361、587、609。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259、307、588。

拉夫莱男爵,埃米尔·路易·维克多(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baron de 1822—1892)——比利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33—134、194。

拉梅耐(德拉梅耐),于盖·费利西泰·罗伯尔·德(Lamennais [de la Men-nais], Hugues-Félicité-Robert de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和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保皇派,后为自由派。——551。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法国天文学

- 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阐发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并阐发了概率论(1812)。——367。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62、71、72、81、84、141、224、330—332、358、388、631。
-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 Eduard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5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73、208。
- 拉扎罗尼男爵,米凯莱(Lazzaroni, Michele, barone 1863—1934)——意大利贵族,银行家和工业家;罗马银行政府专员(1889—1893);切扎雷·拉扎罗尼的侄子。——449。
- 拉扎罗尼男爵,切扎雷(Lazzaroni, Cesare, barone 1825—1893以后)——意大利贵族,地主;九十年代初为罗马银行总出纳员;米凯莱·拉扎罗尼的叔叔。——447、448、451。
- 腊韦,昂利(Ravé, Henri 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新闻工作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259。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19。
- 莱塞普斯子爵,斐迪南·玛丽(Lesseps, Ferdinand-Marie, vicomte de 1805—1894)——法国实业家和工程师;开凿苏伊士运河(1859—1869)的国际公司组织者;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1893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被宣告无罪;沙·艾·玛·莱塞普斯的父亲。——450。
- 莱塞普斯,沙尔·艾梅·玛丽(Lesseps, Charles-Aimée-Marie 1849—1923)——法国实业家;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之一;1893年在巴拿马舞弊案中被判处一年徒刑,后被宣告无罪;斐·玛·莱塞普斯的儿子。——450。
- 莱瑟姆,罗伯特·戈登(Latham, Robert Gordon 1812—1888)——英国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伦敦大学教授。——264。
- 莱维,莱昂内(Levi, Leone 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理·科布顿的朋友。——322、403。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

- 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529、538。
-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 Joseph-Ernest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549、554、556—557、561、569、572。
- 雷纳克男爵,雅克(Reinach, Jacques, baron de 1840—1892)——德裔法国银行家;经管巴拿马运河公司财务;在巴拿马舞弊案审判前自杀。——450。
-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388。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语文学家 and 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81、141、170、224、287、331、587、672、688。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48、251。
-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先后为进步党、自由思想党和自由思想人民党领袖;《自由思想报》的创办者和主编(1885—1904);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9—1871年);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年起);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9—1905)。——479。
-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 William Dobson 1827前后—1907)——英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68。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7、29、30。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 (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09、677。
-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笔名斯巴达克 Spartacu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宪章运动并为宪章派刊物撰稿;《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66年迁居美国。——512。
- 琉善(Lucianus [Lukianus] 约120—180)——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549、551。
- 龙格,燕妮——见马克思,燕妮。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19、424、647、652。
- 鲁迪尼侯爵,安东尼奥·斯塔腊巴(Rudini, Antonio Starabba, marchese di 1839—1908)——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大地主;自由党人;多次担任内阁大臣;内阁首相(1891—1892和1896—1898);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445、446、452。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677。
- 鲁维埃,皮埃尔·莫里斯(Rouvier, Pierre-Maurice 1842—1911)——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甘必大的支持者;共和派报纸《平等报》的出版者(1870);1871—1902年为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预算委员会主席,1881—1882年任商业和殖民部长,1884—1885年任商业部长,1887年5—11月任内阁总理,1889年起任财政部长;1892年因参与巴拿马舞弊案件被迫

- 辞职;1902—1905年复任财政部长,1905年6月起任外交部长。——340、449、452。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372、574。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61、315、395、670。
- 路透通讯社(Reuters 或 Reuter)——1849年由保罗·尤利乌斯·路透(1871年起为男爵)在亚琛创办的通讯社,1851年迁往伦敦。——441。
-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228、229、289、374、380。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232。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2、345。
- 罗班,保尔(Robin, Paul 1837—1912)——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1869年起),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430。
- 罗杰斯,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58。
- 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化学教科书。——388。
- 罗伊,亨利(Roy, 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116、213、219。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656。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365、366。
- 洛伊特纳,卡尔(Leuthner, Karl 1869—194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报》编委;议会议员(1911—1933)。——701。

- 吕克,哥特弗里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Lücke, Gottfried Christian Friedrich 1791—1855)——德国新教神学家,曾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格丁根大学任教授,福音书注释者。——569。
- 律斯勒,康斯坦丁(Rößl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论家和官员,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1892),拥护俾斯麦的政策;曾任外交部顾问(1892—1893)。——640。

## M

- 马尔提尼,斐迪南多(Martini, Ferdinando 1841—1928)——意大利剧作家、新闻工作者、政治活动家,属于资产阶级左翼;议会议员(1874—1919);教育大臣(1892—1893)。——447。
-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Martignetti, Pasquale 1844—1920)——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256、259。
- 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斯多亚派哲学家。——555。
-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Marx, Heinrich [Herschel] 1777—1838)——德国律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马克思的父亲。——418。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307、419、424、650。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 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马克思的大女儿,沙·龙格的妻子(1872年起)。——307、424。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 Eleanor [Tussy] 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伴侣(1884年起)。——63、64、75—78、114、135、136、194、195、197、200、205、206、210—212、214、307、309、662、663、677。
-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

- 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330、538。
- 马特金,威廉(Matkin, William 1845—1920)——英国工联活动家,木工和细木工工会领导人;多次担任工联议会委员会委员;工联理事会主席(1890)。——411。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39、422、537。
-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1780)。——17。
-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德国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622。
- 麦金利,威廉(McKinley, William 1843—1901)——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领袖之一,奉行保护关税政策;1877年起多次当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1897—1901)。——415。
-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McLennan, John Ferguson 1827—1881)——苏格兰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写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258、263—270。
- 麦克马洪伯爵,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马真塔公爵(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comte de, duc de Magenta 1808—189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580、629。
-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拉特兰公爵(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Duke of Rutland 1818—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议会议员,屡任保守党内阁的大臣。——383。
- 曼特尔,吉迪恩·阿尔杰农(Mantell, Gideon, Algernon 1790—1852)——英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

来。——366。

曼托伊费尔男爵, 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 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 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50。

毛奇伯爵, 奥托(Moltke, Otto, Graf von 1847—1928)——德国军官; 德意志帝国党成员;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93—1907); 国会议员(1893—1894)。——689。

毛奇伯爵,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 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 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 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 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 实际上是总司令; 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 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 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31、32、53、54、57。

梅林, 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8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新时代》杂志编辑, 戏剧团体“自由人民舞台”秘书,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写有《马克思传》以及德国史和社会民主党史方面的著作。——214。

梅萨-列奥姆帕特, 何塞(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 《解放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委(1871—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72), 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 1873年流亡巴黎; 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西班牙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 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42。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

-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3。
- 门格尔, 安东(Menger, Anton 1841—1906)——奥地利法学家, 维也纳大学教授。——357、547。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521。
- 米凯尔, 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 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 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289。
- 米克洛希奇, 弗兰蒂舍克(Miklošich, František 1813—1891)——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 斯洛文尼亚人;曾任维也纳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授(1849—1886);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12。
- 米涅,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 早年研究法律, 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 后进入巴黎新闻界, 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 《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兰西革命史》等历史著作。——538。
- 米切利, 路易吉(Miceli, Luigi 1824—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属于资产阶级左翼;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议会议员(1861—1897);曾任内阁大臣;1889年领导调查罗马银行。——445、446。
-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进化论的代表,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258、264、266—271、656。
- 莫尔, 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 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乌托邦》一书的作者。——15。
- 莫尔肯布尔, 海尔曼(Molkenbuhr, Hermann 1851—192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雪茄烟工人和作家;国会议员(1890年起);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04年起);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689。

- 莫斯库斯(Moschos [Moschus]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诗人。——581。
- 穆迪,德怀特·莱曼(Moody, Dwight Lyman 1837—1899)——美国传教士,新教教会活动家。——380。
-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68,657。
-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32。

##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20—25,30,99,232,236,339,367,499。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6,38—40,226,229,230,321,352,379,401,421,427,430,465,528,591,622,627—630,682。
- 纳杰日杰,若安(Nădejde, Ion 1854—1928)——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90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259。
-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公元前625前后—562)——巴比伦王(公元前604—562)。——558。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1,34,36,67,343,524,668。
-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俄国皇帝(1894—1917)。——637。
-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569—571。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7,30,33。
- 纽比,托马斯·考特利(Newby, Thomas Cautley)——伦敦出版商。——176,213。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88年起为议会议员;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90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298。

## O

欧门—恩格斯公司(Ermen&Engels)——曼彻斯特的一家股份公司,恩格斯是该公司股东之一。——652。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72、256、366、518。

欧文斯,约翰(Owens, John 1790—1846)——英国商人,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创建人。——388、390。

##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32、36、422、427。

帕涅尔,威廉(Parnell, William)——英国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1888年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11。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363—366。

皮-马尔加尔,弗朗西斯科(Pi y Margall, Francisco 1824—190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职业是作家;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和1868—1874)的参加者;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内务部长(1873年2月13日—6月11日)和临时总统(1873年6月11日—7月18日)。——509。

皮斯,爱德华·雷诺(Pease, Edward Reynolds 1857—1955)——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参与工党的建立。——578。

-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166。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71、72、235、236、242、420、423、427、430、530、561、629。
- 普里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 年发现氧气;1794 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365。
-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70 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1883),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领袖;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299、503、515、520。
-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俄国诗人。——24。

## Q

- 契普里安尼,阿米尔卡雷(Cipriani, Amilcare 1845—1918)——意大利政论家;19 世纪 60 年代为加里波第派;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组织者之一;巴黎公社参加者;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1890 年后为无政府主义者。——666。
- 乔利蒂,乔万尼(Giolitti, Giovanni 1842—1928)——意大利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1882 年起);国库大臣(1889—1890);1892—1893 年任内阁首相,罗马银行舞弊案揭发后被迫辞职;1903 年起又数次任内阁首相。——445、446、450。
-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207。

## R

- 热尔韦,阿尔弗勒德·阿尔伯(Gervais, Alfred-Albert 1837—1921)——法国海军上将,1891 年 8 月率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443。

日罗-特隆,亚历克西斯(Giraud-Teulon, Alexis 1839—1916)——瑞士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日内瓦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268、270、276。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33—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521。

## S

萨尔梅龙-阿隆索,尼古拉斯(Salmerón y Alonso, Nicolás 1838—1908)——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马德里大学历史学和哲学教授;议会议员(1871年起);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司法部长(1873年2月)和临时总统(1873年7—9月)。——509。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 公元前4前后—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555。

桑基,艾拉·戴维(Sankey, Ira David 1840—1908)——美国新教传教士。——380。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35。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671—1713)——英国政治活动家、著作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自然神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辉格党人。——376。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左右—1852)——普鲁士内务部官员,1843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419。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06、256、671。

施杜姆,卡尔·冯(Stumm, Karl von 1836—1901)——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612。

施特恩堡,列夫·雅柯夫列维奇(Штернберг, Лев Яковлевич 1861—1927)——俄国民族学家,因参加民粹派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库页岛(1889—1897)。——435、438。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

- 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54。
- 施廷茨莱(Stinzleih)——110。
- 斯蒂凡,亨利希(Stephan, Heinrich 1831—1897)——德国国务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邮政总局局长。——88。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4、181。
- 史密斯,罗伯特·安格斯(Smith, Robert Angus 1817—1884)——英国化学家、卫生学家;卡尔·肖莱马的老师。——388。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06。
- 斯旺·桑南夏恩公司(Swan Sonnenschein & Co.)——伦敦的一家出版社,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392。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550。
- 梭恩,威廉·詹姆斯(Thorne, William James 人称威尔 Will 1857—1946)——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煤气工人;社会民主联盟成员(1884年起);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书记(1889—1934);工联议会委员会委员(1893—1921);议会议员(1906—1945);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11、662。
- 梭伦(Solon 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521。
- 索菲娅-奥古斯塔——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 T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267、557、570、575。
-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

- 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进化论的创始人。——260。
- 泰勒,塞德利(Taylor, Sedley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分红的制度;80年代企图继续布伦坦诺在70年代开始的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指责马克思蓄意伪造所引用的资料。——113、114、133—137、144、152、155、194—197、199—204、209—212、214。
- 泰斯特勒,海尔曼·奥古斯特(Teistler, Hermann August 生于186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青年派”领袖之一;《萨克森工人报》编辑(1890)。——103。
- 汤隆古,贝尔纳多(Tanlongo, Bernardo 1820—1896)——意大利企业家;罗马银行经理(1882年起)。——446—448、450—452。
- 汤普森,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357。
- 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 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古希腊诗人;田园诗歌的创始人。——581。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90前后—159)——罗马喜剧作家。——119。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季奇(Ткачѳ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被捕,1871年6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1873年逃往伦敦,追随彼·拉甫罗夫,《前进!》的撰稿人;1874年是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成员。——511、512。
- 特朗布尔,乔纳森(Trumbull, Jonathan 1710—1785)——美国传教士、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商人;康涅狄格州州长(1769—1784)。——380。
- 特里尔,格尔松·格奥尔格(Trier, Gerson Georg 1851—1918)——丹麦语文学家,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259。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231、233、240、339、580、628。

- 提比里乌斯(提比里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公元前 42—公元 37)——罗马皇帝(14—37)。——569。
- 托洛尼亚公爵,朱利奥·博尔盖塞(Torlonia, Giulio Borghese, principe 1847—1914)——意大利贵族;曾任罗马银行监事长。——446—448。

## W

-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159。
- 瓦尔特和阿波兰特(Walter & Apolant)——柏林的一家出版社。——222。
-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378。
-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É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党人,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1871年在巴黎被判处死刑,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1881),1884年起是巴黎市参议院议员,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1)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32、235、529。
- 万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315、395。
- 王德威尔得,埃米尔(Vandervelde, Émile 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后成为该党右翼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代表,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议会议员(1894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后屡任内阁大臣。——706。
- 威尔逊,约瑟夫·哈弗洛克(Wilson, Joseph Havelock 1858—1929)——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海员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组织者和主席(1887年起);1892年起多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407、496。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

- 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53、54、57、623、628、637、639。
-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9)。——52、54、57、58、667、680—683。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33。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25。
- 韦斯特华伦,燕妮·冯——见马克思,燕妮。
- 韦伯,悉尼·詹姆士(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妻子比·韦伯合写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693。
-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173、185、192。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573。
- 维勒,布鲁诺(Wille, Bruno 1860—1928)——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之一。——103。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648、652。
- 维特利乌斯(奥鲁斯·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 15—69)——罗马国务活动家;60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执政者),69年1月被推为皇帝,同年年底在内战中被杀。——557、570。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

- 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72、330、347—349、549、551、561。
- 翁伯托一世(Umberto I 1844—1900)——意大利国王(1878—1900)。——448。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345、669。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57。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外交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6、33。

## X

- 西格勒,古斯塔夫(Siegle, Gustav 1840—1905)——德国政治活动家,化工厂厂主;民族自由党人;国会议员(1887—1898)。——689。
- 西吉达(马拉克西安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Сигида [Малаксиано],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2—1889)——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党员,因不能忍受监狱里的体刑而自杀。——45。
- 希普顿,乔治(Shipton, George 1839—1911)——英国工联领导成员,改良主义者;彩画匠工联书记;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72—1896),《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64、78、659。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74。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

- 1824), 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29。
- 肖伯纳, 乔治(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英国剧作家和政论家, 1884年起为费边社社员。——662。
- 肖莱马, 菲利浦娜(Schorlemmer, Philippine, 父姓罗特 Roth 1811—1892)——卡尔·肖莱马和路德维希·肖莱马的母亲。——390。
- 肖莱马, 卡尔(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德国化学家, 有机化学的创始人, 辩证唯物主义者,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年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国际会员, 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88—391。
- 肖莱马, 路德维希(Schorlemmer, Ludwig 1847—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旋工师傅; 卡尔·肖莱马的弟弟。——390。
- 肖特, 安德烈亚斯(Schott, Andreas 1552—1629)——德国学者, 耶稣会会士, 古典作品的翻译家和出版者。——550。
- 辛格尔, 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商人, 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联络员,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911), 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 1887年起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90年起和倍倍尔一起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1891、1893、1896和1907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62、81。

## Y

-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 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565。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21、23、25、27、29、30。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36、39、512、668。
-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299、441、443、486、671。
- 亚马多一世(Amadeo I 1845—1890)——西班牙国王(1870—1873)。——509。
- 杨楚克,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Янчук,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9—1921)——俄国民族学家。——435。
- 杨格, 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

- 币数量论的拥护者;18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158。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7、13、14、16—21、25、38。
-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418。
-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Iglesias, Pablo 1850—1925)——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政论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解放报》编委(1871—1873);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79),后来成为该党改良派领袖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578。
- 伊里奈乌斯(Irenaeus 约130—202)——基督教神学家,小亚细亚希腊人,177年起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阐明基督教教义。——570—571。
- 易卜生,亨利克(Ibsen, Henrik 1828—1906)——挪威剧作家。——100。
-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06。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前后—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639。
-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奥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14、17、19。

## Z

- 扎莫伊斯基伯爵,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 Władysław, Graf 1803—1868)——波兰大地主和将军,曾参加1830—1831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33。
-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3。

##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261、262。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24、405。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游吟诗人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103。

奥列斯特——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261、262。

### B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560—562。

巴勒——据圣经传说，是摩押王。——560。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的作者。——557。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549、554、562。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

他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用“达摩克利斯剑”比喻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灾难。——227。

但以理——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556—558、566、568。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204。

**E**

厄默尼德——见依理逆司。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克丽达妮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的丈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人物。——261。

**L**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554。

**M**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568。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259、559。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554、564、567。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554。

**N**

尼哥拉——据圣经传说,是耶路撒冷的祭司,一个异教教派的创始人。——

561—562。

## P

佩雷格林——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披着传教士的外衣进行活动。——550—553。

普罗特斯——古希腊神话中为波赛东服务的海神，能预言，能变形。——550。

## Q

乔纳森大哥——美国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是美国人或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这个称谓后来逐步被“山姆大叔”所取代。——380。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549、573。

## S

塞米拉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14。

瑟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因诋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213。

## T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王，因侮辱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549。

##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557。

## Y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

- 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261、262。
-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72。
- 亚格斯都士——古希腊神话中克丽达妮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米农;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261。
-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部)中的人物。——261。
- 耶和华——见雅赫维。
-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549、555、558—559、566—568、571—574。
- 耶洗别——据圣经传说,是暴虐残忍的以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塔女神(腓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是淫乱和渎神的化身。——561。
-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24。
- 依理逆司——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涅墨西斯或厄默尼德;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261、262。
-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的作者。——557、566。
-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558、568、573。
-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作者。——557。
-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566。
- 犹大——据传说是圣经中犹大书的作者。——557。
-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562、564、566、567、572。

## 文献索引<sup>①</sup>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 卡·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和94号(Die moralisi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rende Moral. Beitrag zu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Gegen Carl Heinzen. In: 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 Nr. 86, 87, 90, 92, 94; 28., 31. Oktober, 11., 18., 25. November 1847)。——420。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底)(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nebst einem Anhang. Zweite Hälfte 1840 bis Ende März 1841)。——418。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19日《莱茵报》(科隆)第125、128、130、132、135、139号附刊(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Ers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Preßfreiheit und Public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25, 5. Mai 1842. Beibl.; Nr. 128, 8. Mai 1842. Beibl.; Nr.

---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 130, 10. Mai 1842. Beibl.; Nr. 132, 12. Mai 1842. Beibl.; Nr. 135, 15. Mai 1842. Beibl.; Nr. 139, 19. Mai 1842. Beibl.)。——418, 424。
-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1842年10月25、27、30日和1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298、300、303、305和307号附刊(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Drit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8, 25.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0, 27.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3, 30.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5, 1. November 1842. Beibl.; Nr. 307, 3. November 1842. Beibl.)。——418—419, 424。
-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224。
- 《法国工人党纲领领导言(草案)》,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日内瓦)第25期(Considérants du Programme socialiste(Projet). In: Le Précurseur. Genève. Nr. 25, 19. Juni 1880)。——631。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1871年莱比锡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eipzig 1871)。——226、227、234、236、238、423。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载于1871年7月3、10、17、31日,8月7、21日,9月4日《解放报》(马德里)第3、4、5、7、8、10、12号(La guerra civil en Francia. Manifiesto del Consejo general de la Asociacio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A todos los miembros de esta Asociacion en Europa y en los Estados-Unidos. In: La Emancipacion. Madrid. 1871. Nr. 3, 3. Juli; Nr. 4, 10. Juli; Nr. 5, 17. Juli; Nr. 7, 31. Juli; Nr. 8, 7. August; Nr. 10, 21. August; Nr. 12, 4. September)。——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载于1871年11月12日,12月3、10、27日《平等》(阿格里真托)第18、21、22、24号(La guerra civile in Francia. Manifiesto del Consiglio Generale della Società in Europa e in America. In: L' Eguaglianza. Girgenti. 1871. Nr. 18, 12. Novem-

- ber; Nr. 21, 3. Dezember; Nr. 22, 10. Dezember; Nr. 24, 27. Dezember)。——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2年]布鲁塞尔第3版(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3. éd. revue. Bruxelles [1872])。——428。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增订第3版，1891年柏林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3. deutsche Aufl. Verm. Berlin 1891)。——428。
- 《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 London 1860)。——422、428、528。
- 《哥达纲领批判》，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Nr. 18, 9. Jg. B. 1. 1890—1891)。——224。
-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Brief an Wilhelm Bracke.)。——224。
-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0—11月)(À la rédaction de l'«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Oktober/November 1877)。——516—517、521、523。
-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于1886年《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In: Вѣстникъ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 Женева. Nr. 5. 1886. [U. d. T. :] Письмо Карла Маркса)。——521。
-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于1888年10月10日《司法通报》(莫斯科)第39卷第10期(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 In: Юридическій Вѣстникъ. Москва. Т. 39. Nr. 10, 10. Oktober 1888. [U. d. T. :] Письмо Карла Маркса)。——521。
-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8、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7、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64, 5. April 1849; Nr. 265, 6. April 1849; Nr. 266, 7. April 1849; Nr. 267, 8. April 1849; Nr. 269, 11. April 1849)。——246。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 Hottingen-Zürich 1884)。——246。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柏林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 Separat-Abdr. aus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vom Jahre 1849.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Berlin 1891)。——247、427、657。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93年米兰版(Capitale e salario colla biografia dell'autore e con una introduzione di F. Engels. Prima traduzione italiana di P. Martignetti. Milano 1893)。——427。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载于《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 gehalten am 9. Januar 1849 [muß heißen: 1848] in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zu Brüssel. In: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Stuttgart 1885(Anhang II.))。——427。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420、427。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89年波士顿—伦敦版(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Transl. into English by F. Kelley Wischnewetzky. With preface by F. Engels. Boston, London 1889)。——427、657。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n: [K. Marx:]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114、115、163、170—172、176、180、183—186、194、207、212、221、428。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130、155、163、170—171、204、211、423。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1年伦敦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fficial ed., rev. by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 1871)。——431。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1年伦敦版(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Éd. Officielle, rév.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 Londres 1871)。——431。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2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mtl. deutsche Ausg. rev. durch den Generalrath. Leipzig 1872)。——283、431。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载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Statut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In: [Joseph Card:] 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430。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伦敦版(Statut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votés au Congrès. Londres 1866)。——283。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载于《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增订第3版，1891年柏林版(Ers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In: [Karl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3. deutsche Aufl. verm. durch die beiden Adressen des Generalrath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und durch eine Einl. von F. Engels. Berlin 1891)。——226、227。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1870年[伦敦版](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40、336—337、691。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载于《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增订第3版，1891年柏林版(Zwei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In: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

- tion.3.deutsche Aufl.verm.durch die beiden Adressen des Generalrath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und durch eine Einl.von F.Engels.Berlin 1891)。——226、227。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424、696。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427。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波士顿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oston 1853])。——421、427。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Neuer Abdr. mit Einl. von F. Engels, u. Dokumenten. Hottingen-Zürich 1885)。——421、427、657。
- 《卡尔·马克思的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1872年1月1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号，1872年1月20日第6号(Die Inauguraladresse von Karl Marx, anläßlich der Gründ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1864.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5, 17. Januar 1872; Nr. 6, 20. Januar, 1872)。——114、118、119、129—131、136、137、144、153、154、164、168、175、190、194、200、202、213。
-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nen. Prozeß gegen den Ausschuß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wegen Aufrufs zum bewaffneten Widerstand. <9. Februar 1849. > Mit e. Vorw. Von Fr.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5)。——657。
-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载于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Der Kommunismus des „Rheinischen Beobachters“. In: Deutsche Brüsseler-Zeitung. Nr. 73, 12. September 1847)。——420。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York. 1852. H. 1)。——226、421、427、537。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2. Ausg. Hamburg 1869)。——421。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第3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3. Aufl. Hamburg 1885)。——421、427、622。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91年1月7、14、21、28日，2月4、11、18、25日，3月4、18、25日，4月1、8日，6月3、10、17日，7月1、8、22、29日，8月5、12、26日，9月12、19、26日，10月3、10、17、31日，11月7、21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15、17—24、26—29、37—39、41、42、44—47、49、51—56、58、59、61号(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In: Le Socialiste. Paris. 1891. Nr. 15, 7. Januar; Nr. 17, 14. Januar; Nr. 18, 21. Januar; Nr. 19, 28. Januar; Nr. 20, 4. Februar; Nr. 21, 11. Februar; Nr. 22, 18. Februar; Nr. 23, 25. Februar; Nr. 24, 4. März; Nr. 26, 18. März; Nr. 27, 25. März; Nr. 28, 1. April; Nr. 29, 8. April; Nr. 37, 3. Juni; Nr. 38, 10. Juni; Nr. 39, 17. Juni; Nr. 41, 1. Juli; Nr. 42, 8. Juli; Nr. 44, 22. Juli; Nr. 45, 29. Juli; Nr. 46, 5. August; Nr. 47, 12. August; Nr. 49, 26. August; Nr. 51, 12. September; Nr. 52, 19. September; Nr. 53, 26. September; Nr. 54, 3. Oktober; Nr. 55, 10. Oktober; Nr. 56, 17. Oktober; Nr. 58, 31. Oktober; Nr. 59, 7. November; Nr. 61, 21. November)。——427。
- 《论犹太人问题》，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Judenfrag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424、696。
-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1843年1月15、17—20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第15、17—20号(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5, 17—20; 15., 17—20. Januar 1843)。——418—419、424。
- 《帕麦斯顿》，载于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号(Palmerst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2, 19. Oktober 1853)。——422、427。
- 《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载于《政治评论集》[1854年]伦敦版第2期(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o. 2. London [1854])。——422。
- 《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5年伦敦版(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London 1855)。——422。
- 《帕麦斯顿勋爵》，载于1853年10月22、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伦敦)第77、78、79、80、81、84、85和86期；一部分作为社论

- 发表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 11 月 4、21 日和 1854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2、3916、3930 和 3973 号 (Lord Palmerston. I—VIII.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77, 22. Oktober 1853; Nr. 78, 29. Oktober 1853; Nr. 79, 5. November 1853; Nr. 80, 12. November 1853; Nr. 81, 19. November 1853; Nr. 84, 10. Dezember 1853; Nr. 85, 17. Dezember 1853; Nr. 86, 24. Dezember 1853; [Leita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2, 19. Oktober 1853; Nr. 3916, 4. November 1853; Nr. 3930, 21. November 1853; Nr. 3973, 11. Januar 1854)。——422。
- 《帕麦斯顿勋爵。现代史的一章》, 载于 1853 年 11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0 号 (Lord Palmerston. 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30, 21. November 1853)。——422, 427。
- 《帕麦斯顿勋爵传》, 载于 [1856 年]《自由新闻小丛书》(设菲尔德) 第 5 期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In: Free Press Serials. No. V. Sheffield [1856])——427。
- 《帕麦斯顿与俄国》, 载于 1853 年 11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6 号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6, 4. November 1853.)。——422, 427。
- 《帕麦斯顿与俄国》, 载于《政治评论集》[1853 年] 伦敦第 1 版第 1 期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r. 1.1. ed. London [1853])。——422。
- 《帕麦斯顿与俄国》, 载于《政治评论集》[1854 年] 伦敦第 2 版第 1 期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r. 1.2. ed. London [1854])。——422。
- 《帕麦斯顿与俄国》,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5 年伦敦版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London 1855)。——422。
-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载于 1844 年 8 月 7、10 日《前进报》(巴黎) 第 63 和 64 号 (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Socialreform. Von einem Preußen“. In: Vorwärts. Paris. Nr. 63, 7. August 1844; Nr. 64, 10. August 1844)。——427。
- 《施普雷河与明乔河》, 载于 1859 年 6 月 25 日《人民报》(伦敦) 第 8 期 (Spree und Mincio. In: Das Volk. London. Nr. 8, 25. Juni 1859)。——428。
- 《18 世纪外交史内幕》, 载于 1856 年 6 月 28 日, 7 月 5、12、19 日《自由新闻》(设菲尔德) 第 12—15 期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In: The Free Press. Sheffield. 1856. Nr. 12, 28. Juni; Nr. 13, 5. Juli; Nr. 14, 12.

- Juli; Nr. 15, 19. Juli)。——428。
- 《18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1856年8月16、23日，9月13、20日，10月4日，11月8、29日，12月6、20日，1857年2月4、18、25日，4月1日《自由新闻》(伦敦)第1、2、5、6、8、13、16、17、19、26、28、29、34期(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1856/1857. Nr. 1, 16. August; Nr. 2, 23. August; Nr. 5, 13. September; Nr. 6, 20. September; Nr. 8, 4. Oktober; Nr. 13, 8. November; Nr. 16, 29. November; Nr. 17, 6. Dezember; Nr. 19, 20. Dezember; Nr. 26, 4. Februar; Nr. 28, 18. Februar; Nr. 29, 25. Februar; Nr. 34, 1. April)。——428。
- 《偷梁换柱》，载于1859年7月30日，8月6、13和20日《人民报》(伦敦)第13—16期(Quid pro Quo. In: Das Volk. London. Nr. 13, 30. Juli 1859; Nr. 14, 6. August 1859; Nr. 15, 13. August 1859; Nr. 16, 20. August 1859)。——428。
- 《协会临时章程》，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伦敦版](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In: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London] 1864)。——71、212、423、430。
- 《协会临时章程》，[1865年]在巴黎印成[传单](Congrès Ouvrie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èglement provisoire. [Trad. par le Bureau de Paris de l'A.I.T.] Paris [1865] [Flugbl.])。——430。
- 《1848年至1849年》，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1848 bis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1—3)。——421、427、622、626。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Abdr. aus der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Hamburg 1850. Mit Einleitung von F. Engels. Berlin 1895)。——421、618、622—623、633、635—636、638、640。
- 《英国与俄国》，载于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73号(England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73, 11. Januar 1854)。——422。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113、357、420、427。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附弗·恩格斯的序言和注，1885年斯图加特版(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Deutsch von E. Bernstein und K. Kautsky. Mit Vorwort und Noten von F. Engels. Stuttgart 1885)。——427、656。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91年马德里版(Miseria de la filosofía. Contestación á la filosofía de la miseria de Proudhon. Versión española, precedida de una carta de Federico Engels. Madrid 1891)。——242、427。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附弗·恩格斯的序言和注，1892年斯图加特第2版(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Deutsch von E. Bernstein und K. Kautsky. Mit Vorwort und Noten von F. Engels. 2. Aufl. Stuttgart 1892)。——357、427。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246、248、422、428。
-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614。
- 《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卡·马克思短篇著作》第3辑，1889[封面：1890]年巴黎版(Przyczynek do krytyki ekonomii politycznej. In: Marx, K. Pisma pomniejszych. Ser. 3. Paryż 1889 [auf dem Umschlag: 1890])。——428。
-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44号(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44, 1. Juni 1872)。——118—119、137、170、175、179、185—186、196、202、207、213。
-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63号(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63, 7. August 1872)。——127、137、180、190、193、196、204。
- 《资本论》，约·鲁瓦先生译，译文经作者审定，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 Trad.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ev.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428、534—535。
- 《资本论》第1卷 1886年哥本哈根版(Kapitalen. Bd. 1. København 1886)。——428。

-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rd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 Vol. 1. 2. London 1887)。——33、206、317、362、428、657。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113、114、120、129、136、141、144—146、153、155、172、174、177、179、181、182、190、204、209、213、215—218、249、252、317、331、345、362、397、422、428、522、523、532、533、705。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Т. 1. Кн. 1: Процесс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72)。——428、515。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2., verb. Aufl. Hamburg 1872)。——145、198、200、202、204、522。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3., verm. Aufl. Hamburg 1883)。——33、145—146、165—167、207、211、648、656。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弗·恩格斯编，1890年汉堡修订第4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4. durchges. Aufl.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0)。——144—147、206、207、211、215—217、428、648、656。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1890年莱比锡版(Kapitał. Krytyka ekonomii politycznej. T. 1. Lipsk 1890)。——428。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 Buch 2: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85)。——422、428、532、533、614、648、656、705。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1885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Т. 2. Кн. 2: Процессъ обращенія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85)。——428。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93年汉堡第二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 Buch 2: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2. Aufl.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3)。——428。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上、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弗·恩格斯编，1894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3. Buch 3: Th. 1. 2. Der Gesa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4)。——304、422、424、428、530、532、614、648、705。

### 弗·恩格斯

-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88年第6年卷(Schutzzoll und Freihandel.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6. 1888)。——414、657。
- 《编者序》(《〈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卷(Editor's Preface. In: K. Marx: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 Vol. 1. London 1887)。——657。
- 《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Po und Rhein. Berlin 1859)。——655。
- 《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载于西·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霍廷根—苏黎世版(Einleitung [zu Sigismund Borkheims Broschüre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In: Sigismund Borkheim: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Hottingen-Zürich 1888)。——657。
- 《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年汉堡版(In Sachen Brentano contra Marx wegen angeblicher Citatfälschung. Geschichtenerzählung und Dokumente. Hamburg 1891)。——656。

- 《德国的社会主义》，载于1892年《工人党年鉴》1892年里尔版(Le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In: 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 pour 1892. Lille 1892)。——329、342。
- 《德国农民战争》，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5/6)。——655。
- 《德国农民战争》，载于1870年4月2日—5月29日，6月4—25日，8月13、24日，9月7日，10月12、15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27—43、45—51、65、68、72、82、83号(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1870. Nr. 27, 2. April bis Nr. 43, 28. Mai; Nr. 45, 4. Juni bis Nr. 51, 25. Juni; Nr. 65, 13. August; Nr. 68, 24. August; Nr. 72, 7. September; Nr. 82, 12. Oktober; Nr. 83, 15. Oktober)。——655。
-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莱比锡第2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2., mit e. Einl. vers. Abdr. Leipzig 1870)。——655。
-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3. Abdr. Leipzig 1875)。——655。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版(Preuß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6)。——659。
- 《第三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Zur dritten Auflage.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3. verm. Aufl. Hamburg 1883)。——656。
- 《第四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弗·恩格斯编，1890年汉堡修订第4版(Zur vierten Auflage.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1. 4., durchges. Aufl.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0)。——113、114、137、206、215、216、221、656。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1—3[章]，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年第8年卷(Die auswärtige Politik des russischen Zarenthums. [Abschn.] 1—3.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8. 1890)。——656。

-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载于《共产党宣言》，经作者审定的德文第3版，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Vorwort. In: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3. Autor. Dtsch. Ausg. Hottingen-Zürich 1883)。——66。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附弗·恩格斯新版引言，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n: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von K. Marx. Neu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von F. Engels, und Dokumenten. Hottingen-Zürich 1885)。——657。
-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Zur Geschichte der preußischen Bauern. [Einleitung zu W. Wolff: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In: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Von Wilhelm Wolff. Hottingen-Zürich 1886)。——657。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652、694、696。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9. 1890/1891. Bd. 1)。——652。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定，1885年贝内文托版(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In relazione alle ricerche di Luigi H. Morgan. Versione riveduta dall'autore, di P. Martignetti. Benevento 1885)。——259、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1885年《现代人》(雅西)第17—21期和1886年第22—24期(Origina familiei, proprietatei private si a statului. In legatura cu cercetarile lui Lewis H. Morgan. In: Contemporanul, Iași. An. 4. 1885. Nr. 17—21; an. 5. 1886. Nr. 22—24)。——259、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哥本哈根版(Familjens, Privatejendo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 Tilslutning til Lewis Morgans Undersøgelser.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ørget af G. Trier. København 1888)。——259、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昂·腊韦译，1893年巴黎版(L'origine de la fa-

- 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État. (Pour faire suite aux travaux de L. H. Morgan.) Trad. française par H. Ravé. Paris 1893)。——259、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Zürich 1884)。——258、272、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2. Aufl. Stuttgart 1886)。——258。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9年斯图加特第3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3. Aufl. Stuttgart 1889)。——258、656。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2 [1891]年斯图加特第4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4., durchges. u. verm. Aufl. Stuttgart 1892)。——258、434、648。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5. Aufl. Stuttgart 1892)。——521。
- 《卡尔·马克思》，载于《人民历书》1878年不伦瑞克版(Karl Marx. In: Volks-Kalender. Braunschweig 1878)。——424。
-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载于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8年波士顿版(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by Karl Marx]. In: Karl Marx: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With extract from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Transl. into English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Boston 1888)。

——414。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载于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9年波士顿—伦敦版(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by Karl Marx]. In: Karl Marx;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With extract from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Transl. into English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Boston, London 1889)。——657。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Vorwort [zu „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nen“]. In: 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nen. Prozeß gegen den Ausschuß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wegen Aufrufs zum bewaffneten Widerstand. Hottingen-Zürich 1885. (9. [d. i. 8.] Februar 1849.) Aus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656。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1885年斯图加特版(Vorwort [zur ersten deutschen Ausgabe von Karl Marx’,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In: Karl Marx;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Deutsch von E. Bernstein und K. Kautsky. Stuttgart 1885)。——656。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自1883年德文第2版，1884年日内瓦版(Развитіе научнаго соціалізма. Переводъ со 2-го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1883. Женева 1884)。——256、361。

《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日内瓦版(Socy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Przekład z tłumaczenia francuzkiego Lafargue’a. Genève 1882)。——361、656。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1880年巴黎版(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 française par P. Lafargue. Paris 1880)。——361、656。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Benevento 1883)。——256、361、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Socialismo utópico y socialismo científico. Con la biografía y retrato del autor. Trad. de A. Atienza. Madrid 1886)。——256、361、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1年布加勒斯特版(Socialism utopic și socialism științific. București 1891)。——361、656。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年伦敦—纽约版(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Transl. by E. Aveling. London, New York 1892)。——358、363、656。
- 《[流亡者文献。一、]波兰人的声明》，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Flüchtlings-Literatur. I.] Eine Polnische Proklamation. In: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1871—1875). Berlin 1894)。——528。
- 《[流亡者文献。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Flüchtlings-Literatur. II.] Programm der blanquistischen Kommune-Flüchtlinge. In: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1871—75). Berlin 1894)。——529。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 Sonder-Abdr.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1888)。——413、648、656。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530、655。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 In: F. Engels;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1871—75). Berlin 1894)。——530。
- 《论法兰西内战》，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1891年第9年卷第2册(Ueber den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9. 1890/1891. Bd. 2)。——656。
- 《论历史唯物主义》，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2—1893年第11年卷第1册(Ue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11. 1892/1893. Bd. 1)。——363。
- 《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Zur Wohnungsfrage. (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 von

- 1872.2.durchgesehene Auflage.Hottingen-Zürich 1887)。——655。
- 《论住宅问题。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Leipzig 1872)。——655。
-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可能是1873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2: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 [vielm. 1873])。——655。
- 《论住宅问题。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1873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 3: 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Leipzig 1873)。——655。
-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载于《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Vorwort [zur zweiten, durchgelesenen Auflage Zur „Wohnungsfrage“]. In: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von 1872. 2. durchges. Aufl. Hottingen-Zürich 1887)。——97。
-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爱·艾威林译，1892年伦敦—纽约版(The Mark. In: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Transl. by Edward Aveling. London, New York 1892)。——362。
-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85年第3年卷第1期(Marx und Rodbertus.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3. Jg. H. 1. 1885)。——656。
- 《美国工人运动》，载于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24和25号(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In: Der Sozialdemokrat. Zürich. Nr. 24, 10. Juni 1887 und Nr. 25, 17. Juni 1887)。——658。
- 《美国工人运动。乔治运动。劳动骑士团—社会主义者》1887年伦敦—纽约版(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The George movement. The Knights of Labor. The Socialists. London, New York 1887)。——658。
- 《美国工人运动。乔治运动。劳动骑士团—社会主义者》1887年纽约版(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The George movement. The Knights of Labor. The Socialists. New York 1887)。——658。
-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年纽约版(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der „Lage der arbei-

- 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Hrsg. von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u. L.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312、658。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2. Aufl. Hottingen-Zürich 1886)。——361、648、655。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358、361、655。
- 《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8年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前进报》第52、61、64、75、79(莱比锡)附刊(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s Sozialismus. In: Vorwärts. Leipzig. 1878. Nr. 52, 5. Mai. Beil.; Nr. 61, 26. Mai. Beil.; Nr. 64, 2. Juni. Beil.; Nr. 75, 28. Juni. Beil.; Nr. 79, 7. Juli. Beil.)。——361。
- 《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前进报》(莱比锡)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hilosophie. In: Vorwärts. Leipzig. 1877. Nr. 1, 3. Januar; Nr. 2, 5. Januar; Nr. 3, 7. Januar; Nr. 4, 10. Januar; Nr. 5, 12. Januar; Nr. 6, 14. Januar; Nr. 7, 17. Januar; Nr. 10, 24. Januar; Nr. 11, 26. Januar; Nr. 17, 9. Februar; Nr. 24, 25. Februar; Nr. 25, 28. Februar; Nr. 36, 25. März; Nr. 37, 28. März; Nr. 44, 15. April; Nr. 45, 18. April; Nr. 49, 27. April; Nr. 50, 29. April; Nr. 55, 11. Mai; Nr. 56, 13. Mai)。——361。
- 《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前进报》(莱比锡)第1—2、3、4、5、6、127、130、139、152号附刊(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 Vorwärts. Leipzig. 1877. Nr. 1/2, 27. Juli. Beil.; Nr. 3, 10. August. Beil.; Nr. 4, 17. August. Beil.; Nr. 5, 7. September. Beil.; Nr. 6, 14. September. Beil.; Nr. 127, 28. Oktober. Beil.; Nr. 130, 4. November. Beil.; Nr. 139, 28. November. Beil.; Nr. 152, 30. Dezember. Beil.)。——361。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655。
- 《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Vom Verf.

- von „Po und Rhein“.Berlin 1860)。——655。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Zürich 1882 [vielm.1883])。——256、361、362、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2., unveränd.Aufl.Hottingen-Zürich 1883)。——256、361、362、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3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3., unveränd.Aufl.Hottingen-Zürich 1883)。——256、361、362、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1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enskab.In: Socialistisk Bibliotek. 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 Bd. 1; Socialistiske Pjecer.København 1885)。——256、361、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De ontwikkeling van het socialisme van utopie tot wetenschap.'s-Gravenhage 1886)。——256、361、656。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柏林第4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4., vervollst. Aufl. Berlin 1891)。——362、648、656。
- 《威廉·沃尔弗》，载于1876年7月1、8、22和29日，9月30日，10月7、14、21和28日，11月4和25日《新世界》杂志(莱比锡)第27、28、30、31、40、41、42、43、44、45和47期。——657。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5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05、106、107号(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05, 31. Oktober 1873; Nr. 106, 2. November 1873; Nr.107, 5. November 1873)。——528。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3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Separatabdr. aus dem „Volksstaat“. > (Leipzig [1873]))。——528、655。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弗·恩格

- 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In: F. Engels: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75). Berlin 1894)。——509、528。
- 《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Vorwort.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 Buch 2;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r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85)。——614—615、656。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载于弗·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658。
-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86年附录和1887年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7年]纽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appendix written 1886, and preface 1887.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312、392、397、658。
-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92年版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92年伦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preface written in 1892 by F. Engels.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London 1892)。——312、316—318、392、397。
- 《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载于1885年3月《公益》(伦敦)第1卷第2期(England in 1845 and 1885. In: The Commonweal. London. Vol. 1. Nr. 2. March 1885)。——113、318、398—399。
- 《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85年第3年卷(England 1845 und 1885.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3. 1885)。——398—399。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113、312、316、392、648、655。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92年斯图加特第2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2., durchges. Aufl. Stuttgart 1892)。——392、397、413、648。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载于弗·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Appendix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F.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ransl.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312、392、655、658。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载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伦敦版(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1892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London 1892)。——405—407。
-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Die Lage Englands. [I.] 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 London 1843.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694。
- 《再论〈福格特先生〉》，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Abermals „Herr Vogt“. In: F. Engels;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 1871—1875. Berlin 1894)。——528。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67、71、330、331、347、348、351、361、420、422、427、456、459、536、585、618、623、630、655。
- 《共产党宣言》[1869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Женева 1869])。——66、655。
- 《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1872年莱比锡新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 mit einem Vorw. der Verf. Leipzig 1872)。——647。
- 《共产党宣言》，译自1872年德文版，附作者序言，1882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1872. Съ предисловіемъ авторовъ. Женева 1882)。——66、520。
- 《共产党宣言》，维·皮耶卡尔斯基译，1883年日内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 1847. Przelozyl Witold Piekarski, Genewa 1883)。——68、351、352、655。
- 《共产党宣言》1885年哥本哈根版(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Med Forfat-

- ternes Forord. (Efter den tredje avtoriserede tyske Udgave.) In: Socialistisk Bibliotek. 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 B. 1. Socialistiske Pjecer, København 1885)。——68、655。
-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5年8月29日，9月5、12、19、26日，10月3、10、17、24、31日和11月7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1—11期(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In: Le Socialiste. Organe du Parti ouvrier. Paris. 1885. Nr. 1, 29. August; Nr. 2, 5. Septermber; Nr. 3, 12. Septermber; Nr. 4, 19. Septermber; Nr. 5, 26. Septermber; Nr. 6, 3. Oktober; Nr. 7, 10. Oktober; Nr. 8, 17. Oktober; Nr. 9, 14. Oktober; Nr. 10, 31. Oktober; Nr. 11, 7. November.)。——68、655。
-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6年6月11、18、25日，7月2、16、23、30日和8月4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14—17和19—22期(Manif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In: El Socialista. Madrid. Nr. 14—17, 19—22; 11, 18, 25 Juni, 2, 16, 23, 30 Juli, 4 August 1886)。——68、655。
- 《共产党宣言》1886年马德里版(Manif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Madrid 1886.)。——68、655。
- 《共产党宣言》，弗·恩格斯编辑并作注，1888年伦敦版(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 and annot. by F. Engels. London 1888)。——68、655。
- 《共产党宣言》，附弗·恩格斯新序言，1890年伦敦增订第4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4. autor. deutsche Ausg. Mit e. neuen Vorw. von F. Engels. London 1890)。——427。
- 《共产党宣言》1892年伦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 Wydanie drugie. Londyn 1892)。——351。
- 《共产党宣言》1893年米兰版(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di F. Engels. Milano 1893)。——459、536、655。
-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882年1月21日。手稿)(Vorrede zur zweiten russischen Ausgabe des „Manifeste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21. Januar 1882)。——66、520、527。
-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载于《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1872年莱比锡新版(Vorwort. In: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 mit e. Vorwort der Verfasser. Leipzig 1872)。——71、522。
- 《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隆版(Zwei politische

-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I. Der erste Preßprozeß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I. Prozeß des Kreis-Ausschusses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Köln 1849)。——427。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年伦敦—汉堡版(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Hambourg 1873)。——432。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Frankfurt a.M. 1845)。——363—365、419、427、655。
-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622。
- 《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版(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Im Auftrag des Haager Congresses verfaßter Bericht über das Treiben Bakunin's und der Allianz der socialistischen Demokratie. Deutsche Ausg. von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Uebers. von S. Kokosky. Braunschweig 1874)。——432。
- 《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1872年伦敦版(Résolutions du Congrès Général tenu à La Haye du 2 au 7 septembre 1872.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Londres 1872)。——432、697。

## 其他作者的著作

### A

- 阿[伦特],奥·《简讯》,载于1890年12月4日《德国周报》(柏林)第49期(A [rendt], O.: Mittheilung. In: Deutsches Wochenblatt. Berlin. Nr. 49, 4. Dezember

1890)。——222。

埃里蒂埃,路·《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载于1892年8月6、13、20日,9月3、17日,10月1、8、22日,11月5、12、19日,12月10、24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2、33、34、36、38、40、41、43、45、46、47、50、52号(Héritier, L.: Die Juraföderation und Michael Bakunin. In: Berliner Volks-Tribüne. 1892. Nr. 32, 6. August; Nr. 33, 13. August; Nr. 34, 20. August; Nr. 36, 3. September; Nr. 38, 17. September; Nr. 40, 1. Oktober; Nr. 41, 8. Oktober; Nr. 43, 22. Oktober; Nr. 45, 5. November; Nr. 46, 12. November; Nr. 47, 19. November; Nr. 50, 10. Dezember; Nr. 52, 24. Dezember)。——429—431。

## B

巴尔,海·《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载于1890年5月28日《现代生活自由论坛》(柏林)第17期(Bahr, H.: Die Epigonen des Marxismus. In: Freie Bühne für modernes Leben. Berlin H. 17, 28. Mai. 1890)。——98。

巴霍芬,约·雅·《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Bachofen, J. J.: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260、262。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1751—1780年巴黎版(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mis en ordre et publié par Denis Diderot et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aris 1751—1780)。——376。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第3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 1—2. Leipzig 1841. Bd. 3 [u. d. T.]: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Braunschweig 1842)。——554—555。

鲍威尔,布·《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Bauer, B.: Christus und die Caesaren.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hums aus dem römischen Griechenthum. Berlin 1877)。——554—555。

贝纳里,斐·《对〈启示录〉第13章第18节中数字666(ΧξϞ)及其变体616(ΧιϞ)的解释》,载于《思辨神学杂志》[柏林]1836年第1年卷(Benary, F.: Erklärung

- der Zahl 666(Χξζ)in der Apocalypse(13,18.)und ihrer Viariante 616(Χιζ).In: 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Theologie.Hrsg.von Bruno Bauer.Jg.1.1836)。——570、572。
- 倍倍尔,[奥·][《1892年12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92—1893年第八届第二次例会》1893年柏林版第1卷(Bebel,[A.]:[Rede im Deutschen Reichstag,13.Dezember 1892.]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8. Legislaturperiode.2.Session 1892/93.Bd.1.Berlin 1893)。——469。
- 比斯利,爱·斯·《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伦敦)新辑第47期(Beesly,E.S.: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n: The Fortnightly Review.London.Nr.47.New series.1.November 1870)。——116—118、140、171、176、183—184、190—191。
- 《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2日《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伦敦)第30卷第785期(Mr.Beesly and the Intenational Association.In: 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London. Vol.30.Nr.785,12.November 1870)。——183。
- 《比亚吉尼关于罗马银行的报告》,载于1893年1月19—20日《那不勒斯信使报》第19号(La Banca Romana secondo la relazione Biagini.In: Corriere di Napoli.Nr.19,19./20.Januar 1893)。——449。
- 《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94年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14号(Eine Erklärung der Rekadtion ... In: Der Sozialdemokrat,Zürich.Nr.17,23. April 1885)。——89。
- 宾宁,W.《工联代表大会》,载于1887年9月17日《公益》(伦敦)第3卷第88期(Binning,W.:The Trades' Unions Congress. In: The Commonweal.London. Vol.3.Nr.88,17.September 1887)。——72。
- [波措-迪-博尔哥,沙·安·]《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1825年10月4日(16日)于巴黎》,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Pozzo di Borgo, Ch.A.:] Dépêche réservée du général Pozzo di Borgo, en date de Paris du 4/16 Octobre 1825.In: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ublié en 3 livraisons, de juillet 1853 à septembre 1854. Paris 1854)。——30。

- 波克罕,西·《纪念 1806—1807 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Borkheim, S.: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Hottingen-Zürich 1888)。——657。
- 伯麦,雅·《黎明》(又名《曙光》),载于《雅科布·伯麦全集》1832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Böhme, J.: Aurora oder Morgenröthe im Aufgang. In: Jakob Böhme's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W. Schiebler. Bd. 2. Leipzig 1832)。——364。
- 伯麦,雅·《上帝的本质和三要素》,载于《虔诚和开悟的德国通神者雅科布·伯麦的所有神圣著作……》1730 年版[出版地不详]第 2 卷(Böhme, J.: De tribus principiis oder, Beschreibung der drey Principien Göttlichen Wesens. In: Theosophia relevata. Das ist: Alle Göttliche Schriften des Gottseligen und Hoherleuchteten Deutschen Theosophi Jacob Böhmens ... Bd. 2. [O. O.] 1730)。——364。
- 博维奥,乔·《没有书信的讨论》,载于 1877 年 2 月 2 日《论坛报》(罗马)第 33 号(Bovio, G.: Discussione non epistole. In: La Tribuna. Roma. Nr. 33, 2. Februar 1877)。——347—349。
- 勃朗,路·《劳动组织》1841 年巴黎版(Blanc, L.: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is 1841)。——331。
- 《柏林,8 月 12 日。卡·马克思先生……》,载于 1872 年 8 月 15 日《协和》(柏林)第 2 年卷第 33 期(\* Berlin, 12. August. Herr K. Marx ... In: Concordia. Berlin. Jg. 2. Nr. 33, 15. August 1872)。——140、214。
-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根·德尔编,1843 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ou l'on découvrela fausse idée qui règne dans le monde a l'égard des ces trois article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345、669。
- 布雷默,尤·《理屈词穷》,载于《人民呼声报》(马格德堡),日期不详(Bremer, J.: Der Weisheit Ende. In: Volksstimme. Magdeburg)。——101。
-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载于 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柏林)第 10 号([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citirt. In: Concordia. Berlin. Nr. 10, 7. März 1872)。——115、137、144、170、175、184、196、200、207、213。

-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一部分》,载于1872年7月4日《协和》(柏林)第27号([Brentano,L.:]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gt.I. In:Concordia.Berlin.Nr.27,4.Juli 1872)。——137、184、186、190、201、202、208、214。
-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二部分》,载于1872年7月11日《协和》(柏林)第28号([Brentano,L.:]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gt.II.In:Concordia.Berlin.Nr.28,11.Juli 1872)。——137、180、209、214。
- 布伦坦诺,路·《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1890年柏林版(Brentano,L.:Meine Polemik mit Karl Marx.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s Fortschritts der Arbeiterklasse und seiner Ursachen.Berlin 1890)。——113、114、122、131、137、215、222。
- 布伦坦诺,路·《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载于1890年11月6日《德国周报》(柏林)第3年卷第45期(Brentano,L.:Meine Polemik mit Karl Marx.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s Fortschritts der Arbeiterklasse und seiner Ursachen.In:Deutsches Wochenblatt.Berlin Jg.3.Nr.45,6.November 1890)。——221。
- 布伦坦诺,路·《现代工人公会》第2卷《英国工会批判》1872年莱比锡版(Brentano,L.: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Bd.2.Zur Kritik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Leipzig 1872)。——213。
- 布伦坦诺,路·[《1890年9月26—27日在社会政策协会全体大会上的演说》],载于《社会政策协会文集》1890年莱比锡版第47辑(Brentano,L.:[Rede auf Generalversammlung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26. und 27. September 1890.]In: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Leipzig 1890.Nr.47.)。——385。
- [布伦坦诺,路·]《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载于1872年8月22日《协和》(柏林)第34号([Brentano,L.:] Weiteres zur Charakteristik von Karl Marx. In:Concordia.Berlin.Nr.34,22.August 1872)。——214。

## C

- 查普卡·冯·[温斯特滕,奥·][《1893年1月17日在奥地利帝国议会的演说》],载于1893年1月20日《工人报》(维也纳)第3号(Czapka von [Win-stetten, A.]: [Rede im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rath, 17. Januar 1893.] In:

Arbeiter-Zeitung. Wien. Nr. 3, 20. Januar 1893)。——454。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1879年日内瓦第2版第5卷《论公社的土地所有制》, 引自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Сочинения. 2. изд. Т. 5: Обь общинномъ владѣніи землею. Genève 1879. Nach: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ія. Женева 1885)。——515—516。

##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361。

德吕蒙, 爱·《犹太人的法国。当代史评论》[1886年]巴黎版第1—2卷(Drumont, É.: La France juive. Essaid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T. 1. 2. Paris [1886])。——60。

杜林, 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 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ühring, E.: 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2. theilw. umgearb. Aufl. Leipzig 1876)。——361。

杜林, 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修订第2版(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2. theilw. umgearb. Aufl. Berlin 1875)。——102, 361。

杜林, 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 E.: 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361。

## E

恩斯特, 保·《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载于1890年5月14日《现代生活自由论坛》(柏林)第15期(Ernst, P.: Frauenfrage und sociale Frage. In: Freie Bühne für modernes Leben. Berlin Nr. 15, 14. Mai. 1890)。——101。

恩[斯特], 保·《马克思主义的危险》, 载于1890年8月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2号附刊(E[rnst], P.: Gefahren des Marxismus. In: Berliner Volks-Tribüne.

Nr.32,9.August 1890.Beibl.)。——102。

## F

法耳梅赖耶尔,雅·菲·《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1836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2册(Fallmerayer, J. Ph.: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Ein historischer Versuch. Theil 1. 2. Stuttgart, Tübingen 1830—1836)。——573。

《反谷物法鼓动》,载于《评论季刊》(伦敦)1843年第71卷(The Anti-Corn-Law Agitation. In: The Quarterly Review. Vol.71. London 1843)。——318,399。

福尔马尔,[格·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就“农业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议题所作的报告》],载于1894年10月26日《前进。柏林人民报》第250号(Vollmar, [G.von]: [Bericht über den Frankfurter Parteitag der SPD zum Tagesordnungspunkt „Agrarfrage und Sozialdemokratie“.] In: Vorwärts. Berlin. Nr.250, 26. Oktober 1894)。——581。

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Fawcett, H.: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London 1865)。——167。

《福斯特先生在布拉德福德》,载于1871年10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7184号(Mr.Forster at Bradfort. In: The Times. London. Nr.27 184, 3. Oktober 1871)。——381。

## G

盖得,茹·/保·拉法格《工人党纲领》[1883年]巴黎版(Guesde, J./P.Lafargue: Le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Son histoire-ses considérants-ses articles. Paris [1883])。——595—598,631。

格莱斯顿,威·尤·[《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见[西利,罗·本·]。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报》(伦敦)第22418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22418, 17. April 1863. [U.d.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121,126,134,151,152,189,196,209。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伦敦)第2219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

- 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Morning Star. London. Nr. 2219, 17. April 1863. [U.d.T.:] The budget.)。——121、126、134、145—147、151、152、188—189、196、209、215、217—219。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邮报》(伦敦)第27872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7872, 17. April 1863. [U.d.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124、126、151、2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每日电讯》(伦敦)第2439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Nr. 2439, 17. April 1863. [U.d.T.:] The budget.)。——123、126、151、2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5282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5282, 17. April 1863. [U.d.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124、126、151、2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旗帜报》(伦敦)第12069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Standard. London. Nr. 12069, 17. April 1863. [U.d.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124—126、151、2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35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35, 17. April 1863. [U.d.T.:] The budget.)。——116—122、126—128、130、134、136、140、144—145、147、151、172—173、178、179、184—188、191—194、196、198、199、201—203、208—211、214、217—219。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5630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5630, 17. April 1863. [U.d.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124、126、151、219—2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年伦敦版第3辑第170卷(Gladstone, W.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ser. Vol.

170.London 1863)。——116、118、119、122、125、127、128、130、134、140、148、151—154、156、165—166、168—170、173、178、179、187—192、194、197、198、200、202、205、207—212、214、217。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年4月16日星期二》,载于威·尤·格莱斯顿《1853、1860—1863年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年伦敦版([Gladstone, W. E.] Financial statement of 1863. Delivered on Thursday, April 16, 1863. In: W. E. Gladston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1853, 1860—1863. To whom are added, a speech on tax-bills, 1861, and on charities, 1863. London 1863)。——178。

格莱斯顿,威·尤·[《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年伦敦版第3辑第174卷(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April 186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ser. Vol. 174. London 1864)。——156、166—167。

## H

哈克斯特豪森,奥·冯·《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Haxthausen, A. vo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eil 1. 2. Hannover 1847. Theil 3. Berlin 1852)。——511、522。

《海德公园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游行》,载于1891年5月4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9092号(Eight Hours' Day Demonstration in Hyde Park. In: The Daily Chronicle. London. Nr. 9092, 4. Mai 1891)。——662。

《荷兰莱顿公共古物博物馆的希腊纸草书》1843年莱顿版(Leemans, C. (Hrsg.): Papyri graeci musei antiquarii publici Lugduni-Batavi. Leiden 1843)。——557。

[赫尔岑,亚·伊·]《俄国和旧世界》,引自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Герцен, А. И.:] Старій міръ и Руссія. Nach: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ія. Женева 1885)。——511、512。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uard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8)). —— 238。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 莱·冯·亨宁编, 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 G.W.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eil 1. 2. Hrsg. von L. von Henning.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3—5)). —— 368—369。

## J

吉芬, 罗·《资本的增长》1889年伦敦版(Giffen, R.: The growth of capital. London 1889)。——602。

[吉勒斯, 斐·]《论艾威林—吉勒斯事件》, 载于1891年9月17日《汉堡回声报》第218号([Gilles, F.:] Zur Affäre Aveling-Gilles. In: Hamburger Echo. Nr.218, 17. September 1891)。——664。

居利希, 古·《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Gulich, 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2 Jena 1830)。——13。

## K

[卡尼茨伯爵, 汉·威·亚·冯][《关于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93—1894年第九届第二次例会》1894年柏林版附录第2卷([Kanitz, H. W. A. von:] [Antrag zur Verstaatlichung der Getreideeinfuhr.]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 9. Legislaturperiode. 2. Session 1893/94. 2. Anlagenbd. Berlin 1894)。——600。

考茨基, 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87年11月4日、11月11日、11月18日、11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45、46、47、48、49、50号(Kautsky, K.: Friedrich Engels. In: Der Sozialdemokrat. Zürich. 1887. Nr. 45, 4. November; Nr. 46, 11. November; Nr. 47, 18. November; Nr. 48, 25. November; Nr. 49, 2. Dezember; Nr. 50, 9. Dezember.)。——658。

考茨基, 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1887]年

- 布吕恩版 (Kautsky, K.: Friedrich Engels. In: Oesterreichischer Arbeiter-Kalender für das Schaltjahr 1888. Hrsg. v. d. Redaction des „Volksfreund“ in Brünn. Brünn[1887]). —— 648—649、658。
- [考茨基,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祝贺他70岁生日》,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Kautsky, K.:] Friedrich Engels. Zu seinem siebenzigsten Geburtstag.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9. 1890/91. Bd. 1.)。 —— 649、658。
- 考茨基,卡·《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 (Kautsky, K.: 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 Mit e. history. Einl. Stuttgart 1888)。 —— 15。
- 柯瓦列夫斯基,马·《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 (Kovalevsky, M.: 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 (Skrifter utgifna af Lorénska stiftelesen. Nr. 2))。 —— 362。
-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1894年11月14日《前进报》(柏林)第266号 (Das Grundwer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In: Vorwärts. Berlin. Nr. 266, 14. November 1894)。 —— 614。
- 库尔曼,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 (Kuhlmann, G.: Die Neue Welt oder das Reich des Geistes auf Erden. Verkündigung. Genf 1845)。 —— 551。

## L

- 拉伯克,约·《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 (Lubbock, J.: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1870)。 —— 266。
- 拉伯克,约·《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82年伦敦第4版 (Lubbock, J.: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4. ed. London 1882)。 —— 268。
- 拉法格,保·《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代表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载于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第

- 38号附刊(Lafargue, P.: Das bäuerliche Eigenthum und die wirthschaftliche Entwicklung.Referat auf dem Kongreß von Nantes im Namen des Nationalraths der Arbeiterpartei. In: Der Sozialdemokrat. Berlin, Nr. 38, 18. Oktober 1894, Berl.)。——609。
- 《拉法格先生案件》,载于1891年11月17日《每日纪事报》(伦敦)第9261号(The Case of M. Lafargue, In: The Daily Chronicle, London, Nr. 9261, 17. November 1891.)——307。
- 拉夫莱,埃·德·《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83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30987号(Laveleye, E. de: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30 987, 26. November 1883)。——194。
- 拉普拉斯,皮·西·德《论天体力学》1798—1825年巴黎版第1—5卷(Laplace, P.-S. de: Traité de mécanique céleste. T. 1., 2. Paris an VII [1798]. T. 3. Paris an XI [1802]. T. 4. Paris an XIII [1805]. T. 5. Paris an XIII 1825)。——367。
- 拉萨尔,斐·《工人纲领。关于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阶级想法的具体联系》1862年柏林版(Lassalle, F.: Arbeiter-Programm. Ue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Berlin 1862)。——330。
- 莱瑟姆,罗·戈·《记述民族学》(两卷集)1859年伦敦版第一卷《亚欧东北部》,引自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伦敦—纽约新版(Latham, R. G.: Descriptive ethnology. Vol. 1. 2. Vol. 1: Eastern and Northern Asia-Europe. London 1859. Nach: John Ferguson Ma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A new ed. London, New York 1886)。——264。
- 《老一套的诡计》,载于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柏林)第278号(Ein alter Kunstgriff. In: Freisinnige Zeitung, Berlin, Nr. 278, 26 November 1892)。——479。
- 勒南,厄·《反基督者》,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73年巴黎版第4卷(Renan, E.: L'Antichrist. In: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iv. 4. Paris 1873)。——556—557, 572。
- 勒南,厄·《基督教起源史》(八卷集)1863—1883年巴黎版(Renan, E.: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iv. 1—8. Paris 1863—1883)。——549, 557, 572。
- 勒南,厄·《使徒》1866年纽约版(Renan, E.: The Apostles. New York 1866)。

——549。

勒南,厄·《圣保罗》,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69年巴黎版第3卷(Renan, E.: Saint Paul. In: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iv. 3. Paris 1869)。——561。

[利文,赫·安·]《利文伯爵的紧急电报。1825年10月18日(30日)于伦敦》,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Lieven, Ch. A.]: Dépêche secrète et confidentielle du comte Lieven, en date de Londres, le 18/30 octobre 1825. In: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ublié en 3 livraisons, de juillet 1853 à septembre 1854. Paris 1854)。——29—30。

《两次有趣的访谈》,载于1893年1月21—22日《晚邮报》(米兰)第21号(Due interviste interessanti. Un colloquio con Tanlongo prima dell'arresto. In: Corriere della sera. Milano. Nr. 21, 21./22. Januar 1893)。——451。

罗杰斯,詹·埃·《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Rogers, J. E.: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1793). Vol. 1. Oxford 1866)。——158。

《罗马银行丑闻》,载于1893年1月21—22日《世纪报》(米兰)第9627号(Gli scandali bancari di Roma. In: Il Secolo. Milano. Nr. 9627, 21./22. Januar 1893)。——448。

《罗马银行的破产》,载于1893年1月22—23日《世纪报》(米兰)第9628号(Il crac della Banca Romana. In: Il Secolo. Milano. Nr. 9628, 22./23. Januar 1893)。——452。

罗伊,亨·《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Roy, H.: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London 1864)。——116、117、121、140、141、144—146、150、167、171、172、176、177、179—182、190、191、213、215、216、218、219。

洛克,约·《人类理智论》(四卷集)1690年伦敦版(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four books. London 1690)。——365。

## M

马克思,爱·《国际大众运动记事》,载于1884年2月《今日》(伦敦)第1卷第2

- 期(Marx, E.: Record of the International Popular Movement. In: To-Day. London. Vol. 1. Nr. 2, Februar 1884)。——195、197、210。
- 马克思, 爱·《答塞德利·泰勒先生》, 载于 1884 年 3 月《今日》(伦敦) 第 1 卷第 3 期(Marx, E.: Gentlemen, Mr. Sedley Taylor... In: To-Day. London. Vol. 1. Nr. 3, März 1884)。——211、214。
- 马志尼, 朱·《战争》, 载于 1859 年 5 月 2—16 日《思想和行动》(伦敦) 第 17 期(Mazzini, G.: La Guerra. In: Pensiero ed Azione. London. Nr. 17, 2.—16. Mai 1859)。——39。
- 麦克伦南, 约·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76 年伦敦版(MacLennan, J. F.: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 1876)。——267。
- 麦克伦南, 约·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 年伦敦—纽约新版(MacLennan, J. F.: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A new ed. London, New York 1886)。——264—265、270。
- 曼纳斯, 约·《英格兰的托付, 及其他诗歌》1841 年伦敦版(Manners, John: England's Trust, and other poems. London 1841)。——383。
- 毛奇, [赫·卡·伯·]《1828—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Moltke, [H. K. B.]: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32。
- 梅林, 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 年不来梅增订第 2 版(Mehring, F.: 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Lehre. 2. verb. u. verm. Aufl. Bremen 1878)。——214。
- 梅林, 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四、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载于《凉亭。家庭画报》(莱比锡) 1880 年第 7 期(Mehring, F.: Zur Geschichte der Socialdemokratie. 4.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Der internationale Arbeiterbund. In: 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 Leipzig. Nr. 7, 1880)。——62。
- 《美国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 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2—1893 年第 11 年卷第 1 册(Die amerikanische Textilindustrie auf dem chinesischen Markt. In:

-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11. 1892/1893. Bd. 1)。——416。
- 门格尔,安·《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Menger, A.: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Stuttgart 1886)。——547。
- 米海洛夫斯基,尼·康·《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Карль Марксъ передъ судомъ г. Ю. Жуковскаго. In: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Петербургъ. Nr. 10, Oktober 1877)。——521。
- 米克洛希奇,弗·《斯拉夫语比较语法》1852年维也纳版第1卷《语音学》(Miklosich, F.: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lavischen Sprachen. Bd. 1. Lautlehre. Wien 1852)。——12。
-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268—269。
-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91年斯图加特版(Morgan, L. H.: Die Urgesellschaf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aus der Wildheit durch die Barbarei zur Zivilisation. Aus dem Engl. übertr. von W. Eichhoff unter Mitw. Von Karl Kautsky. Stuttgart 1891)。——269。
- [摩尔根,路·亨·]《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载于1847年《美国评论》(纽约)第5期([Morgen, L. H.]: Letters on the Iroquois. [Gez.:] Skenandoah. In: American Review. New York. Nr. 2—12, vom Februar bis Dezember 1847)。——264。
- 摩尔根,路·亨·《Ho-dé-no-sau-nee 或易洛魁联盟》1851年罗切斯特—纽约—波士顿版(Morgen, L. H.: 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 Rochester, New York, Boston 1851)。——264。
- 摩尔根,路·亨·《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Morgen, L. H.: System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17, 218))。——266。

## P

普列汉诺夫,格·[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载于1892年

- [可能是 1893 年]《社会民主党人》(塞夫利耶沃)第 2 期(Плеханов, Г. [В.]: О задачѣхъ социалистовъ въ борьбѣ съ голодомъ въ Россіи(Письма къ молодымъ товарищамъ). In: Соціалъ-демократъ. Севлиево. Кн. 2. 1892 [vielm. 1893]). — 503。
- 普列汉诺夫, 格·[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载于 1892 年[可能是 1893 年]《社会民主党人》(塞夫利耶沃)第 2 期(Плеханов, Г. [В.]: Хегелевата философия на историята. In: Соціалъ-демократъ. Севлиево. Кн. 2. 1892 [vielm. 1893]). — 503。
- 普列汉诺夫, 格·瓦·《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日内瓦版(Плеханов, Г. В.: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ія. Женева 1885)。 — 515—516。
- 普列汉诺夫, 格·《1890 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 1890—1891 年第 9 年卷第 2 册(Plechanow, G.: Die sozialpolitischen Zustände Rußlands im Jahre 1890.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9. 1890/1891. Bd. 2)。 — 299。
- 蒲鲁东, 皮·约·《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68 年巴黎—布鲁塞尔—莱比锡—里窝那新版(Proudhon, P. J.: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sup>e</sup> siècle. <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Nouv. éd. Paris, Bruxelles, Leipzig, Livourne 1868)。 — 235。

## Q

- 《〈前进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农业问题》, 载于 1894 年 11 月 4 日《科隆人民报》第 656 号(Der Vorwärt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 Parteitag und die Agrarfrage. In: Kölnische Volkszeitung. Nr. 656, 4. November 1894)。 — 587。

## R

- 日罗-特隆, 亚·《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 年日内瓦—巴黎版(Giraud-Teulon, A.: Les origines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e, Genève, Paris 1884)。 — 270。
- 日罗-特隆, 亚·《家庭的起源》1874 年日内瓦—巴黎版(Giraud-Teulon, A.: 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 Questions sur les antécédents des sociétés patriarcales. Genève, Paris 1874)。 — 268, 270, 276。
- 茹柯夫斯基, 尤·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 载于 1877 年 9 月

《欧洲通报》(圣彼得堡)第9期(Жуковский, Ю. Г.: Карл Маркс и его книга о капиталъ. In: Вѣстникъ Европы. С.-Петербургъ. Nr. 9, September 1877)。——521。

## S

《社会党的政策》,载于1894年10月24日《改良报》(罗马)(I provvedimenti di P. S. In: La Riforma. Roma. 24. Oktober 1894)。——584。

《声明》,载于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14号(Erklärung. In: Der Sozialdemokrat. Zürich. Nr. 14. 2. April 1885)。——89。

圣西门, [克-昂·]德, 奥·蒂·《关于欧洲社会的改组, 或关于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巴黎版(Saint-Simon, [C.-H.] de, A. T.: 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106、671。

施特恩堡, 列·[雅·]《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 载于1893年《民族志学评论》(莫斯科)第2期(Штернбергъ, Л. [Я.] Сахалинскіе Гіяки. Замѣтки изъ личныхъ наблюдений. In: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ѣніе. Изданіе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го Отдѣла. Москва. Nr. 2. 1893)。——438。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第2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London 1776)。——181。

## T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 Annales)。——557。

塔西佗《历史》(Tacitus: Historiae)。——557。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 Germania)。——267、575。

泰勒, 塞·《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30990号(Taylor, 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30990, 29. November 1883)。——195、197、202、209、214。

泰勒, 爱·伯·《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Tylor, E. B.: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

zation, London 1865)。——260。

泰勒,塞·《致〈今日〉编辑》,(马克思博士和格莱斯顿先生 1863 年的预算演说),载于 1884 年 3 月《今日》(伦敦)第 1 卷第 3 期(Taylor, S.: To the Editors of „To-Day“.(Dr. Marx and Mr. Gladstone's Budget Speech of 1863.) In: To-Day, London, Vol. 1. Nr. 3, März 1884)。——200、202、211。

《汤隆古被押送至监狱》,载于 1893 年 1 月 25—26 日《晚邮报》(米兰)第 25 号 (Il trasporto del tanlongo alle carcer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Milano, Nr. 25, 25./26. Januar 1893)。——451。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 年伦敦版 (Thompson, W. Th.: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 London 1824)。——357。

## W

瓦茨,约·《棉荒实况》1866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 (Watts, J.: The facts of the cotton famine, London, Manchester 1866)。——159。

[威廉二世]《我决定……》,载于 1890 年 2 月 5 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第 34 号 ([Whilelm II.:] Ich bin entschlossen ... In: 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34, 5. Februar 1890)。——52、57。

[威廉二世]《在我就职时……》,载于 1890 年 2 月 5 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第 34 号 ([Whilelm II.:] Bei Meinem Regierungsantritt ... In: 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34, 5. Februar 1890)。——52、57。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 年伦敦版第 1 卷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Vol. 1, London 1833)。——173、185、192。

沃邦, [塞·]《王国什一税草案》,载于《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 年巴黎版 (Vauban, [S.]: Projet d'une dîme royal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345、

669。

沃尔弗,威·《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Hottingen-Zürich 1886)。——657。

[西利,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吁》1843年伦敦修订第2版([Seeley, R.B.:]The perils of the nation. An appeal to the legislature, the clergy, and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2.ed., rev. London 1843)。——142、165。

## Y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论》(Irenaeus: Adversus reses)。——570—572。

## Z

《再谈党代表大会》,载于1894年11月10日《前进。柏林人民报》第263号。Nochmals der Parteitag. In: Vorwärts. Berlin. Nr. 263, 10. November 1894)。——587。

《致本报读者》,载于1890年8月31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105号(An unsere Leser. In: 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 Dresden. Nr. 105, 31. August 1890)。——81、84、102。

《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载于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莫斯科)第284号(Въ засѣдані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го отдѣла Общества любителей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ія. In: Русскія вѣдомости. Москва. Nr. 284, 14. Oktober 1892)。——434—438。

## 法律、法令、文件

### B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 London 1884)。——324、404。

《步兵操典》1888年柏林版(Exerzier-Reglement für die Infanterie. Berlin 1888)。——469—470。

## D

-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 of all mines in Great Britain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23 & 24 Vict.cap.151 do not apply.With ref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s employed in such mines.London 1864)。——158。
-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草案》，载于1890年8月8日《柏林人民报》第182号(Organisations-Entwurf fü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In: Berliner Volksblatt.Nr.182,8.August 1890)。——82。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In: 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Congres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Gotha vom 22. bis 27. Mai 1875. Leipzig 1875)。——224、279。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10月14—20日》1890年柏林版(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beschlossen auf dem Parteitag zu Erfurt 1891. In: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Erfurt vom 14. bis 20. Oktober 1890. Berlin 1891)。——332、604。
- 《德意志帝国宪法》，载于1871年《德意志联邦法令通报》(柏林)第16号(《帝国法令通报》)(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Bundes-Gesetzblatt des Deutschen Bundes. Berlin. Nr. 16. (Reichs-Gesetzblatt. 1871. Berlin))。——88、287。
- 《德意志帝国刑法典》，载于1871年《帝国法令通报》(柏林)第24号(Straf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In: Reichs-Gesetzblatt. 1871. Berlin. Nr. 24)。——88。

## F

- 《法国农业纲领》，载于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第38号(Das französische Agrarprogramm. In: Der Sozialdemokrat. Berlin. Nr. 38, 18. Oktober

1894)。——587。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载于1878年10月22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第249号晚报（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49, 22. Oktober 1878. Abends）。——50、51、55、59、89、103、227、256、279、287、300、332、390、580、585、630、631、692、697、704。

## G

《根据1863年11月1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省议会两院的辩论速记记录。第二议院》1864年柏林版第2卷和第3卷（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ie Allerhöchste Verordnung vom 1. November 1863 einberufenen beiden Häuser des Landtages. Haus der Abgeordneten. Bd. 2. u. 3. Berlin 1864）。——452。

《工人党的农业纲领》，载于1894年11月《新纪元》（巴黎）第11号（Le programme agricole du Parti ouvrier. In: L'Ère nouvelle. Paris. Nr. 11, November 1894）。——587、597—604、609。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 1863.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London 1864）。——162—164。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第7号报告。1864年。附附录》1865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endix. 1864. London 1865）。——157。

《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aris 1854）。——30。

《关于在法定期限内流通银行券的法令。1874年4月30日》，载于《意大利王国法律法令官方汇编》1874年罗马版第41卷（Legge sulla circolazione cartacea durante il corso forzoso. 30 aprile 1874. In: Raccolta ufficiale delle leggi e decreti del Regno d'Italia. Vol. 41. Roma 1874）。——444。

**H**

《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第 1 号报告》1885 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London 1885)。——315、396。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0 卷(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3.ser.Vol.170.London 1863)。——116—119、122、125、127、128、130、134、136、140、142、147—154、156、168、170、172—174、177—179、187—192、194、197、198、202、205、207—212、214、219。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74 卷(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3.ser.Vol.174.London 1864)。——156。

**K**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6 年 7 月 23 日刊印,1866 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July 1866.(Report from Committees.Session 1 February—10 August 1866.Vol. 14.[London] 1866))。——158。

**L**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 年伦敦版(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Part.VI.)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London 1866)。——166。

**M**

《民法典》——见《拿破仑法典》。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 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et seule officielle.Paris 1808)。——377、596、599。

**P**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四卷集)1794年柏林第2版(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Th.1—4.2.Ausg.Berlin 1794)。——88。

**S**

《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1888年12月28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147号(Programa del Partido Sicialista Obrero. In: El Socialista. Madrid. Nr. 147, 28. Dezember 1888)。——293。

**T**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1—6号》(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Report 1—6 of the commissioners)。——159—161。

**X**

《选举委员会的报告。[1871年3月30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90号(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s Elections. [Paris, 30 mars 1871.]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Nr. 90, 31. März 1871)。——232。

**Y**

《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1894年苏黎世版(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kongresses in der Tonhalle Zürich vom 6. bis 12. August 1893. Zürich 1894)。——696—698。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3年伦敦版第3卷《通报》(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Vol. III. General Report. London 1863)。——157, 165。

**Z**

《在贝尔法斯特的阿尔斯特大厅举行的工联第二十六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1893年9月4—9日》[1894年]曼彻斯特版(Report of the twenty-six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Held in the Ulster Hall, Belfast, on September 4, 5, 6, 7, 8 and 9, 1893. Manchester [1894])。——577。

《在格拉斯哥市政厅举行的工联第二十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92年9月5—10日》1892年曼彻斯特版(Report of the twenty-fif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held in the City Hall, Candleriggs, Glasgow, on September 5, 6, 7, 8, 9 and 10, 1892. Manchester 1892)。——411—412。

## 文学著作

### A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261、262。

《艾达》。——575。

### B

博马舍,皮·奥·卡·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35。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讽刺诗集》。——167、182、191、216、219。

### D

狄更斯,查·《小杜丽》。——188。

### F

法勒斯莱本,霍夫曼·冯·《德国人之歌》。——493。

### G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368。

### H

海涅《〈还乡曲〉补遗》。——450。

海涅《安心》。——495、563。

### K

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556。

**L**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550—551。

**M**

《马赛曲》。——341、443、698。

莫斯库斯《牧歌》。——581。

**P**

普希金,亚·谢·《叶甫盖尼·奥涅金》。——24。

**S**

莎士比亚《错中错》。——35。

**T**

《塔木德》。——571。

忒俄克里托斯《牧歌》。——581。

忒伦底乌斯《兄弟》。——119。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573。

**X**

《西维拉占语集》。——557。

席勒《信仰的话》。——174。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639。

圣经——203。

—《旧约全书·以斯拉记》。——557。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259、366。

- 
- 《旧约全书·摩西二经(出埃及记)》。——259。
  - 《旧约全书·摩西三经(利未记)》。——259。
  - 《旧约全书·摩西四经(民数记)》。——259。
  - 《旧约全书·摩西五经(申命记)》。——259。
  -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556、557、566、568—569。
  -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566。
  - 《旧约全书·以赛亚书》。——558、568、573。
  - 《新约全书》。——555—556。
  -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562、575。
  - 《新约全书·约翰一书》。——558。
  - 《新约全书·约翰二书》。——558。
  - 《新约全书·约翰三书》。——558。
  -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549、575。
  - 《新约全书·彼得前书》。——575。
  - 《新约全书·彼得后书》。——575。
  -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409、554、555、558、573、575。
  -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409、554、555、573、575。
  -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409、554、555、573、575。
  -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09、554、555、564、567、573、575。
  -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548、556—559、562、566、567、570、572。
- 
- 《巴录书》(次经)。——557。
  - 《以诺书》(伪经)。——557、566。
  - 《曾德—阿维斯陀》(波斯古经)。——573。

# 报 刊 索 引

## A

《奥地利工人历书》(Österreichischer Arbeiter Kalender)——奥地利的一家社会主义年鉴,1874—1930年在维也纳新城、维也纳和布吕恩出版。——648、658。

## B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 Organ für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r)——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105。

《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Berliner Volks-Tribüne. Social-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1887—1892年在柏林出版;接近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102、429。

##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121、123、125、126、134、148、151、152、189、193、196、209。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21、123、125、126、134、144—147、148、151、152、154、188、193、196、209、215、217—219。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124—126、148、151、220。

## D

-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419、424、647、652、694、696。
-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信徒的政治和哲学杂志,1841年7月2日至1843年1月初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负责编辑。——419。
-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保守派刊物,1888年4月—1900年9月在柏林出版。——221、222。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411、427。

## E

-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ія вѣдомост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434—438。

## F

-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国政府的官方报纸,主要刊登法律和法令;其前身是1869年1月1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帝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Empire française)。1870年9月帝

国灭亡后,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的名称出版;1871年3月20日—5月24日先后作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出版,但仅在3月30日的报纸上写有“巴黎公社正式机关报”字样,报纸主编是皮·韦济尼埃、沙·龙格,其成员有古·库尔贝、爱·瓦扬。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这个名称在凡尔赛出版。——232。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1854年在巴黎创刊,1866年改为日报。——679—685。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曾三度易名:《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从此主要刊登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但是该报刊登国际文件时常作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163。

##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538。

《改良报》(La Riforma)——意大利的一家日报,1867年起在佛罗伦萨出版。——584。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Zentralorga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1893年在维也纳出版,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19世纪50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583、617。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法国的社会主义年鉴,1892—1894年和1896年在里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329、342、672。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 Sozial-ökonomisches Volksblatt)——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年至1890年用这个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891年1月至1894年用《工人新闻》(Ar-

beiterpresse)的名称出版。——107。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33。

《公益。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The Commonweal,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alist League)——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318、399。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330、538。

## J

《今日》(To-Day)——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1883年4月—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1884年7月—1886年的编辑是亨·迈·海德门。——195、197、198、200、202、210、211、214。

## K

《科隆人民报》(Kölni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天主教报纸,1868年至1941年出版。——587。

## L

《莱茵报》——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起

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418、424。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1943年在柏林出版。——62。

《论坛报》(La Tribuna)——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83年起在罗马出版。——347。

《论坛报》——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M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123、125—126、148、151、220。

《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55年至1930年(从1877年起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306、307、662、687—693。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24—126、148、151、195、220。

《美国评论:辉格党关于政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期刊》(The American Review: A Whig journal of politics,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美国辉格党的月刊,1845—1852年在纽约出版,副标题曾作多次改动。——264。

《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俄国民意党在国外的机关报,1883—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由彼·拉·拉甫罗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主编,共出五期。——521。

《民族志学评论》(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俄国的一家季刊,1889—1916年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民族学部在莫斯科出版。——438。

## N

《那不勒斯信使报》(Il Corriere di Napoli)——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88年由《罗马信使报》和《晨邮报》合并而来。——448、449。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421—422、428。

## O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естникъ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ъ исторіи, полит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1866—1908年由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在圣彼得堡创办和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该杂志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521。

## P

《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季刊,1809—1967年在伦敦出版。——318、399。

##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约1917年在伦敦

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124—126、148、151、220。

《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Zentral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前身是1884年创办的《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该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414、463、489、532、587、614。

《前进报》——见《前进。柏林人民报》。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44年1月创刊,每周出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创办人和编辑之一为亨·伯恩施太因,副标题为《巴黎艺术、科学、戏剧、音乐和社交生活信号》(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 Wissenschaft, Theater, Musik und geselligem Leben),1844年7月1日卡·路·贝尔奈斯参加编辑部,同时副标题改为《巴黎德文杂志》;报纸最初为一家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批判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420、427。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 Central-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三次,同时出版学术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报纸以及它的学术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它的续刊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361。

## R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由埃·

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428。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其前身是《民主周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给编辑部提供帮助和指导，使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16、118—119、121、137、168、170、175、176、178—181、184—186、190、192、193、204、207、209、213、528。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90—1933年在马格德堡出版。——97、101。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年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424。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12月7日—1851年7月26日在伦敦出版，1852年2月7日—4月24日再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304。

## S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 Organ zur Wahrnehmung der Interessen der Arbeiter)——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90—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19世纪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81、84、102。

《闪电报》(L'Éclair. Journal de Paris, politique, quotidien, absolument

- indépendant)——法国的一家日报,1889—1939 在巴黎出版。——666—672。
-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1895—1898 年在巴黎出版。——575。
-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 Zentral-Wochenblat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4 年 1 月 25 日—1895 年 12 月 16 日在柏林出版;主编是马·席佩尔。——609。
-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 Тримѣсеченъ общественно-литературенъ сборникъ)——保加利亚的文学政治季刊,1892—1893 年间在塞夫利耶沃不定期出版,总共出版四期。——503、691。
-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 Demokrat)——捷克的一家报纸,于布拉格出版。——505。
- 《社会民主党人报。德语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Der Sozialdemokrat.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er Zunge)——一家德文周报,1879 年 9 月—1888 年 9 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 年 10 月—1890 年 9 月 27 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 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 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报纸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51、62、82、87—90、92、390、658。
- 《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1—1924 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 19 世纪 90 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347、349。
- 《社会主义党。革命中央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e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法国的一家周刊,布朗基派的机关报,1891 年—1895 在巴黎出版。——529。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 Organe central du Parti ouvrier)——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 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 年以前是工人党的机关报,后来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 世纪 80—90 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68。
-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 Organó del Partido Obrero)——西班牙的一家周

报,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86年3月12日起在马德里出版。——68。

《时代.时事、文学与艺术月刊》(Time. A Monthly Magazine of Current Topics, Literature and Art)——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5。

《世纪报》(Il Secolo. Gazzeta di Milano)——意大利的一家日报,1866年5月至1927年4月在米兰出版。——448、452。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杂志,由资产阶级激进派于1865年创办;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116、171、176、183、190。

##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19世纪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世纪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113、116—123、125—128、130、133、134、136、140、141、144—145、147—148、151、152、172、173、178、179、184—188、191—196、198、199、201—203、208—211、214、217、219、381。

## W

《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意大利的一家日报,1876年起在米兰出版。——451。

## X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

敦出版。——124—126、148、151、219。

《现代人》(Contemporarul)——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的一家文学、科学和政治杂志,由康·多布罗贾努-盖雷亚和若·纳杰日杰创办;1881年7月—1890年12月用这个名称在雅西出版,先是每月出两次,后改为月刊;该杂志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些片断。——259、691。

《现代生活自由论坛》(Freie Bühne für modernes Leben)——德国的一家文学杂志,1890—1893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开始是周刊,1892年起为月刊。——98、101。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1871年创刊,在柏林出版至1876年。——113、115—117、122、131、133、137、138、140、142、144、168、170、172、175、176、179、180、183—186、189—192、196、200—202、207—210、213、214。

《新纪元》(《L'Ère nouvelle》)——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3—1894年在巴黎出版;茹·盖得、让·饶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该杂志撰稿。——597。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约·亨·毕尔格尔斯等。报纸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88、246、420、427、618、648、652、655。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1848—1849)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1850年11月,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加上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421、427、622、648、655。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19世纪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批评、告诫,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办刊方向。——221、258、266、280、299、363、399、414—416、485、588、633、635、636、638、640、648、649、652—658。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由米·埃蒂耶纳和麦·弗里德兰德创办,1864—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700—702。

## Y

《1892年工人党年鉴》——见《工人党年鉴》。

《议会报》(Il Parlamento)——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451。

## Z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918年;自1885年起是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自1893年起是自由人民党的机关报,自1910年起是进步人民党的机关报;由欧根·李希特尔创办并发行。——479。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周刊)。1855—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曾发表过马克思的一些文章。——428。

《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183。

《钟声》(Колокол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

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66。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я Записки. Учен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该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521—522。

## 地名索引

## A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 31。  
 阿尔卑斯山脉(区) 230、245、584。  
 阿尔及利亚 490。  
 阿尔科伊 509。  
 阿尔萨斯 56、227。  
 阿尔萨斯—洛林 41、42、46、55、336、  
 338、465、492、629、671、691。  
 阿非利加(洲)——见非洲。  
 阿富汗 43。  
 阿根廷 410。  
 阿卡迪亚 573。  
 阿穆尔边区 437。  
 埃尔伯费尔德 246、647、648。  
 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68、578。  
 埃及 29—32、556、557。  
 埃劳(埃格尔) 23。  
 埃奇河(阿迪杰河) 493。  
 爱尔福特 23、665。  
 爱尔兰 319、323、399、401、404、511、  
 591、596、673、692。  
 爱琴海 48、503、571。  
 安达卢西亚 510、591。  
 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 14。

奥布(图尔库) 23。  
 奥地利 13、14、16、18—22、25、27、  
 31、33—36、38、39、41、42、44、46、  
 47、60、74、80、230、296、297、304、  
 336、387、439、454、459、466、469、  
 477、491、492、498、501、541、604、  
 617、626、628、637、648、658、680、  
 686、690、707。  
 奥尔绍瓦 35。  
 奥克斯斯河(阿姆河) 8、43。  
 奥斯特利茨 22、23。  
 奥滕森 689。  
 奥匈帝国 奥地利和匈牙利 106。  
 澳大利亚 澳洲 215、266、275、290、  
 313、393、700。

## B

巴比伦 568、569。  
 巴登 82、246、648。  
 巴登—普法尔茨 648。  
 巴尔干半岛 10、11、34、44、343、486。  
 巴尔干山脉 31、41。  
 巴尔米拉(泰德穆尔) 571。  
 巴伐利亚(拜恩) 14、18、57、289、  
 593、680、681。

- 巴勒斯坦 550、555。  
巴黎 19、25、30、38、42、60、68、71、73、74、76、206、227、228、230—237、239—242、270、299、307、329、330、339、342、355、356、367、378、379、411、419—421、423、424、427、430、441、442、451、456、477、486、490、494、529、540、549、557、561、572、579、591、597、623—625、627—629、633—635、638、647、652、666、667、673、675、677、678、694、697、703。  
巴伦西亚 509、510。  
巴门 647、652。  
巴拿马(运河) 441、444、445、447、449、450—452。  
巴纳特 44。  
巴涅尔-德吕雄 307。  
巴塞尔 427。  
巴塞罗那 94。  
巴斯克地区 509。  
巴特西 661。  
白俄罗斯 11、19。  
保加利亚 35、41、503、591、637、691。  
北角 390。  
北美洲 北美 61、66、435、592、598。  
北石勒苏益格 337、492。  
贝尔法斯特 577。  
贝尔特海峡 11。  
贝尔维尔 227、234。  
贝内文托 256、259。  
比利牛斯山脉 307。  
比利时 14、71、92、93、323、403、420、501、561、585、592、593、637、681、706。  
比萨拉比亚 25、26、41、44。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宾夕法尼亚 316、397。  
滨河路 578。  
波恩 418。  
波尔多 300。  
波尔特巷 163。  
波河 655。  
波兰 11—13、16—21、23—26、32—35、39、45、48、56、94、99、313、339、340、351、382、393、441、442、459、483、626、628、707。  
波罗的海(东海) 7、20、23、493、524。  
波士顿 414、421、427、657。  
波斯 13、43、548、558、573。  
波斯尼亚 41。  
波希米亚 498、548。  
伯罗奔尼撒半岛(摩里亚半岛) 573。  
伯明翰 158、323、404。  
柏林 32、34、42、49—51、98、101、102、105、113—115、137、140、170、189、207、212—215、222、238、241、299、313、334、358、393、418、419、422、427—429、456、463、479、495、505、511、563、570、587、609、614、624、633—635、647、648、655—657、666、675、683、687、688、703。  
博斯普鲁斯海峡 11、24、32、41、43、47、49。

不来梅 214、647、652、688。  
 不伦瑞克 424、432。  
 布达佩斯 107。  
 布格河 18。  
 布哈拉汗国 43。  
 布加勒斯特 25。  
 布拉德福德 381。  
 布拉格 492、498、505。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194、210。  
 布列塔尼地区 421。  
 布卢姆斯伯里 63。  
 布鲁塞尔 95、246、298、411、420、  
 421、427、647、652、657、673、675、  
 697。  
 布吕恩(布尔诺) 304、648、658。

### C

查尔朱 43。

### D

达达尼尔海峡 41、49。  
 达姆施塔特 388、390、391。  
 大不列颠(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  
 6、14、16、19、20、23、24、31、33—36、  
 38、39、41—44、60—62、68、71、72、  
 74、76、77、79、80、90、92、94、95、99、  
 100、106、113、115、116、129—131、  
 136、142、147、154—158、160、162、  
 164—169、172、173、175、176、178、  
 179、184—186、192—194、199、203、  
 204、206、208、210、213—216、258、  
 259、265、267、269、270、288—290、

298、301、302、306、312、313、315—  
 321、323—325、338、345、362、363、  
 365—367、370、373—385、388、  
 390—401、403—409、411—417、  
 422、423、428、430、466、486、489、  
 493—496、501、507、515、518、524、  
 577、591、602、618、623、625、627、  
 648、655、658—660、662、671、673、  
 675、677、682、687—689、692、697、  
 701、702。

大俄罗斯 11、12、19、518。

大格尔申街 505。

大西洋 312、682。

丹麦 34、39、43、89、94、96、339、492、  
 607、637。

德国 德意志 12—14、18、20—22、  
 28、34、39—42、44、46、47、50—58、  
 60、71、72、80、81、84、85、87—90、  
 97—101、103、105、106、110、116、  
 133、140、157、170、171、174、177、  
 180、181、184—186、189、194、196、  
 207、210、214、221—222、225—227、  
 230、235、238、256、258、283、287—  
 291、293、295、297、299、300、302、  
 312、316、317、320、321、323、329—  
 334、336—342、347—349、352、355、  
 358—362、364、366、367、372—  
 374、378、379、381、383—386、388—  
 393、396、397、401、403、412、413、  
 415—417、419、420、423、424、427、  
 444、446、454、456、459、465—470、  
 473、477—480、482、485—487、

490—496、498、499、501、506、511、  
525、528、530、548、549、554、556、  
561、563、569、579、580、584—587、  
589—593、600、601、604、612、613、  
629、630、636、638、647、648、652、  
655—657、665—667、670—672、  
675、679—684、690—692、694—  
697、701、704、707。

德累斯顿 81、84、246、633、688。

德涅斯特河 18。

德维纳河(道加瓦河) 8、24、482。

地中海 456。

第聂伯河 8、24、482。

蒂宾根 573、575。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23、24、339、  
466。

东鲁米利亚 41。

东欧 62、528、543、627。

东普鲁士 16。

东中央区 68。

顿河 8。

多瑙河 8、32、35、41。

多瑙河两公国 30—35。

## E

俄国 俄罗斯 3—27、29—50、55、  
60、66、67、94、99、106、227、299、  
323、336—340、342—346、351、  
353、404、424、428、436—438、441、  
442、456、459、465、466、477、480、  
487、493、494、503、511—527、529—  
531、591、613、624、626、637、655、

656、667—672、681、682、690、691。

## F

法国 法兰西 6、8、12、14、16、18—  
22、25、27—36、38—44、46—50、  
55、60、71、72、74、76、94、95、99、  
100、106、226—236、240—242、  
288—290、293、297、300、307、308、  
316、317、319、323、329、330、336—  
342、345、355、361、365、366、373、  
374、376—381、384、386、396、398、  
399、401、403、412、419—421、423、  
424、428、430、441—444、449、450、  
454、456、465、466、468、472、477—  
479、482、486、489—494、499、501、  
512、515、524、529、538、540、549、  
561、579、580、585、587—601、604—  
606、610、618、621—624、626、628—  
631、635、636、647、660、666、667、  
669—673、679、681、682、684、690、  
691、694—696。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365、419、427、  
466、587、655。

凡尔赛 231—235、240、355。

梵蒂冈 450、452。

非拉铁非(阿拉谢希尔) 559、561、  
566。

非洲(阿非利加洲) 266、548、564。

腓特烈港(哈密纳) 20。

费城 393。

芬兰 20、23、25。

芬兰湾 351。

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省 351、524。  
 弗里德兰(普拉夫金斯克) 23。  
 弗利特街 68、163。  
 佛兰德 493。  
 伏尔加河 8。  
 符腾堡 289。

## G

刚果河 323、404。  
 高加索山脉(地区) 8、10、33、671。  
 高卢 571、640。  
 哥本哈根 68、256、259、607。  
 哥达 224。  
 格伯斯多夫(索科武夫斯科) 98。  
 格奥克泰佩 43。  
 格拉纳达 509。  
 格拉斯哥 390、408、411、412、673。  
 格吕克斯堡 34。  
 格罗夫纳广场 661。

## H

哈雷 141、214、224。  
 哈利斯河(克孜勒河) 58。  
 海德堡 388。  
 海德公园 63、76、77、662、663。  
 海德公园角 661。  
 海恩费尔德 296。  
 海牙 93、225、256、298、423、432、  
 677。  
 汉堡 33、82、110、313、393、421、422、  
 427、428、432、622、623、655、656、  
 692。

汉诺威 56、511、639。  
 浩罕 43。  
 荷尔斯泰因 551。  
 荷兰 89、302、373、416、486、493、  
 704。  
 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 550。  
 赫希斯特 390。  
 黑海 8、11、20、43、48、351、503。  
 黑森 639。  
 黑山 41。  
 华盛顿 266、271。  
 华沙 33—35。  
 滑铁卢 636。  
 霍德梅泽瓦沙海伊 544。  
 霍廷根 246。

## J

基斯诺斯(塞尔米亚)岛 574。  
 吉森 388。  
 加的斯 509、510。  
 加利福尼亚 72、313、393、700。  
 加利利 555。  
 加拿大 290。  
 加特契纳 67。  
 剑桥 113、155、195、200、201、209、  
 211、214。  
 捷克 305、498、505、699、707。  
 君士坦丁堡 6、10、20、23、24、27、31、  
 32、35、41、42、44、47、49、68、343、  
 377。

## K

卡缅涅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482。  
 卡诺萨 57。  
 卡斯蒂利亚(地区) 100。  
 卡塔赫纳 509、510。  
 凯比尔堡 662。  
 康奈尔斯维尔 316、397。  
 喀尔巴阡山脉 48。  
 喀琅施塔得 342、667。  
 喀土穆 548。  
 科尔多瓦 509。  
 科夫诺(考纳斯)省 482。  
 科隆 71、418—421、424、427、489、  
 506、648、652、655、657、683。  
 科西嘉岛 22。  
 克拉科夫 35。  
 克拉肯韦尔-格林 661。  
 克莱尔沃 233。  
 克里木 18、32、35、36、42、43、343、  
 422、520、524、667。  
 克里特岛 44、45。  
 克罗伊茨纳赫 419。  
 库普弗格拉本 472。  
 库页岛 434、435、437、438。

## L

莱巴赫(卢布尔雅那) 29。  
 莱比锡 25、164、196、361、431、647、  
 648、655。  
 莱顿 557。  
 莱茵河 莱茵省 莱茵地区 21、22、  
 29、31、56、58、61、230、338、339、  
 418、419、424、474、570、594、596、  
 655、704。  
 兰开夏郡 313、367、393、415。  
 朗-爱克街 163、212。  
 里尔 307、342、361。  
 里海 43。  
 立陶宛(公国) 11、12。  
 利物浦 92。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吕贝克 688、689。  
 吕内维尔 21。  
 伦敦 29、30、33、50、62、63、67、68、  
 73—76、78、82、86、104—107、109、  
 110、116、121、123—125、130、148、  
 152、156—159、163、165—167、  
 170—178、181—185、187、189—  
 191、197、212、213、215、216、219、  
 225、239、240、242、245、255、257、  
 260、266、270、271、296、298、304、  
 307、309、311、315、318、322、324—  
 326、352、355、357、366、377、381、  
 383、386、387、389—392、396、399、  
 403、404、406—408、421、422、427—  
 429、431—433、439、460、464、498、  
 502、503、507、508、531、540、541、  
 543、579、586、588、598、602、616、  
 617、621、641、642、647、648、652、  
 655、651—659、662、664、665、673、  
 686、701、706。  
 罗马 12、268、371、372、444—449、  
 451、452、547、555—558、562—  
 571、575、576、581、584、585、591、  
 640、641。

罗马尼亚 41、637、691。

罗切斯特 271。

洛林 227。

洛桑 552。

## M

马德里 68、256、427、499、577、578。

马恩河 342。

马格德堡 97、101。

马拉加 509。

马其顿 558。

马赛 412、595、673。

迈尔-恩德 661。

迈纳(马尼) 573。

曼彻斯特 79、313、323、388、390、  
393、404、647、648、652。

梅尔夫(马雷) 43。

梅克伦堡 593、637。

梅梅尔河 493。

梅斯 233。

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合众国 19、  
31、60、62、66 — 68、80、159、173、  
185、237、264、266、269、270、288 —  
290、312、313、316、318、323、380 —  
382、392、394、396 — 398、404、410、  
414 — 416、422、424、487、564、572、  
658、697。

美尼尔芒坦 234。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见法兰克福  
(美因河畔)。

美洲 16、71、73、77、244、266、268、  
275、337、373、377、390、423、435、

493、528、638、696。

蒙马特尔高地 356。

米德尔斯伯勒 407。

米哈伊洛夫斯科耶 43。

米兰 244、347、349、448、451、456、  
624。

摩尔多瓦 23、34。

摩里亚半岛——见伯罗奔尼撒半岛。

摩洛哥 662。

摩泽尔河 418、419、424、516。

莫斯科 莫斯科省 10、25、350、434、  
435、440、524。

穆尔西亚 509、510。

穆兰-萨凯多面堡 233。

## N

拿骚 639。

那不勒斯 444、448、449。

纳瓦里诺 31。

南俄草原 36。

南美洲 南美 275、381、592。

南特 591、597、598、606、609。

讷伊(塞纳河畔) 233。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437。

尼科美底亚 641。

尼斯 655。

尼西亚(伊兹尼克) 558、560。

牛津 158。

纽约 270、271、312、392、421、423、  
427、655、658。

挪威 20、23、25、98—101、390。

**O**

欧洲 5、6、8—11、13、14、16—20、  
22、25、27、29—35、37、40—50、53、  
55、66、67、71、73、77、99、106、183、  
227、244、271、290、298、299、302、  
313、330、336—342、345、346、351、  
352、355、371、372、380、386、393、  
409、411、412、420—423、427、432、  
456、459、461、463、465、474、484、  
486、493、494、501、517、521—523、  
525、528、537、552、592、613、618、  
622—624、626—629、638、667、  
668、671、680、682、690、691、694—  
696、703。

**P**

帕加马 561、562。  
帕里 550、551。  
帕特莫斯岛 571。  
葡萄牙 94、413、648。  
普法尔茨 246、648。  
普列夫纳(普列文) 44、682。  
普鲁士 8、13、14、16—19、21—23、  
25、27、31—35、39、40、42、56、57、  
60、88、189、226、227、230、231、233、  
234、287、289、290、334、337、339、  
344、356、418、420、421、442、465、  
466、469、470、472、474、475、478、  
483、488、490、522、591、593、612、  
613、628、629、640、655、657、680、  
681。

普鲁特河 8、31、35。

**Q**

齐斯莱塔尼亚 44。  
桥街 661。

**R**

日耳曼尼亚 267、444。  
日内瓦 66、68、73、256、270、429—  
432、515、521、551。  
瑞典 10、12、13、20、23、25、589。  
瑞琴特公园路 109、308、309、311、  
433、439、503、507、577、616、642、  
687。  
瑞士 89、93、246、290、302、390、429、  
449、464、493、551、585、630、637、  
691、704。  
汝拉(侏罗)省 429—431。

**S**

撒马尔罕 43。  
萨克森 81、84、102、234、345、641。  
萨克森林地 623。  
萨莫萨塔(萨姆萨特) 549。  
萨瓦 655。  
塞尔维亚 41。  
塞纳河 233、342。  
塞瓦斯托波尔 36。  
塞维利亚 35、509。  
桑威奇群岛——见夏威夷群岛。  
色当 230、233、336、468、691。  
沙皇格勒——见君士坦丁堡。

绍斯波特 323、324、404。  
 设菲尔德 428。  
 圣彼得堡 10、16、20、43、299、441、  
 442、515、521。  
 圣斯特凡诺 41。  
 圣文德尔 650。  
 施皮歇恩 468。  
 石勒苏益格 338、339。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34、39、593。  
 士麦那(伊兹密尔) 559、561。  
 斯巴达 585。  
 斯德哥尔摩 23、362。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98。  
 斯塔福德郡 323、404。  
 斯特拉斯堡 194、210。  
 斯图加特 15、260、269、413、414、  
 427、521、573、648、656、689。  
 斯旺西 72。  
 松德海峡 11、43、44。  
 苏格兰 157、267、302、373、511、518。  
 苏莱曼山脉 43。  
 苏黎世 246、361、390、411、412、421、  
 427、475、648、655—658、673、675、  
 676、694、696—698、703。  
 索尔福德 408。

## T

塔甘罗格 30。  
 塔什干 43。  
 太平洋 435。  
 泰申 18。  
 泰晤士河 661。

特拉法加广场 75。  
 特兰西瓦尼亚 44。  
 特里尔 418、650。  
 特罗保(奥帕瓦) 29。  
 特洛伊 261。  
 突厥斯坦 43。  
 图林根 289。  
 土耳其 6、10、13、18、20、23、25、27、  
 28、30—32、35、41、48、62、682。  
 推雅推喇(阿克希萨尔) 561。  
 托登楠法院路 430。  
 托登楠街 309。  
 托斯卡纳 444、448。

## W

瓦格拉姆 636。  
 瓦拉几亚 23、34。  
 旺多姆广场 231。  
 旺沃堡 233。  
 威尔柏克街 171、176、213。  
 威尔士 159。  
 威廉堡 230。  
 威斯特伐利亚 12、18、56。  
 维登 88。  
 维多利亚街 661。  
 维罗纳 29。  
 维斯图拉河——见维斯瓦河。  
 维斯瓦河(魏克瑟尔河,维斯图拉河)  
 8、338、482。  
 维也纳 12、25、33、49、60、62、74、  
 439、498、505、624、633、700—703。  
 魏克瑟尔河——见维斯瓦河。

沃尔特 468。

沃州 552。

乌拉尔 515。

伍利奇 661。

### X

西班牙 28、29、62、71、94、242、293、  
307、411—413、432、499、509、510、  
528、548、561、571、577、578、585、  
630、633、648、655。

西带区 171、176。

西北区(伦敦) 109、308、309、503、  
507、577、616、642。

西伯利亚 72、512、700。

西里西亚 657。

西欧 5、17、20、27、33、42、49、50、67、  
73、242、343、371、486、503、512—  
519、522、523、527、534、591、594、  
596、598。

西区 661。

西西里岛 西西里 444、564、581、  
591。

西藏 259。

希腊 10—12、28—31、262、268、  
371、550、555、557、558、565、575、  
576。

希腊半岛 568。

希瓦汗国 43。

下萨克森 593。

夏威夷群岛 266、436。

香槟 466、489。

小俄罗斯 11、19。

小亚细亚 11、550、557、558、564、  
571、572。

新拉纳克 518。

兴都库什山脉 43。

匈牙利 34、35、39、107、108、246、  
321、352、379、401、440、459、543、  
544、626。

叙利亚 550、557。

### Y

雅典 521、585。

雅西 259。

亚琛 29。

亚德里亚海 11。

亚该亚 571。

亚历山大里亚 555。

亚美尼亚 41、44、45、550。

亚速海 18、351。

亚细亚 551、558、571、640。

亚洲 11、32、266、343、503。

药杀水(锡尔河) 8、43。

耶路撒冷 555、559。

耶拿 13、23、393、490。

伊瑟隆 246。

伊斯特本 582。

伊西堡 233。

以弗所 561、562。

以色列 560、568。

议会广场 661。

易北河 56、488、489、591、593、612、  
613。

意大利 28、29、39、46、47、71、173、

- 244、245、289、321、336、347、349、  
352、379、401、413、422、428、432、  
444、448、450、456、459、460、466、  
477、491、492、499、528、534、537、  
539、561、564、579、580、584 — 586、  
637、648、667。
- 银镇 75。
- 印度 16、43、45、259、263、313、343、  
373、393、410、416、422、435、511、  
518、519、592。
- 英格兰 157、159、160、316、397。
- 英国——见大不列颠。
- 英属印度 343。
- 犹地亚地区 555。
- 幼发拉底河 571。
- Z**
- 泽姆林(泽蒙) 35。
- 芝加哥 411。
- 中国 313、381、394、416、484、564。
- 中欧 503、682。
- 中维柳伊斯克 515。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王学东 李朝晖 李其庆 周思成 王宏道  
鲁 路 金 建 张凤凤 胡晓琛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李 楠 曹浩瀚 章 林 张贤佳 朱 羿  
高 杉 李园园 李莉娜 吴海涛 姚 颖  
姜 颖 林芳芳 罗 炯

全卷译文由王学东 李朝晖审定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汪莹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吕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01-022785-6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45942 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 第二十九卷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20 年 12 月第 2 版 202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31.75 插页:1  
字数:82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22785-6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7-01-022785-6



9 787010 227856 >